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IN
THE MODERN NOVEL

乡村 与 城市

[英] 雷蒙·威廉斯 著

韩子满 刘戈 徐珊珊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IN THE MODEL

Raymond Williams

乡村
与
城市

[英] 雷蒙·威廉斯 著

韩子满 刘戈 徐珊珊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与城市 / (英) 威廉斯著; 韩子满, 刘戈,
徐珊珊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09842-7

I. ①乡… II. ①威… ②韩… ③刘… ④徐…
III. ①农村社会学—研究—英国②城市社会学—研
究—英国 IV. ① C912.82 ② 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249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乡村与城市

〔英〕雷蒙·威廉斯 著
韩子满 刘戈 徐珊珊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09842-7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960×1300 1/32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4.375

定价: 58.00 元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IN THE MODERN NOVEL

by RAYMOND WILLIAMS

Copyright © 1973 BY RAYMOND WILLIAM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献给我的祖父母
他们是乡村工人

※

詹姆斯·伯德

玛丽·安·刘易斯

约瑟夫·威廉斯

玛格丽特·威廉斯

译序

文学中的乡村与城市综论

雷蒙·威廉斯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之一。他最早对利维斯的精英文化批评思想提出挑战,把研究的视角转向大众文化和文学,建立了以“文化唯物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开辟了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学术影响可谓深远。他一生著述甚丰,一直以来国内学界对他的介绍和研究大多围绕他的《文化与社会 1780—1950》(1958)、《漫长的革命》(1961)、《关键词》(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等著述,而对另一部重要作品《乡村与城市》(1973)则谈论不多。事实上,《乡村与城市》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是他结合自己的出身经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英国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做出的深刻解读,对我们理解他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甚至对我们把握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顾名思义,《乡村与城市》主要围绕“乡村”和“城市”这两种基本的人类居住方式展开论述。全书共25章。第1章具有前言的性质,概括了历史上人们围绕“乡村”和“城市”所形成的各种观念,指出英国经验对于研究“乡村”和“城市”关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第25章为全书的总结。主体部分23章以英国文学中根深蒂固的乡村怀旧为起点,回顾了16至20世纪多部英国文学作品(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随笔等)中对于“乡村”和“城市”的描写以及有关“乡村”和“城市”观点的发展变化,并将之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发展过程联系起来,揭示出“乡村”和“城市”对立的实质及其所反映的现代大都

市和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危机。

其中,第2章“视角问题”、第3章“田园与反田园”、第4章“黄金时代”、第5章“城镇和乡村”和第6章“他们的命运他们的选择”聚焦16、17世纪的英国社会现实,分析这一时期农业资本主义秩序的建立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及其在田园诗歌和喜剧中的反映;第7章“改良的道德”、第8章“自然之线”、第9章“生为耕田命”、第10章“圈地、公地和社群”、第11章“法恩汉附近的三个作家”、第12章“喜人的景色”和第13章“绿色的语言”主要针对18世纪的英国社会。此时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已经建立,并演化出新的道德价值观念,人们开始积极思索新的制度及其产生的社会后果。小说就是基于这种兴趣而产生的具有创造性的文学形式,诗歌语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第14章“城市中的变化”和第15章“城市中的人们”主要探讨在新的经济秩序下,城市的快速发展及其所引发的诸多问题。该部分引用了布莱克的诗作和狄更斯的小说,揭示出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城市生活的特质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精神面貌;第16章“可知的社群”、第17章“被遮蔽的乡村”和第18章“威塞克斯和边境区”主要分析了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杰弗里斯、哈代等小说家的作品,通过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勾勒出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在工业和城市发展的阴影下被遮蔽的英格兰乡村的真实图景;第19章“黑暗之城与光明之城”和第20章“城市中的身影”针对艾略特、伍尔夫和乔伊斯等人笔下的城市形象,分析20世纪现代城市中人们的精神荒原;第21章“生存着的乡村人”和第22章“又见边界区”则聚焦20世纪初的乡土小说和劳伦斯的小说,分析在机械文明的压力下,作家们再次转向乡村寻找精神救赎的努力;第23章“城市和未来”剖析了莫里斯、威尔斯和赫胥黎等人的科幻小说和乌托邦小说及其所反映的人们对工业文明的悲观展望;第24章“新都市”则主要回顾英帝国的殖民历史和多部殖民文学,指出“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和延伸。

全书内容丰富,初读之下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但细究起来,书中仍有一条论述的主线,那就是批驳了“消逝的农村经济”这一在英国社会及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变革之后,英国传统的农村社会已经消失,农业经济也已边缘化,其重要性在不断降低,而

且这种现象在世界所有地方都将如此。威廉斯首先批驳了这一错误观点的一个主要历史来源,即怀旧的田园主义传统。这种传统把过去的乡村英国理想化,冠之以“旧英格兰”、“快乐的英格兰”、“有机社会”、“黄金时代”等诸多美称,认为乡村作为一种自然的和道德的生活方式遭到了近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破坏而一去不复返,实在令人叹惋。

威廉斯通过一系列的事实和深刻的分析证明,并不存在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苦难的过去时光,所谓的“旧英格兰”不过是刻意编织出来的意识形态神话,是对真实历史做出的误导性的回应,文学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首先对田园诗歌进行了反思(第3章),指出田园诗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对封建秩序的一种选择性的美化过程。田园诗歌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古典时期的田园诗已经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一类理想化的语气和意象,但它们还是保存了与真实的乡村经验和社会条件之间的张力:既歌颂田园生活的乐趣,也反映农事劳作的艰辛;既赞美乡村社群的淳朴和良善,也谴责战乱和腐败给农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然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新田园诗中,却出现了对这些古典模式的一种重大改动。农业劳作的艰苦和乡村社会中的黑暗现实遭到了摈弃,诗歌中的生活张力被一步步删除,只留下精心挑选的精致意象,宛如一个涂了釉彩的虚幻世界。这一做法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在17、18世纪英国新古典主义作家的笔下,田园诗最终变成了一种脱离现实生活土壤、极其造作和抽象的文学形式。

不仅如此,在这类“人造”田园诗中,还出现了有关乡村理想的一个新的比喻:乡村因其静谧、纯真和富足而成了逃避俗世喧嚣(以城市为代表)的隐退之地。这就导致了乡村和城市(以及宫廷)之间的二元对立:这边是自然,那边是俗世。逃离腐败的城市后,最理想的落脚点就是某一处丰饶而富足的田产,在那里过上丰衣足食、快乐无忧的生活。威廉斯列举了17世纪许多新田园诗人的作品来对此进行阐释,还特别提到了一类赞颂乡绅地主的乡间宅邸(country house)的诗作。在这些诗中,乡绅的生活(以其乡村中的宏伟宅邸为象征)被作为腐败的宫廷和城市生活的对比物而受到赞美。不仅如此,乡村社会和阶级秩序还被视为一种更为广泛的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万物皆安

于自己的位置,鸟类和牲畜甚至自愿把自己贡献给乡绅的餐桌。乡绅们也乐善好施,允许村里的穷人和自己共享盛宴。这是一种诙谐、轻快的描述,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充满人道精神的、和谐的农业文明秩序。

威廉斯指出,如果我们把这些诗歌同它们创作的背景联系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它们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写作这些诗歌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农业秩序被成功开创出来的年代,因此这些诗歌的矛头针对的其实是资本主义制度。对地主阶级的责任感和慈善心的强调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形成了对比,后者把所有社会关系功利性地缩减为赤裸裸的金钱秩序。乡村景象越和谐、温馨,所激发的失落感也就越强烈。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诗作中展现的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对封建秩序下所谓的自然经济的一种神秘化、理想化的描述,是对地主阶级和封建时代价值观念的辩护,因此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并不存在什么“自然的”和“道德的”经济,那个前资本主义世界本质上既不道德,也不自然。在最简单的技术含义上,并不存在完全不受市场经济影响的所谓的“自然”农业,所谓“和谐的自然秩序”之所以可以建立,其基础是对“乡村劳作和这种劳作通过其得以组织起来的那些财产关系的掩藏”(第5章)。新田园诗所凸显的其实是一种消费慈善,也即作为一种消费共同体表达出来的人们之间的亲爱关系。似乎所有在劳动上的不慈善,都能够通过后继的宴席的慈善而得到救赎,因而真正的生产劳作和生产关系被合法地阻挡于视线之外。读者看不到宅邸之外那些饲养动物和种植果蔬的乡村劳动者的生存状况,他们的工作全都由一种神奇的自然秩序来替他们完成,而当他们最终真正出现时,只是作为被施舍的对象在老爷们的宴席上分一杯羹,似乎是地主在养活他们一样。这一切是那么顺理成章,以致在这个传统所产生的情感和指涉体系中,上帝和地主的形象发生了重叠,都被称作“Lord”。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刻意的美化和神化。更关键的是,实行这种农业的社会制度并不比后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仁慈。威廉斯回顾了封建社会的压迫历史,指出那个时代不仅常出现战争和匪患,即便在和平时期,施行的也是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人和土地一样都是财产;多数人都沦为劳作动物,被强制进贡、强制劳动或被如牲畜般买卖。当然,下层人也受到“保护”,不过只是作为贵族地主的财产,以便他们能够付出更多的劳力,生产

更多的食物,这是一种相当彻底的身体和经济控制。

其次,这一“自然经济”和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截然不同,毫不相干,两者有着非常暧昧的承继关系。确切地说,后者是在前者之中孕育产生的。人们通常把黑死病的爆发视为英国封建秩序衰落的开始,认为瘟疫减轻了不断增长的人口给过度耕作的土地带来的压力,导致地主和佃农及劳工之间的社会关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但事实是,瘟疫不过是外因,不管有没有瘟疫,在封建秩序内部已经存在某些力量,这些力量无论如何都会导致变化的发生。在封建时代晚期,地主阶级本身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广泛涉足各类商业活动,依靠租金和资本投资的利润生活,逐渐演变成新式的资本家地主。他们的商业行为导致了大范围的圈地运动,征收苛刻的地租和圈占土地的过程巩固了他们对土地的控制。许多村庄被摧毁,传统的定居方式被改变。流离失所的农业人口涌向城市,变成工业无产阶级,城市逐渐发展出新的、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及概念。到了复辟时期,一个代表新式资本家地主的政府掌握了政权,明确标志着新秩序的建立。因此整体看来,这一阶段的历史并不是封建秩序衰落的故事,而是地主阶层残酷地蓬勃发展的故事。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种形式的统治代替另一种形式的统治:神秘化的封建秩序被另一种神秘化的农业资本主义秩序所取代,后者通过头衔和权威象征,通过对某种‘自然秩序’连续不断的建构来继续迷惑和控制民众,从而与前者保持了足够的连贯性”(第4章)。

再者,所谓“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对立也不过是表面现象。城镇既是乡村的映象,又是乡村的代理者,它们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多数城镇都是作为农业秩序本身的一个方面发展起来的:在简单的层面上作为市场,而在更高的层面上作为金融、行政管理和二次生产的中心。因此出现了各种相互作用和张力,有些城镇还发展出了一定程度的自治。但在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16和17世纪,社会的有效根基仍然是土地财产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生产,城镇与此主导秩序有功能上的联系。乡村中进行的对人和自然的剥削,在城市里被集中变成了利润。但同时,其他一些剥削形式带来的收益——商人、律师、宫廷宠臣积累的财富——又渗入进了乡村,进一步加强了农业剥削的力度。如果城镇里的景象令人反感的话,那不过是因为城镇使人们真正靠之生

活的那些决定性关系变得明显罢了,而补救的方法也从来就不是去为乡绅的纯真高唱赞歌,而是改变社会关系和核心价值观念,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正是在这个时刻,“城镇和乡村”的谎言发挥了作用:宣扬表面上的对比,掩盖真正的对立。因此,威廉斯认为,虽然田园主义怀旧反对资本主义的金钱秩序,承载了一定的人道主义情感,但又将这些情感附着于一个理想化的前资本主义的美好世界,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和误读。

在否定了田园主义怀旧传统之后,威廉斯对“消逝的农村经济”这种思想的另一主要来源,即城市进步主义观念进行了批驳。城市进步主义很像是田园主义怀旧的相反一极。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并不缅怀过去,他们虽然也谴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厂和城镇的悲惨生活,但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的高生产率,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市化和现代化的进步一面表示肯定。他们对乡村社会的蔑视同他们对城市的工业化未来的信心一样强烈,因此相信农村经济的消亡是历史之必然。在威廉斯看来,城市进步主义同田园主义一样荒谬。如果说后者错在认不清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模式是乡村和城市大部分历史的基本过程的话,那么前者的错误则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它正在将人类引往的可怕危机视而不见。

威廉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点并非是对机器或改良技术的使用,而是拥有这些机器和技术的是少数人。资本主义一直都是种自相矛盾的进程,增加真正的财富,却又不均匀地进行分配。在技术改良与此进程的社会后果之间一直存在着惊人的反差,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乡村贫民和城市无产者所承受的苦难就是证明,18世纪的反田园诗歌以及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也真切地记录了这一现实。即便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管理和规划的经济体系也是服务于掌握土地和生产方式所有权的少数人。工业采矿、公路体系、房屋拆迁,乃至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一种情况不是从一开始就被嵌进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各种优先权。一切决定均由少数派做出,他们控制着资本,并通过利润计算决定这些资本的使用。

此外,资本主义使更多的人能够生存下来,但又把人仅仅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除了这些抽象的功能外,对社会没有实质性的权利,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是一个导致异化、分隔、外部化和抽象化的社会过程。它赋予城市

和工业以绝对优先权,其代价就是破坏了人类社群所珍视的那些有关坦率、联系、亲密和分享的经历。19世纪以来众多作家笔下有关城市生活的诸多黑暗意象已经揭示出不断加深的现代大都市和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危机,激起了人们对城市和工业的境况和未来的忧惧。而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对比不过是人们对此历史进程的一种反应。

更重要的是,对大都市工业化的过分信心还导致了农业的边缘化。劳作农业是人类最中心、最迫切、最必要的活动之一,人类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发展并扩展劳作农业,未来土地上的工作只会变得更加重要、更加中心化,而不是相反。资本主义赋予城市和工业以绝对优先权,以致农业和乡村只可能与过去或遥远的地方联系起来,成为文学怀旧的对象,这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一个惊人的畸变。而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其终极形式——帝国主义时,它甚至改变了世界。英国经验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英国的乡村和城市间发生的事情一直扩展到其殖民地和整个国际体系当中。19世纪时仅限于英国内部的城市和乡村的职能划分如今已扩展到了全球:西欧和北美社会是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的中心,同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那些被视为“欠发达”的其他社会,那些社会仍以农业为主,或处于“欠工业化”的状态。“大都市”(英文写作 *metropolitan*, 通常译作“宗主国”)国家通过贸易体系以及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联合管控,从那些偏远地区获取食物和原材料,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原料的供应地占据了地球表面的绝大部分,也承载了地球人口的绝大部分,但在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里它们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经济和政治关系当中的城市与乡村模式就越过了一国的边界,成为整个世界的模式,其恶劣后果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食物和人口危机。

因此,威廉斯坚信,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带来的是一场全面、深重的危机,要化解这场不断加深的危机,人类必须抵抗资本主义。人类要承认这场危机的存在,而不是逃避问题,并且要通过灵活的、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观察和干预能力来解决危机。各种形式的少数派资本所具有的活跃力量是最为活跃的敌人,必须打倒它们、取代它们。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动用资本主义拒绝、反对并疏远的那些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一无所有的劳工和城市工人在抗议

和绝望之中产生的那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必须通过新的方式变成一个集体负责任的社会。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两者内部一直存在的斗争将会变成一场普遍的斗争。

《乡村与城市》是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著作。首先,书中展示出的文学研究功底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威廉斯是文学批评家出身,后来又亲自尝试小说创作,文学底蕴自是非同一般。他把文学作品和社会研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让读者在诗歌、小说和散文的参照下解读英国乡村和城市,以及二者之间关系变化的历程,感悟文学所带有的阶级烙印及其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真正体现了他所坚持的文化唯物主义立场。正如康沃尔指出的那样,威廉斯“研究文学并非为文学分析之目的,而是作为历史证据,来揭示支撑乡村/城市二元分立的那种意识形态”(Kanwar, 48)¹。抑或如米尔纳所言,威廉斯写作《乡村与城市》的根本创新之处在于他“把文学表现与‘历史事实的问题’相比较,对文本进行检验,直到揭示出这些文本对它们的背景之歪曲”(Milner, 205)²。很显然,这正是威廉斯作为文化批评家的一个重要特色,而这一特色使他的著作独树一帜。

其次,威廉斯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脉络的精准把握以及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刻剖析也体现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超强的逻辑思辨能力。威廉斯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掩饰他对资本主义的反感,但这并未阻碍他对资本主义进行冷静、客观的评价。《乡村与城市》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本书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威廉斯对田园主义思想和城市进步主义观念的批驳可以说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正是这一点,使其具有了极高的学术价值,成为我们把握资本主义发展史,解读资本主义各种症候的极好帮手。

再次,《乡村与城市》是以威廉斯自身的生长经历为参照写成的,我们在

1 Asha S. Kanwar. "Raymond Williams and the English Novel", *Social Scientist*, Vol. 16. No. 5 (May, 1988), 46—58 页。

2 Andrew Milner. "Utopia and Science Fiction in Raymond Williams."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Vol. 30, No. 2 (July, 2003), 199—216 页。

书中可以看到许多他生活的点滴,这对我们理解他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思想有很大的帮助。威廉斯出身威尔士边境乡村的一个劳工家庭,后来移居英格兰,艰苦的生长经历和边缘身份使他对自己的阶级抱有真诚的情感,这使他无法认同利维斯所代表的精英文化思想,更无法接受这一思想对大众和大众文化持有的消极否定态度。有评论家曾指出,威廉斯和利维斯的区别在于,“利维斯视文学为文化社群的鬼魂,死后的残余物。对他而言,真实的乡村社群已然死亡——被工业革命杀死了。只有在文学——反思性的文学——中人们可以找找那些价值。但威廉斯相信那些价值依然活着,就存在于他所出身的村子里。”(Green, 159)此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在很大程度上,《乡村与城市》就是对利维斯思想的有力驳斥。威廉斯之所以能够在书中点破英国传统知识分子所珍视的田园幻象,揭示出前资本主义“有机”社会的残酷本质,就在于他的阶级立场使他能够不受精英思想的桎梏,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甚或刻意不愿看到的事实。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乡村与城市》一书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也很有启示性。威廉斯在书中对近代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反思,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历史上是资本主义的敌人,但就乡村和城市的问题而言,它们在细节上,而且往往在原则上,在继续甚至是加剧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同样的基本进程。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城市进步主义观点,对资本主义的高效生产率表示赞赏,或者预言在某个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开始失去这种进步特性。为了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更有效地控制自然,资本主义必须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对于这种观念,威廉斯表示深恶痛绝,将之称作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个建立在“对现代化和文明的单一价值观的信心之上”的“重大歪曲”(第25章)。因为这一观点所隐含的前提是,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它的发展形式包含了比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农业文明更为高级的价值观。而一旦这一前提获得承认,几乎所有打着城市无产阶级旗号的计划都会具有正当性并会得到强制执行,包括对乡村和农业的贬低以及对西欧和北美之外的“欠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压榨。反观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包括以环境和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和城市,或许我们应当从威廉斯的担忧中感悟出些什么。

需要说明的是,威廉斯独特的文风和渊博的学识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一如他的其他著作,本书惯用长句,个别地方句子结构非常复杂,包含多层逻辑关系;用词也有明显的古雅特色,有些词甚至可以说比较古奥;有些格式方面的处理也不太符合当今的规范,比如书中的引言都没有在行文过程中明确标明出处,只是在书后列了一个“参考文献”,交代某一页有几处引言,出自什么地方,但却不标明某一个出处对应哪一页的哪一个引言。译者在翻译时除了要仔细分析句子结构、理解所有用词之外,还需要对这些引用文献仔细查证,力求把出处和具体的引言一一对应起来,以脚注的形式在译文中体现出来。这一过程花费了很多时间。书中提到的各种著作、作家、诗人、历史事件等,更是让译者费尽了脑筋。虽然译者中既有人曾游学英国专攻翻译,也有人专治18世纪英国文学,翻译时仍然自始至终都有强烈的力不从心之感,工具书不离手,时刻在网络上查询,其间还多次请教国外的友人。

这样的翻译很折磨人,但也充满乐趣。有人说,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在翻译本书时我们对这一点感受最深。我们认真翻译了,也有了很大的收获,但翻译的时间毕竟有限,很多需要斟酌的地方没有来得及仔细推敲,再加上能力和水平有限,译文肯定有许多不足之处,甚至是严重的毛病,我们期待着读者在享受威廉斯精辟睿智的分析之余,也对译文多提宝贵意见。

致谢

本书前几版的部分章节已在《看台》、《听众》、《批评季刊》、《18 世纪研究》和《小说》上发表;有些章节被用作《鹈鹕英语散文经典》第二册、企鹅版《董贝父子》、麦克吉本与基出版公司重印的《霍奇与他的主人》的导读;有些作为专题收入名为《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书中,已经出版。

由于之前的有些内容已经发表,我因此多次有机会以不同的身份与其他学者合作探讨本书的课题。这些学者中,我特别需要提到的是 G. T. 伊瓦利艾罗博士、J. P. 帕林德博士和亚德里安·普尔先生,我们一起探讨,相互学习。我还有幸与 T. F. 伊格尔顿博士、H. H. 厄尔斯基-希尔博士、S. C. 希斯博士、M. D. 龙博士、查尔斯·斯万先生、约翰·费基特先生还有许多我的同事和学生一起讨论。

我太太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持续而又无可替代的帮助。我还要特别感谢麦瑞林·威廉姆斯博士,她是《托马斯·哈代与乡村英格兰》一书的作者。她古道热肠,以自己特殊的经历审校了本书的手稿和校样。

下列机构允许我使用以下版权资料,在此我表示感谢:费伯出版有限公司(Faber & Faber)和哈考特公司(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他们允许我引用 T. S. 艾略特《诗选:1902—1966》中的部分诗作,哈考特公司拥有 1936 年版的版权,艾略特拥有 1963 和 1964 年版的版权;哈代庄园董事会、麦克米伦公司加拿大分公司、圣马丁出版社、麦克米伦公司伦敦分公司和巴新斯托克公司允许我引用了托马斯·哈代著《苔丝》中的部分章节;哈代庄园董事会、麦克米伦公司加拿大分公司、麦克米伦公司纽约分公司和巴新斯托克公司允许我引用了托马斯·哈代著《诗选》中的一段。

目录

	译序 文学中的乡村与城市综论 / 1
	致谢 / 1
1	乡村与城市 / 1
2	视角问题 / 10
3	田园与反田园 / 16
4	黄金时代 / 51
5	城镇和乡村 / 65
6	他们的命运他们的选择 / 77
7	改良的道德 / 85
8	自然之线 / 94
9	生为耕田命 / 124
10	圈地、公地和社群 / 138
11	法恩汉附近的三个作家 / 152
12	喜人的景色 / 167
13	绿色的语言 / 177
14	城市中的变化 / 201

15	城市中的人们 / 217
16	可知的社群 / 232
17	被遮蔽的乡村 / 252
18	威塞克斯和边境区 / 270
19	黑暗之城与光明之城 / 293
20	城市中的身影 / 317
21	生存着的乡村人 / 340
22	又见边界区 / 363
23	城市和未来 / 374
24	新都市 / 382
25	多样的城市与多样的乡村 / 393
	附录 / 413
	参考文献精选 / 415
	索引 / 427

1 乡村与城市

“Country”(乡村)与“city”(城市)是两个很有感染力的词,我们只需想一想它们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多少经验,就会明白这一点。在英语中,“country”可以表示一个国家,也可表示一片“土地”;“the country”可以是整个社会,也可以是该社会中的乡村。在人类漫长的居住史上,我们直接或间接地以之谋生的土地与人类社会成就之间的这一联系,历来为人们所熟知。而人类社会的成就之一就是城市:首都,大城镇,一种特色鲜明的文明形式。

人类历史上的居住形式极为丰富。人们对这些居住形式倾注了强烈的情感,并将这些情感概括化。对于乡村,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认为那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宁静、纯洁、纯真的美德。对于城市,人们认为那是代表成就的中心:智力、交流、知识。强烈的负面联想也产生了:说起城市,则认为那是吵闹、俗气而又充满野心家的地方;说起乡村,就认为那是落后、愚昧且处处受到限制的地方。将乡村和城市作为两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并加以对立起来的观念,其源头可追溯至古典时期。

不过真实的历史历来都是多种多样的,多得令人惊异。“乡村生活方式”包括了猎人、牧人、农夫和工厂化农场主的各不相同的生活,其组织包括了从部落、领地到封建庄园等不同形式,既有小农和佃农阶层,也有乡村公社,既有大庄园和种植园,也有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和国有农场。城市的形式也不少:首都、行政基地、宗教中心、集镇、港口、商品集散地、军营、工业集中区。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在名称和部分功能方面与现代都市或都市群有联系,但二者绝对不是完全相同的。而且,当今世界除了乡村和城市这两种传统形式之外,还有许多种居住形式:郊区、郊外住宅区、棚户区、工业区。“村庄”这一概念似乎很简单,但在历史上也有多种变化:在大小和特性方面各有不同,村庄内部又有聚居和散居之分,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村庄也有区别。

尽管这些差异大小不一,但贯穿这些差异的,有一些意象和联系始终可见。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描述并分析这些意象和联系,结合历来相互各异的人类经验对其加以考察。出于实际考虑,我的例子大多来自英语文献,尽管我的兴趣要更广泛得多。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明白,英国经验特别重要,因为乡村与城市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变化,在英国很早就发生了。而且在英国这一变化非常彻底,在某种意义上,其他地区的变化至今仍不如其彻底。工业革命不仅改造了城市和乡村,其基础也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农业资本主义,传统的农民阶层很早就消失了。在英国历史上的帝国主义阶段,不列颠和殖民地农村经济的性质都在很早就有了变化:对国内农业的依赖程度降到了很低,经济上活跃的人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四从事农业。在人类漫长的定居史上,英国成为第一个主要在都市居住的民族。因为随后的多数重大发展,包括世界上有关“发展”的一般概念,都是沿着这些具有决定性的方向进行的,所以英国经验至今仍然格外重要:这一经验不仅是症状性的,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有助于进行诊断。无论以后如何发展,英国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由于内涵丰富,因而值得铭记。尽管经历了这一转变过程,英国人对乡村的态度,以及对乡村生活的态度,却一直不变,其韧性不同凡响。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正因为如此,直到整个英国社会已经绝对城市化以后,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文学主要还是乡村文学。即便是到了20世纪,在这个城市化、工业化的国度里,一些以前的观念和经验仍然有影响。所有这些都使得英国经验以及英国人对于乡村和城市的阐释具有一种永恒的重要性,虽然这种重要性并不是英国经验所独有的。

这种重要性可以作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加以陈述,并不得不对其加以评估。不过,我不妨在书的开头就坦白一下,自我记事起,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就是个人问题。英国已经绝对城市化且又工业化,但我却出生在一个偏远的村子里,位于一片很久远之前就有人定居的乡村,就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交界地区。距离村子二十英里之内,就在一趟公交线路的尽头,朝一个方向走是一个建有大教堂的古老城市,朝另一个方向走是一个古老的边界集镇,但穿过这个集镇再往前走几英里,就是威尔士南部广大的煤炭和钢铁工业区里最早诞生的几个工业化市镇和村庄。对于人类定居形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有

许多描述和阐释。在阅读这些描述和阐释之前,我已经清晰地实地见过这些市镇和村庄,目睹了这些市镇和村庄运转的情况,并一直难以忘怀。在求学的过程中,我到了一座围绕一所大学兴建起来的城市。自那以后,在居住、旅行和工作的过程中,我参观了(有时出于需要)许多不同的大城市。我在时间和空间上展望未来,也回顾过去。在展望与回顾的过程中,一直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经验,同时也作为问题谨记在心(或是努力去了解)。我曾以其他方式撰文论述过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但我也在缓慢地积累证据,以便将这种关系作为社会、文学 and 知识史事件加以详尽地阐述。

本书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不过尽管本书的阐述经常也必须沿着非个人化的程序展开,但这种阐述背后却始终蕴藏着我个人感受到的压力和使命感。由于乡村和与城市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客观问题和历史事实,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成千上万人直接关注的问题,而且也是他们的切身经验,因此我觉得我无需对我的个人动机进行辩护,虽然我还是要提到这一动机。

因此,还未开始阐述,我就意识到乡村生活对我而言具有多重意义。这种生活就是我书桌面对的窗外田野里的榆树、山楂花和白马;是11月傍晚时分,修剪完树枝步行回家的男人们,个个都把手插在卡其布外套的兜里;是戴着围巾站在自家小屋外的女人,等待载着男人们的蓝色公共汽车。孩子们上学的时候,这些女人又到地里收获作物;是路上行驶的拖拉机,在路上留下锯齿状的轮印;是凌晨对面那家养猪场母猪下崽,关键时刻开着的灯光;是急拐弯处遇到的缓慢行驶黄色货车,车上装满了绵羊,都挤在两边用板条隔开的空间里;是无风的傍晚青草垛传来的夹杂着蜂蜜味的浓浓的清香。乡村生活也是满是黏土和石块的贫瘠的田地,以1.2万英镑一英亩的价格卖给投机的地产商,做住房建设之用。

我刚才说过,我出生在一个村子里,现在依然生活在村子里。不过,我出生的村子就在布莱克山脚下,那里一片红土的农田旁边就是亮绿的草场,最靠近窗外的是橡树和冬青树。我现在生活的村子坐落在平原地区,在一片布满黏土和石块的未耕地上,在东英吉利高高的蓝天之下。村子挨着堤坝和水闸的边缘,远处是费恩湿地的大片黑土。

这种现实的反差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但这不是唯一的反差。在布莱克

山脚下的那个村庄里，一如在我住的这个地方，有一种鲜明的对比令人极为关注。一方面是人类不曾干预过的自然，其中人们可以实实在在地感觉到树、鸟儿和形貌不断变化的土地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是劳作农业，在其中大部分的自然正在被人工制造出来。有两类灌木树篱，那边长在土堆上，这边长在平地上或水沟边。挨着树篱生长的有橡树、冬青、榆树和荆棘，这些树和树篱都是为了观赏目的，也是由人们种植并照料的。我儿时居住的小屋旁边有一条小路，小路的尽头现在是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一辆辆卡车在上面飞驰而过。但那条小路也曾被修整过，铺上了石子，有车在上面驶过：在这片只有两代人历史的土地上，这条小路是一个地标。小路的起源是：最初一个年轻的建筑工人娶了一位农民的女儿，得到了一块田地的一角，在那里建起了自己的房子，后来又建起了他自己的作坊，巷子正好通向作坊。后来旁边又盖了一些住房，也盖了一些作坊，这些作坊再后来又被改造为新的住房。最初的那个作坊是我父母的第一栋住房。在那片有着榆树和白马的田野里，就在我现在家的后面，还保留有一座9世纪建筑物的模糊痕迹，草丛下面一英尺处还埋着一条用卵石铺成的路。现在有人想拉新的铁丝网，但在卵石路所在的地方无法立起木桩。

因此这种乡村生活具有多重意义：在情感上和行为上，在范围上和时间上。田野下面的卵石比马道通往的那所大学还要古老。那条马道有着薄薄的荆棘树篱，蔓延五英里，穿过空旷多风的田野，走过斯塔弗古斯森林，就到达了那所大学。按某种方法计算，卵石上一英尺厚的泥土应有千年的历史。但是，布莱克山村庄里那条小路（现在它与那条高速公路有很大不同，也不再是我儿时记忆中那绿茵遮蔽的小路）的历史却并不久远：大约是我父亲12岁时修的，那时我父亲在一个农场上做工。我还保留着父亲离开农场时农场主写的推荐信：圆体字，写得歪歪扭扭的，说父亲是个诚实而勤快的人。父亲当时是要去铁路上当搬运工。山谷中的那条路线由四段路构成，也即老公路、矿车轨道、新公路、铁路：绵延的路堑和路堤就像丘陵一般；固定而熟悉，一百年前就建好了。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是个信号工，值班室就在山谷中：那是一个通向多个著名地方的铁路网的一部分。铁路通向纽波特和赫里福德，过了这两个城市，又通向伦敦。但父亲仍然是个村民，有自己的花园，自己养蜂，

骑自行车把自己花园出产的东西运到市场去。那也是一个网络,不过他是骑自行车去的。农民们赶着马车到市场去,商贩们则开着卡车去。这已经是本世纪的事了。父亲和他的父亲一样,出生在农家,但却无法依靠土地生活。我的祖父叫约瑟夫,是个农场工人,但中年的时候却丢掉了工作,连同工作一起丢掉的,还有他的小屋。失业后他成了一名修路工:沿着公路的一段挖挖修修,那条路通往中部地区,通往其他城市。我的一个叔叔住在伦敦;另一个住在伯明翰;我们一家人探望近亲以及度假的时候,在乡村和城市间穿梭。我们家散居在多个地方,通过公路、铁路联系在一起,现在则通过书信和照片联系。这些都是乡村与城市之间、乡村向城市过渡的各种地方及社群之间、乡村向城市过渡的不同工作岗位及居住方式之间不断变化着的交流方式及联系方式。

因此,这种乡村生活有自己的多重意义,但这些意义自身已经有了变化,而且与其他因素相比也有变化。在英国西南方,我们以前晚上经常注视着布莱诺黑色山脊上方,威尔士南部工业区炼钢炉发出的亮光。如今,在英国东部,我晚上会遥望着长着榆树、白马在上面吃草的田野那边,剑桥的灯光白中透着橘色;到了秋天,这里的农民会焚烧地里收割后留下的作物茬子,荆棘树篱有时也会跟着起火。晚上我刚看到这火时,还以为不知哪里失了火。我的网络从我在窗前坐的地方开始,通向剑桥和伦敦。比这两个城市更远的,是邮戳显示的地方,那些不熟悉的邮票和远方的城市:罗马、莫斯科、纽约。

城市的灯光。晚上睡觉前,我走到屋外,注视着明亮的天空:我注视着城市,同时想起了哈代笔下的裘德。裘德也是站在野外,注视着远方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克里敏斯特。有时我也会想到华兹华斯。他从山区去往伦敦,站在威斯敏斯特桥上,咏叹道:

大地再没有比这儿更美的风貌:

若有谁,对如此壮丽动人的景物

竟无动于衷,那才是灵魂麻木;

瞧这座城市,像披上一领新袍,

披上了明艳的晨光;环顾周遭:

船舶,尖塔,剧院,教堂,华屋,
都寂然、坦然,向郊野、向天穹赤露,
在烟尘未染的大气里粲然闪耀。¹

这确实是繁忙而嘈杂的工作日开始前伦敦城的写照,但因为辨认出这是伦敦而油然而生的冲动还是可以清晰可辨的,而且我知道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过这种冲动:人类文明所造就的巨大建筑、会堂、图书馆和剧院、高塔及其圆顶;经常比这些更感动人的是那些房屋、街道以及熙熙攘攘、心态各异而又兴奋的人群。我曾站在许多城市感受这种冲动:斯德哥尔摩和佛罗伦萨之间实实在在的差别、巴黎和米兰之间实实在在的差别。这是一种可以辨认而且令人动容的品质:处于中心、充满动感、灯火辉煌。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也感受到地铁的混乱和交通堵塞、一排排房子的单调乏味、陌生的人群拥挤过来造成的难受劲儿。但这还算不上一种经验,算不上是成年人的经验,除非把这些象征着公认而且经常是宏伟成就的中心里面生机勃勃的运动也包括进来。H. G. 威尔斯参加一次讨论社会变化的政治会议后曾经说过,这座高耸的城市其实是一种障碍的标尺。社会要想变化,必须去除这些障碍。我在仰视那些作为权力中心的高大建筑时也有过这样的感受,但我不会说:“这是你们的城市,你们伟大的资产阶级纪念碑,你们这个仍然摇摇欲坠的文明架设起的高塔。”或者我不只说这些,我还会说:“这是人类建造的,通常都如此富丽堂皇,那么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这种对可能性的感受,对聚集和运动的感受,在我对城市的感受中的确是一个永恒的元素:和我向山下望去时产生的感受一样永恒。我望下去时看到的是,一块块巨大的色彩斑斓的农田,那是我的家人多少代以来开垦出来的,并在边上种上了树篱。我还看到我熟知的居住区、孤零零的农场、城堡或教堂边上一溜小屋;还看到小河、树林、人行小道和小巷所形成的线条。因此,虽然乡村和城市以互不相同的方

1 华兹华斯《威斯敏斯特桥上》,这里用的是杨德豫的译文,见《华兹华斯诗选》,杨德豫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47页。——译者注(书中引言译文若无特别说明,都为本书译者所译。另,凡未标明“译者注”的注释,皆为原书注。以下不再标注。)

式对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开始阐述前,我还是抑制了一下自己的情感。

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我从一个村子里来到城市,人们教导我,我自己也意识到:个人的情况、家庭经历的故事应该服从于全局性的记录,要了解证据及证据间的联系,并变换看问题的视角。如果把大学的围墙比作公园的围墙的话,可以说我们儿时绕墙而走,却无法进去,现在却有了大门,有了入口,尽头是一座图书馆:那里有直接的记录,假如我能学会读懂这个记录的话。来到城市之后,我才从市民、学者那里了解到有关乡村生活、乡村文学真正意义的说法。这种说法影响很广,其实也是一种现成的而且有说服力的文化史。一想到这,我就感到有一种讽刺的意味。我仍在读相关的著作,其中既有学术著作,也有出了私立学校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士所写的著作,以及在村子里长大,现在成为乡村作家的人士所写的著作:各种书籍、杂志、报纸上的随笔,内容全部与乡村生活有关。由于这种文化史的原因,我发现自己一直在问这么一个相同的问题:与这些作者相比,我身处何处?另一处乡村抑或是这座将一切都定价的城市?这个问题从文化方面来说挥之不去,因而显得既尖锐又不乏讽刺意味。

但是,我对剑桥的感情又不止于此。当然是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这所大学里既有学者和教师,也有把这里作为跳板向上爬的教练和禄虫。这是拓展人类知识,为大自然和他人的生命带去光亮的人组成的世界;也是其他那些缺乏同情心的人组成的世界,他们在围墙之内悠闲而傲慢地讲述他们的限定性范例。大学,不管是剑桥大学还是波洛尼亚大学,对我的家人来说原来都很陌生。不过,剑桥还有一个斯图尔布里奇集市,曾经是整个英国最大的集市,笛福在18世纪20年代曾将其描述为“英格兰各地生意人最大的胜地”;“巨大的人流”,²也是班扬笔下的名利场的原型。多年以后,我以一所学院研究员的身份回到剑桥后,发现由于这一学术身份,或者说这一学术身份使得我自然就成为一种永恒的地主集合体的一部分、一个并不情愿的成员,还受到礼邀参加佃户们的午餐会。这是我无论何时都难以忍受的。我记

7

2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Daniel Defoe; ed. G. D. H. Cole and D. C. Brown-ing; Everyman Revised Edition(1962); 83.

得阿瑟·扬曾这么说过剑桥：剑桥，能教给佃农的比，农场的更重农具甚过为五倍开，要早建的人，市就将来里个十一个一从究，为一种其更耕的，还不需耕下要一年 16000 镑的收益，只要出一先令六便士，董事会成员就能参加晚宴。即使年收入达 1000 镑的绅士，行事再谨慎，也无力常常举办这样的宴会。³

笛福曾经顺着一条路，走到尽头：

这条路在湿地边上，通向亨廷顿，在那里和北面大路交汇；在这边，是一片怡人的种植玉米的乡村。和前面所说的地方一样，其中点缀着几座绅士的宅邸。⁴

1790 年扬走了另一条路：

走在剑桥通向圣诺特的路上，六七英里之内的农业非常糟糕，我相信是英国最糟糕的。从剑桥那些庄严的尖顶四下望去，所看到的农村景象，与剑桥大学内对农业的忽视，似乎有一种巧合。

我现在从大学回家开车走的就是这条路。路两边的农田如今耕种得很好。不过，在西边下一个村子里，科贝特(Cobbett)⁵1822 年看到这样一番景象：

这村子大小和皮卡地接近。在村子里我看见女人们拖着耙去玉米地里耙地。除了和康沃尔郡和德文郡一些极为破败的市镇有些相似外，根本看不出这是个英国的村子。上帝似乎对这个村子施了诅咒。周围

3 Sheep and Turnips; bei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Arthur Young; A. Defries; 1938; 150—151.

4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87.

5 科贝特(William Cobbett, 1763—1835): 英国政治评论家、新闻记者, 1802 年创办《政治纪事》周刊, 谴责英国政府无视工人阶级的利益, 鼓吹议会改革, 代表作《乡村漫游》。——译者注

的土地看起来并不差,但这片乡村却是寸草不生,偶尔可以看到的矮树丛,甚至是绿树篱,上面都蒙了一层黄色的苔藓。满眼荒凉,让人很不舒服。就在这最乏味的景色的最乏味之处,几乎是不失时机地矗立着“卡克斯顿绞刑架”,友好地向行人伸出一只手,刚刚刷过漆,上面字写得很大,我想这是为了方便那些一想麦子要卖到四先令一蒲式耳就吓得要死的人阅读。⁶

这里也不是过去的样子了。但无论何时,只要想到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想到出身和学问的关系,我都会觉得这方面的历史一直是进行着的、延续着的:这不仅仅是思想和经验之间的关系,也是租金和利息的关系,与境遇和权势的关系;这是一个更大的系统。

这就是我身处的位置,就在这一大的系统之中。我发现,着手工作之先,我就必须一步一步,慢慢地分解那些一度向光一样快速运动的经验和疑问。乡村和城市的生活既是运动着的,又处在当下;在时间中运动,在一个家庭和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运动,在情感与观念中运动,在关系和决策组成的网络中运动。

一只狗正在叫——那是拴着的狗发出的叫声——就在石棉瓦牲口棚后面。叫声时断时续;这里有,其他许多地方也有。有问题提出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往后推一下椅子,低头看着我的资料,感受一下变化。

6 *Sheep and Turnips*; 177—178.

2 视角问题

9

我最初遇到的问题是视角方面的问题。几年前,有人寄给我一本书,要我写书评:是一本关于乡村的书。语言是我熟悉的,通常情况下我应该是喜欢读的。不过,在讨论乡村生活经验之前却有一段套话:

从维吉尔时代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的一种生活方式突然中止了。¹

要是具体考证的话,这种说法显然让人觉得奇怪。从维吉尔时代开始?在英国?一种乡村生活方式?

如果只是大略地说一说,这种观点却是很多人所熟知的。在那本书中,有一段令我记忆犹新的话,是这么说的:

自远古时期以来一直保持其持续性的整个文化如今死去了。²

这似乎就是过去 50 年间发生的事情:比如说自一战后开始。不过这种说法带来一个问题。我记得一本在批评界很有影响的书,就是利维斯和汤普森合著、1932 年出版的《文化与环境》中有一句话。“旧英格兰”的“有机社群”消失了,“这种变化就是最近才发生的”。³ 这一观点主要是根据乔治·斯图尔特 1907 至 1932 年间出版的那些书而得出的。在 1911 年出版的《村庄里

1 *The Pattern under the Plough*; G. Edward Evans; London, 1966; 17.

2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F. R. Leavis and Denys Thompson; London, 1933; 87.

3 *Change in the Village*; Goerge Sturt (Goerge Bourne); London, 1966; 17.

的变化》一书中,斯图尔特论述了英格兰农村,认为英格兰农村“正在消失”。我们可以看到,就消失在刚刚走过的小山背后。

然而,学者们对时间的认定就像是自动扶梯一样,开始向前移动。斯图尔特将英格兰农村消失的时间追溯到两个时期:1861年以后的圈地运动和1900年以后的住房解决方案。但这一说法立即让我们想起了哈代小说所描绘的时代,这些小说写于1871年至1896年,描述了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英国农村。批评家们不是坚持认为,正是在哈代的小说里,我们发现了有关乡村生活转折性巨大变化的记录吗?这种变化就是对有一位作家所称的“农业和四季永恒韵律”的破坏和毁灭。这也是理查德·杰弗里斯所说的那个时代。杰弗里斯在19世纪70年代回顾“老庄稼汉”时曾说,在那之前的半个世纪里——也就是19世纪20年代以后——英国乡村发生的变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大。与此相似,乔治·艾略特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和《费利克斯·霍尔特》(1866)中不是也曾回顾过19世纪二三十年代英格兰古老的乡村吗?

到了这里,自动扶梯就马不停蹄地向前开了过去。19世纪二三十年代,科贝特已是暮年。他与同时代的英格兰乡村有直接的接触,但他却缅怀他的童年时代,也就是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格兰,那个更加快乐的乡村。托马斯·毕威克在其19世纪20年代写的《回忆录》中,也缅怀起18世纪70年代他童年时的村子。两人都坚定地认为,决定性的变化就是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发生的。约翰·克莱尔在1809年曾写道:

10

哦,那些黄金年代里快乐的伊甸园⁴

从他书里的字句来看,他回忆的似乎是18世纪80年代,尽管他在一段有关正在消失的乡村秩序的回忆文字中谈到了“远去的草场、早已消失的风景”。

不过,自动扶梯还是向前开去。科贝特和毕威克的童年时代也是克雷

4 Helpstone; John Clare; in Poems, ed. J. W. Tibble; 2 vols; London, 1935.

布⁵在《村庄》(1783)中所反映的时期:

诗中不再有真相,尽管表示不屑吧,
但要承认村庄生活充满了苦难。⁶

这也是哥尔德斯密斯⁷在《荒村》(1769)中所描绘的时代:

就在此时,我站在这里思考,我认为
我看到乡村的美德正在离开此地
对美好的奥博恩的回忆:

平原上最可爱的村落
在那里健康和富足振奋着劳作的青年,
在那里微笑的春天来得最早,
夏季绽放的花朵迟迟不愿凋零。
可爱的村舍透露着纯真和安逸
我的青春在此度过,那时每一种消遣都令人开心。⁸

运用最普通的算术知识我们也会明白,我们的自动扶梯已经翻过了下一座小山,到了18世纪50年代。

随着我们的时间之旅向前推进,我们明白,我们所讨论的显然不仅仅是

5 克雷布(George Crabbe, 1754—1832):英国诗人,以擅长用朴素的语言如实描绘日常生活闻名,主要作品有《村庄》、《教区纪事录》等。——译者注

6 *The Village*; George Crabbe; in *Poetical Works of George Crabbe*; ed. A. J. and R. M. Carlyle; Oxford, 1914.

7 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英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长诗《荒村》,喜剧《委曲求全》,散文《世界公民》等。——译者注

8 *The Deserted Village*; Oliver Goldsmith; in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ed. A. Dobson; Oxford, 1996.

普通的算术知识,也不是普通的历史。这些知识分子们有关“旧英格兰”的叙述,无法确定到底说的是哪里。对于这样的叙述,我们需要非常怀疑。但这些见证中至少有一些是根据作家自身的直接体验而写的。对于这些叙述,我们需要深究的并不是史实错误,而是历史视角。对于真实的历史来说,我称作自动扶梯的这个事实也许是一个重要的线索。但也只有我们开始看到这一事实的规律时,才会成为线索。

既然直到现在我们所做的,只是将“旧英格兰”和她永恒的农业韵律从20世纪初推到18世纪中叶,我们再次登上自动扶梯就是很值得去做的事情。想一想“我们成熟稳定的18世纪”,与一般的论述相比,我们的论述或许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还是往前看,看一下17世纪20年代初菲利普·马辛杰⁹在《城市夫人》和《偿还旧债的新办法》中讲述的情况吧。在这两首诗里,新的重商主义正在打破旧的定居方式及其美德。进行圈地活动的贾尔斯·欧弗李奇爵士已经来到了这里。古老的农业文明遭到了破坏:

11

你的父亲

是一个诚实的农夫,是个谦逊的好人,

邻居们从未叫他老爷。你的傲慢

来自他吗?¹⁰

我们说不准。不过,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巴斯塔德1859年的《格言七书》,其中发出了同样的抱怨。要是非要假设巨变就发生在17世纪初,我们不妨看一下托马斯·莫尔1515年在《乌托邦》中对旧秩序被破坏情况的描述:

全国各处,凡出产最精致贵重的羊毛的,无不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一流的一些主教,觉得祖传地产上惯例的岁租年金不能满足

9 菲利普·马辛杰(Philip Massinger, 1583—1640):英国剧作家,以讲究情节、真实性和讽刺有力著称。主要剧作有历史剧《罗马演员》、喜剧《偿还旧债的新办法》等。——译者注

10 *The City Madam*; Philip Massinger; Act IV, sc. iv.

他们了。他们过着闲适奢侈的生活,对国家丝毫无补,觉得不够,还横下一条心要对它造成严重的危害。他们使所有的地耕种不成,把每寸土都围起来做牧场,房屋和城镇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作羊栏。并且,好像他们浪费于鸟兽园囿上的英国土地还不够多,这般家伙还把用于居住和耕种的每块地都弄成一片荒芜。¹¹

当然,除了这些,我们还可以再往前看看稳定的中世纪时期那个有机的社会,假如那时有这样一种社会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朗格兰¹²所描述的14世纪70年代时的情形。朗格兰笔下的耕者皮尔斯亲眼目睹了农业工人的种种不满。他们不吃前一天摘下的蔬菜,而是要吃当天的鲜肉;他们指责上帝,咒骂国王;但是在饥饿制定各种法令的年代里,他们却没有怨言。我们还要追溯到黑死病横行之前,一直追溯到渔猎法刚颁布的年月,或是大宪章时代吗?那时英诺森三世¹³如此写道:

农奴就要为庄园主服务吗?他们因为受到威胁而变得战战兢兢,替庄园主无偿劳作而疲惫不堪,经常挨打而遍体鳞伤,被剥夺了财产。¹⁴

或者说,我们能在《末日审判书》书里找到那永恒的韵律吗?在《末日审判书》那个时代,五个人中,就有四个是隶农、边农、茅舍农或者奴隶。或者说,这种永恒的韵律可以在自由的撒克逊时代找到吗?这个时代就在后世所称的淫掠专制的诺曼时代之前。在撒克逊人还没有沿各条河流向内陆扩张时的凯尔特人的世界里能找到吗?在凯尔特人还没有来到英国时,那个尚处于被美

11 译文出自托马斯·莫尔著,戴镗龄译,《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版,第21页。——译者注

12 朗格兰(William Langland, 1330?—1440?):生平不详,据猜测系中古英语头韵诗《耕者皮尔斯》的作者。——译者注

13 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 1161?—1216):意大利籍教皇(1198—1216)。——译者注

14 *Selected Letters of Innocent III*; ed. Cheney and Semple; Edinburgh, 1953.

化了的野蛮状态中的伊比利亚人的世界中找？我们要走到哪里才能把自动扶梯停下来呢？

当然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伊甸园。我们将再次考察这个被人们牢牢记着的花园。不过，我们还是先走下自动扶梯，对其总体的运动情况做一番思考。

有一种许多人都熟知的习惯，那就是把过去，把那些“过去的好日子”当作一种手杖，来敲打现在。上面列举的这些难道就只是这个习惯吗？它们显然属于这个习惯，但还是有一些问题。作家们信心十足地让我们到“旧英格兰”——似乎那就是我们可以落脚的地方——去寻找永恒的韵律，但这个“旧英格兰”又开始不断向更早的时代退去。这些时代就其自身来看，还是很有意义的。当然，我们注意到，这些时代都是作家各自的童年，这一定有重大关系。可以说，怀旧是普遍而持久的；我们只对其他人的怀旧感到不满。有关童年的回忆具有永恒的意义，这么说还是可以令人信服的。不过，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看似自动扶梯的简单运行，那种历史不断的后退，其实是一种更为复杂的运动：旧英格兰、定居、乡村的美德——所有这些实际上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不同的价值观遭到了质疑。对于每一种回顾，我们都要进行准确的分析。我们将会看到被这些回顾所支撑的依次出现的批评阶段：宗教的、人文的、政治的、文化的。这些阶段每一个都值得考察分析。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关注的点都有所不同，但它们最终都将把我们引向一个难以回答但又是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召唤的这些见证人引发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视角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引发了文学事实和文学视角方面的问题。他们所说的东西也并不都属于同一个模式。作为事实资料，这些东西种类繁多，既有戏剧中的演讲，也有小说中的段落，还有散文中的议论和杂志上的随笔。如果是诗歌，它们也可能是不同类型的诗歌，这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做出这些严谨的区分，我们就只需分析这些重要的感情结构。接下来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定义田园作品的问题，或是如何定义被称作田园作品的那些作品的问题。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形式问题。

3 田园与反田园

13

(1)

诗中不再有真相,尽管表示不屑吧,“谁不微开又”兰州英
美大童育到一登,平但要承认村庄生活充满了苦难。¹ 克雷布,然也。他又深
克克雷布的这两行诗是《村庄》第二部的头两行,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向人们展
示了这一主要问题的特点。可是这种论述诗歌时的道歉口吻从何而来?对
真相如此执着,针对的是谁?要读懂克雷布的《村庄》这首诗,需要深入思考
这两个问题。

仿照我学到的例子,我描画村舍, 诗人又人 吟咏来,通个
就如真理将会做的那样,而诗人则不然。

又是真理,而且反对诗歌。不管我们后人对于克雷布所描绘的英格兰有什么
疑问,他心目中的对比并非是以前的英国乡村与当时的英国乡村之间的对
比,而是真实的写作方式与虚伪的写作方式之间的对比。从更大的方面来
看,他极力对比的是田园诗歌传统和他所臆想的现实主义。他显然认为,他
心目中的田园诗曾经是有基础的,但这一基础只是在古典时期才有,在他生
活的那个时候或稍早前并不存在:

伴随着和谐的音乐,乡村诗人歌颂着

1 The Village. 前引书。

家乡的土地。这样的时代已经远离：
如今没有一个牧羊人能够用不同的舒缓的
诗句，吟颂祖国或是心中少女的美丽。

克雷布所正式排斥的是一种文学传统，也即新古典主义田园诗歌传统：“对曼图亚诗歌²的机械模仿。”或是像克雷布自己最初描述的那样，那时约翰逊还没有对他的诗句做出修改：

身处美景，那是平静快乐的源泉，
曼图亚最棒的少年提泰鲁斯或许可以歌唱；
可是，为他着迷，或者为他所吟颂的景色打动的
现代诗人，难道也要对曼图亚的缪斯顶礼膜拜？
难道我们要远离真理和自然，
随着幻想，或是维吉尔引领的道路前行？³

约翰逊把最后一行改成“随着维吉尔，而不是幻想引领的道路前行”，⁴减弱了原诗的力度。要是约翰逊不帮克雷布改诗，而且克雷布也不要约翰逊帮忙，这首诗会更好。
“从维吉尔时代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如果说的是定居农业的生活方式，那却是从早得多的时代延续下来的。对一种假定的社会事实的指涉才是真正重要的结构。它典型地反映了围绕整个“田园”问题的混乱认识。

因为如果我们去文学中寻找以前有关乡村生活的重要作品，我们可以找

2 曼图亚(Mantua)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市，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因生于此地而被称作“杰出的曼图亚人”。此处“曼图亚诗歌”是指维吉尔的诗歌。——译者注

3 维吉尔(Virgil, 70—19BC):古罗马诗人，作品有《牧歌》10首，《农事诗》4卷，代表作为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其诗作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产生巨大影响。——译者注

4 有关这一处修改的证据见于 Boswell; *Life of Samuel Johnson*; ed. J. W. Croaker; London, 1831; Vol. V, 55.

到赫西俄德⁵的《工作与时日》。公元前9世纪的作品,比维吉尔早好多个世纪。在这部作品里,我们发现一种由风俗和信仰组成的独特结构,其中有一首史诗,歌颂广义上的农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的农业和贸易。这种生活方式视谨慎和努力为最高美德。在有关释放种种灾祸(其中包括辛苦的劳作这一灾祸)的潘多拉盒子的神话结构中,以及对后世影响很大的有关五个时代的叙述中,赫西俄德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五个时代中,最早的是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

远离灾祸和悲哀……(凡人)拥有一切美好之物,因为不必费力,多产的大地就会为他们奉上充足的果实,从不吝惜。⁶

我们将会看到有关黄金时代的神话有多么深远的影响。但是对于处于乡村文学源头的赫西俄德来说,这个时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之后又过去了三个时代。正是他所处的铁器时代的特点,决定了他会提出有关实用农业、社会正义以及和睦邻里关系的建议。而正是在“充满苦难的生活中”⁷,这些实践可以创造出一个劳作社群。

古希腊的田园诗人要比赫西俄德晚得多:差不多晚六个世纪。直到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化时期,严格意义上的“田园”诗作为文学形式才出现。所描绘的风光也不再是赫西俄德笔下的皮奥夏,而是忒奥克里托斯和摩斯科斯笔下的西西里岛、希腊群岛和埃及;⁸ 田园诗运动的文学中心是亚历山大。因此,“田园”文学的基地已经有所不同:忒奥克里托斯《田园诗》第10章的背景是播种和收割,但这只是个例外。常见的工作是放羊和放牛。在赫西俄德所处的年代中,一年的工作是犁地、看管葡萄园、养猪和养羊,至此已很不一样

5 赫西俄德(Hesiod):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译者注

6 Works; Hesiod; ed. and tr. H. G. Evelyn White; London, 1914 (1954年重印); 11.

7 The Greek Bucolic Poets; ed. and tr. A. S. F. Gow; Cambridge, 1953; 30.

8 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 310?—250? BC):古希腊诗人,始创田园诗,在30首田园诗中以《泰尔西斯》最著名,诗作对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和后来的田园文学有很大影响。摩斯科斯(Moschus),约公元前150年的古希腊田园诗人。——译者注

了。一般认为,田园文学史从当地农民社区的歌唱比赛发展而来;但正如忒奥克里托斯的诗里所显示的那样,尽管这一形式经常得以保留,但某种程度的修饰和技巧已随处可见,特别明显的就是文学语言的运用。与此同时,其以劳作为背景的特点还是经常清晰可见的。我们只需读一下对黎西达斯漫长的身形初次出现时的描述:

他是个羊倌,谁见了他都不会认错他,因为他一眼看上去就是个羊倌。他肩披一件茶褐色的羊毛围巾,那是从一只毛乱而密的羊身上取下的皮,散发着新鲜凝乳的气味。上身穿一件有年头的束腰外衣,用一条很宽的带子系着;右手握着一根野橄榄枝做的弯棍。⁹

15

《田园诗》第九章中,乡村歌手们在唱歌之前必须:

把小牛引导母牛身子底下,让公牛和未怀孕的母牛在一起。

达芙妮躺的那个由洁白的牛皮做成的躺椅,就在那清凉的河边,是用被大风刮下悬崖的牛群的皮做的,这是牧牛人的悠闲。牧羊人“理想世界的财富”是:

许多头母羊,母羊身上剪下的羊毛堆在我的头上和脚下。橡木火上煮着布丁,冬日里有烤熟的干橡子。

狼、狐狸、蝗虫和甲壳虫都是乡村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同样作为乡村生活一部分的还有香脂草、蔷薇花、苹果和蜂蜜。《田园诗》第八章中牧人们丢下瘦弱的公牛和小牛,去参加歌唱比赛,因为他“爱上那该死的胜利”。在田园歌曲动人的演变过程中,那种淳朴社群的感受非常明显而强烈。这种社区中,人们生活拮据,对于夏天和繁殖带来的乐趣感受尤为强烈,因为他们也了解冬

9 The Greek Bucolic Poets; 39—40.

天、不育和事故：

春天比冬天可爱，苹果比刺李可爱，母羊的羊毛比羔羊的羊毛厚。¹⁰

当然，随着这一传统的发展，出现对夏季的祈求是可能的，因为这很明显会为他们带来乐趣：引自赫西俄德的诗——

当刺棘蓟开花，喧闹的知了在树上

歌唱……

……哦，那时给我

一块岩石下的阴凉，身旁放着毕布里斯的葡萄酒，

最优质的面包，一气喝光山羊奶；¹¹

或者又如忒奥克里托斯的诗句：

那里充满欢乐和奢华：

云雀和伶俐的燕雀在空中歌唱；

棕色的蜜蜂围着水井转悠；

斑鸠在呻吟；到处都是

富饶夏日和成熟收获的气息：

我们脚下落满梨子，身边到处滚着

苹果；枝头硕果累累，

李子直把枝条压到地面

撒落一地，供我们享用。¹²

10 *The Greek Bucolic Poets*; 47.

11 *Oxford Book of Greek Verse in Translation*; T. F. Higham and C. M. Bowra; Oxford, 1938. 144—145.

12 *A Book of Greek Verse*; W. Headlam; Cambridge, 1907; 213.

在后来很久之后,通过错误的引用,这种描写被视为是田园诗唯一的精髓。但当我们从忒奥克里托斯转向两个世纪之后(也即公元前1世纪)的维吉尔时,我们却发现了田园诗的一种延续性,也即田园诗通过文学性的精心描写,保留了与劳作和乡村生活真正的社会条件之间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维吉尔的《牧歌》比忒奥克里托斯的田园诗还要理想化,而且还更加刻意;但他自己那个时代意大利的乡村骚乱也常会闯入诗中遥远的阿卡迪亚。因此在《牧歌》第一部中,梅里波乌那熟悉的祈求——

啊! 幸运的老人,在这儿,在神圣的泉水

和熟悉的溪流中间,你将享受到渴望已久的阴凉,

舒适的阴凉。

在这儿,就和过去一般,你邻居的土地紧挨着

你的土地,

海博拉蜜蜂吸吮着树篱上的花朵,

嗡嗡的声音常会温柔地把你引入睡眠。另一边

葡萄整枝工迎着和风在峭壁的脚下歌唱;

你的最爱,声音沙哑的斑尾

林鸽

一直在咕咕鸣叫,而斑鸠则在榆树枝头吟唱

同他自己作为一个遭到驱逐的小农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我们中其余的人必须离开这里,四处逃散——

到锡西厄,干燥的非洲,阿姆河的滔滔洪水,

甚至到大不列颠——那个位于世界尽头的地方。

啊! 我何时才能再见到我的故乡? 多年之后,

或者永远不能? ——再看看我那简陋的村舍覆盖草皮的屋顶,

充满惊奇地注视玉米穗子,那是我的整个王国。

想到某个不敬神的士兵占据我那精心耕作的农田,

一个外国人在收割那些庄稼！国内纠纷
使我们沦落于斯……

我将再也不会歌唱。¹³
在《牧歌》第九部中，田园歌唱再次直接同面临没收土地威胁的小农们的希望和恐惧联系在一起：

哦！黎西达斯，我本将在有生之年看到一个外人
攫取了我的小农场——我过去从未担心过会有这种事。
并且告诉我，“你们被驱逐了，你们这些老佃户，你们
必须走。”
我们流离失所。看看命运是如何
为我们带来灾难——
你看到我带到市场上来的这些是他的羊（诅咒它们）。¹⁴

17 诗歌本身本来可以保护土地和土地上传统的农民，但在战争暴力以及战争产生的后果——例如通过大规模的没收土地政策来安置退伍士兵——的压力下，

像我们这样的诗歌，黎西达斯，就像老鹰来时的鸽子一样无能为力。¹⁵

而且我们还记得维吉尔自己就是一个小佃农的儿子，他父亲的土地就面临着被没收的威胁。

因此，维吉尔田园诗内部的对比是乡村定居的乐趣和丧失土地以及遭受驱逐的威胁之间的对比。这后来也发展成为一种早些年代的文学——战乱

13 *The Eclogues of Virgil*; tr. C. Day. Lewis; London, 1963; II.

14 同上。

15 同上。

和国内动乱时代的文学——中变得常见的对比。战乱时乡村生活可以和战争、内战以及城市的政治混乱形成对比。这要取决于这种对比是如何进行的。它可以是一种当下的事实,就像《牧歌》第一部 and 第九部。也可以是种生活回顾,就像梅里波乌的悲伤回忆。或者也可以开始被构建入一个更为宽泛的观念体系:有关过去或未来的设计。在《农事诗集》的一些段落中,例如第二部的结尾处,就带有理想化和广泛回溯的意思,而这后来将变成非常典型的特点。忒奥克里托斯的田园景色一直很直接,近在眼前:就在城市的城墙外面。赫西俄德的黄金时代和现代人的铁器时代形成对比,一直是种神秘的记忆,在那时劳动是必需的,并且受到赞美。在维吉尔诗歌的某些部分发生了一种变形,风景变得更遥远,事实上变成了阿卡迪亚。黄金时代被认为出现在那里,受到诗歌的力量的召唤和歌颂:

对他们来说,远离兵戈战事,土地主动提供了一种轻松的生活……
树木和田野自动出产果实,他采摘果实。他能够安享和平,生活富足。¹⁶

从对肥沃土地自然而然感到的快乐,到对这种不需耕种土地的神奇创造,之间只是一小步。但这一步有时走了出来,尽管是在孤立的段落中,在《农事诗集》那复杂的运动中:对农民一年劳作进行的冗长而细致的描述和赞美;对他的工具,他的劳动方法,他面临的危险,他的敌人,他的技巧和他毕生努力的描述和赞美。需要强调的不仅是美化的语气,而且是这种语气还未从乡村劳作生活中抽取出来。但与此同时,田园牧歌的味道已然在另一种语境中显露,有关未来的语境:黄金时代的回复,第二次降临;甚至在政治上已非常迫近,正如在《牧歌》第九首中:

山羊将走回家去,它们的乳房胀满奶水,而且
没有人

18

16 Georgics, II; 459—501 各处。

赶着它们；牛不再担心遇到狮子……

……于是殷红的葡萄将缀满棘刺树的

枝头

蜜汁如露水般从橡树坚硬的树皮中流淌而出……

……土地不需要犁耙，藤蔓无需

剪除

劳苦的农夫终于可以把轭从牛身上卸除。¹⁷

这种神奇的乌托邦景象是个预言：“开动织机，编织未来。”因此在它的赞美中包含了对于非常不同的当下的感知，重新回来的黄金时代就是从这个当下中解脱出来的。

因此，即便在古典田园诗歌和其他乡村文学的这些发展中（这样的发展开创了一类理想化的语气和意象），也几乎总是存在和其他经验之间的一种张力：夏季和冬季之间；乐趣和损失之间；收获和劳作之间；歌唱和旅行之间；过去或未来和现在之间。文艺复兴对这些古典模式进行改动的成就，如果可以被称为成就的话，则在于这些生活张力被一步步删除，直至再也没有东西能与之对抗，而精心挑选的意象独立存在：不是在一个生命世界中，而是在一个涂了釉彩的世界中。因此梅里波乌迪对他被迫离开的那种生活的回忆成了“源泉”，激发了一千首赞颂不受干扰的乡村快乐和安宁的可爱诗篇。甚至更为显著的是，在贺拉斯¹⁸那著名的第二首抒情诗《俭朴赞》（一千首描写快乐的乡村隐居生活的诗歌都能够追溯到这首诗）中，关键的张力通常都被删除了。羊群、蜂蜜、果实和清澈溪流，远离战争、城市和冷酷的高利贷，对这些东西的赞美在贺拉斯那里出现在一个放高利贷者的感伤沉思中，他在想着变成农民，让人还清他的债款，然后在诗的高潮部分再把钱放出去¹⁹。对这一

17 *The Eclogues of Virgil*; 23—24.

18 贺拉斯 (Horace, 65—8BC): 古罗马诗人, 作品有《讽刺诗集》、《歌集》、《书札》等, 《书札》中的《诗艺》对西方诗歌有过很大影响。——译者注

19 *Odes of Horace*; tr. A. D. Godley; London, 1898.

讽刺的删除——最初是有意的,然后变成了传统——是一个比名称上和主题上的延续性更为重要的事实。²⁰

所有的传统都具有选择性,田园诗的传统和其他传统也是如此。诗人们走过之处,学者们又跟了上来,有关我们自己的16至18世纪的田园诗或“乡村隐居”诗歌的问题被再三搁置,取而代之的是自信的回溯注解。我们决不能像克雷布和其他人那样,以乡村的本来面目看待它:那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或物质主义的反应,或许甚至是一种乡下人的反应。相反,让我们记住,这首诗是以贺拉斯的第二抒情诗或者维吉尔的《牧歌》第九首为基础写成的;而且还有像忒奥克里托斯和赫西俄德这样伟大而遥远的名字;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也即黄金时代。

现在我们应该把这种做法称为诈骗了。学术雕饰已经形成了一种追溯影响的习惯,以至于需要不断有像柯勒律治这样的人对之做出纠正。这种雕饰习惯地把影响追溯到下面几种人:

19

似乎认为每一种可能的思想和意象都是有传统的人;根本不晓得世界上还有像源泉(不论大小)这样的东西的人;因此而仁慈地认为他们看到的正在流淌的每一条小河都来自别人水槽底部小孔的人。

(《克丽斯特贝尔》前言)²¹

而当假定的源泉,也即其他人的水槽,被做出了如此大的改动和简化,以至于没人能够轻易看到此时水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时,这种纠正就更为必要了。

(2)

因此我们必须使用一点儿幻想来使田园诗变得令人愉快;包括只展

20 这种删除讽刺的传统也有例外。伊丽莎白·杜茜(Elizabeth Duthie)提醒我注意,在乔纳森·斯迈德利在《杂诗几首》(*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和威廉·萨默威尔(William Somerville)《诗集》(*Poems*)中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21 *Selected Poetry and Prose of S. T. Coleridge*; ed. S. Potter; London, 1950; 58.

呈现牧羊人生活中的最好一面,把痛苦隐藏起来。²²

当蒲柏这么说的時候,“传统”已经发生了改变。“诗中不再有真相。”¹⁷和18世纪批评界有关田园诗特点的漫长争论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引起争议的主要是,这样的一首田园诗,一首令人愉快的田园诗,是否应当总是追溯到黄金时代,就像拉辛和新古典主义作家们认为的那样;或者应当追溯到有关乡村生活之宁静这一更为持久,事实上永恒的概念上,如封特内尔和其他人所主张的那样。在前一种情况下,因为是黄金时代,就真的有和平和纯真。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仍会存在有关这些东西的概念,一种对于故乡和当地景物的传统的文学幻想:

只有牧羊人生活的宁静展现在观者的眼前,还要掩饰或者隐藏起这种生活的卑贱,同样也只展示它的纯真,而藏起它的痛苦。

只有用这种思路,我们才能理解克雷布:

但当置身这悦目景色之中,我追寻
那些贫苦辛劳的当地人,
看到正午烈日,炽热刺目,
照射在他们裸露的头顶和挂满汗珠的额头;
而一些虚弱怯懦者
虽然悲叹自己的命运,但却仍继续劳作;
难道我还敢让这些真实的不幸藏在
诗意的骄傲那华而不实的陷阱之中?²³

20 “难道我还敢?”这个问题承载着感受到的愤怒。当习惯、制度和经验发生冲

22 Pope: Twickenham Edition, Vol. I; 27.

23 *The Village*. 前引书。

突之时,在那些关键时刻之一,这个问题也承载了一种视角危机。他们是谁?谁敢采用这种方式?克雷布自己又在对谁说话?

哦!不要轻视你所感受不到的贫寒,
也不要嘲弄节衣缩食带来的痛苦;
平常,而非健康,普通,而非充裕,
这就是你们赞赏但却从不屈尊尝试的东西。
你们这些文雅之人,梦想拥有乡村生活的闲适,
喜欢流畅的小溪和更为流畅的十四行诗;
去吧!如果你们的赞美也包括安宁的茅舍的话,
朝里望望吧,问一问那里是否真有安宁。²⁴

这些声称喜欢纯朴的人,他们是一个数量众多的群体。这种传统可能直接传承自维吉尔,而在其末端处,例如英国的“古典作家”的笔下,田园诗变成了一种极其造作和抽象的形式:它的纯朴完全是外部的。但这一传统也源自《农事诗集》,例如在波利希安和阿勒曼那里,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就有凭灵感写下的作品和模仿之作:波利齐亚诺的《乡村》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诗,但他所描绘的劳作之年却是托斯卡纳的农民的;阿勒曼的《培育》则是《农事诗集》中描写的乡村劳作生活的现代意大利翻版。

然而,“田园诗”虽然一度具有很精确的含义,却在同一个时期经历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变化。它最严肃的元素是对自然美重新变得热切的关注,但现在这个自然已经变为科学家或旅行者眼中的自然,而不是劳作中的乡下人眼中的自然。因此,原来的田园诗中的描写因素被剔除出去,而“自然诗歌”的整个传统(就以这些分离的方式强烈而感人)得以建立起来,沿着它主要的路线发展前进,经历了多个世纪,直到我们现在。另一个主要元素则非常不同:田园诗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变得戏剧化和浪漫化。田园罗曼司(从薄伽丘到桑

24 The Village. 前引书。

纳扎罗的《阿卡迪亚》[公元1500年])是一种新的形式,其中田园牧歌和自然描写被融入了一个本质上不同的世界,那里有着理想化的浪漫爱情。田园诗中唱情歌的牧羊人是名义上的基础,但此时开始出现的牧羊人和仙女则是贵族娱乐活动中的摆设。以塔索的《阿明达》为开端的牧歌剧近似于创造一个宫廷,其中牧羊人是种理想化的面具,一种高雅的伪装:一个传统的纯真的形象。而自相矛盾的是,通过他诡计才得以展开。这种精致华丽的游戏作为贵族娱乐一直持续到玛丽·安托瓦内特时代,并且留下了成千上万个彩陶形象。这种游戏同宫廷真正兴趣之间的关联,显然要超过同乡村生活的任何可能形式之间的关联。

然而这一点并非总能被人们意识到。蒲柏在他有关田园诗的随笔文章中就把这种游戏当了真,并且建议对牧羊人的描写:

不能……按照真正的牧羊人的模样进行,而应当按照他们被想象成的样子;因为是最高贵的人在从事这项工作。²⁵如果让臣扮演牧羊人时间足够久的话,那么真正的牧羊人就应当变成贵族了。

但是蒲柏等人所提供的简单并不仅仅是这类化装戏服。那个时代的第二个真正兴趣也体现在了田园诗当中:中世纪和后中世纪对寓言的偏爱。普坦汉姆在1589年认为田园牧歌:

不是为了模仿或表现乡村爱情或交流的方式才被发明出来的:而是在普通人的面纱之下,通过粗俗的语言,来暗示和关注更为宏大的事物。²⁶

25 The Village. 前引书,26页。

26 The Arte of English Poesie; G. Puttenham; ed. G. D. Willcock and A. Walker; Cambridge, 1936;

他接下来继续说,维吉尔就是如此,选择性的文化改编经历的正是这一过程。维吉尔和赫西俄德一样,尚能够提出有关生活及其在直接世界中之目的这样极为严肃的问题(在直接世界中劳作之年和田园歌曲仍然以自己的权利存在)。而贵族改造却把这些基本的活动简化成形式,不论是寓言的“面纱”,还是宫廷游戏的戏服。这是一种重要的变化,但它一直占有优势地位——尽管人们会认为它的推动力早就已经消失了——以至于在20世纪作家的批评话语中,田园诗的普通现代意义即来自于这些形式,而不是来自它们最初的实质或更重要的继承者。我们被告知,“田园”的意思即为简单的事物体现出或隐含着普遍真理:即便是一部当代的工业无产阶级小说,也能在这个意义上被看成是田园的!但作为理解作家——例如斯宾塞²⁷——的批评程序,这很公平,但其推论很荒谬,而荒谬也有其意义。正如在如此多的英国文学思想领域中那样,在重大的历史变化点(也即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上一直有种有效而自觉的僵化现象。如果田园诗只是一种伪装或寓言,那么克雷布的问题就毫无意义;那不过是种粗鲁的噪音。但若要认识和理解一个重要变化的现实的话,克雷布的问题就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因为宫廷和贵族宅邸的田园诗并不是真正重要的发展。这种诗在时间和地位上是孤立的,因此其模式和现实很容易理解。更为重要的则是这种人造模式的内部转化,那种朝着一个新社会的方向和兴趣发生的转化:一种发展中的农业资本主义。新田园诗作为宫廷娱乐是一回事;新田园诗在新的位置上,也即乡村宅邸及其产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必须跟随人造牧歌和田园诗的发展,但我们将只能达到决定性的转化点上。届时这些诗歌将在新的意识形态和乡村宅邸中被重新定位。

22

(3)

诗人们常常把他们的舌头借给王子们,后者可以支付金钱或做出回答。而借给牧羊人什么,以及按多少利率借,则比较成问题。想要忘记锡德尼的

27 斯宾塞(Edmund Spenser, 1552—1599):英国诗人,以长篇寓言诗《仙后》著称,另有诗作《牧人月历》、《结婚曲》等,在语言和诗歌艺术上对后世英国诗人有深远影响。——译者注

《阿卡迪亚》²⁸是不容易的,它给予了英国新田园诗以持久的标题。《阿卡迪亚》写于一座园林。这座园林是圈占了整个一个村庄并驱逐了佃农后修建起来的。因此,高雅的游戏就在离可见的乡村生活现实一臂远之处——一条粗暴的手臂之外²⁹。

当然,还有其他有关田园的比喻。善良的牧羊人永远都是一种常见的基督形象,充满爱心的牧师,被树立为腐败教会的对立面。与此有关的英语例子可以在斯宾塞《牧人月历》的5月、6月和9月牧歌中找到。更常见的是,通过一种看起来很明显的联系,牧羊人的生活可以被用来代表自然生活和自然情感。这一传统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发展成一条主线,但在一些较短的诗中却有着一种新鲜感。这种新鲜感只是偶尔在戏剧和罗曼司中精心塑造的人物和使用的手法上体现出来;那仍然是个已知的乡村,并不仅仅是阿卡迪亚。

在快乐的五月,
在一个清晨,
我走过树林边,
他的骄傲宛如五月一般。³⁰

但这首由尼古拉斯·布雷顿创作的诗(诗中,林边恋人忽然变成了菲瑞达和克利登)不如清澈的瀑布、烤焦的山谷和唱歌的小鸟等常见的新田园诗背景那么典型。从情感上来说,在马洛的诗句那刻意的含混中,这一比喻还是说

28 锡德尼(Sir Philip Sidney, 1554—1586):英国诗人、廷臣、军人,作品有传奇故事《阿卡迪亚》、牧歌短剧《五月女郎》、十四行组诗《爱星者和星星》及文学评论《诗辩》等。——译者注

29 这里作者用了一个文字游戏,“一臂远之处”是直译,原文是“at arm's length”,意思是“保持一定距离,避免太接近或熟悉”。作者的意思无非是说,高雅的游戏从未进入乡村生活现实。这里直译,是为了保留原文的比喻。——译者注

30 *The Ploughman's Song*; in *Oxford Book of 16th Century Verse*; ed. E. K. Chambers; Oxford, 1932; 410.

得过去的：³¹

干草和常春藤花蕾的腰带

珊瑚纽扣和琥珀饰钉。³²

不过有关新田园诗的那些比喻试图在人们已经观察过的自然中证明自己。对于这种证明的方式,人们却有着更为持久的兴趣。宫廷玩具和夸张情感又回到了乡村小路,有所失也有所得。正是在此时(这个时刻比新田园传统还完全是一种文学技巧的那个时候更有意义),艰难的探寻开始了。

23

当然了,那时已经出现了某种反田园因素。劳作的牧羊人(已然在唐尼利的《第二部牧羊人剧》中以比喻的角色和真实的角色出现在伯利恒了)在《空爱一场》中又出现了。但是常见的反对意见是罗利针对马洛提出的:³³时间无情地侵入新田园诗中无休无止的5月:

不过河流发怒,岩石变冷之时,

时间把羊群从田地赶进围栏。³⁴

如果欢乐没有时限,岁月也没有需求,新田园诗的魅力将使人们相信这一点。

因此,有趣的运动的就是超越浪漫爱情,也即超越新田园诗中那永恒的5月,朝着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英国乡村中,对最古老的乡村理想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比喻。不是新田园罗曼司中那些在庭院和花园中谈论高雅爱情的仙女和牧羊人;而是乡村中的静谧、纯真和简单的富足:比喻的,但也是实际

31 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英国戏剧家、诗人,发展无韵诗体,革新中世纪戏剧,为莎士比亚和詹姆斯王朝剧作家开辟了道路,主要剧作有《帖木儿》、《爱德华二世》等。——译者注

32 *The 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 Love*; in Marlowe's Poems; ed. M. Maclean; London, 1968; 257.

33 罗利(Sir Walter Raleigh, 1554? —1618):英国探险家、作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早期美洲殖民者,著有《世界史》,散文、诗歌等。——译者注

34 *The Nymph's Reply to the Shepherd*; in Poems of Sir Walter Raleigh; ed. Agnes M. C. Latham; London, 1929; 40.

的隐退。传统意象当然随手可用：黄金时代和天堂。看到迈克·德雷顿³⁵在其诗《致弗吉尼亚航行》中将两者同时置于一个殖民地，这很有意思：

弗吉尼亚，
地球上唯一的天堂。

那里自然储有
禽鸟、野味，还有鱼，
最肥沃的土壤
不需你的耕种
就会有三倍的丰收，
远远超出你的愿望……

……自然的法则仍然
赋予其以黄金时代，
没有其他烦恼，
除却要抵御并不漫长的
冬季的严寒。³⁶

这类想象变得很普通。在 17 世纪晚期的一首匿名诗中，就有着此类想象一个非常纯粹的形式：

在人类被野心出卖之前，
世界最初被创造得多么美丽。
在那些青翠的田野里的快乐青年

35 德雷顿 (Michael Drayton, 1563—1631)：英国诗人，主要作品有《英格兰的英雄信札》，神话诗《尼姆非迪娅》等。——译者注

36 *The Works of Michael Drayton*; ed. J. William Hebel; Oxford, 1931; Vol. II, 363.

拥有富饶出产的一切；
 纯粹无杂，一如最初
 刚刚离开自然子宫的伟大宝库。
 他无忧无虑地生活于斯
 羊群的增长令他心满意足，
 覆盖着和平那温柔的羽翼。
 没有恐惧，没有战争困扰他的思绪，
 他的胸中没有野心；
 他的羊只，他的曲柄杖和烟斗就是他全部的所有，
 他不需要更多，也不觊觎更多。³⁷

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自然富足的简单意象重又融入了一种带有社会含义的道德态度：从其在经典诗歌中的源头转变为“青翠的田野”。乡村生活传统上就是野心、动乱和战争的一种纯真的替换物。有无数诗歌表达过这种观点，有的带有梦幻色彩，有的则充满痴迷。正如查尔斯·科顿的诗（其名为《退隐》，恰如其分）中的这几行：

上帝！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多么美好啊！
 田野看起来多么美丽！
 我们的饮食起居是多么清洁！
 主啊，我们的时光多么幸福！
 多么平和！多么一致！

这是一种持久愿望的形式，那种想要逃离所谓的俗世，或是所谓其他人的持久愿望（这倒更有趣）。所引诗行中的“我们”就是该诗最终处的“我”：

37 In *Oxford Book of 17th Century Verse*; ed. H. J. C. Grierson and G. Bullough; Oxford, 1934; 954.

天啊！如果人们能够让我独处，
我将认为自己是个
多么快乐的人啊。

这种思想在亚伯拉罕·考利³⁸的《愿望》中，在与“城市这个巨大的蜂箱”的鲜明对比中再次表达了出来：

啊！泉水，当沉浸在你中时我
就会摆脱不安的思绪，看到了吗？
啊，田野！啊，树林！何时，何时我才能成为
你们树荫下的快乐佃农？³⁹

在一种简单的、无法归于具体某地的幻想中，这种思想持续地包含了当代社会经验和欲望的另一种特质。看到这一点真的很有趣。

考利把愿望实现的自我看作“快乐佃农”。这种愿望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吸收入自然意象的结果。约翰·霍尔在《田园赞美诗》中是如此描绘的：

伟大的主啊，每棵树都从他那里接受恩赐，
然后用树叶当作租金来偿还。⁴⁰

25 理查德·洛夫莱斯⁴¹有一首奇怪的诗，《艾琳达的手套》。诗中的浪漫蕴意完全来自这类意象：

38 亚伯拉罕·考利（Abraham Cowley, 1618—1667）：英国诗人和散文家，作品受玄学派诗歌影响，具有新古典主义特色，诗作有《诗的花朵》、《品达罗斯颂歌》，散文《关于自我》等。——译者注

39 *Poems of Abraham Cowley*; ed. A. R. Waller; Cambridge, 1905; 88.

40 *Oxford Book of 17th Century Verse*; 798.

41 理查德·洛夫莱斯（Richard Lovelace, 1618—1657）：英国诗人、军人，狂热的保王分子，写保王党人请愿书，遭监禁，诗作有《卢卡斯塔》。——译者注

你那雪白的农场和你那五间房屋！
告诉你雪白的女主人这里有人
到访，要偿付他每日的租金：
但是采摘花朵和心灵的她已然离去，
你空空如也，将被粗暴地占有。

但是不要悲伤，美丽的白房子，
你那雪白的女主人将要返回家中；
如若不然，又有什么佃农能够适合
你狭小的房间那些细长的转弯，
必然要被他自己的厄运所驱逐。

因此请允许我把我的租金留给你；
五个吻，每个落于一处……⁴²

这里，通过别出心裁的刻意的比喻，我们一刹那间看到的真实的 17 世纪乡村生活比在退隐诗中看到的还要多。然而在后来的诗歌中可以看到对实际社会阶层逐渐明确的定位：也即独立的小不动产终身保有者（freeholder）。例如内厄姆·泰特⁴³的诗句：

仁慈的上帝！赐予我一处乡村住宅吧
宁可微不足道，也不要宏伟壮丽。

或者如庞姆弗瑞特的诗句：

42 *Poems of Richard Lovelace*; ed. C. H. Wilkinson; Oxford, 1930; 58.

43 内厄姆·泰特(Nahum Tate, 1652—1715): 英国桂冠诗人和剧作家, 写过一些赞美诗, 其佳作为《万应灵丹: 咏茶诗》。——译者注

我希望有一处没有债务负担的适用田产
可以让我过雅致的生活,而非显赫:
能够满足我的普通花费:
有时还略微宽裕,能够招待朋友。
穷人之子不应抱怨
命运,他们应当过过我的生活。⁴⁴

或者蒲柏所译贺拉斯诗歌的不合格译本:

那个人是快乐的
他只愿拥有几亩传自父辈的接壤农田
满足于在自己的土地上
呼吸故乡的空气。

他的牧群挤出牛奶,他的田地生产面包,
他的羊群提供衣服;
他的树木夏日为他遮阳,
冬季可作取暖的柴禾。⁴⁵

意义深远的是,不需耕耘的自然的眷顾,那个神秘的或者乌托邦化的意象现在具有了一种社会维度:一处“没有债务负担的适用田产”,通过雇用劳工耕作而衣食无忧。正如马修·格林的诗句:

距离镇子大约二十英里的一处农庄
狭小、齐整、有益健康,属于我自己:

44 *The Choice in Poems*; London, 1792.

45 *Ode on Solitude*; Pope: Twickenham Edition, Vol. VI.

两个女仆,从未去过镇上,
 一个仆人,就是个乡巴佬,
 一个帮忙踩干草堆的男孩儿,
 其他人扶犁的时候他来赶牛……

经济现实重又出现的时候,又再次被吸收进入自然幻象之中:

但愿我那简陋的住宅坐落在
 某片精心挑选的土地上,……
 适宜鸟儿们来居住
 它们用歌声支付它们的免役税。⁴⁶

在这一有趣的发展进程中,我们看到传统的田园诗正在变成一个地方化的梦。然后,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日益变成了对真实的英国乡村生活及其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描绘,因此也是一种美化。正是针对这一点,也是对文学中新田园诗歌中的简单化传统,克雷布提出了他的抗议。

(4)

这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正式或非正式田园诗的问题。正如我所言,正式或非正式田园诗是很容易辨认的。在一些被普遍解读为描写真实乡村经济的重要诗歌中,有一种更难解决的问题,这种问题也是新田园梦想永恒的和平与纯真所依存的现有社会基础。这些诗歌中有一些描写的是乡村住宅,考利曾在《孤独》中把这类住宅赞美为自然的组成部分:

致敬! 古老而高贵的树木,如此雄伟和优良!
 致敬! 树林中的百姓!

46 A Cure for the Spleen; in *Oxford Book of 17th Century Verse*; 286.

诗意的鸟儿在林中欢唱，
用感激的歌声支付
安静鸟巢和丰富食物的费用。

致敬！贫穷的缪斯最富有的庄园宅邸！
你那乡村住宅和别墅，
所有快乐的神都无比喜爱，
以致他们常常离开他们在天上那辉煌、宏伟的大都市
来到你这里。⁴⁷

27

此处树林、鸟儿、诗人和神实际上被看作 17 世纪英国的社会结构——自然的秩序。把这与范肖的诗进行对比是很有意思的，他在直接描写 1630 年乡绅被命令回到他们的地产上去的真实情景。他看到的是：

一个幸运之岛：
漂浮在富足的海洋当中
每个树枝上都有海龟在歌唱，
一个安全的隐居处所，对所有来到的人均是如此，
正如现在的我们一样。

这正是我们熟悉的微笑的乡村意象。

然而我们，就像这里有什么敌人一样，
把遭到鄙视的田地交给乡下人，
来到四面高墙的城里
似乎要拯救我们自己。

47 In *Oxford Book of 17th Century Verse*; 713.

因此他们必须回去：

土地的汁液和鲜血流入
根部，令心脏窒息，
让它们加速的力量扩展开去，
遍布每一处。

这正是弥尔顿更为大度地设计出来的那个意象。他是在呼吁进行国民教育时设计这个意象的，基础是与作为自然产物的文化相关的意象：“把政府管理和文化的自然热度更广泛地传递到如今仍受到忽视的各个边远地区去。”⁴⁸ 范肖则预见到对另一个维吉尔的培养（这一指涉占有主导地位），但他主要的呼吁却更为直接：

不要让乡绅们不情愿去往
他们生长的地方。⁴⁹

这是看待 17 世纪乡村英国危机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当然也提醒了我们，考利诗中“辉煌、宏伟的大都市”并非经常是那个样子，或是自然就生成那个样子。

但位于这里所讨论的情感结构的中心处（即乡村宅邸和负责人的文明之间的关系），是描写真实地方和人的诗歌：典型的如本·琼森的《致潘舍斯特》（*Penshurst*）和《致罗伯特·罗斯爵士》（*To Sir Robert Wroth*），以及托马斯·卡鲁的《致萨克斯海姆》（*To Saxham*）。⁵⁰ 这些并不是任何单纯意义上的田园或

48 *The Readie and Easie Way to Establish a Free Commonwealth*; John Milton; London, 1660（第二版修订本）；重印为 *Prose of Milton*; ed. R. Garnett; London, 1921; 156。

49 *Ode upon Occasion His Majesty's Proclamation in the year 1630. Commanding the Gentry to reside upon their estates in the country*. In *Oxford Book of 17th Century Verse*; 448.

50 本·琼森（Ben Jonson, 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评论家。托马斯·卡鲁（Thomas Carew, 1595—1640）：英国骑士派诗人。——译者注

新田园诗歌,但他们使用了乡村生活的一个独特版本,以赞美一处宅邸或其主人的形式,来表达某些社会和道德价值。

你是多么幸运啊,罗斯,能够热爱乡村,
无论是自己选择,或者命运使然,抑或两者都是;
尽管城市近在咫尺,还有宫廷,
你却不受两者恶习和享乐的沾染。⁵¹

28 因此,乡绅的生活被作为宫廷和城市生活的明显对比而受到赞美。城市律师、城市资本家和廷臣们的形象被引入来点明道德教诲。

该诗接下去写道,在罗斯爵士的乡村社区中,

喧闹的乡下人成群而来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乡村经济中没有傲慢、贪婪和算计。然后琼森就能够反过来正面认同和确定田园传统:

正是这里,而非别处,属于那个古老的时代
能够夸口具有黄金之名。

但是,透过赞美的窗格看一下,真是如此么?一种新田园意象在都铎时代的一处乡村宅邸中是否得到了某种社会基础?一些评论家是这么认为的,但《致潘舍斯特》的复杂性无论如何都应当使我们感到犹豫。因为对该诗的任何没有偏见的解读,都会发现其尤为独特之处在于它通过否定进行定义的过程:

51 《致潘舍斯特》和《致罗伯特·罗斯爵士》最初发表于《森林》(*The Forest*, 1916),后来又重印于《本·琼森作品集》(*Ben Jonson, Works*; ed. C. H. Herford and P. and E. Simpson; Oxford, 1925—1952; Vol VII)。

潘舍斯特,修建你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
 展示,你并非用大理石建成;这里也没有一排
 磨光圆柱,或是黄金屋顶:
 你并不像传闻所言,有着穹窿顶塔,
 或者楼梯、庭院;但却古老巍峨,
 你缺少的东西,正是你受到尊敬的原因……
 ……尽管你的围墙是用乡下石头修起,
 但它们没有造成任何人的毁灭,也没有人抱怨,
 没有哪个在周围居住的人希望它们倒塌……
 ……现在,潘舍斯特,当那些想要使你同
 其他大厦相称的人,看到
 它们除了傲慢、矫饰的堆堆土石外,别无他物,
 就会说,它们的主人修建了它们,而你的主人却是为了居住。⁵²

这种通过否定和对比——不是与城市和宫廷对比,而是与其他乡村宅邸对比——做出的宣告,本身就足以提醒我们,不能只是从潘舍斯特到整个乡村文明做简单的扩展。傲慢、贪婪和算计的力量在地主们中间和在城市商人中间一样,显然非常活跃。因此这里赞美的东西或许是种针对新时代的压力而产生的乡村社会的概念;而这一概念的象征就是琼森在其中受到招待的那所房子。

而这正是与卡鲁的《致萨克斯海姆》的对比尤其相关之处。因为那里也碰巧有通过否定做出的定义,尽管是一处不同的房子:

你的门口没有守门人
 来检查穷人,或者将之摒据于外;
 也没有栓锁;你的大门就是为了

29

52 《致潘舍斯特》和《致罗伯特·罗斯爵士》,前引书。

让陌生人进来而修建。⁵³

或者再一次,更为微妙:

寒冷的空气本将使许多穷人
饿死,如若不是你挽救了他们,
他们的祈祷使你的餐桌
无比丰盛,无人能比。⁵⁴

这个慈善之岛就是诗人自己吃过饭的那座宅邸;不过,这是严酷经济当中的一个孤岛,正是接下去赞美之词的全部关键所在。

我们不必要拒绝承认琼森和卡鲁的幸运例外:不像其他宅邸,他们的潘舍斯特和萨克斯海姆“没有造成任何人的毁灭,没有人抱怨”;没有哪个“在周围居住的人”希望它们“倒塌”。⁵⁵我们毋需怀疑,的确有这样的宅邸和这样的人,但它(他)们最好也不过是一种权力的温和行使方式,这种权力在其他地方则是卑鄙和残酷的,它(他)们自己是自己的证明。当我们仔细看的时候,会发现这种道德并不是这一经济的结果;它是抗拒该经济的一种地区性立场和标准。

在这两首诗(在琼森的诗中更为强烈和令人信服)中,社会秩序被视为一种更为广泛秩序(也即现在有时称作自然秩序的东西,带有形而上的意义)的组成部分,这当然很明显。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东西比对自然天命的强调更为醒目了,但以我们的后见之明,这也是把双刃剑。鸟类和其他生物把自己

53 《致潘舍斯特》和《致罗伯特·罗斯爵士》,前引书。这里作者注错了。这样注释似乎这首诗和上面的诗一样,都出自《本·琼森作品集》。但这首诗就是卡鲁的《致萨克斯海姆》,出处应该是 *In Poems of Thomas Carew*; ed. R. Dunlop; Oxford, 1949。原作者在下面的注释中提到了这本书,应该提前到此处。以下四个注释,原书都是错的,本书译者已更正过来。——译者注

54 *In Poems of Thomas Carew*; ed. R. Dunlop; Oxford, 1949.

55 同上书, 27—30 行。

当作食物献出来,这究竟是哪一种风趣(因为这一定是风趣;最热情的传统主义者几乎不会说这是观察)呢?正如琼森所见,潘舍斯特庄园:

提供长着斑点的紫色野鸡
来装点你丰盛的餐桌:
田里到处都是斑斓的山鹑
自愿被宰杀供你食用。⁵⁶

卡鲁扩展了这一夸张修辞:

野鸡、山鹑,以及云雀
飞进我的宅邸,就像飞进了方舟。
公牛心甘情愿地走进
屠宰场,羊羔
和每一只牲畜都主动
将自己献出。
盘子里的鱼儿看起来
比在小溪中还要快乐。⁵⁷

事实上,在这些段落中,风趣有赖于一种观察自然的共同而自觉的视角。夸张的修辞是有意为之的,这在此文学传统中其实很传统,在其他更为开阔的视角中则受到一种共同意识的控制和认可。在某种层面上,这是一种自愿的、快乐的消费伦理。从两首诗都围绕餐桌组织起来这一点上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但是这种做法可能表现的粗鄙,例如卡鲁的诗(一种有意的夸张,就如在如此众多的骑士派诗歌显示的那样,就如由于意识到另一种视角变无

30

56 In *Poems of Thomas Carew*; ed. R. Dunlop; Oxford, 1949; 23—28 行。

57 同上书, 65—69 行。

法做出简单的陈述),在琼森那里则被某种感伤情绪所修正,某种对自己境况的自觉意识:

我不乐意坐下(就像如今一些人那样,
坐在大人物的餐桌旁)吃饭。
这里无人为我添杯,也没有一旁伺候的
侍者羡慕我贪婪的吃相:
不过端上我要的食物,让我吃吧。⁵⁸

很容易感觉到这其中的调侃。事实上,在这种殷勤吃喝的整体语气中,对土地及其产物轻松无厌地利用——对一种有组织的、合作性的生产和消费感到延长了的快乐——的指涉不仅仅是种暗示。土地及其产物是诸多早期阶段的集约耕作的基础:土地是肥沃的,人们在其上耕种以提供食物。但这就更难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谈论“自然秩序”,仿佛就是与自然保持一致的人似的。恰恰相反,这种自然秩序径直通往餐桌。

当然,在琼森和卡鲁(尽管琼森中更为可信)的作品中,这种有关自然天命的观点都是同人类共享经验联系在一起的:所有人都受到欢迎,甚至穷人都能够在此餐桌上进食。正是对这一点的强调,而非对其他的强调,支撑了有关负责任的文明的观点。在此文明中人们直接关爱彼此,而不是通过一个更复杂、更商业化的社会的抽象概念来关爱彼此。我们被告知,这就是有关责任、睦邻和慈善的自然秩序:这是一些我们现在不大搞得懂的词汇,因为旧英格兰已经不存在了。

当然,人们还是能够看明白它们所表达的含义,而且乍看之下,作为一种单纯的冲动,它是善意的。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慈善传统最为虚弱。因为这仅仅是一种有关消费的慈善,正如罗莎·卢森堡最先指出的

58 原书此处的注释有误。这几行仍然出自“To Penshurst”,应该还是出自 Ben Jonson, *Works*。——译者注

那样：⁵⁹

罗马无产者不是通过工作来谋取生存，而是靠政府发放的救济品。因此基督徒对于共同财产的要求与生产方式无关，而是同消费联系在一起。⁶⁰

因此，正如艾德里安·坎宁安所言，这种慈善——作为一种消费共同体表达出来的人们之间的亲爱关系，以基督教的餐桌和分发面包作为其自然的意象，宴席作为其社会实现——被延伸至一些时期和社会，在那些时期和社会中它变得边缘化。有关生产的慈善——真正工作并生产那些最终用来分享的产品的人们之间的亲爱关系——却由于对消费慈善（吃喝共享，而当应用于普通的劳作社会时，又不可避免地神秘化）的习惯性指涉而被忽视，被遮蔽，有时遭到压制。人们确信无疑，所以在劳动上的不慈善，都能够通过后继之宴席的慈善而得到救赎。再者，在这个传统所产生的情感和指涉体系中，上帝之名和主人之名是一个词——我们的主，这非常重要。

31

然而，任何神秘化的做法都要付出努力。潘舍斯特或萨克斯海姆的世界只有通过有意识的选择和强调才能被看作一种符合道德的经济。而这正是我们的收获：不仅在我所指涉的评判解读中是如此，在琼森和卡鲁真实的诗歌中也是如此。当然那种观察方式是有社会原因的：作者作为客人而对其主人的社会地位的认同，他们消费其他人生产的东西。但一个已经开始变得复杂的传统意象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诗意支持。肯特郡的森林里有德律阿德斯、潘和巴克斯，不仅仅是琼森致罗伯特·罗斯爵士的诗中那样的黄金时代，虽然对潘舍斯特最初的正面描写是古典文学式的，而施惠的神则是珀那忒

59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60 Luxemburg: *Socialism and the Churches*; cit. A. Cunningham: *Catholics and the Left*; London, 1966; pp. 83—84.

斯。⁶¹然而更具深意的是,通过同基督教和古典神话的传统联系,这片天佑之地被看作伊甸园。这个国家中所有的东西都由自然赋予人们,供其使用和享受,毫不费力。这个国家就是那个天堂:

早熟的樱桃和晚熟的李子,
无花果、葡萄和榲桲,应时出产;
红红的杏和毛茸茸的桃
挂在你的围墙上,每个孩子都能够到。⁶²

但它并没有被作为天堂来看待;它被作为潘舍斯特来看待,一种由地主和太太安排的自然秩序。当我们回想起马韦尔那多少有些类似的诗句时,⁶³这种操纵就显得很明显:

甘美的桃子好奇地
落在我的手里;
当我走过之时,被西瓜所绊倒,
我跌落在草丛里,鲜花缠绕。⁶⁴

32 这里,对富足自然的享用,有关花园中的天堂的感觉,成为另一种风趣的素材:堕落之前的轻松享受。那么我们会记得,从天堂堕落的整个结果就是人类不再能够轻易地从提供一切的自然中采摘食物,而是要被迫用自己的汗水争取面包。在琼森和卡鲁对自然秩序的赞美中,真正发生的正是通过艺术的

61 德律阿德斯(Dryads),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树神;潘(Pan),希腊神话中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畜牧神;巴克斯(Bacchus)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酒神;珀那忒斯(Penates),罗马神话中储藏室诸守护神、家神之一。——译者注

62 此处原注释有误。这几行仍然出自“To Penshurst”。——译者注

63 马韦尔(Andrew Marvell, 1621—1678):英国玄学派著名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英国著名诗人,长于讽刺。——译者注

64 *The Garden*; in *Poems and Letters of Andrew Marvell*; ed. H. M. Margoliouth; rev. ed. P. Legouis and E. E. Duncan-Jones; Oxford, 1971; Vol. I.

力量对这个诅咒做出的提炼：一种神奇的再创造，对可视为自然的慷慨。然后又是自愿的慈善再创造：两者都用来为乡村地主辩护并祝福，或是通过典型的具体化做法对其宅邸进行辩护与祝福。但这种对劳作诅咒的神奇提炼其实是通过劳工的生存的简单提炼来完成的。饲养动物并将它们赶到宅邸里屠宰、做成肉食的那些真实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设置陷阱捕捉野鸡和山鹑以及捕鱼；他们种植果树，为它们施肥并采摘；这些都没有呈现出来；他们的工作全都由一种自然秩序来替他们完成。当他们最终真正出现时，只是作为“喧闹的乡下人”或者，更简单一些，作为“很多穷人”，而展示给我们的则是慈善和亲和。正是带着这种亲和，老爷们向他们布施。布施的东西不是他们生产的，而是不知怎么地，变成了自然秩序塞在老爷们的手中之物。正是这种情形，这类关系，其合理性最终被宴饮所证明。我们有必要暂且把后来的一段由一个劳工，也即斯蒂芬·达克于18世纪20年代描写的乡村宴席同此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我们发现桌上摆满食物，
杯中盛满浓郁的艾尔酒，令人兴奋，
他无比慷慨，不断敬酒，
以致我们以为不必再去劳作，也不必在意过去。
然而次日一早就真相大白，
我们必须重又辛苦劳作；
重新回到那些谷仓，
为明年的玉米腾挪地方。⁶⁵

先前的意象遮蔽的正是宴席和工作之间的这种联系。它们只是选取每个人都会忘记劳作并默许“欺骗”的那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使之变得“自然”和永恒。真正重要的就是这种观看方式。琼森眺望潘舍斯特的田野，看到的不是

65 *The Thresher's Labour*; in *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 Stephen Duck; London, 1736.

劳作,而是一片自我出产的土地。卡鲁甚至根本不看:

尽管霜雪遮蔽了我的双眼
使我看不到屋外美景……
……但你(萨克斯海姆)的大门之内
也是如此雅致
充满了土生土长的甜美之物,为
屋檐之下带来福祉;
你的贮藏
冬季不曾减少,夏季不曾增多。⁶⁶

33

于是,这里不仅劳作,甚至四季的生产变化都在神秘化的赞美中遭到了抑制或遮蔽:一种自在的富足,“土生土长的甜美之物”。把这称作自然秩序是对语言的滥用。这就是这些诗歌的本质:不是乡村生活,而是社会赞美;一种人们熟知的对贵族及其服务者的夸张修辞。

赋予琼森和卡鲁诗歌传统形态的那种社会秩序事实上在另一类乡村诗歌中得到了直接的描写,赫里克⁶⁷的《典当手推车》(The Hock - Cart)是其中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首诗中,劳作的事实得到了承认:

夏日之子走来了,正是他们的劳作
使我们成为美酒和油脂的主人:
正是通过他们的辛苦劳作和粗糙的双手,
我们耕耘土地,然后收割。
现在他们头戴玉米叶,走来了,

66 *Poems of Thomas Carew*, 1—2 行及 5—10 行。

67 赫里克(Robert Herrick, 1591—1634):英国牧师,诗人,本·琼森的高足,作品回复了古典抒情诗风格,著有诗集《西方乐土》等。——译者注

吸着烟斗,唱着丰收的歌回家去。⁶⁸

但这是那类特殊的劳动歌曲,针对的是他人的劳动。当收获之物已经运回家中后,这首诗继续写道:

来吧,我的老爷,来看看手推车。

这个老爷(诗中所称呼的)是“米尔德威大人阁下,威斯特摩兰伯爵”,而赫里克把自己放置在老爷和劳工之间,使得主导的社会关系变得明了(在琼森和卡鲁的诗中这种关系则是被暗示的和神秘化的)。劳工们必须为老爷的健康干杯,然后还要记得回去工作,就像牲口一样:

必须把

温顺的牛重新套上轭

一起回到犁

耙那里(尽管它们现在已被挂起)

而且你必须知道,你的老爷的话一点也不假,

你必须供养他,因为他的食物也养活着你。

这种乐趣就像雨水一般

不是为了淹没你的痛楚

而是为了重新带来春天。⁶⁹

早期的这种欢快的对人的管理在情感上是很残忍的,它使用雨水和春天的比喻,使得就连饮酒都变成了一种获取更多劳力(和更多痛楚)的方法。但表层的东西——

68 In *The Poetical Works of Robert Herrick*; ed. F. W. Moorman; Oxford, 1921; 100.

69 同上。

你必须供养他,因为他的食物也养活着你

34 ——正是包含在早期那些有关自然富足的意象中的那种令人痛苦的矛盾。比起《潘舍斯特》或《致萨克斯海姆》来,《典当手推车》不常作为自然的和道德的经济的例子被人引用,或许这并不令人奇怪。但所有成问题的都是对真实过程意识程度。赫里克所令人尴尬地吟咏的,正是琼森和卡鲁所思索的。这是一种我们如今不大可能忘记的社会秩序和作为结果的一种观看方式。

4 黄金时代

35

但是仍然存在一种视角危机。当我们在时间上向回运动,不断朝着一个更早、更快乐的乡村英国追溯时,我们将无法找到一个地方或一个时间阶段,能够让我们真正停下来。

不过这种回溯也有其自身的逻辑。如果我们选取一个足够长的时间阶段,就不难看到英国乡村生活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如此的广泛,如此的复杂,更不要说那些重要的地区差异了,以至于似乎并不存在能使我们清晰辨认出那些可被方便地称作独立时代的时间点。那些细致的历史著作无处不在显示,许多旧的形式、旧的习惯和旧的感觉方式在新发展的总体趋向已清楚无疑的时代中依旧得到了保留。于是,某个看起来陈旧的秩序,某个“传统”的社会,仍然在各种时期不断出现,再出现,令人眼花缭乱:在实践中表现为一种观念,某种程度上以经验为基础,以之为参照我们可以衡量当代的变化。因此,从根本上讲,用以理解这一后向参照的那种情感结构并不属于历史阐释和分析的范畴。真正重要的是对于变化事实的这种特殊反应,而这具有更为真实且更为有趣的社会原因。

因此,在我们审视的那些诗歌中并没有历史回溯。不过,我们发现的是对封建以及紧随其后的后封建时代的价值观念的美化:对一种以固定的、互惠性的社会和经济关系(据称这类关系是非常全面的)为基础的秩序的美化。于是,这些诗歌就和一个时期在时间上发生巧合,在该时期中,另一种秩序——资本主义农业秩序——正在被成功地开创出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此巧合背后存在着一种如今仍旧至关重要的价值冲突。那些对于封建的或贵族秩序的颂扬:

而且,你必须知道,你的老爷的话一点也不假,

你必须供养他,因为他的食物也养活着你¹

这种颂扬曾经在一种理想化的回顾中被广泛用作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对责任、慈善和向穷邻居敞开大门的强调与资本主义动力形成了对比,后者把所有社会关系功利性地缩减为赤裸裸的金钱秩序。

36

这导致了一种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中很明显的价值危机。对新的金钱秩序之粗鄙和狭隘进行回顾时,常有一种激进态度。这种态度被用来充当对我们自己时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承载人道主义情感,但是通常又将这些情感附着于一个前资本主义的,因此是无法挽回的世界。于是一种必要的社会批评指向了更为安全的往昔世界:指向一个书本和记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学者可以表现出职业性的人道主义,而在他自己的真实世界里他不是闭塞的,就是冷漠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包裹着社会价值,而这些价值如果变得活跃起来的话,就会立刻跃升,成为对某些制度、某些社会阶层和道德稳定性的辩护。这些制度、社会阶层和道德稳定性带有封建性质,但也具有更为相关和更加危险的当代适用性。在 20 世纪的知识分子运动中,有些这样的“乡村”美德离开了土地,成为明确的社会反应的纲领:这些社会反应维护传统的财产分配,或者以血和土地的名义攻击民主。

但是,许多人并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在英国可以辨认出一种不稳定的,但却持续存在的乡村-知识分子激进态度:真心而主动地敌视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反对商业主义,反对开发环境;依恋乡村生活方式和情感,迷恋文学和传统信仰。但是,在所有这类情感中,判定点都在于资本主义转化的性质。一如各种激进态度,任何对当下的批判都会面临必须在过去和未来之间选择其方向的时刻。如果选择了过去——现在人们如此经常,如此坚定地做出这种选择——我们就必须把辩论进行彻底,直至那些受到防护的根部;把关注,人类的关注,推回到关键价值从中产生的那种自然经济,那种道德经济,那种有机社会。

1 *The Poetical Works of Robert Herrick*, 前引书。

一开始就有一个难题。单就此立场而言,最醒目的反对者是某些大都市知识分子,他们也属于一种可以辨认的类型。我指的不仅是那些从来对乡村状况一无所知,因此其无知清晰可辨的人,而且包括所有那些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农民、乡巴佬、农村小丑长期抱有轻蔑之意的人。在这些中间,很盛行在聚会上不断地戏仿远方乡村地区大量并有了广为接受的戏仿形式,牛奶、稻草、牲畜和粪肥都能够立刻招致戏仿和笑声。如若不是他们包含其他可能存在的,更为严肃的立场或与之发生交叠的话,他们大可以自娱自乐。例如,有多少社会主义者曾拒绝使用那句有关“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²的总结性档案用语?直到最近,事实上直到中国和古巴的农民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这种思维方式是欧洲的城市社会主义者所惯有的。而在它的背后,接近历史辩论的中心的37 地方,总是存在一种更为严肃的立场。因为自马克思之后,在某些语境下,人们常会谈到资本主义的进步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市化和现代化的进步性。在某种历史图解中,既有对资本主义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厂和城镇长期的悲惨生活进行的强烈指控,但同时也心甘情愿地对相同事件反复使用“进步的”这一形容词。我们不断地听到这一轻快的、不耐烦的所谓现实主义的反应:对资本主义革命的高效生产率和新近解放的生产力的反应;对资本主义特有的城市和工业发展既诅咒,又美化;对权力统治——力量、收益、生产、人类对自然的控制——的不假思索的赞美,就好像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能够和随之而来的对人的剥削割裂开来似的。他们做的就是谴责这个,表扬那个;而解释这种情感混乱的最合适的学术惯用语就是辩证。最后作为混乱的高潮而需要加上的,就是一种新近的评论,一种补救性的描述,也即在某个阶段——是现在吗?是昨天——资本主义开始失去这种进步特性,而为了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更有效地控制自然,资本主义必须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企图完成资本主义事业。面对此强大趋势,就连那种陈旧的、悲伤而思古的激进主义似乎都带上并体现出了某种人文关怀。

2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3,42页。——译者注

但最终它无法做到这一点,无法成为它所暗示的东西。在简单的怀旧和简单的进步趋势之间存在进行冗长辩论的空间,但却无法给人带来启迪。我们必须换种方法重新开始:不去对一种或另一种制度进行美化,而是从历史开始,那些美化不过是对此历史做出的偏颇的、误导性的回应。

首先,把对“自然的”或“道德的”经济(如此多的人都信赖这种经济)的美化与新资本主义制度雄心勃勃的残酷性进行对比。关于这种经济,几乎没有什么是道德的或自然的。在最简单的技术含义上,它被视作一种“自然的”生存农业,尚未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这已经令人感到怀疑,而且存在许多例外情况;尽管这一重要论点可以被部分接受。然而,实行这种农业的社会制度同后来人类所经历的任何制度都一样苛刻,一样残酷。即便我们把这种制度下经常出现的战争和匪患——难以计数的人们种植庄稼和饲养牲畜,最终却遭到劫掠,房屋被烧毁,他们也被捆起手腕带走——排除在外,这种经济,即便在和平时期,也是一种最彻底的剥削制度:人和土地一样都是财产;多数人都沦为劳作动物,被强制进贡、强制劳动或被“如牲畜般买卖”;他们也受到“保护”,不过只是像牲畜和溪流那样受到保护,以便他们能够付出更多的劳力,生产更多的食物,抛洒更多的血汗;在其所有运行的关系中,这种经济都指向一种相当彻底的身体和经济控制。“乡下人就像柳树一样,修剪后才能更好地发芽。”³ 从一切重要的方面来看,郡副司法长官的这句格言都可视为这种“自然的”和“道德的”经济原则。

多少世代以来,人们都在不断地清理土地,在边缘地区分散建立起他们的居住点。他们带着他们相应的责任 and 美德,一度以这种直接的方式生活着。当我们回顾早期英国社会时,我们总是会记起当时的人口是多么少,他们在各个地方直接定居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极度分散的凯尔特农场;罗马统治时期的村庄耕种的土地只是现今的百分之二到三;有历史记载的千年期间,这个国家的总人口仅仅从不到百万增长至刚过百万。这些事实提醒我们,早期的定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同自然的直接搏斗,也即清理荒

3 引自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M. H. Dobb; London, 1946; 44。

野。但这从来就不是故事的全部。部落定居服从利剑的权力,还要进贡;凯尔特、萨克森和斯堪的纳维亚王国都是建立在全国范围或地区性的掠夺之上。即便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别的人出于各种压力而在不断涌入;为了征服,为了逃离贫瘠的土地、饥荒或令其恐惧的事物。或者,当简单的地方防御建立起来并发展成军事体制后,就有了另一种入侵:内部权威和义务的重新分配。无论内外,都有武装团伙的无情侵入,他们带着他们的显赫头衔,国王和男爵,来吸吮他人的血汗。这些武装团伙在他们的神灵和教会的保佑下,成为了社会的和自然的阶层,而在金字塔的底层,许多世纪以来一直生存着耕作土地的劳工,自然的人——他们有时能够找到一个生存空间,一个可以定居的工作区域;但常常也会剥夺这一空间——不过无论如何他们都得开拓土地,辛苦劳作来养活这一上升中的社会阶层,该阶层可以说在诺曼底国王以及后来的英格兰国王的中世纪“秩序”中升至巅峰:这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剥削体制,因为它打着“你必须供养他”的旗帜,组织得更严密,剥削的范围也更广泛。

只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当我们读到随着这一秩序开始土崩瓦解出现的对于混乱的抱怨时,我们的立足点在何处?我们认同的又是什么人?是农奴、佃农、隶农?或是这一抽象的秩序?连续多少世代以来,无数人们不过是这种秩序的工具。假设我们可以正确地做出选择——尽管总是不大可能存在真正将自己置身大多数人中间,并试图按照他们的体验方式来看待世界的历史学家——但当该秩序发展成新的秩序时,我们又该认同什么?

39

这个问题部分地取决于该秩序的瓦解是如何被描述的。通常把黑死病的爆发视为该秩序衰落的开始。黑死病流行了二三十年,在此期间,死亡人数超过百万,许多居民区被废弃。瘟疫的连续爆发减轻了不断增长的人口给过度耕作的土地带来的压力,地主和佃农及劳工之间的社会关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不过不管有没有瘟疫,在这一秩序内部已经存在某些力量,这些力量无论如何都会导致变化的发生。城镇和修道院繁荣兴起:它们往往是由封建地主所建立,但却发展出新的、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及概念。林地被清理出来,可以提供木材、燃料和牧场。羊毛贸易的增长提供了开发更多牧场的动力,这又导致了大范围的圈地运动,许多靠耕种为生的村庄被摧毁,各种

新型资本家地主快速涌现。整体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封建秩序衰落的故事,而是有关蓬勃发展——而且经常是残酷地蓬勃发展——的故事。对修道院的压制释放出大块大块新的土地,巩固了新的所有权形式。直到内战爆发前,官方还不时会反对大规模的圈地和新的所有权形式,但到了复辟时期,一个代表新式地主的政府就已经掌握了政权。这明确标志着新秩序的建立,这种新秩序已经发展了至少两个世纪:在那些大庄园和重建住宅,尤其是那些“乡村宅邸”的身上,这一秩序已经有了物质表现。这些“乡村宅邸”自16世纪初就开始取代城堡和修有工事的农庄,并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们很快将成为新的社会制度引人瞩目的中心。一种更稳定、更集中的秩序——一种社会和经济秩序,而非直接的军事和身体控制——正在一个更加繁荣、人口变得更多的国家中充分形成。在这些世纪当中,如果光看主导阶层的财富的话,这就是一个有关发展和成就的故事,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却是一种形式的统治代替另一种形式的统治:神秘化的封建秩序被另一种神秘化的农业资本主义秩序所取代。后者通过头衔和权威象征,通过对某种“自然秩序”连续不断的建构来继续迷惑和控制民众,从而与前者保持了足够的连贯性。

但接下来英国乡村历史的重要问题就是中间阶层的不断复杂化:他们处于封建领主和农奴之间;大土地主和无地劳工之间。任何对封建制度本身或者后继的资本主义诸阶段的简单描绘都会低估这些中间群体的重要性:他们是自由民和部分农奴,可终身保有产业的大佃农,小地主,对公地和公共牧场享有权利的小农场主和小佃户。混乱时期既见证了这些中间群体的出现,但也包含了他们所遭受的压制,他们的抗争,以及他们内部的分化。不过我们只需看看今天英国乡村的情况就能明白这些中间阶层中的一些人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即便在今天,他们仍不可避免地处于严峻的经济压力之下。许多英国乡村史专家,许多以英国乡村经验为素材的作家自始至终都认同封建贵族和土地主立场。至少到18世纪,这一直都是想象文学通常采取的立场。但在每个时期也一直存在着强有力的为中间阶层代言的人:事实上要远远多于那些为真正遭受剥削的无地贫民——他们才是真正而且永久的大多数——代言的人。这些变化着的,有时是无意识的认同方式非常关键,因为

我们正是要以它们为根据,来检验混乱引起的各种反应以及那个反复出现的,有关更快乐、更自然的往昔的神话。

有趣的是,这个有关快乐往昔的神话曾被所有这些认同立场所利用,尽管方式不同。我们曾在琼森和卡鲁的作品中看到他们用此神话来为贵族服务:他们把土地和地产神秘化为黄金时代和天堂诗意的计量器。他们所颂扬的当然并不完全是封建制度:地产被描写为上天所赐予;它没有明显的起源,正如看不到其中有明显的劳作一样。但萨克斯海姆是农业混乱的产物:它于1500年左右被占用,1531年传到克罗夫茨家族手中。当卡鲁造访该地时,它之所以显得重要,是由于它同宫廷的关系;该地是往返纽玛克特赛马会的旅程中一个很受欢迎的休息站。作为娱乐的一部分,那里常会举行假面舞会,这吸引了诗人们的到来。于是一套相当明确的社会关系被父亲般的贵族形象神秘化了。

萨克斯海姆现在保留下来的东西,引用这位为该村庄撰史的人的话说,就是:

田野中的一条护城河,教堂里的一两块纪念碑,
以及相当有限的慈善活动。

考虑到这个家族两百年的历史,他又补充道:

他们本应做得更多。⁴

潘舍斯特当然仍屹立不倒,还出现在小册子和广告中,但它其实是以皇家庄园的身份开始它的辉煌历史的:它的建造:

没有造成任何人的毁灭,没有人抱怨

4 *Little Saxham Parish Registers, 1559—1850*; Woodbridge, 1907.

——后来由于死刑和剥夺财产而易手,再后来爱德华六世把它赠给了威廉·西德尼。西德尼是宫廷教师和侍从,亨利八世的前管家。半个世纪之后,当琼森造访之时,这段历史还算不上是种永恒的秩序。和萨克斯海姆一样,艺术在这里受到引人瞩目的资助,但作为一处产业,潘舍斯特依靠的是典型的16世纪情境,也即最快速获益的途径是同宫廷保持亲密关系。社会形象再一次掩盖了一套新近产生的明确的社会关系。殷勤款待曾赠予自己产业的王室,这种做法既是出于礼节,也有内在的必需性。

如果有人要求我们表明对那些明显比较新式的投机地主的态度时,我们应当记住这些“传统的”居住地的近代特质,这很关键。虽然潘舍斯特和萨克斯海姆如今被视为旧的自然秩序的象征,但其实它们是新秩序的直接产物,正如所有那些“乡村宅邸”一样,不管它们有没有被美化。但是考虑到它们背后隐藏的固定的、神秘化的利益,就很容易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抱怨后继新人对它们的粗鲁攫取。现在,通过和此自然的比较,以潘舍斯特这个王室礼物——表面看来它是自我生发的——为参照,就不难体味出琼森为沃尔波内⁵设计的台词的尖刻性。沃尔波内如此评论当时明显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

我不参与贸易,不搞投机;
我不用犁铧伤害土地,也不去养肥牲畜
让它们被残忍屠宰;我没有炼铁厂、
榨油厂、面粉厂,或者工人来把这些东西碾成粉末;
我不会吹制精美的玻璃,也不会让船只去遭受波涛汹涌的海洋的威胁。
我不在公共银行里存钱,
也不和私营高利贷者打交道。⁶

5 沃尔波内是琼森所著喜剧 *Volpone, or The Fox* (1605—1606 年上演,1607 年印刷出版)中的主人公。沃尔波内是位狡猾富有的威尼斯人,喜欢恶作剧。他假装病重来戏弄那些觊觎他财产的亲戚们,让他们赠予自己昂贵的礼物。最后他的阴谋败露,受到惩罚。——译者注

6 *Volpone*, Act I, sc. i.

的确,这番话所表达的对私欲的克制——超越了普通人的辛苦劳作和对财富的追求——听起来就像是潘舍斯特的主人说的。但这是沃尔波内——骗子、狐狸——的话:这是一个值得人深思的讽刺。

从社会的另一极,从无地者和贫困者的立场看,有关黄金时代的概念似乎理解起来更困难些。不过功能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贵族对此概念的利用中,惹人注目的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在一片正在涨潮的无情海洋中,有一个神奇的、上天赐予的小岛。而对无地者来说,剥削却更为彻底,这不难理解。的确,他们是从“自然秩序”的内部看问题,他们对更古老时代的指涉也因此更具批判性,更为绝对:

当亚当锄地,夏娃纺织之时
谁又是绅士?

无地穷人强调的是长期的腐败,而非幸运的个别例外时期。甚至连基督的救赎都无法打动他们:

42

我们是按基督的模样造出来的人,但我们却被迫像牲畜一般活着。⁷

这是最为卓越的贫苦农民组织之一,14世纪的“大社团”的宣言。该宣言没有把一个被认为是共同拥有的宗教信仰神秘化,而是对之提出了质疑。不过,在无地者的情感背后,基本上总是相信曾存在过一个更古老的,尚未腐败的时代,而斗转星移,贫穷依旧,这个想象中的时代就具有了各种历史属性,种类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在人对历史仍然无知的时候,在对任何当代地主的合理仇恨中,人们会无休止地回顾一个先于这些地主存在,也先于任何地主存在的时代,而如何称呼这个时代,或者具体指的是哪个时代,都是不重要的,也是随意的。回顾即是渴望,因为这样一种观点不仅仅产自基督教的伊

7 引自 *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 A. L. Morton; London, 1938; 119。

甸园——人类堕落之前的那个简单、自然的世界——概念,而且产自有关黄金时代的一个版本,它不仅仅把黄金时代形容为奇妙的、自我生发的自然。该版本建立在有关一种原始社群,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的概念之上。它并不是来自赫西俄德的诗歌,后者把黄金时代描写为人在其中像神一般生活的时代。该版本的源头应该是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古希腊时期,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就很明显:

没有农民开垦土地;甚至用地界标来分配或分割地面都是不合法的;人们追求共同的收益,而土地本身则更为慷慨地提供所有的东西,不受任何人的指挥。⁸

这种观点融合了自我生发的土地的概念和财产与效用自觉共享的概念。它和卢克莱修⁹的观点形成对比,卢克莱修认为原始人看不到公共利益。但在有一种传统中,这种融合的观点却一直存在,而这必须与贵族所宣扬的反社会的、神秘化的黄金时代——自我生发的土地被其所有者,也即它的上帝所赐予——区别开来。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中,我们发现了有关这种共享概念的诸多痕迹。正如斯宾塞在《哈巴德大妈的故事》中借另一只狐狸之口所言:

不分你我;凡人那时的

幸福三倍于今。

那就是农神撒杜恩统治下的黄金时代。¹⁰

或者如查普曼¹¹的诗句:

8 《农事诗集,第一部》译文收录在 L. P. Wilkinson 翻译的 *The Georgics of Virgil*; Cambridge, 1969。

9 卢克莱修 (Lucretius, 约 94—55BC): 古罗马诗人、哲学家。——译者注

10 *In Works of Edmund Spenser*; ed. Osgood and Lotspeich; Baltimore, 1932—1949; *Minor Poems*, Vol. II, 110.

11 查普曼 (1559—1634): 英国诗人、戏剧家、翻译家,译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主要作品包括诗作《和平之泪》和剧作《向东方去!》等。——译者注

那时,并无你我之分,
所有东西均共有:无人遭虐待,
大地公平地出产她的果实。¹²

这种有关黄金时代的稳固而独特的版本是一种神话,它发挥着记忆的功能,因而可以被无地穷人所利用,表达他们的渴望。用“大社团”的话说:

43

天下所有东西均应共有。

这一主张将一直传递下去,到17世纪的掘地派,再到我们时代的土地宪章运动者和激进劳工。人们几乎绝望地坚持着对快乐往昔的信仰,但与其说是认可实际的传统,还不如说是出于想要改变的冲动。

然而,对失落的纯真这一概念最有趣的利用并非来自地主阶层或无地穷人,而是来自不断变化的中间群体。因为这些人总是有谋生之法,却又都是暂时的(正如维吉尔的《牧歌》中所描绘的):他们在变化的社会结构中有自己的位置,但却不断面临失去此位置的威胁:面临被向下推入无地穷人组成的无名大众之中的威胁,陷入困顿之中,而许多人最终也的确落得这样的下场。这类人通过变化提高了社会地位,他们也易于对重新开始的或持续发生的变化感到不满。他们对新的历史阶段的代理人的描述确实充满了愤怒,但他们对低于自己的人——那些“懒散的劳工”——的描述则使这种愤怒变得模棱两可。这在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中所表达的有保留的人道主义中就可见一斑。莫尔对新的剥削者和勒索高额地租的地主的控诉是强烈而清晰的。

有为数众多的绅士,他们就像金龟子一样无所事事地生活,别人为他们劳动,但他们却仍然感到不满意:我指的是他们的佃户,他们通过提

12 G. Chapman: *Dramatic Works*, Vol. III; London, 1873; 117.

高地租把佃户欺压到极限。¹³

对小佃农的社会认同以及对富有地主的仇视同样显而易见。

这群贪婪的、永不知足的人是他们的故乡的瘟疫。他们会用一道栅栏或树篱围圈起数千英亩的土地，农夫则失去自己的田产……或者被强迫在圈起的土地旁边居住，或者由于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伤害，他们身心交瘁，不得不变卖一切……¹⁴

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圈地运动对小人物的驱逐。但除了小业主的破败和好客之道的衰落外，还有另外一种趋势，这在莫尔的著作中也同样受到了气愤的指责：

44

和这片悲惨的贫困景象同时存在的，却是无边的挥霍，可恶的奢侈和过度的放荡。因为不仅绅士的仆人，而且还有手艺人，甚至包括乡村里的耕夫以及其他各种人，他们穿着新奇的服装，餐桌上摆满昂贵的食物。¹⁵

这是对奢侈的穷人酸溜溜的指责。这种指责在《劳工者法令》颁布时代朗格兰的诗歌里我们就曾听到过，那之后，几乎在每个时代我们都听到过：不仅在富人反复吟唱的可笑的合唱曲中，而且在中等人士——那些没有安全感的人——那更强烈、更严重的忧虑中都曾听到过。这两种针对投机富人和懒散穷人的抱怨，在莫尔的作品中被一个修辞高潮集合在了一起：

不要让这些有钱人高高在上，不要再让他们独占和囤积，利用差

13 《乌托邦》，19。

14 同上书，21。

15 同上书，22。

断来随意操控市场了。不要让如此之多的人无所事事地生活了,让人们恢复勤劳和节俭,让人们重新动手做衣服穿,让懒散的人可以通过诚实的劳动来打发他们的时间,并能够有所收获。¹⁶

重新工作,也就是说,按我们的要求和条件并以我们的方式重新工作,同时上帝保护我们不受强大的垄断者们的不公平竞争的伤害。因此,自然的理想就是再创造出一群小业主来,而这一理想被投射在了乌托邦岛上。有关一个更幸福的原始状态的神话再一次得到了利用,韦斯普奇¹⁷和其他人对他们在新世界中所见的原始经济的叙述又为该神话做出了一些补充。但在那个天堂之岛上,并非所有的东西都是共有的。这更像是个小业主的共和国,通过法律来规范和保护民众,但也通过法律来强迫劳动。

这一切背后的社会经历是很明晰的。在严格的封建秩序分崩离析之时,农民中的上层趁势崛起,他们通过几代人的经验产生了有关自由和独立的概念和幻想,但他们在羊毛贸易的繁荣所带来的市场变化和农业技术变革中遭到大土地主——也即这些新兴人士中最为成功者——的压迫和侵占。于是,基于暂时的稳定而产生了一种道德抗议:就像在接下来的乡村抗议史中一再发生的那样。这种抗议是可信而感人的,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却又不真实的。它希望获得父权式的地方关爱,希望有全国性的立法来保护某些新近出现的所有权和劳工形式。这样的理想有诸多基础,包括对封建主义专制的拒绝,对金钱造成的新的专制的深切痛恨,试图稳定一种过渡性秩序,在此秩序中小人物们会被保护不受圈地运动的伤害,但同样他们的利益也被保护不会遭到他们雇用的懒散劳工的损害,等等,而看起来他们对这些基础的利用几乎是同等的。就这样,一种道德秩序被从封建传统及其终结中提取了出来,不切实际地试图将自己强加于内在不稳的社会形势之上。财产的圣洁性不

45

¹⁶ 《乌托邦》,22。

¹⁷ 美瑞格·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 1454—1512):意大利探险家,曾对南美洲做过多次探险航行,并确认美洲大陆并不是印度,推翻了之前哥伦布的观点,被认为是“新世界”的实际发现者。——译者注

得不与激烈变动的财产关系共存,慈善理想则同严酷的劳资关系——不论是新的模式,还是旧的模式——共存。这就是与混乱无序的现在相对立的,对有序而快乐的往昔的想象的第三种来源。这是建立在某种暂时的境况和对稳定秩序的深切渴望之上的理想化产物,它被用来掩盖和逃避当下现实的痛苦矛盾。

5 城镇和乡村

46

不过,最终的情感结构并不仅仅是建立在快乐往昔的概念之上的。它还基于另一个相关概念,也即纯真:田园诗、新田园诗和反思性诗歌所表现的乡村纯真。要对此进行分析,关键在于乡村和城市以及宫廷之间的对比:这边是自然,那边是俗世。这一对比常常就依赖于对乡村劳作和这种劳作通过其得以组织起来的那些财产关系的掩藏,对此我们已经有所评论。但在这一对比中还存在其他元素。农业生产的方法——农田、树林、成长的庄稼、牲畜——对观察者来说很有吸引力,而且在许多方面,在好的时令,对那些在其中劳作的人也很有吸引力。因此这些东西可以有效地同商业主义的交易所和会计室形成对比,或者同工业生产的矿井、采石场、磨坊和工厂形成对比。在许多方面,这种对比在现实经验中仍然有效。

但自始至终,在农业开发的过程——这事实上已经化作一种风景——和这种开发在法庭、金融市场、政治权力和明显的城市支出等方面的反映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分裂。

城镇和乡村生活之间的修辞对比确实是很有传统的:昆体良将其作为一个主干论题的第一个例子,¹而在后来的希腊和拉丁文学中,贪婪和单纯在这些典型区域所形成的传统对比也很常见。不过,主要是在涉及罗马帝国之处,当城市开始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机体时,这一对比被固定了下来。在尤维纳利斯粗鲁的讽刺诗中,²我们就发现了再传统不过的这种格调:一份连续而清晰的腐败现象的清单。

1 昆体良(Quintilian, 35? —96?):古罗马修辞学家、教师,著有《雄辩术原理》共12卷。——译者注

2 尤维纳利斯(Juvenal, 60? —140?):古罗马讽刺诗人。——译者注

我在罗马又能做什么？我从来就没有学会如何撒谎。³

这种热闹的生活，充斥着奉承和贿赂，有组织的教唆，喧哗噪声和川流车辆，加上因有人抢劫而显得不安全的街道，拥挤破旧的房屋和时常面临的火灾危险，这就是城市本身：以它自己的方式存在着。于是，从这个地狱退回乡村或者海边，比起仅仅把乡村和城市生活方式相对立来，就是一种不同的幻象。当然，这是一个食利者的幻象：他所寻找的凉爽的乡村并不是劳动农民的乡村，而是幸运居民的乡村。那里有乡村美德，不过只是作为一种记忆，正如《讽刺诗》第十四首所表现的那样：

年迈的山区农夫
常会告诉他们的儿子们……
要对简陋的茅舍感到知足……⁴

在城市中，这些美德则常常是骗人的怀旧感伤：

罗马的那个小集团假装拥有
古老的农民美德，作为他们放荡生活的托词。⁵

因为这个幻象是典型的城市式的，即便当它进行否定之时也是如此。

在那些日子里，当世界
还很年轻，天空仍然崭新，人们的生活完全不一样。⁶

3 Juvenal; *the Sixteen Satires*; tr. P. Green; London, 1967; 88.

4 同上书, 269。

5 同上书, 75。

6 同上书, 127。

但在讽刺诗第六首中,这一对往昔的传统指涉指的却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那时,冷风飕飕的
洞穴是人们唯一的住所,唯一的家宅
神、家人和牲畜全都一起关在黑暗之中⁷

而且那时妇女“比她们打着橡果味饱嗝的丈夫还要邋遢粗鄙”。被美化的不是乡村经济,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而是在乡下购买的一幢可终身拥有的住宅,或者“一处迷人的海边别墅”,或者甚至是“海面上一个贫瘠的岛屿”。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有关乡村的梦想,而是一个有关城市郊区或者郊外住宅区的梦想。而且它是对城市内部腐败——律师、商人、将军、皮条客的兴起;趋炎附势和唯利是图;拥挤不堪的生活状态所产生的噪音和危险——的直接反应。事实上,在讽刺诗第十五首中,受到赞美的是有关城市的理想:

主权国家的理性,彼此帮助的冲动,
把我们分散的群体聚集成民族,放弃
我们祖先曾以之为家的
森林;
群体一起修建房屋,因为邻居在周围的
存在
使我们更安详地入睡,学会集体安全……⁸

然后那个精确的注释被加了上去:

但如今甚至连蛇与蛇之间都比人之间相处得更好。⁹

7 Juvenal: *the Sixteen Satires*; tr. P. Green; London, 1967; 127.

8 同上书,87。

9 同上书,286—287。

这种对腐败的城市生活强有力的讽刺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特殊的影响;而许多它影响不到的地区和后世的人们则又都重新体验到了这种讽刺。不过,重要的是它是如何被吸纳进城镇和乡村生活方式这种更为温和的传统对比的。毕竟,罗马是个特例;一个帝国首都,一个大城市。本可以追溯到其源头的:它是建立在对一百个民族的剥削之上的。但当罗马被吸纳进有关任何城市秩序和任何乡村秩序之间关系的描述时,作为肯定后者的一种方式,它独特而壮观的腐败生活就变得非常不同了。毫无疑问,这就是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时刻。

至于城镇的增长、中世纪晚期的新城市运动以及后封建时代的定居活动,导致这些现象的社会和经济原因现在仍然没有定论。有些城镇是通过诸如贸易扩展这样的方式独立发展起来的(例如皮雷纳)。有的城镇的发展则是通过与寺院和军营之间的联系。独立手工生产也有了重大发展,出现了集中的趋势和城市式的控制形式。但直接或间接的,多数城镇似乎都是作为农业秩序本身的一个方面发展起来的:在简单的层面上是作为市场;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则是作为金融、行政管理和二次生产的中心,这反映了真正的社会秩序。因此出现了各种相互作用和张力,有些城镇则发展出了一定程度的自治。但就我们所谈论的时期而言,也即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16和17世纪,社会的有效根基仍然是土地财产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生产,而城镇,甚至包括首都,都与此主导秩序有功能上的联系。而新的基础之一,也即商业利润,事实上是对此直接的关系造成了烦扰。传统上的抱怨大多都是对这种烦扰的表达。但当我们读到乡村美德和城市贪婪之间的抽象对比时,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社会和道德秩序之间存在的固定的、必要的和功能上的联系,而传统上这两种秩序很容易被对立起来。

因此,在琼森写给罗斯的诗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乡村绅士和城市俗人之间的对比。但如果不是忙于替人打官司证明土地所有权的话,那么那些律师们的大部分时间又花在了什么上面?交易所里进行的交易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国内被忽视的劳工的剩余价值,而随着贸易的发展,还包括国外劳工的。随着城市金融秩序的重要性的提高,新资本中的很大一部分流向哪里了呢?难道不是流回了乡村,进一步加强农业剥削的力度吗?被轻易限定在城市之

内遭到谴责的那种贪婪和算计,清楚明白地转回到了坐落在农田和农民中间的乡村宅邸里。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乡村中进行的对人和自然的剥削,在城市里被集中变成了利润。但同时,其他一些剥削形式带来的收益——商人、律师、宫廷宠臣积累的财富——又渗入进了乡村,似乎,但也仅仅似乎,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似的。正如 1577 年有人对商人的描述所显示的那样:

他们常会变成绅士,正如绅士们也常会转变成商人一样;这两类人彼此互相转化。¹⁰

这种互相转换正是关键之处。人们通常把这一时期的社会进程视为来自城市的传染:

从那里(就像源自一处肥沃丰裕的苗床一般),廷臣、律师和商人被持续不断地移植。

当然了,移植得相当成功;潘舍斯特就是一个例子。但在那些安居在乡间的人和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断地在当时变化着的经济中进行自我定义,它可以被看作一种意识形态的基础,该意识形态认为一种纯真的、传统的制度正在遭受一种新的、更残酷的秩序的侵袭和毁坏。

在封建制度解体的整个过程中,所有权的复杂变动无疑变得明显了。商人和律师是最易于辨认和最容易隔离出来的新人。16 世纪中期,罗伯特·克罗尔非常明确地通过对封建秩序的指涉对该过程进行了批评,而在封建秩序中,每个人都被认为应当安心从事他生来就被安排从事的职业:

10 *Descriptions of England*; William Harrison; ed. F. Furnivall; London, 1887; 131.

如果商人只管
商品的事儿，
把农庄留给那些
必须生活靠田地为生的人
那么他们就是最高尚的人。¹¹

但是，这种对于产业和职业的严格划分至少在两个世纪前就已经消失了，不论是否和田地有关。正如克罗尔接下去所言，认为只有商人：

买进农庄
然后又将其租
给那些必须种地的人，
尽管这样会给他们带来痛苦：
重重地征收贡金
或者过度收取租金。

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看法，但最终却不过是种幻觉。这种事情到处都在发生。并不需要商人来教地主们这么做，正如我们已经在托马斯·莫尔的作品中看到的那样。或者，又如琼森的《魔鬼是只驴子》中的人物所言：

50

我们天天都看到这些变化：委托人的
良田沃土现在成了律师的财产；
泰勒先生富裕的庄园里
堆积的木材曾经多过贮木场
但如今却也被丈量后做最后的拍卖。
世事变迁，全由天定。¹²

11 *Select Works of Robert Crowley (Crole)*; ed. J. M. Cowper; London, 1871.

12 *The Devil is Ass*; Act II, sc i.

产业易手无疑是由于诉讼造成的,律师们也从中获益。但如果把土地所有权转换的整个过程等同于这类“外来者”的到来的话,那就是简单的臆测了。其实,这种等同是建立在具有神秘化功能的回忆之上的。“泰勒先生”和他“富裕的庄园”是种吸引人的形象,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设想他的所有权始自伊甸园,正如潘舍斯特的例子一样。这就是“传统的”秩序这一概念最有效的误导人之处。因为无论何时,在地位稳固的业主们的身上都不存在纯真,除非我们选择把纯真硬加给他们。在由武力征服、坑蒙偷窃、政治阴谋、宫廷谄媚、敲诈勒索和金钱权力构成的漫长过程中,很少有什么财产所有权能经得起人道主义调查。认为时间的流逝使这些熟悉的获取财产的过程带上了纯真的特质,从而与那些同样由这些重要欲望驱动的后续阶段所表现出的残酷形成了对比,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经久不衰的幻想。定居的业主和新的野心家之间,或者土地资本的持有者和新的商业资本持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在“乡村”、“宫廷”和“城市”群体的形成过程中,这些冲突当然会有政治体现。但对于20世纪的观察者,或者具有人性的普通人而言,却很难像任何一个群体的成员那样,完全体会到那个不断变动的、相对的历史过程所带来的复杂的嫉妒和苦痛之情。无论何时,只要我们面对地主们——无论旧与新——的行动细节时,就会发现,用一位现代农业历史学家的话来描述他们很合适:“无情的一伙儿。”那些我们满怀感情地提及的“古老的家族”,其实不过是一些压榨和剥削邻居时间更久的人家而已。而那些“入侵者”,那些新人,不过是正在进入并强化一个业已建立的体系罢了,而这一体系由于自身内部压力的原因正在发展出新的掠夺形式。如果我们有多余的博爱需要释放的话,还不如施与那些被忽视了的农民呢,他们不管怎样,无论是在旧地主还是新地主的手下,都在开垦和耕种土地。

因此,乡村和城市之间的那个暂时的对比只具有间接的重要性。不过,在整个对比中还有另外一个需要强调的方面。一个城市当然要以其乡村邻居种植的东西为食。城市之所以可以这么做,是因为它通过政治权威为那些掌控农业生产的人提供了法律和贸易,两者被相互的利益和权力需要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后来,在一些临界点上,当城市的运作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对外征服和贸易上变得具有自生性时,一种“秩序”和另一种“秩序”之间的

对立就有了一个新的基础。可以说,权力和利益的代理者变得疏离了,在某些政治形势下甚至占有了支配地位。我们可以认为,在连锁的剥削之上,作为整体的城市在剥削作为整体的乡村。

这仅仅是因为城市通常集中了整个社会真正的社会和经济运作过程,甚至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地步,也即不仅城市的秩序和宏伟,而且它的虚假和它的奢侈都看起来几乎是自我供养的,就像罗马那样;人们住在城市里,在那里繁衍生息,似乎全靠他们自己一样。于是寄生虫们聚集在真正的服务性工作周围,就像17世纪伦敦的法律界底层和下流社会的情况那样。在垄断市场的律师的身边,聚集着骗子和职业赌棍。在发财的商人的身边,聚集着小贩、托儿、公然行骗者。在政客的身边,聚集着告密者、掮客、调解人和(在宫廷和其他地方都一样存在的)妓女;有些人来自所谓的贵族,有些人则正在变成贵族。

由于继承法发生了变化,城市还越来越多地提供另一种服务。它为那些相对分散的乡村地主们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婚姻市场(后来被称作“社交季节”)。同样,在此市场周围,也聚集了皮条客和淫媒,还有职业陪护、沙龙经营者、浪荡子和妓女。当这些种类繁多的下流社会形成气候之后,就很容易投射出一种来自乡村的单纯的人的形象,他带着乡村特有的纯真来到城里这些令人惊奇的人群当中。这无疑也反映了部分实情。在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喜剧——马辛杰的《偿还旧债的新方法》或米德尔顿¹³的《妙计捉鬼》——中,下流社会的活力是显而易见的,而人们要尽阴谋诡计所谋求的,正是财产所有权和抵押文件。因此,我们很容易欣赏欧夫里奇、卢克、豪德或维特古德之类人物的粗俗下流,然后在某个特定的情节点认同那些“合法的业主们”,那些善良的、纯真的人,他们通过城市社会的这些堕落的陋巷,找到通向他们的产业,他们所继承的乡村财产的路。但这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他们所来自其中的那个“稳固的”、“合法的”乡村秩序真正的前世今生从未受到过探究。

13 托马斯·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 1570? —1627):英国剧作家,主要作品还有政治讽刺剧《一局棋》,悲剧《妇女互相提防》等。——译者注

在复辟时代的喜剧中,“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对立一般也同样存在,不过明显又有些含混。这些戏剧是城里上流社会的作家写的,针对的观众也是上流社会,因此常反映那些显而易见的焦虑情感,对乡村生活的粗陋,或仅仅对它的单调进行抵制,或者做出一种必要的抵制表象。某些固定的乡村人物类型被建立起来:黑田、假小子或酒桶肚;就像后来出现的傻大个儿以及整个玛迈赛特世系和乡巴佬村那样。¹⁴在上流社会人士的闲聊中,这些人物类型很容易引发笑声。城镇上流社会的成员们脱离了乡村宅邸,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依赖乡村宅邸的供养;他们构成了任何人所能想象出的最尖酸刻薄的反乡村者。从这个特殊的角度,现在能够看到的是:

一处布局凌乱的大房子,看上去就像无人居住似的,家里的人少得可怜。在那里,先生,你会看到我的母亲,我跛足的姑母和我自己坐在一间大客厅的椅子上,彼此离得很远,闷闷不乐,就像空荡荡的鸟舍里的三四只忧郁的小鸟一样。¹⁵

不过,这种单调的安稳生活仍然和稳固的人际关系联系在一起。以同样的模式,一种忠诚的爱被视为:

比乡村更悲哀!可怜可怜我吧,艾米丽亚,我将去往那个悲哀之地。我想我已经听到乌鸦那可恶的叫声了——嘎,嘎,嘎!¹⁶

但最后,乌鸦啼叫的正是世人所喊叫的:不得不安定下来,获得一份产业,缔结一门亲事。而这就是那种含混的感情的根源。伦敦上流社会的人们通过炫耀、拜访和诡计所做到,不过就是为了找寻婚姻对象,而婚姻也是必要的财产交易手段。当这个游戏正在进行之时,人们不可能不对之抱有玩世不恭的

14 玛迈赛特(Mummerset):一个由演员们虚构的英国西部乡村。——译者注

15 *The Man of Mode*; George Etherege; London, 1676; Act V, sc ii, 217—218 行。

16 同上书,492—493 行。

态度,但同样的,这种玩世不恭从不会到达促使他们放弃该游戏将为他们带来的好处的地步;这也正是为什么是玩世不恭,而不是真正反对的原因。

年轻时尚:那么,罗利,这就是我们的财产,如果我们能够获得继承权的话。不过我认为我们家的房子看起来就像诺亚方舟一样,它的主要部分似乎是被用来容纳天上的飞禽和地上的野兽的。

罗利:拜托,先生,别让你的脑袋只关注这里房屋的布局;只管俘虏那个女继承人,让魔鬼搞房子的事吧。

年轻时尚:只管弄到房子,让魔鬼搞那个女继承人吧,我说。¹⁷

53 于是,毫不奇怪,这次预备“求婚”——可以很恰当地这么称呼——所表现的明显的玩世不恭态度被延续进了婚姻之中。而当婚姻是建立在财产交易之上时,这种求婚也就并不比那些城里男子更有道德。因为这些乏味而贪婪的诡计——也即粗俗的占有和俘获,把当事人缩减成物体间的相互关系——所体现的玩世不恭,不过是种更深层的玩世不恭的浮渣而已。而作为有序社会,这种更深层的玩世不恭已经把男人和女人变成产业和收入的有形的交易载体。

智者将会发现我们命运的不同,
你娶了一个女人,我则娶了一份殷实的产业。¹⁸

当婚姻变成这个样子的時候,再把它用作道德对比物,来反衬妓女和靠有钱老婆为生的男人的那些伎俩就不大合适了。任何体制,如果将这种社会利益或便利放置于个人爱情或忠贞观念之上,都必然在其可见的中心区域滋养这

17 *The Relapse*; John Vanbrugh(约翰·范布勒); London, 1696; Act III, sc ii, 1—10 行。

18 *The Man of Mode*; Act IV, sc ii, 217—218 行。

些如今被方便地冠以复辟时期戏剧的“道德败坏”之名的习惯和风气。不论这个词语向我们展示的东西值得赞赏还是招人鄙夷,它都不过是种微不足道的、肤浅的道德败坏;是清醒意识到该体制的实际优先权的归属后做出的一种疲惫的、脆弱的、极其快速而机警的反应。

所以,邪恶的城市和纯真的乡村之间存在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比,因为城镇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乡村统治阶级的需要所引发的。这种戏剧在道德所肯定的不是用婚姻来反对诡计或风流韵事(这么称呼还是很恰当),也不是用智慧来反对愚蠢,或者用美德来反抗邪恶。它的目的是要把产业归于正确的人的手中:

一份将寡妇阿拉贝拉·朗格里士的全部房产转由爱德华·米拉贝
尔保管的契约。¹⁹

的确,如果你驻足倾听的话,城里人的欢快谈话从未真正偏离过他内心对财产和收入的关注。甚至连此模式的明显例外者——纯真者、朴实者和忠诚者——也通常会在最后表明自己拥有财产。在《平凡商人》的结尾,当城里人的贪婪诡计败露并受到谴责后,费德丽亚不仅把自己的纯真交付与了爱人,而且还送给他:

这样一份礼物,父亲去世后传到了我的手中。我父亲是位北方的绅士,血统高贵,我是他唯一的孩子;因此我现在继承了每年两千英镑的遗产。²⁰

在最真实的意义上,这就是世道常情。

因此,从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对立——贵人和骗子之间——到复辟时期的

19 *The Way of the World*; William Congreve, London, 1700; Act V, sc i, 550—552 行。

20 *The Plain Dealer*; William Wycherley; London, 1676; Act V, sc iii, 183—186 行。

统一——酒桶肚和年轻时尚之间——的感情转变既是坦率程度的增加,同时也表明了真正的和明显的标准的丧失。的确,对于获得土地的真正过程的态度变得更加冷漠了。理想正在消失,正如神秘化正在消失一样。不过,在任何阶段,我们都不必接受这种“城镇——乡村”对比的表面价值。因为在真正关键的交易中,到底谁来自乡村?不是雇工或佃农;忍饥挨饿的家人迫使他们留在农田里。只有地主和他那拥有继承权的儿子,地主的妻子和她那满怀期待的女儿来城里处理他们必要的事务。他们由于不合时尚而上当受骗或者遭到嘲弄,然后作为一种报复,他们返家之时又进一步提升了他们有关朴素和单纯的诚实的标准。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和感觉到形式背后的人们,不过现在既然骨头已经化作尘土了,我们看到的必然是形式。他们带来的东西,以及他们试图促进的东西,都是建立在那些永受蒙蔽的人们短暂而痛苦的生命之上的:那些我们永远也看不见的田间农民;那些流离失所者和遭到驱逐者;所有那些用土地和劳作为他们提供食物和零花钱的男人和女人们。“上帝创造了乡村,人创造了城镇”这句话毫无道德可言。年复一年,英国乡村由人所创造和再创造,而英国城镇既是乡村的映象,又是乡村的代理者(诚实与否,要视利益而定)。如果城镇里的景象差强人意,因为它使人们真正靠之生活的那些决定性关系变得明显而令人反感,那么补救的方法从来就不是某个到访者的朴素生活和高尚思想所体现的道德,也不是绿色田野的喃喃细语声。只有改变社会关系和核心价值观才行。而正是在这个时刻,“城镇和乡村”的谎言发挥了作用:宣扬表面上的对比,掩盖真正的对立。

6 他们的命运他们的选择

55

内战、共和、复辟和 1688 年立宪政体的确立所标志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社会性质,而且毫不奇怪,这个国家的文学在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和新的创造性作品等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在表现田园隐居的诗歌中,出现了从冥思的理想到单纯的劳动美德的理想,然后又到其复杂变化形式的显著转变,正如我们将在汤姆森的作品中看到的那样。不过,在最为重要的那一类诗歌,也即有关乡村宅邸的诗歌中也出现了一种有趣的转变。如果我们从马韦尔的《阿普顿宅邸》转向蒲柏的《致伯林顿》,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转变。

把《阿普顿宅邸》和《致潘舍斯特》和《萨克斯海姆》中的世界相提并论是行得通的,因为两者之间有着某些明显的延续之处。这里再次出现了与众不同的宅邸,作为对比来反衬“空荡荡的宫殿”,也即其他地方和其他人们“不成比例的居所”:

但是这里所有的东西都造得如同
自然一般,整齐而亲近。¹

现在进行的指涉是历史性的和回溯性的:

在其中我们发现了属于那个
更清醒的时代和头脑的尺度

1 Upon Appleton House in Marvell ed.

那时身材高大的人们真的躬身
进入狭窄的拱门；
似乎正是要通过在如此局促的门之间穿越，来练习
自我约束，以便将来能够穿过天堂之门

这里也出现了“道德的经济”的标志：

庄重简朴的房屋主立面
没有敞门的装饰：
但内部的房间日日均不缺乏
朋友的到访。

但接下来变化变得明显了。这所宅邸的起源不再被神秘化，而是被公开而诙谐地做出了说明并得到了辩护。这座新宅由议会党将军，新模范军的创始人费尔法克斯修建，此诗写作前一两年左右才竣工。它取代了这个家族以前的一所旧房子，就建在费尔法克斯家族在阿普顿的土地上，当年的西多会修道院解体时这块地转到了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手中；修道院的断壁残垣仍然清晰可见。因此，尽管有古老的“更清醒的时代和头脑”的说法，但一种明显的变化——如此多的土地财产事实上正是建立于这种转变之上——不仅得到了承认，而且被合理化了。和每一处被没收的宗教房产一样，这座修道院在其后来的所有者看来具有邪恶的味道。费尔法克斯家族当时曾发生过的一个事件——“修女们那光滑的舌头把她吞没”——就被用来描绘一种贪婪、虚伪和吝啬的秩序，而从中得出的道德教益是：

“但这些建筑确然不会长存。
由愚蠢者修建，被堕落者经营”²。

2 Upon Appleton House in Marvell ed.

于是对修道院的剥夺和产权易手就被彻底合理化了：

修道院被摧毁之时，这座宅邸
 落入费尔法克斯家族手中，就如物归原主。
 修女和创建者们曾经希冀的东西
 这么一来似乎更好地得到了实现。
 因为即便她们被证明并不真的信奉童贞圣母，
 修道院却仍然属于圣母。
 尽管许多修女在此地发愿出家，
 但直到如今，这里并不是真正的宗教寺院。³

重要的是，诗人越来越坦率，同时也更愿意，也更有能力展望宅邸周边的环境了。宅邸的主人靠军事起家，所以这里花园的布局“恰如堡垒的模样”，它被视为是以失落的天堂的形式向和平转变：

那时花园只有塔楼
 而鲜花则是所有的驻军。⁴

不过这首诗最不寻常、最优美的部分（该诗融合了各种不同的视角，各种重要的领域和兴趣，这本身就具有深远的意义）则是向远处的田野和树林进行眺望并徜徉其中。不可思议的乡村，自我生发，如今则被呈现为一幅充满意象的劳动场景：割草的人和制干草的人，“衣着朴素的村民们”来到收割过的草地上放牛，冬季的河水泛滥漫过河谷草场。所有这些都被捕捉到，不过是以一种修辞格的形式：对一幅现时的场景的自觉注视；从明显疏离的角度看到的景色：

3 *Upon Appleton House* in Marvell ed.

4 同上。

他们在光洁的草场上
犹如在镜子里描画的风景。⁵

的确,收割后的草地被视为画家作画的帆布:

一片平坦的空地,恰似小女孩的衣服,
伸展开来,等待污渍的出现。

57

不过从这个角度仍然可以看到各种意象:收获季节“有益的暑热”、收割和舞蹈、“衣着朴素的村民们”。同样重要的是,诗人在浏览这幅充满意象的景色后,又进一步穿越这景色,进入树林。真正退回到大自然中去,作为逃避俗世的一种方式:

如果我在这些树木背后驻扎我的思绪,
我想,那该多么安全,多么强劲啊。⁶

当他返回时,洪水已然退去,春天的田野重现绿色。

因此,这首出色的诗作表现出的张力和它之前的任何东西都不相同。宅邸及其来自被没收的产业的历史被合理化了,成为一种宗教的和自然的秩序。但与此同时,还进行着一种外向运动,超越这些东西,进入一个劳动场景,然后进入原生态的树林,作为向自然的退隐。感情不断变换,只有诗的声音在进行控制。在有适度的喜悦当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感伤,这是因为意识到还有其他经历存在:按传统的方式把宅邸赞美成:

天宇的中心,自然的怀抱。
天堂唯一的图纸

5 *Upon Appleton House* in Marvell ed.

6 同上。

这出现在与深切感悟到的无常世事的对比当中：

这并不是曾经的世界，
而是天然形成的一堆；
所有的东西都是随意丢掷而成，
海湾、沙漠、悬崖、石头。⁷

在马韦尔之流的心目中，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不过，即便如此，当我们读到诗中对宅邸主人之女的美貌和纯真的溢美之词，而且接下来了解到她的婚姻时，仍然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讽刺。她是费尔法克斯橡树上的榭寄生：

从那里，为了某种共同的利益
牧师将折下这朵圣洁的花蕾；
而她欣喜的父母则在尽情欢庆
使他们的选择成为他们的命运。⁸

讽刺之处不仅在于这场婚姻所造成的个人命运的改变，因为联姻的对象是可怕的乔治·维勒斯，他在该诗中受到了美化，而几年之后他成为了白金汉公爵。讽刺还在于这座新宅邸的果实是种政治交易，财产和头衔将在此交易中得到改组。这是一场保皇派的维勒斯和掌握领导权的议会军将军之女之间的联姻。维勒斯的一些地产已经转到了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手中；这场婚姻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和财产协议。宅邸主人的女儿曾为美德典范，她的命运其实是选择的结果，而不论是在土地掌控还是政治权力方面，我们必须承认马韦尔另外一句评论的公正性。这句评论常被应用于政治，而没有像它应该的那样，被应用于家族财产积累、剥夺和交易以及宅邸修建的这种漫长的过程上：

58

7 *Upon Appleton House* in Marvell ed.

8 同上。

获得权力的那些计谋
也必须被用来维持权力。⁹

从这些复杂的协议中最终浮现的是种非常不同的情感结构。马韦尔的诗的确具有过渡的性质：新旧秩序之间的情感纠葛。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把所有有关乡村宅邸的诗歌都归于一个单一传统，似乎这些宅邸的居住者们都来自某个延续不断的家族似的，这种做法有多么愚蠢。在极端的形式中，宅邸本身被具体化了：宅邸，然后是其衍生物，也即宅邸的居住者，它们都成了一种秩序的显著标志，尽管该秩序由于一个新的贵族阶级及其之后的新的农业资本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生成而被不断地重新建构。当我们读到蒲柏的时候，不是在理想化的田园诗中，而是在书信体诗中，我们将发现属于这一阶级的改变了的、更为明显的情感。写给巴瑟斯特和伯林顿的诗与“财富的使用”有关。诗中建议，位于在吝啬和放荡这两种极端罪恶之间的，应当是谨慎的生产投资，被合理的慈善所调节：

对财富的珍视，要同享受财富的
艺术和施舍财富的善行同时具备，
既不要缺乏，也不应过度追求，
既不可因懒惰而消乏，也不需由劳役来增加；
以正确的花费来平衡财富，
为节俭添点儿高尚；
为显赫添点儿慈悲；为富足添点儿健康；
噢！教教我们吧，巴瑟斯特！你尚未被财富损坏！¹⁰

那么谁会来修饰，或者说谁会来改进土地？

谁来像巴瑟斯特那样种庄稼，或者谁来像博伊尔那样造屋。

9 *Horatian Ode*, in Marvell ed.

10 《致巴瑟斯特》，219—226 in Twickenham ed., Vol. III, ii; III。

只有使用才能使花费具有正当性，
 显赫的所有光芒均从理智那里借得。
 他平静地享用父辈留下的田地，
 即便有所增加，邻里也会感到喜悦；
 快乐的佃户们欣然承受一年的劳作，
 可感激他们的主人要胜于感激土地；
 肥沃的草地也乐于喂养
 他那产乳的小母牛和战功赫赫的骏马；
 树林在茁壮成长，既非出于骄傲，也非为了炫耀，
 而是为了将来修屋建船：
 要让他的种植园从一片草丘延续到另一片草丘，
 先是荫蔽一处乡间，然后兴建一个城镇。¹¹

这种秩序不再是天赐的和自然的，就如琼森和卡鲁的诗表现的那样，也不再是争取得来的、缺乏稳定性的东西，就如马韦尔的诗表现的那样；它成了有意识进行道德教化的题材。乡村宅邸很恰当地从属于金钱的使用和生产投资，这是对自然的创造建设，而不是歌颂：人的作品中的自然，而非天赐的或幸运的天堂中的自然。正是以这些方式，诗歌从传统意象，也即象征符号和观察评论的有意融合，改变为以当代语言进行的直接的道德辩论。

59

只有使用才能使花费具有正当性。

但这种有意识的资产阶级伦理观受到两种考虑的限定。有关慈善和博爱的概念被强有力地重申：这一概念产自那种自然的、道德的经济理想，并同其有着语言上的连续性，不过现在却被尊为典范，就如对罗斯镇男子¹²的赞颂

11 《致伯林顿》，154—155。

12 Man of Ross, 本名约翰·卡罗尔 (John Kyrle, 1637—1724)：英国慈善家，因在罗斯镇积极行善而得此名。——译者注

中那样,并且同土地所有权秩序的另一产物明显形成对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产物(在《致巴瑟斯特》中)就是那个维勒斯,白金汉公爵,阿普顿家女儿的丈夫:

了不起的维勒斯躺下了——唉! 他的变化有多大啊,
这个纵情享乐的人,异想天开的灵魂!
……那里,赢得他的健康、财富、朋友和名声的
胜利者;这个拥有千万无用财富的老爷终了于此地。¹³

对慈善的忽视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道德和神学上的敝戒了,而是成了使用上的缺陷。

第二种起到限定作用的考虑则部分来自宅邸作为物体的孤立状态:始于对宅邸进行道德称颂的那一过程的完成和转化。《致伯林顿》一诗相当接近那个关于宅邸建造和风景园艺的重要的18世纪传统的源头。在此传统中,乡村作为新的进步道德的外在标志被重新改造和设计。这是对无益的炫耀展示和空荡荡的宫殿建筑做出的谴责,正如琼森或马韦尔本来或许会表达成的那样;但这也是有意识对如何修建,如何设计庭园或花园提出的建议;是对自然的改良:

总之,让自然永远不会被忘记。
但要像对待羞怯的美人那样对待自然女神,
既不能给她穿得太多,也不可任她全身赤裸。¹⁴

在这种具有说服力的建议中,一种新的情感结构已经变得显而易见,成为新经济的一部分。而这种有关改良的道德观所具有的复杂性,正是我们现在必须转向的话题。

13 *Epistle to Burlington*; 118—119。

14 同上书, 142。

7 改良的道德

(1)

60

英国乡村的真实历史始终都集中在土地财产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和工作关系上。到 18 世纪,几乎一半的耕地为大约五千户人家所有。在七八百万人口中,有四百户人家作为这种主导地位的中心形式,几乎占有了四分之一的耕地。在这种控制之下,不再存在任何古典意义上的农民阶层,而是出现了一种由土地租用人和工资劳动者组成的日益规则的社会结构: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生产的规范越来越以有组织的市场的形式得到实现。

从封建时代以及紧接其后的后封建时代的方式向这种发展中的农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这当然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但它的社会含义却是足够清晰的。的确,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在政治意义上也属于贵族,他们拥有古老的或者看似古老的头衔和宅邸。这给人一种幻觉,似乎这是一个由义务和社会等级间的传统关系所决定的社会。但这一阶级的主要活动却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依靠租金和资本投资的利润生活,而正是征收苛刻的地租和圈占土地的过程巩固了他们对土地的控制。

但是,在这四百户人家和农业无产者之间从未有过任何单纯的对抗。相反,在经济程序的这两极之间,存在着一种由小土地主、大佃农、残留下来的小自由农和根据官册土地保有者、中小佃农,以及享有部分残留公共权利的雇农和工匠构成的日益严格的等级秩序。这个过程始于 16 世纪,现在仍然在强劲地发展当中。许多小农场遭到抑制,尤其是在那些可耕种的土地上,同时,耕地本身也在稳定地增长,有时甚至是急剧增长。即便是在地主、佃农和雇工之间的社会关系中,也在不断演化出新的观念。产业从最初被视为可

61 带来这样和那样收入的遗产,变成了能够带来巨额增值利润的投资机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一种有关改良——对土地的改造和整理——的意识形态变得重要并具有指示意义。而阻碍这种现代化发展的社会关系就被逐步地,有时甚至是无情地遭到废弃。

这些变化所导致的价值危机在18世纪文学中以各种方式得到了体现。在诗歌中,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对快乐的佃农和乡村隐居生活的美化,已经让位于对变化和失落的深切而悲伤的感悟,这种感悟最终以新的方式建立起一种常见的怀旧结构。

但是,在此变化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积极思索这些新的制度和侧重所产生的人文后果。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兴趣,才出现了小说这种在当时最具创造性的文学形式。在一个土地财产事务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有关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从詹姆士一世晚期的喜剧和复辟时期的风俗喜剧以及蒲柏的道德诗,扩展为理查逊和菲尔丁的小说,而在这种扩展中这些问题也发生了变化。菲尔丁的《琼斯传》中地产相邻的两个地主,奥华绥和韦斯顿老爷,或者理查逊的《克拉丽莎》中的拉弗雷斯,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好生、长手,屯肚子·笨爵士和年轻时尚的世界的直系后代。《琼斯传》的情节的基础是试图通过婚姻把萨默赛特郡最大的两份地产合并起来的欲望:索菲亚·韦斯顿和布利非之间被人安排的婚事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最终汤姆·琼斯被发现是奥华绥真正的继承人,这时她同汤姆·琼斯的婚姻也就完成了她当初由于个人原因而反对的这个目的。与此类似的,克拉丽莎·哈娄同索尔姆斯之间的包办婚姻也是部分出于她的家族的算计,目的是要把他们的产业集中起来并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正是为了逃避这种安排,她才退缩进传统土地贵族拉弗雷斯的那个具有破坏性的、玩世不恭的世界。

在不断增大的压力下,通过这些小说的情节所戏剧性地表现出来的的是在经济利益和其他价值观念之间漫长的选择过程。不过,在戏剧中,我们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伦敦的社交界——看到这一切。契约在其中被制定,而通过隔离和集中表现,观察者(他先是表示抗议,然后又变得玩世不恭)的语气温气也在其中确立并得到保持。而在小说中,我们则转向了那些家庭本身,观看故事情节在家庭及其内部成员的身上发生。尽管理查逊和菲尔丁之间有

诸多不同,这一变化却是两人所共有的。他们的笔下没有不同群体的代表——如好生、长手之流——之间的正式对抗以及站在所描写的世界一定距离之外做出的兴致勃勃的观察,相反,故事情节变得内化,并被作为人物性格问题被人体验并进入戏剧。

其实,有关改良的开放的意识形态在笛福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不过是以一种抽象的形式,这与理查逊和菲尔丁有本质不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8世纪20年代写成的《大不列颠全岛漫游》中,笛福对乡村生活现实细节的观察是无与伦比的,他对生产、销售和租赁的方式做出了记录。正是从他那里,我们了解到18世纪初农业专业化和市场生产的程度,以及农业同城市、港口和早期煤矿区、铁矿区以及纺织工业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一个不加掩饰的商业世界,几乎不带任何田园气息,而笛福把强烈的兴趣和就事论事的报告相结合的做法是18世纪农业调查这一重要传统的真正先驱,该传统经由威廉·马歇尔、《农村报告》、阿瑟·扬和《农业记录》,一直延伸至科贝特以及19世纪。这是生产农业真实的发展路线,而且其本身就是变化的一个主要指标。不过,除了极个别例外,这一路线是对新的生产方式通过其发挥作用的那些社会关系和人类世界的抽象概括。只有到了此路线的尽头,在世纪之交的危机中,社会调查和经济调查才被充分结合在一起。于是,不足为奇,尽管笛福对田地和市场所发生的事情做出了详细和专门化的观察,他并没有在他的小说中考虑它们所蕴含的社会现实。他宁可在其他故事中投射有关改良和单纯经济利益的抽象精神——《鲁滨逊漂流记》是个最显著的例子——并创造出一个有关孤立的个人的虚构世界,而对这些个人来说,其他人的存在基本上都是暂时的和功能性的——还是像《鲁滨逊漂流记》和《莱儿·弗兰德斯》所表现那样。有意或无意地,这种对某种条件和伦理的强调具有前兆性而且力量强大。但是克鲁索改良的是一个偏远的岛屿,莱儿·弗兰德斯则是在拿自己做生意,这体现了此种强调的特点。重要的改良和贸易既未远离家门,同时也很广泛,不过有关改良的简单实践和伦理可以在刻意孤立的故事中被更稳当、更专心地领会。

在真实的乡村生活中,商业精神却不得不与其他制度、考虑和风尚互相联系在一起,并受到这些因素的检验。不论是理查逊,还是菲尔丁,都不如笛

福那样了解英国乡村发生的事情,但他们却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把侧重点放在细致反映人际关系上:不是时代精神,而是时代精神更为直接的体验。

63

不过,我们同样也不能对这些人际关系进行抽象概括。当索菲亚和布利非的婚事作为合并比邻产业的途径而被策划的时候,布利非的性格就反映了当时真实的商业精神:

浪漫的恋人总是希望完全而彻底地占有爱人的心,但这种想法从未进入过他的头脑。她的财产和她的人是他唯一的追求目标,而他无疑希望能够很快就获得对这两样东西的绝对所有权……¹

当然,韦斯顿老爷利用自己的女儿来合并两家的产业,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似的。而奥华绥——

他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的心对任何意外而突然降临的世俗好运都无动于衷²

也向我们展示了他更为冷静和达观的考虑:

智慧……只是教会我们把一条举世皆知,甚至连最卑微的人都懂得的简单格言扩展得范围更广一些。这条格言就是,购买任何东西都不要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现在,不论谁铭记这条格言进入俗世大市场,并不断地将之应用于荣誉、财富、享乐和市场提供的任何其他商品,我敢断言他是一个智者,而且必须按照这个词的世俗意思承认他;他做了最为成功的交易,因为在现实中他购买任何东西都只费一丁点儿的力,却把所有我提到的那些好东西都带回家,同时还完全彻底地保持了健康的

1 《汤姆·琼斯》,第六卷第七章。——译者注

2 同上,第六卷第三章。——译者注

康、纯真和声望,而这些则是其他人通常要付出的代价。³

事实上,这正是《汤姆·琼斯》的写作立场。这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更加精于算计的社会所拥有的道德观。从这个立场看,布利非冷酷的贪婪、韦斯顿老爷直白的粗俗就显得引人注目,容易受到批评;但是算计和代价其实具有更宽泛的指涉含义。爱情、荣誉、肉体快乐、忠诚:这些同样需要被拿来同收入和田亩数一起加以计算。人性是种温顺而稳定的东西:当面对卑鄙的算计者时,它显得坚定而坦然,但它自己也在致力于找寻幸福以做平衡——这是真实的市场价。汤姆·琼斯因不计私利而受到教训,但他随即就被宽容地提供了补偿,不仅如此,菲尔丁对情节的操控也使其指向恢复个人满足和物质利益间的那种平衡,使两者能够得到调和、共存,甚至等同起来。小说不断地就物质财富和人性需要及冲动之间的关系提出疑问,但解决的方式却是做出调整,通过一个得偿心愿的情节,通过一个设计好的、幸运的发现,松散而轻易地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这个把戏被实施、被发觉,但却仍然引人入胜,这种文学手法成了一个著名的讽刺。当琼斯被发现是真正的继承人,而两家产业能够通过爱情婚姻合并起来时,解决问题的语气是一种刻意为之的——有人或许会说这是一种精明的——亲切——

64

令我们高兴的是,尽管可能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琼斯先生看起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⁴

于是,财产协议、调整、补助金等事宜巧妙地得到了解决;而这对儿最终获得幸福的恋人是如此地“和善、宽和与仁慈”,以致那些身份比他们低的人,那些佃户和仆人,都衷心地祝愿他们婚姻幸福。

毫无疑问,这种统一的道德观的出现有其必要性。对土地和女继承人毫无顾忌的争夺是前一个时代主导风格,而在18世纪前半叶,发展过程渐趋稳

3 《汤姆·琼斯》,第六卷第三章。——译者注

4 同上,第十八卷第十三章。——译者注

定,那种风格就被这种对社会地位更广泛、更有远见的经营所取代。如果可能的话,人性、家族利益、个人需要现在都必须被包括进任何理性的、旨在改良的协议当中去。若非如此,利益至上的主潮流将自由发展,社会将为之付出代价。

重要的是,这种阴郁的观点在文学中通过某种特殊狂热传递给我们:理查逊以童贞的孤绝状态作为维护人类价值的整个斗争的唯一反应。的确,在《帕梅拉》中,童贞被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并不是它本身具有价值,而是作为一种在未获得婚姻这一必要保障的情况下不能放弃的资产。但在《克拉丽莎》中,童贞是不能用来做交易的,任何程度,任何方式都不行;它不再只是肉体上的贞洁,而且是精神上的贞洁;人和灵魂的完整。当家人安排克拉丽莎和索尔姆斯结婚,作为“提升家族地位的迫切目标”的一部分(也即巩固和扩增家族产业)时,克拉丽莎的回答是:

“为了我哥哥的计划,夫人,我就得和一个我从来都无法忍受的男人结婚吗?”⁵

尽管克拉丽莎表现得更为安静,但她的回答与索菲亚对和布利非的婚姻做出的回答是一样的——

“哦!先生,这样的婚姻比死亡还糟。我对他甚至不仅仅是无兴趣;我讨厌他,憎恶他。”⁶

不过,在《克拉丽莎》中,这种强调贯彻始终。在拉弗雷斯面前的暴露与市场的幸运机会无关,与提高个人的价格也无关。这是在一个无情算计的世界面前的彻底暴露——意味深长的是,这个世界属于一个旧式地主,一个因地位稳固而肆无忌惮的骑士,一个“出身高贵者”好生。没有任何婚约能够赋予这

5 《克拉丽莎》,第一卷第13和第17封信。——译者注

6 《汤姆·琼斯》,第六卷第七章。——译者注

种曝露以正当性；甚至连强奸都无法摧毁克拉丽莎的贞洁。这是联合的反面，是必要的和解（也即在利益和价值之间达成协议）的反面。通过拒绝妥协和坦然接受毁灭，个人的完整性被狂热地保存了下来。

通过这种单纯的强调，理查逊偏离了任何可以协商的世界，当然，他也成功地把一种普遍的危机缩小限定在一个私人的、（在其语境中是）时髦的事件上。《克拉丽莎》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自此之后美德将同任何可利用的世界剥离开来，而这正是清教主义晚期阶段以及后来的浪漫主义的一个特点。尽管这部小说涉及地主家庭的贪婪和野心，但它归根结底并不是对一个时代或社会结构的批判，而是对那种可被抽象地称作“俗世”的东西的批判。这种退却应当受到重视，不过它本身也是对逐渐变得自信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问题的一种回答。贞洁的专门化和个人以孤立乃至毁灭作为生存手段的矛盾做法，都同怜悯和慈善的专业化以及从社会向传播博爱的自然的退却——稍后我们会将这些追溯为对一个本质残酷的秩序持续不断出现的危机做出的反应，而对此秩序尚无任何现成的和适当的社会反应——联系在一起。

(2)

那么，从《克拉丽莎》那绝望的、私密化的强调，到土地改良的真正代理者们那镇定自若、探究实际的平常口吻，这之间一定就像有着天壤之别。只有通过这种日常、普遍的方式，社会危机才能够从任何相关的途径看到。当我们阅读农业作家的著作时，很容易接受他们对于更好地利用土地的强调，即便这常常明显地同租金的计算联系在一起（有趣的是，拉弗雷斯从来不会向老佃户讨索苛刻的地租；与他在性问题上的自由一样，他的收入是继承而来的，而不是投机得来的）。从这些主张改良的作家的身上我们学到了如此多的东西，而他们在提供更多的食物方面的成就（同那些实验农民和更为有名的实验地主的成就一起）又给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任何热爱土地的人都很容易站在他们的一边。不论对他们还是我们，最难理解的就是这些改良的最终后果，而这些改良在当时是无可非议的。

读阿瑟·扬的传记，就会同时把握住改良运动的精神及其真实的困难。他在一座庄园中长大，这座庄园多少代以来都是他父亲家族的财产，但只有

获得了他母亲家(17世纪晚期从荷兰迁来的一个犹太家族)的资金后才得到有序整理。旧屋被翻修成一座宅邸,正如这一时期人们常做的那样。这一社会野心超出了扬家族的收入。阿瑟·扬去给商人做学徒;他原本是想像他父亲一样当一名教士的。父亲死后,他经济拮据,开始写小册子谋生。然后他又回过头,动用他母亲的小额财产经营20英亩副本土地。由于长期缺乏资金,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成功的农夫,但作为农民作家,通过收集和宣传改良生产的技术和精神,他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充分地、为圈地运动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提出了有利的理由。他不停地旅行,在他那四十六卷的《农业年鉴》中为新的实验农业提供了关键的交流方式。变化来自对土地本身的利用:在于新的作物(尤其是根用作物),在于排水装置和开垦,在于有计划的土地施肥,在于畜牧业。但是扬强调农业利益和当时其他新的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系:商业资本(由于他自身的经历,他对这一点非常清楚);早期工业技术(例如掘土技术。该技术在应用于农业之前,已经被用于修建港口和码头);物理科学(例如他同普里斯特利合作进行的土壤化学实验)⁷;政治势力和组织(例如他向国王和议会所做的宣传,他最终还被任命为新农业部大臣)。

在每个部分,扬都触及到了土地在他所处的世纪里经历的现代化(这是我们现在所称)的问题;不过他不断强调的却是农业的落后、农业发展程度的低下、对大面积荒地的忽视,以及同海外贸易相比在投资方面的匮乏等问题。而且在生命的末期,他越来越多地谈及自己的社会经验和社会观察的结果。改良土地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需要地主们担负起领导责任。但这不仅加强了地主阶级的优势地位,而且因为要得到大块有利可图的土地单元而开展圈地运动,从而制造了更多数量的无地者和失地者,这些人在新的环境下无法生存或者参与竞争。许多农民无法迅速掌握新的生产方式,这本身就同土地所有制有关:既然土地改良总是导致地租的增加,在生产每个阶段都存在一种潜在的威慑因素。只有像柯克这样绝无仅有的地主,才会新的

67

7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 1733—1804):英国神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反对三位一体等基督教教义,曾发现氧等十种气体和植物的光合作用。——译者注

生产方式带来的利润和佃户的租金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关系。因此,这种经济发展进程虽然用其自身有限的术语能够如此轻易地合理化,但其实却具有一些社会后果,这些后果有时会同此进程产生抵触,有时则给许多家庭和群体带来灾难。当扬看到他所为之奋斗的这些变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时,他并不是唯一对此进行重新思考和提出新的质疑的人:

我宁愿英国所有的平民百姓都沉没在大海里,也不愿看到穷人将来因圈地而遭受他们现在所受的遭遇。⁸

⁸ *Annals of Agriculture*, XXVI, 214.

8 自然之线

(1)

68

正是在扬的 18 世纪——在英国乡村所经历的那些变化和矛盾(他不仅促进了这些变化和矛盾的产生,而且无与伦比地对之做出了记录)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菲尔丁温和的包容,理查逊绝望而专业化的恐惧,而且看到了乡村生活已然丧失的平静和美德的一种新的、更为严肃的社会形式。献给快乐的佃农(他们代表着反思的田园传统那理想化的、独立的自我)的诗歌让位于描写失落、变化和遗憾的诗歌:这种情感结构(既深切动情又冥思苦想,既心惊胆寒又孤僻沉默)在哥尔德斯密斯的对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就在此时,我站在这里思考,我认为

我看到乡村美德正在离开此地。¹

在 18 世纪上半叶,旧的社会结构尚未解体,尽管在汤姆森² 的《四季》(写于 18 世纪 20 年代和 40 年代之间)中,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各种态度——真的,它们之中的许多与其说是情感,还不如说是态度——以致某种矛盾因素已然开始显露。因此,汤姆森可以用最传统的词语来讲述黄金时代——

自然生长的庄稼摇摆起伏

1 *The Deserted Village*, 397—398 行。

2 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 1700—1748):英国诗人,主要作品有歌咏自然的无韵诗《四季》,颂歌《统治吧,布里塔尼亚!》,长诗《自由》等。——译者注

恰似一片黄色的富裕海洋……
 ……野生山楂树撒下一片红色的果实
 落在树下坐着的人们的身上，
 这些因劳作而晒得黝黑的人们，悠闲自在，轻松自由……³

——但他接下来又写道：

然而现在，无论这些华丽的神话曾经意味着什么，
 遮蔽过多少纯真的时光，
 在这黑铁时代均已无影无踪。⁴

他仍然可以写描写隐居生活的熟悉的田园诗——

噢！他只知道他的快乐，所有人中
 最幸福的人！他远离人群的喧嚣，
 和少数几个挚友隐居山谷深处，
 畅享田园生活纯洁的乐趣⁵

——但对城市又抱有一种典型的含混态度，既谴责城市的风尚和奢侈，但又推崇它的知识和文雅，以致田园诗也带上了一种明显的郊区风味，尽管此处是与“少数几个挚友”在一起。这在《冬》一诗的一个晚期版本中得到了精确体现，如下面几行：

哦！切斯特菲尔德，请允许田园缪斯
 用她的歌声为你带来荣耀！

3 *The Seasons*; in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James Thomson*; ed. J. L. Robertson; Oxford, 1908; 48—49.

4 同上书，13 页注释。

5 同上书，*Autumn*，1235—1238 行。

在她重新谦恭地飞入暮色之前。⁶

汤姆森同时赞美改良运动和充满浪漫色彩的荒地,这之中有着更明显的含混意味,逐渐导向真正的矛盾。对改良运动的赞扬是新的现象,而且意义深远;其他的例子还包括戴尔的《羊毛》和菲利普斯的《苹果汁》,⁷在这些作品中,发源于乡村的工业进程被刻意赞扬。在汤姆森的《懒惰之堡》中,具有真正的现代化精神的印答斯垂爵士征服了“慵懒的快乐土地”⁸。这就为隐居的田园诗增加了又一个维度,例如:

他在悄然隐居的同时,并未放弃
乡村工业那些有趣的牵挂。
四季轮回,充满优美的变化
新的景色缤纷呈现,新的风景映入眼帘……
嶙峋黝黑的石南荒野因刻瑞斯的储藏而变得明亮灿烂。⁹

而这时不时地变成了对改良的真正鼓励:

你们这些慷慨的大不列颠人,扶犁耕作吧……
愿你们肥沃的土壤带来无尽恩泽,
昌盛繁荣,自然的良好祝福撒遍
每一片土地;为衣不蔽体的人民提供衣服,
成为世界用之不竭的谷仓。¹⁰

6 Winter, in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James Thomson*; ed. J. L. Robertson; Oxford, 1908; 663—665 行。

7 约翰·戴尔(John Dyer, 1699—1757):爱尔兰诗人。《羊毛》作于 1757,描写羊毛贸易。菲利普斯(Amrose Philips, 1674—1749),英国诗人、剧作家。主要诗作有《牧歌》和诗剧《痛苦的母亲》。——译者注

8 *Castle of Indolence*, I, Vi; in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James Thomson*; ed. J. L. Robertson; Oxford, 1908; 255.

9 同上书,II, xxvii; 288.

10 同上书, *Spring*, 67 及 74—77 行。

这是支持改良的地主阶级公开的意识形态,非常契合玉米种植和出口增长方面的真正发展。汤姆森的赞扬像是发自肺腑:

快乐的大不列颠。……
 ……你的山谷
 金浪起伏;山巅羊群
 咩咩,难以计数;它们的身边
 有黑色的牛群在低吼,雄美健壮。
 山下,你的草场发光闪耀,在割草人的镰刀之下
 此起彼伏。四面八方,
 都有乡村住宅熠熠发光。你的乡村丰裕富足;
 使得乡村小伙儿也
 心满意足,不知疲倦,干着分内的活计。¹¹

在一个修订版中,“分内的”活计变成了“谨慎的”,但无论如何,现行的社会制度保证了“财富被分享”。并没有任何支持改良的农业学家曾经报道过这样的情况,但这却是人们最希望看到的。在这种社会秩序中,诗歌占
 70
 有中心地位;它是人类的财富,没有它,“无助的人类”就是野人。没有诗歌:

人就不会有高尚的道德,不会有社会福祉,
 也不会有法律;没有财产,没有乡村青年
 耕耘田地,没有工匠
 辛勤劳动,没有敏捷的仆人,也没有贸易。¹²

11 Summer, in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James Thomson*; ed. J. L. Robertson; Oxford, 1908; 1442 及 1448—1456 行;参见 106 页注释。

12 同上书,119 页注释。

当哥尔德斯密斯看到诗歌同奥博恩的村民们一起遭到驱逐时,我们需要回忆起这些诗句。不过汤姆森对这种社会秩序的赞美非常粗略,诗歌在维护财产分配不平等的社会的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又是如此明显,以致就连他都颇费踌躇。在 1727 年和 1744 年之间,这些诗句被修改为:

……人不会有高尚的道德,或社会福祉,
也不会有保护他的法律;没有耕田的
各种技能,也不会使用工具
器械。¹³

技术被从真正的社会关系中提取出来,而这体现了某种紧张情绪。下面是收获的场景:

主人走在后面,堆起禾束堆;
满意的目光
左顾右盼,心中充满快乐¹⁴

但正如在蒲柏的道德散文中那样,因富饶而感到的骄傲必须同慈善融合在一起:

哦!想想吧,充满感激地想想吧
丰收之神对你是多么的眷顾;
她使你的农田丰裕富饶;
而你的那些不幸的伙伴

13 Summer, in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James Thomson*; ed. J. L. Robertson; Oxford, 1908; 1764—1767 行。

14 同上书, *Autumn*, 162—164 行。

就像天空的禽鸟一样围着你盘旋飞翔，
乞求他们可怜的施舍品。¹⁵

那些“伙伴”，也即穷人，是被排斥在赞颂秩序和丰饶的词句之外的因素，而正是由于逐渐允许在诗歌中也显示他们的存在，情感结构才发生了改变。汤姆森甚至开始反思这种相对较新——这主要是18世纪受过教育的上等阶级的“发现”——的认识，也即“穷人”并不仅仅是种慈善负担，给经济造成的重累，而是财富的真正生产者：

那么，你们这些老爷，
要想着那些粗鲁的庄稼汉，
是他们为你们带来优雅与闲暇。¹⁶

当然，汤姆森并没有分析这些不同的态度，也没有质疑它们之间的矛盾。但值得重视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汤姆森自己的身上，我们听到了后来在乡村写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那种语气：一种哀伤的、思虑重重的退缩。

71

在对经过改良的乡村的赞美——开阔、空旷和多产——和下面诗句所透露出的浪漫主义张力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远离了马韦尔的诗歌：

让我穿透远处树林的
午夜沉寂，那片最野性、最广袤的植物……
……这是适宜冥思的惯常去处……¹⁷

15 Summer, in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James Thomson*; ed. J. L. Robertson; Oxford, 1908; 169—174 行。

16 同上书, 350—352 行。

17 同上书, *Summer*, 516—517 及 522 行。

或者再一次：

于是孤寂，戴着沉思的伪装
常常领着我漫步在黄褐色的草地上，
穿越最最悲哀的树林；在那里几乎听不到
一丝微弱的声响，来鼓舞樵夫的劳作。

就是在这里，在树林深处这种将被常常划为清理对象的地方，荒芜和凄凉之
景令人兴奋。出乎意料的，在对荒芜的晚秋时节的反应中，

荒凉的景色刺激着灵魂。
他来了！他来了！每一阵微风都送来了
哲学式忧郁的力量。¹⁸

虽然词藻浮华，这却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到目前为止，自然都被呈现为一种
社会秩序，代表法律和富足的胜利，但现在却被视为一种替代性的秩序；它是
孤独的，具有预言性的，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承载着人类的爱；在

暮色笼罩的树林里，在梦幻般的山谷中。¹⁹

这种变化还要等半个世纪之后才真正形成气候，但汤姆森的例子却极为有
趣，因为在《四季》中，自然的这两种版本，对待乡村和土地的两种态度同时
存在。

的确，真正引起争论的是一种辩证性的变化。一首晚得多的诗，也即柯

18 Autumn, in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James Thomson*; ed. J. L. Robertson; Oxford, 1908; 970—973 行。

19 同上书，1003—1005 及 1031 行。

珀²⁰的《白杨树》(1791),总体上讲是对历史和财富之无常的一种传统而忧伤的反思,通过对已经有几百岁树龄,变得中空和腐烂的白杨树的描写体现了出来。但这里有一种过渡性的反思,似乎抓住了正在被广泛体验到的那种变化的辩证特点:

自然之线,
杰出的、昙花一现的思想,甚至在她最粗糙的作品中,
以激动为乐,但却维持着
引起激动的那种力量,并非没有损害,
但却被不时的冲动所削弱,造就它们最好品质的东西
也是导致它们解体的原因。²¹

这种对充满活力而富有成效的活动所包含的消解因素的认识是非常准确的。

72

(2)

我们必须区分从反思到怀旧这一转变的两个阶段。先有一些诗歌,它们赞美乡村背景中那些谦卑、高尚的人物(借用这类诗歌的典型语言,我们这样称呼他们),或多或少都有意识地与城市和宫廷的财富和野心形成对比。然后又出现了一些诗歌,它们将这种道德对比(在其中乡村和城市的对比就像是种气氛或者不断恶化的风气)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历史性对比(美德被明白无误地视作往昔之物,存在于一个早些的、已然逝去的时期的乡村生活之中)。

当然,第一类诗歌源远流长。但在从琼森致罗斯的诗(其中美德体现在一位乡村绅士的身上)到申斯通的《女教师》(1748)和格雷的《墓园挽歌》

20 柯珀(William Cowper, 1731—1800):英国诗人,患有不时发作的精神抑郁症,赞美乡村生活和自然风光,诗风朴素平易,代表作为长诗《任务》和抒情短诗《白杨树》。——译者注

21 *Yardly Oak*, ll. 80—85, in *The Late Augustans: Longer Poem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Century*; ed. D. Davie; London, 1958; 95.

(1750)之间,²²有一种清晰可辨的社会运动。这一方面只是社会同情的延伸,但有趣的是,它在语气上却有着根本的改变。在后一类诗歌中则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忧伤情绪,我们可以将其同早期一首赞美卑微地位的诗,也即赫里克²³的《感恩祈祷》(1647)所体现的那种安稳感,甚至是满足感和自我满足感进行比照:

主啊,你赐予我一间蜗居
用以栖身,
一个小小的房子,粗陋的屋顶
能够遮风挡雨……
……门廊很低,正如我的命运,
朴素卑微;
但房子的门槛
已被穷人们磨损。²⁴

当我第一次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我家的房顶和门廊或许比赫里克的还要低。当时我既无法忘记这些诗句,也无法不对它们感到愤怒。是我父亲把这首诗带回家的,在一本叫作《英国作家》的书中,那是他在村里夜校上课用的指定阅读书籍。他被要求(价值观念就是这样被灌输的)用心学习这首诗;他让我看看他是否能够做到。我记得我看了,并且感到纳闷,穷人指的是谁?为什么他们要磨损这个门槛?如果诗人的生活社会地位真的如此之低的话。现在我理解了。贫穷被从一种向上的视角所看到,这视角属于一位金匠的侄子,曾经的宫廷诗人,保皇党牧师,他在共和时期失去了生计。

22 申斯通(William Shenstone, 1714—1763):英国诗人、业余园艺家,主要从事“风景园艺”,诗作有《女教师》等。格雷(Thomas Gray, 1716—1711)英国诗人,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诗作不多,代表作为《墓园挽歌》,全诗128行,用8年时间写成。——译者注

23 赫里克(Robert Herrick, 1591—1674):英国牧师、诗人,作品恢复了古典抒情诗风格,著有诗集《西方乐土》等。——译者注

24 A Thanksgiving; in *The Poetical Works of Robert Herrick*.

而大多数人的贫穷则是在一种不同的维度上,低于此处进行比较的标准。但这还不是我愤怒的原因。我的怒气来自于诗人的自我贬损,他把自己放在甚至比门廊还低的位置上,而且对此心满意足。当我现在重复这些诗句时,我似乎仍然能够听到他的哀诉之声——

一个小小的房子,粗陋的屋顶

(他其实很幸运,因为屋顶尚可遮风挡雨);我们常常在村里少数一些受到鄙视的家庭那里听到这种哀诉:有慈善或宗教活动时代的一种自觉的自我贬低。在我的脑海里,这首诗直接延伸到:

上帝祝福老爷和他的亲属们
并让我们呆在我们适当的位置上。

后来我读了赫里克的《典当手推车》,诗中公然表达了对威斯特摩兰伯爵的奉承,我感到我过去是对的,尽管那时并没有人指导我阅读(当然,后来我在剑桥时被告知,那首诗是基督教美德和安宁的典范,而在堕落的当今时代我们很难体会到它的价值)。

我不能说我现在更喜欢申斯通的语气——

哎哟!我可怜的心悲伤无比,
想到谦逊的美德被人所忽视。²⁵

——但任何人都能够感受到语气有了变化。我们毫无疑问有种感觉,也即时代的趋势不利于人们保持得体的独立;善良不可避免地被推入了“单调晦暗的沉闷阴影”之中。

²⁵ *The School Mistress*, 1—2 行; in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Shenstone*; ed. G. Giffillan; Edinburgh. 1854。

当然,申斯通是个庄园主,把大部分的财产都用在萨罗普郡和伍斯特郡交界处的里索斯的风景园艺上。他是早期从事风景园艺的人之一,而且把庄园整理得非常美丽。在《乡村优雅》中的情感正体现了他有关保持朴素世风的观点:

父辈传下的土地不再让人感到满足
再见了,朴素而真诚的快乐——
山峦和深谷的熟悉景色,
乡村的牧群,春天的风,
纠结缠绕的野豌豆的紫色花蕾,
豆荚的芬芳,
让这些只属于那些耕作土地的人吧,
让他们饮取饥渴之酒,食用辛劳所得的面包。²⁶

正是这种对失去的朴素世风的叹惋构成了新的情感结构的根本要素。而正是在此处,在对他的女教师的花园的描绘中,那种熟悉的历史轮廓暂时浮现了出来:

74 这里生长着整齐的迷迭香,过去它曾长满
最骄傲的贵族那最秀美的花园;
但是不久,它因遭嫉而被驱逐,在这里
为它的枝桠找到了神圣的栖身之地;
带着金边的花朵灿烂吐艳。
啊!纵情欢闹的日子;噢!人们谨遵风俗!
不久,它被从它那崇高的领域所逐出:
于是朴素找到了这处粗陋的居所,
从此她再不与乡绅老爷们同住。

26 Rural Elegance; in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Shenstone*.

当然,为模仿斯宾塞而采取的拟古风格为这种熟悉的情感(这种情感无论如何都已超出了迷迭香所能承载的限度)提供了理由。“啊!纵情欢闹的日子”,这是通过文学手法表达的怀旧之情,精确地表达出乡村怀旧和诗意怀旧之间的奇特巧合。这种巧合在此类诗歌中相当常见,而且从此之后因一种失落的乡村文化和一种失落的文学文化之间的正式统一而变得显而易见。但是,明确的强调落在偏僻的乡村背景中通过依依不舍的回顾眼光看到的那种体面的独立上。格雷的《挽歌》背景设在教堂墓地,利用的当然是种传统的寻常事物——

光荣的道路无非是引导到坟墓。²⁷

——但这里仍然有对“穷人短暂而简单的记录”持续而含混的赞扬。之所以含混,是因为它既认可了这种久远的朴素美德——

远离了纷纭人世的勾心斗角,
他们有清醒愿望,从不学糊涂,
顺着生活的清凉僻静的山坳,
他们坚持了不声不响的正路。

——也略带抗议地承认了和抽象的乡村境况相对立的社会现实:

可是“知识”从不曾对他们展开
它世代积累而琳琅满目的书卷;
“贫寒”压制了他们高贵的襟怀,
冻结了他们从灵府涌出的流泉。

27 卞之琳译,《墓畔哀歌》,见《卞之琳文集》(下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译者注

其实真的无法两者兼顾：“清幽僻静的生命之谷”的幸运和公认的“寒冷的贫穷”所造成的压抑。但在这种情感结构中，对于朴素美德的赞扬的含混性暂时保留了下来，并引起了思索。

这或许就是解读那首令人困惑的诗，哥尔德斯密斯的《荒村》(1769)的关键。初读之下，该诗的意思看起来很清楚。对村庄牧师和校长的描写直接（或许还是有意地）从申斯通发展而来。这些描写被放置在简单快乐和矫饰奢华之间的对比之中，而这是一种熟悉的对比，只是有所发展而已。但接下来令人费解的是快乐的乡村和被毁掉的乡村之间的社会对比所表现出的明显的精确性。我指的不是说那种偶然的姿态，就像“啊！纵情欢闹的日子”的那种风格。

曾有一个时期，在英格兰的不幸尚未开始之时
每一路德的土地都供养着耕作它的人。²⁸

我指的是对当时一种社会变化过程做出的清晰的描绘，这种描绘使《荒村》超越了朴素和奢侈之间相对静态的对比。

但时移世易；贸易的无情车轮
攫取了土地，驱逐了乡村青年。²⁹

这同样也不陌生；它同样适用于16世纪或17世纪早期的抱怨。但《荒村》中出现的新的因素是进行观察的意识：对一处明确可辨的社会区域的观察。剥夺农民的土地的事情就发生在“亲爱的奥博恩”——就在这儿。

现在仍然很难确定哥尔德斯密斯脑海中所想的是哪座村庄，如果有这么一座村庄的话。有时人们推测他是在回忆他在爱尔兰的童年时代，但对此我

28 *The Deserted Village*, 57—58 行。

29 同上书, 63—64 行。

们必须用他自己在 1770 年(此时他已在英国定居十二年)的声明来否定这种推测,他说

这四五年来,我一直在进行乡村远足,费尽了所有的力气,要弄清楚我想说的东西。³⁰

还有在《劳埃德的傍晚邮件》(1762)中的那封信,如今被广泛认为出自他手。在其中

不论旅行者前往何方,当他看到乡村居民中的一部分人变得极其富有时,就会看到另一部分人变得穷苦悲惨,那种快乐的平等如今彻底不见了……。几乎在王国的各个地区,勤劳的农夫都越来越少。³¹

还有更为直接的证明。《公共宣传者》(1780 年 9 月 29 日)的一个撰稿人记录了哥尔德斯密斯告诉他的一件事,说在“一个高贵的西印度群岛人”的宅邸附近,“几处村舍被摧毁了”;或许这就是诗中所写的贸易无情入侵的地区背景。

这种社会变化过程其实是个清除的过程,是驱逐和腾空的过程,目的是为宅邸及其庭园提供地方。它以圈地运动为基础——

一个地主攫取了所有的土地

——产生的后果是

富裕、高傲的人

30 *Dedication to the Deserted Village*; 引自 *New Essays by Oliver Goldsmith*; ed. R. S. Crane; Chicago, 1927; 120 页注释。

31 该文后来重印,收入 *The Deserted Village*, 57—58 行。

占据了曾经供养着许多穷人的空间；
用来建造他的湖泊，扩展庄园广阔的领地，
用来饲养他的马匹，让马车和猎犬可以任意驰骋。³²

76 我已经指出过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早期的例子——也许就是在“纵情欢闹的日子”里，也即赫伯特在威尔特郡的乡村住宅，他就是在那里写的《阿卡迪亚》。在牛津郡和多赛特郡有典型的 18 世纪的例子，也有不少较次要的、缺乏记载的案例。哥尔德斯密斯跟随遭驱逐的村民们前往他们可能选择的去处：到乡间的另一处地方，但

如果流浪到某块没有篱笆的公地上
他驱赶自己的羊群去吃那零落的叶子
这些没有篱笆的田野已被富人的儿子们所瓜分
即便最贫瘠的公地也不允许人们进入³³

——圈地运动在继续进行；他们来到城市，但

如果前往城市——那里又有什么在等待着他？
去观看他无法分享的奢侈富足³⁴

——体验到城市所集中代表的财富和穷困之间的夸张对比；最终流亡他乡——

半个凸起的世界横亘其间。³⁵

32 *The Deserted Village*, 39 及 275—278 行。

33 同上书,305—308 行。

34 同上书,309—310 行。

35 同上书,342 行。

通过这些方式,视野变得开阔,真正的历史显现了出来。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提出的。该诗最奇怪的一点就是其中抗议和怀旧的混合,以及把这些情感和诗歌创作联系起来——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方式。首先以对曾经快乐的村庄的乞灵为例:

美好的奥博恩! 平原上最可爱的村落
在那里健康和富足振奋着劳作的青年,
在那里微笑的春天来得最早,
夏季绽放的花朵迟迟不愿凋零。³⁶

乞灵的意义在于对平凡的田园生活的依赖,这同它所描写的对象在文学意义和历史意义上都有一定的距离。

可爱的村舍透露着纯真和安逸
我的青春在此度过,那时每一种消遣都令人开心。³⁷

不仅仅是对童年时代的回忆和对村庄的回忆融合在一起;而且通过这种回忆模式,描写的对象似乎消解在了一种实际上是自我关注的诗歌写作之中。

多少次我曾流连于每处迷人之地,
绿荫遮蔽的小屋,阡陌纵横的田地,
涓涓流淌的小溪,忙碌热闹的磨坊,
比邻山顶处端庄的教堂,
山楂树丛的浓荫下是
轻声交谈的老者和窃窃私语的恋人的座位。³⁸

36 *The Deserted Village*, 1—4 行。

37 同上书,5—6 行。

38 同上书,9—14 行。

77 或许正是那山楂树丛发挥的作用。我们不得不在未经修正过的孩童的视界和一种著名的文学方法既含糊又机械的排演之间进行选择。在这种模式中，生活在村庄里的人们被看作田园生活的局外人：

村庄里所有的人都不必劳作
而在浓郁的树荫下尽情欢娱³⁹

又是在山楂树下！正如在汤姆森的诗中一样。

这就是你的魅力，可爱的村庄！像这样的欢娱，
交替往复，甚至使劳作也变得令人愉快。⁴⁰

但这一连串的描写其实是一系列的文学回忆：把他人的生活和工作消解于一种有关往昔的形象之中。

这就是该诗所暗含的反讽，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诗歌会遭受驱逐。因为在情感真正的运动中，引人质疑的不仅是村庄的生活，还有诗人的独立性，他曾希望能在此处隐居，这里（这是对卡鲁的奇怪附和）

无疑没有坏良心的门房
把饥饿的乞讨者从门前轰走。⁴¹

不仅仅那种可以理解的希望遭受了挫败——

我长期忍受的烦恼结束了，
回到了这里——最终死在家园之中。⁴²

39 *The Deserted Village*, 17—18 行。

40 同上书, 31—32 行。

41 同上书, 105—106 行。

42 同上书, 95—96 行。

我们看到,剥夺了村庄的一切的那些社会力量同时也剥夺了诗歌的活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会记得诗歌在汤姆森笔下那种富裕、有产的社会秩序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

而你,甜美的诗歌,最可爱的少女,
 感官享乐侵袭之处,你仍然第一个飞走;
 和这些堕落的羞耻时代格格不入,
 无法感动心灵,或是获得诚实的声誉。
 亲爱的仙女,遭到忽视和否定,
 我在人群中感到羞惭,在孤寂中骄傲。
 你是我所有福祉的源泉,也是我所有悲伤的根由,
 一开始使我贫困,至今仍然如此。⁴³

如果只有村庄的社会历史受到质疑的话,那么诗歌同时遭受的这种贬抑则无可否认显得非常奇怪。但真实情况却是,从这种激烈的个人情境(在这种情境中,诗人的独立性难以维持他的生活,而他宣称代表的所有的人性则被新富阶层的粗俗和冷漠所击碎和驱逐)中,一种景象得到了延伸,那就是村庄也遭受了类似的屈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乡村所遭受的剥削被敏锐地观察到了。乡村的事实凭借自身的权利得到了呈现。但这种剥削还受制于另一种进程:那就是我在其他地方,在谈及吉辛⁴⁴和奥威尔时所说的否定性认同。也就是说,作者在他所处的社会形势中所遭受的痛苦折磨与他之外的社会历史的事实恰相吻合。他并非看不到真正的社会历史;当社会历史作为一种当下的现实时,他常常对其尤为敏感。但是,他自身的痛苦和他之外的一个社会群体的痛苦之间的统一最终不可避免是否定性的。当下的现实被精

78

43 *The Deserted Village*, 407—414 行。

44 吉辛(George Robert Gissing, 1857—1903):英国小说家,作品以否定现存社会的态度反映伦敦下层生活,代表作为《新格鲁勃街》。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主要作品有反乌托邦政治讽刺小说《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译者注

确而强烈地观察到了,但它同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真正关系却不得而知,因为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是作者自己的发展:一种有关过去的情感,一种有关未来的观念,而通过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交集,所观察到的当下被安排入其中。我们不需要怀疑哥尔德斯密斯对那些被赶出村庄的人们的激烈情感:这种联系是肯定的。只有当这种共同的情感被延伸到记忆和想象中时,结构才变得含混起来,因为这时在语言和观念中掌握一切的是一种不同的压力:也即作者的社会历史。于是,对教区牧师和校长的怀旧式描绘所展现的,是在其自身位置上保持独立和受到尊敬的人,他们被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所支持,而那种生活方式中独立性和共同性都是真实存在的。对于这种自立的权利——这也是诗人的权利——而言,富裕阶层和上流社会的圈地运动是致命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一名诗人就是当田园诗人:诗歌的社会条件——哥尔德斯密斯就是这么认为的——就是那种被理想化的农业经济。后者的毁灭,就是前者的毁灭,或者被用来代表前者的毁灭。于是村庄自身就成了一个田园式的和诗意化的模式:它所遭受的剥夺被归因于财富和奢侈的一般罪恶。因此,古老的村庄被呈现为快乐和富足的,而新的历史形势则是既不快乐也不富足的,这就极具深意了。

一位老爷攫取了整片的领地,
你那一半的耕地被抛荒,平原失去了欢笑,
你那清澈的溪流不再映印天空,
莎草阻塞了水道,疯长蔓延;
在你的沼泽地旁,有一位孤独的访客,
那是叫声沉闷的乌鸦在守卫巢窝;
在你荒芜的牧场上空,田兔在盘旋
单调的鸣叫声声回荡。⁴⁵

45 *The Deserted Village*, 39—46 行。

如果社会进程真就是这个样子,那就真的容易多了。然而真实的历史(旧的社会关系摧毁的同时,土地的使用率和肥沃度也随之增加)被想象出来的进程(农业秩序被摧毁,生产“抛荒”,溪流“被阻塞”,麻鸦的叫声“空洞”,田凫“单调地”鸣叫)所压倒。这幅创造出来的“荒芜”景色是想象之物,而非社会进程;这是新的社会秩序对诗人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对土地产生的影响。对“亲爱的奥博恩”的记忆,是对一种社群,一种情感和一种诗歌的记忆,这种记忆在“贸易无情的”重压下不再能够幸存,但也同样无法被吸收入新的关系和想象;它只能被放逐,做出绝望的抗议,超越历史之外——

让你的声音仍然能够长久不歇,
以弥补险恶的气候。⁴⁶

在《荒村》的结尾,正是遭到放逐的诗歌在充满希望地进行教诲:

那骄傲的贸易帝国迅速走向衰败,
就如海洋冲垮防波堤一样;
而自立自强的力量却可以超越时间,
就像岩石能够抵抗巨浪和天空。⁴⁷

这里,我们后来将称之为浪漫主义的情感结构——自然和工业,诗歌和贸易之间的对立;在当时真正的社会压力下,文化的概念中增添了人和社群的孤立性——被精确无比地投射了出来。我们可以在布莱克、华兹华斯和雪莱的作品中听到它的回声。

46 *The Deserted Village*, 421—422 行。

47 同上书, 427—430 行。

(3)

在兰霍恩的《乡村正义》(1774—1777)中,出现了快乐往昔的一种不同的重构,同时又有意识地求助于当下社会的道德观念。这里,最终的指涉是撒克逊人、丹麦人和诺曼人入侵之前的自由的大不列颠人;这是诺曼奴役观点的一个变体,该观点把诺曼征服解读为封建财产制度、封建压迫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建立,把征服之前的时期——尤其是阿尔弗雷德的萨克森王国——视为自由和平等的乡村社会。在兰霍恩的笔下(两者有同样多——也是同样少——的理由),大不列颠人是自由的祖先;他们自己也是入侵者,不过那段历史已经足够久远了。然而,他们所代表的有关自由的观念并不仅仅是“历史的”。

难道像这样思想是远古时代的梦吗?

只属于某个时代,或者某个区域?

难道不是自然传授了这些思想,

吸入灵魂之内,刻于心灵之上?⁴⁸

这里,有关原始自由的观念与有关“自然”永恒的推动和教诲的观念已经被结合了起来,就像在卢梭那里一样,而这首诗通过科西嘉叛乱对卢梭做出了一种模糊的指涉。不过兰霍恩找到了更具体的载体来承载这种理想: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的地方官员,治安法官:

在快乐的过去,命运眷顾

盛名远播的爱德华医治受伤的国家……

……社会法律从伤害变为保护,

48 *The Country Justice*, Part I, 17—20 行; in *The Late Augustans: Longer Poem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Century*, 71—92。

珍视和平,培养恭谦;
 富人不敢实施暴行,
 消除贫穷和苦难的温床……
 ……往昔的乡村官员衷心履职
 把你——爱德华——的荣誉放在心间。

接下来该诗把这种传统正义同古老的乡村宅邸统一起来——

古宅那朴实无华的院落。⁴⁹

而这构成了对新的生活方式进行攻击的基础:

你们这些现代猿人,
 这些把自然的脸庞打扮得华丽俗气的市侩,
 丝毫不去思考你们在这里看到的雄伟建筑;
 它们来自你们从不知晓的伟大时代。⁵⁰

朴素的旧秩序遭到了通过贸易发财的富裕市民和上流社会的不良习气的侵蚀(正如我们以前听到的一样)。兰霍恩对后者的蔑视同样显而易见:

皇家建筑师们的滑稽品味,
 将把理智和自然的王国变成一片荒芜。⁵¹

这些新人和新的情感进入了古老的乡村,遮暗了传统的正义:

49 *The Country Justice*; in *The Late Augustans: Longer Poem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Century*, Part I, 31—54 行及 80 行。

50 同上书, 61—64 行。

51 同上书, 73—74 行。

哦！爱德华，你最美丽的月桂褪了色！

你漫长而荣耀的历史蒙上了阴影。⁵²

漂泊的退伍士兵受到的苛刻待遇和未婚母亲遭受的野蛮囚禁是衰败的标志。
古老的正义和它那可敬的人道传统，同新时代的冷漠和残酷形成对比。

接下来，兰霍恩又举出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年迈的穷人在那些被指派来管理他们的人的手中所遭受的对待：

但是一个妖魔会暂时引起你的注意，
一个长着人形的妖魔，
教区官员！——尽管这些词会玷污诗歌
破坏诗的光彩；
它弯腰命令你
向那狡猾、残忍的教会执事济贫助理低眉致意；
狡猾的承包人，全无信用，
心硬如石，贪得无厌！
当穷苦年迈的庄稼人
虚弱地倚靠在他那曾经听话的铁锹上，
忘记了壮年时期的工作，
他那有益的劳动和诚实的赞美时，
这个卑劣的家伙会不会克扣老人那本就不多的面包？
这个坏蛋，老人曾经为他布置餐桌。
当收割时炙热的阳光和令人呕吐的空气
迫使干活儿的人松开了手中的镰刀，
无法再给无助的孩子们挣来面包，
他们又该如何生活？

52 *The Country Justice*; in *The Late Augustans: Longer Poem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Century*, 167—168 行。

看看那脸色苍白的母亲吧，满怀悲伤和忧虑，
胆怯地向那傲慢的承包人寻求帮助；
但很快她就被无礼地打发走，
让她求助于教区会议，而且遥遥无期！
这是让她去等——死！我的诗行是否过于严峻？
让人难以接受？
啊！相信这种悲惨经历的真实性吧：
真相很残酷，但故事却是有根有据的。⁵³

没有理由怀疑对“贫民”所受待遇的这一描写的精确性。兰霍恩讲述了一个牧羊人和他的妻子的故事，这个牧羊人被人发现饿死在一丛蕨类植物中。他认为，这就是当下法律的过错：

当你那善良的祖先统治这片广袤的土地时，
悲伤之声从不会不被理睬……
你的祖先不会把穷人的福祉交予教区管理，
也没有郡副司法长官插手于此。⁵⁴

这种回溯被泛化为一种熟悉的对往昔时日的回忆：

对各种地位的人而言，那些日子早已消逝！
殷勤好客的黄金时代……
那时财富是美德的侍女，她的大门
任由受到命运不公待遇的人自由进入；
穷人随时都能见到他们自然赋予的庇护人，

53 *The Country Justice*; in *The Late Augustans: Longer Poem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Century*, Part II, 35—60 行。

54 同上书，95—96 行及 99—100 行。

立法者就是法律的补充！

那些日子已经消逝了，上流社会无边的权势

已经把济贫治安官随波带走……

再也看不到乡村庇护人的身影。⁵⁵

那么，再回到潘舍斯特和萨克斯海姆。它们的继承人都已经搬到城里或布赖顿去了。地主都已经走了，那么谁留下来承担维持正义和发挥人道博爱的功能呢？只有残暴的郡副司法长官和谄媚伪善的、唱赞美诗的教区俗人委员会了。

82

兰霍恩的愤怒是不加掩饰的，但这种社会视角却很奇怪。他在做了一段时日的私人教师和教士后，就通过婚姻进入了一个地主家庭，并在萨默塞特郡当了一名乡村治安官。在他看来，人性属于一种已经消逝了的乡村传统，而非人性则被投射在当代发展过程的代理人身上。因此，是郡副司法长官，而不是地主攫取了牧羊人的羊群，使其最终饿死：

被来路不明的金钱所诱惑。⁵⁶

当然，的确有这样的郡副司法长官和这类代理人，但如果把他们同他们所为之服务的社会进程同那些实行圈地的地主——他们（正如兰霍恩所承认的那样）对此负有责任——割裂开来的话，则又毫无意义。这就好比一个仁慈的人无法容忍自己看到所处时代的苦难的真正根源在于和他直接相关的阶级一样。他只有或者美化该阶级的过去，或者用他们的缺席和新人的入侵来解释现在。

当然，缺席的地主仍然存在；而且他们是这样的一个阶级，不论他们说什么，总是非常明了什么事情正在通过他们或者为了他们而发生。但不论他

55 *The Country Justice*; in *The Late Augustans: Longer Poem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Century*, 123—134 行。

56 同上书，115 行。

们,或者那些移居的商人,都不应被孤立出来作为圈地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严苛行为的动力源头。改变农业英格兰的真正进程被牢牢掌控在一直在场并且积极从事商业活动的地主的手中。而造成变化的真正缘由则是发展中的农业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制度以一种极其有效的方式成功地改变了它的环境,把人和自然都变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目的的工具,而这也正是资本主义贯穿其发展历史所表现出的特点。

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主义一直都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进程:增加真正的财富,却又不均匀地进行分配;使更多的人能够成长和生存,但又把人仅仅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除了这些抽象的功能外,对社会没有实质性的权利。因此,在对土地的惊人改进和此进程的社会后果——被剥夺财产的人和流浪者,年迈者、患病者、有残疾者、哺育孩子的母亲以及孩子们,他们无法以这种方式进行工作,所以仅被视为无用的负担——之间一直存在着反差。要看到成功的生产和这些社会后果之间的矛盾,就要穿透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性格。对像兰霍恩这样的人来说,把后果从制度中分离出来,然后把社会和经济增长的真正结果归咎于社会败坏,这样做更容易些。

当然,新的社会体制本身正在变得更加成功,更加深入,更加自信地表现出扩张性,就此而言,很可能总是存在某种区域性的依据来表达怀旧遗憾。在这里或那里,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时代会被真切地记起。但是,在该体制的整体性矛盾造成的压力下,这种现实主义的区域性观察逐渐变成了一种广泛的历史轮廓,然后又变成了一个神话。英国的地主阶级在改变它的世界的同时也改变了自身,它被美化和移位,同它自己的实际活动构成了一种历史性对比。它实际上的残酷无情只有那些和它有联系并依附于它的人才能够费力地辨认出来,而穷人和受压迫者中的绝大多数却缺少一个连结的声音,无法辨认出他们的日常经历。于是,一种仁慈的本能被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它变成了决定性的社会事件之后出现的同情和怜悯。真正的统治阶级是不容置疑的,所以他们被看成是种暂时的不在场,或者被视为善良的老人,被新兴的坏人所取代——他们自己取代自己。这首悲伤的歌我们已经听了许多个世纪了:一首具有诱惑力的歌,把抗议变成了缅怀,直到我们死去。

兰霍恩对于古老正义的看法,以及对它与新的法律体制的差别的看法,是看待田园往昔的整个方式的一个主要构成因素,而这种方式已经变得非常典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把古老的正义存在的年代先是回推一代人的时间,然后又回推了几代人的时间。这种在时间上表现出的浮动性含混,在后来的整个辩论中是很正常的。

但是,让我们暂时同意回到过去。都铎时代济贫法的家长主义总是与对流浪行为的攻击联系在一起。这种立法的双面性是农业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出现时的典型现象。在匮乏的中世纪经济中,贫穷可被看作是自然灾害的结果:饥荒、疾病和瘟疫。因此对贫穷的反应,至少在理论上,是一种自然的慈善,所有人都因为在自然中生存而被牵扯其中:从宗教的视角看,对上帝的义务中包括这一广泛的义务。当然,现实总是非常不同的:在一个天然的体制中,正常的贫穷被容纳进所期待的秩序,而反常的贫穷则要碰运气了。但正是从一个总体匮乏的经济的发展中,正是在后封建社会的解体和流动中,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确定无疑地出现了。这种意识形态立刻有组织地对付贫穷,正如16世纪的那些新观念——强制征收济贫税,对贫穷进行分类并设立新的行政机器来管理穷人——所反映的那样;而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又以新的方式把贫穷同劳动结合了起来,以至于对所谓流浪者——流浪本身是社会造成的动乱和流动的结果——的掠夺成了一种道德责任。收税员和教会执事济贫助理们从一开始就承担了这样的双重功能:他们既组织实施救济,又强迫无家可归者劳动。这一制度最大的问题总是在于它对付的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社会流动。反流浪法的真实目的主要是为了强迫无地者变成新的经济组织中的工资劳动者。但这种目的却通过以教区为基础的救济组织,被解释为人们所应当担负的照料自己并照料邻居的责任;后来甚至变成了只照料自己的责任。定居的观念,以及后来的父式关爱的观念,同流动的观念和“健壮的流浪汉”,也即自由劳工的观念形成了对立。

这种反差在一场长久的价值危机中持续存在。现在仍然能够常常听到对定居生活和邻居的美化,似乎这是社群唯一的现实似的。在20世纪中期, T. S. 艾略特在定义一个有关基督教社会的观念时说道,“整体而言,人类中

的大多数人最好继续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地”。⁵⁷（“大多数人”当然把一个人排除在外，他不仅从一个地方移居到另一个地方，而且还从一个大陆移居到另一个大陆。）

不过，围绕着定居的观念发展出了一种真正的价值结构。这种结构依赖于许多真切而持久的情感：对那些我们生长于其间的人们的认同感；对我们最初生活于斯和最先学会用眼去看的那个地方，那片景色的眷恋之情。从我自身的经历中，我立刻辨认出了这些情感。我在梦中唯一看到的景色，是我出生的村庄黑山。当我回到那里时，我感到找回了一种特殊的生活，这种生活有时看起来就像是个不可逃避的身份，一种比我在其他地方拥有的关系都更为积极的联系。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对他们的故乡抱有同感，因此定居观念——不论新与旧——所具有的力量就是积极的，无可争议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总是存在如何继续在故乡生活的问题。对此我仍然有亲身体会：不仅因为我不得不离家求学，后来又在外从事某种工作；而且因为我出生的那整个地区的人口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大量减少，因为人们无法再在那里谋生。当我听到对定居的美化时，我有最深切的体会；我知道邻里亲朋意味着什么，而分别和离去又会给人们带来什么。但是，我也知道人们为什么不得不离开，为什么我自己的家庭中会有那么多的人离开。因此，我把对定居（普通的文学——历史意义上的定居）的美化看作是对多数人的需要的无礼漠视。尤其是对旧的济贫法的美化，不论是在兰霍恩还是 20 世纪作家的笔下，在我看来都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是对人性的否定。不过，我明白对任何没有从事过垄断或近似垄断职业的人来说，要想洞穿那种自私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一定

85

57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T. S. Eliot; London, 1948; 52.

控制是显而易见的。把这美化为一种道德的经济而造成的后果一目了然。你适应你所待的地方；如果你不适应，你就遭到折磨。正如 1662 年的一项新法案的前言所言：

由于法律的缺陷，穷人从一个教区移往另一个教区，没有受到限制，他们因此而定居在这样的教区，那里有最好的牲畜，最大面积的公地或荒地来建造屋舍，以及最多的树林让他们取柴和破坏。

之前曾经有过多次尝试来限制这样的男人和女人的谋生途径。14 世纪以来实行的许可证制度限制仆人或雇工离开他们的教区；雇主们发放证书来证明这些人的确是“自由的”；这是法令和雇佣市场的控制机器。在这种对作为劳工的人进行控制的不同阶段里，对贫困的救济虽然包含有某些自然的和善良的情感，但已被大打折扣。因为一方面，从 17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末这段农业明显繁荣兴旺的时期里，工资应当增长但却没有增长。另一方面，所有那些漏过这一初级管控网络的人——有孩子的妇女、孤儿、私生子、病人和老人——就由一种以定居为基础的救济制度来管理，而不同的地区施行这种制度虽有所差异，但整体而言不可避免都是非常残酷的。“年迈者、残疾者或无劳动能力者”，如果在村庄里居住不满三年，就可以被驱逐，或者被合法地忽视。孤儿们被要求去做学徒，他们因此不得受制于师傅的喜好和生活条件。未婚母亲被送入监狱。孩子过多的家庭会被赶到任何可能的地方去；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家庭在城镇或早期工业区要比在村庄里更有生存能力；他们有时在那些地方可以形成一个经济体，而在村庄里最需要的则是抽象的生产者，体格健全的独身男人，家内仆佣。当然，有些教区里仍然保有人道精神。但这种体制却是把最可怜的人从一个教区赶到另一个教区，然后赶进贫民习艺所，在那里废人们——病人、老人、精神错乱者、不幸者、出走者——可以被集中起来，然后更为直接地对他们进行控制。克雷布后来曾对一个这样的混合型贫民习艺所做出过描述：

在那里住着没有父母照料的孩子：

没有子女关爱的父母,也生活在那里;
 心碎的妇人睡在无欢的床上,
 还有被抛弃的妻子和未婚母亲;
 心灰意冷的寡妇默默垂泪,
 步履维艰的老人心惊胆战;
 瘸子、瞎子,他们是最快乐的人!
 还有没精打采的白痴和欢欣鼓舞的疯子。⁵⁸

即便是那些能够留在自己的教区里的人,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也会承受压力。1693年后,对有固定住所的老人——兰霍恩所描写的那些人——的救济需要获得一位法官的同意,而他们的名字要被记录在册,每年都要被审查。1697年的一个法案命令这些教区穷人必须在衣服上佩戴一个红色或蓝色的字母“P”;他们现在成了一类特殊的人被标注了出来。

考虑到所有这些,我们不大可能接受兰霍恩所写的历史,尽管我们可以接受他的观察。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制造出了那些使他深受震撼的残酷行为,也从没有任何可能把乡村正义提升至他所身属的农业社会和经济的标准之上。一个陷于这种制度之中的好人(亨利·菲尔丁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可以用仁慈来对之做出调节;可以看到改革的方法。但局限性仍然存在,那是整个现实的一部分。法官和监工,地主和郡副司法长官,他们属于同一个统治世界。那个故事的确很严密,它并没有取代“乡村保护者”。它就建立在他们之上。

58 *The Village*; 前引书。

9 生为耕田命

87

诗中不再有真相,尽管表示不屑吧,
但要承认乡村生活充满了苦难。¹

克雷布的坚持现在比较容易理解了。这种观察和哥尔德斯密斯或兰霍恩的没有不同,但却出现在一种新的情感结构中,这种结构不需要怀旧。在新的传统中,可以看到一种实际存在的,活跃的和社会性的对比。新传统的活力来自对旧传统的摒弃,对“田园传统”的摒弃:

我的确承认田野和牲畜对
放牧或耕田者充满魅力;
但当置身这悦目景色之中,我追寻
那些贫苦辛劳的当地人,
看到正午烈日,炽热刺目,
照射在他们裸露的头顶和挂满汗珠的额头;
而一些虚弱怯懦者
虽然悲叹自己的命运,但却仍继续劳作;
难道我还敢让这些真实的不幸藏在
诗意的骄傲那华而不实的陷阱之中?²

这是通过改变视角来改变景色。把劳作,并且因此也把劳作者包含于内的做

1 *The Village*; 前引书;第二卷。

2 同上书,第一卷。

法,是一种刻意关系转换。我们只需要想想潘舍斯特周围的田野,就能意识到这种转换的重要性,或者想想《典当手推车》,就可以辨认出情感所发生的有意识的改变。

克雷布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前人已经谈及过的。半个世纪之前,“田园传统”就已遭到过同样的激烈挑战:

没有泉水在这里叮咚,没有羊羔在这里嬉闹,
没有红雀啁啾,没有快乐的田野;
到处都是一片阴沉、忧郁的景象,
只会让缪斯怒不可遏。
当我们给黑豌豆脱粒时,你几乎无法
辨认出我们自己的肤色:
汗水、尘土和令人窒息的烟雾
让我们看上去和埃塞俄比亚人没有两样。
傍晚我们回到家里,吓坏了妻子;
婴儿也惊恐万分,以为来了怪物。
一周又是一周,我们干着这乏味的活计,
除非到打谷的时候换份新工作;
一份新工作,是的,但常常更为糟糕!
打谷工人受尽主人的咒骂。³

在这些诗行中,一种绝对性的转变出现在对工作的细致说明上,尤其出现在那个限定代词上:

当我们给黑豌豆脱粒时。

88

3 *The Thresher's Labour*; 前引书。

因为这是斯蒂芬·达克的作品,他也被称作“打谷诗人”,这个称呼仍然带有一点儿居高临下的味道。在他作品的标题页上,我们实实在在看到了他的历史:

在威尔特郡的查雷敦,在一处谷仓里打了多年的谷,很穷,每周的薪水为4先令4便士,直到引起卡罗琳王后的注意;鉴于他的伟大诗才,王后赐予他一处住宅,位于萨里郡里奇蒙附近的克伊,以及每年30镑的薪水;在此之后,他学习学者语言,接受了圣职,如今是一位品格端庄的教士。

现在没有东西能够减弱他的早期诗作之一,《打谷者的劳作》那朴素的力量:

让那些悠闲享用美食的人
可怜可怜为他们准备食物的收割者吧;
因为我们总是辛苦劳作;
除了安息日,无法休息:
我们的主人也不允许。
想想看,我们过的是种多么痛苦的生活;
每日起早贪黑;
即便在睡梦中,我们也无法摆脱苦痛;
重又开始劳作:
我们的幻想看来永不安生;
我们白天干的苦工,她在梦中重新来过……
……就这样,年复一年;
永不停歇,劳作不止;
恰如西西弗斯不断推回滚下的石头;
我们的工作没有终结。
新的劳工代替旧的劳工;
不断更新,延绵不绝。⁴

4 *The Thresher's Labour*; 前引书。

写这首诗时,他还是打谷工人,那时:

他整日为主人干活儿;在一天的劳作之后,把晚上的时间用来读书。

当这个劳工的声音缓慢适应诗歌中可供使用的模式时,不难感受到其中的紧张:一本正经的阐释,充满焦虑的引经据典,以及体现沉着的文学风格的那些齐整的从句。但是,那种情感仍以自己的方式蓬勃迸发,而且读着这简单而明白的真理,发现达克的名字在 20 世纪依然保留着它那些“限定性的”联想,⁵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一个更好的打趣对象——当然也是让人鄙视的对象——则是后来的社会同化效果。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

89

大人物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召见他。

他已经开始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

对贫穷的生活知足常乐并非惨事,
不必忍受巨大财富带来的烦恼……
……辛勤的劳作使穷人餐饭生香;
饮食愉快,睡梦甜甜……
……但让我们换种说法:
如果贫穷真如他们所言那么可怕,
那么与其在它的重压下呻吟抱怨,
还不如乐天知命来得体面⁶

——从这种持续的、防御性的(虽然有所妥协)的自尊转向了一种不同的语

5 达克的英文写法为 Duck,意思是“鸭子”。——译者注

6 *On Poverty*; 前引书。

气。在翻译完成后不久,他写了《感激,一首田园诗》: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已经说明了问题的本质。⁷

哦!梅纳尔各斯,你知道我可怜的出身,
生于村舍,生为耕田命:
常要伺候严厉苛刻的俗人,
从他们吝啬的手里争取我的面包:
但当卡罗琳得知我的贫困后,
她赐予我一片牧场。
这使我的心中长出新的欢乐;
这样喜悦的表情皆因她的慷慨。⁸

这些话非常坦率,也很好理解,而一两年之后听到:

我歌唱欢乐的树林和繁花锦簇的草原:
林中仙女,你来助我一起歌唱田园吧。

就并不真的令人感到奇怪了。这是《里奇蒙庄园,和皇家花园》中的句子,在那里,“田园”作为一种游戏总是随手可得的。威廉姆·肯特已经为卡罗琳王后设计了一座名为“默林洞”的凉亭——“茅草顶,下面为帕拉蒂奥式的墙面”——达克被任命在里面充当向导。那么这个向导说了些什么呢?

没有野蛮的军队劫掠我们肥沃的草原;
这里平静富饶,小伙儿在微笑。
他在嘲笑那些外国异邦;
可怜的农民在重担下呻吟,

7 该诗的英文标题为 *Gratitude, a Pastoral*, 两个词指的是 *gratitude* 和 *pastoral*。

8 *On Gratitude*; 前引书。

耕耘着土地,收获却不属于他们。⁹

这是从:

昨天早晨,我们在太阳下汗流浹背;
但我们的工作却进展不顺。
我们的面前蓊草缠绕,
大风把玉米吹向相反方向。
我们的身后主人在等待;如果他发现
碰掉了一穗玉米,就会恶狠狠地叫道,
“你们把一半的薪水撒在了地上”。
然后用他那贪婪的手摩擦断茎。

90

的一种短暂而戏剧性的转变。但这不仅仅是从威尔特郡田野到里奇蒙庄园和皇家花园的转变;这是从“我们”向“小伙儿”的转变,一种决定性的文学转变。几年之内,达克写的都是些对经典诗文的模仿之作,浮华空洞,迎合时髦文化,那种文化不仅仅是种文学姿态——“高雅”传统——而且常常体现了社会的认可。我们可以用他的诗作之一来清楚地展现随之而来的沉默以及无意识的反讽,该诗是对克劳迪安¹⁰的模仿,已经由于其他的和无法预料的原因变得滑稽可笑:

白斯诺—格林的小伙儿是多么幸运啊,
他过去从未见过宫廷,
也从未远游离开过
家乡的田野。

9 *On Richmond Park*; 前引书。

10 克劳迪安 (Claudian, ? — 约 408): 全名 Claudius Claudianus, 古罗马诗人。——译者注

有鉴于身后这段悲哀的历史,克雷布在某种意义上是重新开始。他把“放牧或耕田者”那快乐的乡村和“贫苦辛劳的当地人”的现实区分开来。作为一种社会现实标记,这已经很有意思了:在“耕田”和“放牧”的地主与只是勤劳的劳工之间的有效区分。正如现在人们说承包人或建筑师“建造房屋”,而工人只是“在一处建筑工地上工作”,或者换种说法,在“垒砖头”、“做木工”、“拌混凝土”一样;他们干的只是部分,而不是整个进程的全部。整个进程的全部属于地主和雇主,并不在劳工的方向上,因此的确不属于他们。但是,更为直接的主要区别则是在“耕田者”和诗人“我”之间。在传统转变的过程中,许多东西被分割开来:作者是独立的观察者,而不是(或者不完全是;我们将在后来到一个例子中看到这一点)地主资助人的诗人客人。同时,从这种独立的位置,克雷布和兰霍恩一样,看到的是年迈的劳工:

现在他痛苦地走向坟墓;
富人鄙视他;穷人也鄙视他;
每个主人都把他当作奴隶,
催逼他那虚弱的手干活儿,
而当他因年迈而徒劳无功时,
就无情地辱骂他是偷懒的穷鬼。¹¹

91

通过一种起初是人道主义的观察,诗歌背离了意识形态。但这种背离得到了延伸。在他的反田园诗中,克雷布的第一个普遍性证据是一片劣质的土地;萨福克郡的奥尔博罗的一片荒草丛生的贫瘠土地,那时还是内陆。点明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任何对英国文学和乡村历史的研究都必须弄明白区域和地点。正如我们将在科贝特的《乡村漫游》中看到的那样,在一个早晨的旅行时间里,“微笑的乡村”就让位给了“一大片燃烧的沙地”。在这一阶段,以及在次一些的程度我们现今的时代,对于乡村英国的概括常常让位于这种不均

11 *The Village*; 前引书。

衡发展的事实。从阿瑟·扬的萨福克郡到克雷布的萨福克郡,就不过是发生在相同年代里的这样的一次旅行。

但是,克雷布的视野并不仅仅是对劣质土地的反映,劣质土地常常可以被改良的,就像扬所做的那样。他离开那“一大片燃烧的沙地”,点明了以下关键的一点:

但这些场景是自然吝啬的手
对饥荒的土地的有限赐予;
如果人类抱怨,这是
徒劳无功的劳作犯下的错误;
然而还有其他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富足女神在微笑——唉!她只对少数人微笑——
而那些品尝不到富裕,然而却看到了她的宝藏的人,
就如同挖掘金矿的奴隶,——
周围的财富使他们加倍贫穷。¹²

这就是达克所注意到的情形:

饥饿的人行走在自然那丰富的宝库中

——他把它安全地设置为海外某地。这是农业资本主义的独特危机,正如工业资本主义一样。在英国的许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富足女神在微笑——唉!她只对少数人微笑¹³

——但我们可能是在莱斯特郡,或者依附于贝尔弗沃堡的那些村子的土地

12 *The Village*; 前引书。

13 同上书。

上,克雷布是那里的大地主,拉特兰公爵的家庭牧师。就在他写作之前,这些土地中的一部分已经被圈占了:例如克劳克斯顿就在1766年被公爵和地区教会所联合圈占。正是在这个郡,在这样的统治之下,劳工们成了生活在富足之中的穷人。在土地贫瘠地区,错误被归因于自然;但在这里,又是谁的错?

92

问题被提出来了,但最终克雷布视角的特点或能力并不能对此做出回答。《村庄》实际上是首反田园诗,它用对痛苦的描写来反对田园诗对欢乐的描写。同样的,它也对那些美化道德经济的描述提出了质疑;应当给予的关爱并没有被给予。正如克雷布所言(他指的是哥尔德斯密斯):

难道他,以“40 英镑的年收入”,
这个虔诚的人,不算“是个富人”么?
唉!不;另一群羊的放牧人,
和他非常不同的人,在喂养这一小群羊。¹⁴

教区牧师和医生——克雷布的自己人;克雷布自己——忽视,甚至违反了道德责任。

有意思的是,这种社会和道德立场——仁慈而愤怒的观察者的立场,他也是拉特兰公爵的家庭牧师——的含混性在该诗的结构,甚至在语法格中反映了出来。克雷布提出了一个中心问题:

劳作生产了什么,而过去的劳工,
在暮年时,倦怠衰弱,他最终又发现了什么。

但是,他的答案的特点显示出谁才是他真正的读者,并因此表明了他真正的问题。

14 *The Village*; 前引书。

或者你们会认为他们的回报就是健康？
 那是劳作的亲爱的孩子，它因财富而逐渐衰弱。
 那么去看看他们，这些日出而作
 终日辛劳的人吧；
 看看他们，顶着天狼星的灼热
 双膝颤抖，青筋暴跳；
 看看他们，斜倚着长柄镰刀，眺望
 割过的农田，哀叹着尚未干完的活计；
 看看他们，日晒雨淋
 病痛缠身，饱受折磨；
 走过沼泽荒原，
 傍晚的露水浸透他们温暖的毛孔；
 然后你就会承认，劳作对你的这些奴隶而言，
 和你的享乐无度一样致命。

在此处，读者会问，“你”是谁？诗中的“你”总体上讲指的是田园诗人，也可以泛指他的沾沾自喜的读者：

你们这些高雅的灵魂，梦想着乡村生活的闲适。¹⁵

但是，在这些诗句中，暂时又出现了另一个人格：“你的奴隶”；“你的享乐无度”。不是田园诗人，而是富有的地主暂时受到了责难，要求他看看他的劳工所承受的痛苦。但是这种责难实际上建立在一种田园式的假设上：健康是劳作的“亲爱的孩子”；它因财富而“逐渐衰弱”。这不仅仅是在评论健康对锻炼的依赖；这是有意将健康同劳作联系在一起，然后把疾病同财富联系在一起，而这在任何现实世界中都显得很天真。克雷布非常直白地部分推翻了这种

93

15 The Village; 前引书。

天真假设:这样的劳作和日晒雨淋毁掉了人们的身体。但是这一观察的对应部分却始终没有出现,因为注意力被从造成劳工苦难的地主转向了无度的消费者这一更为轻松的形象。在第一卷的结尾,当克雷布重又使用直接引语时,这种隐含的认同变得明显起来:

你啊,无病呻吟假作愁,
神经过敏难入睡,
当奴隶们已经睁着胆怯的眼睛开始劳作,
你却躺在柔软的床上,望着远方的曙光;
你用悲伤的祷告纠缠疲惫的医生,
为自己不知名的新疾病编造名称,
他佯装耐心忍受着你可怕的抱怨,
而只有真正的苦痛才能把你治愈;
你又怎么能够带着真正的苦痛,
被人唾弃,无人关爱,独自死去?

我们可以肯定,这一描述来自生活:来自克雷布生活的时代的医科学生。但是,对作为一个阶级的那些饮食无度、神经质的消费者的蔑视,以及他们同劳工的生活状态形成的强烈对比,使我们忘记了从“你的奴隶”向“你的享乐无度”这一关键转变中到底隐含了什么。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注意力被从社会进程的积极引导者转向了该过程更为孤立和被动的受益者:城镇里过着奢侈生活的人。这些人也有自己的“奴隶”,也即他们的家仆,但他们受到攻击,不是因为他们同剥削活动之间的联系,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冷漠;而只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以及身边的人造成的伤害。

因此克雷布的价值观的结构就很清楚了:这是18世纪的人道主义,强调关爱和怜悯,以一种隐含的朴素而高尚的生活标准为基础。正是在此意义上,这仍然是种田园视角,表现朴素和独立在不断遭到否定后如何变得痛苦和绝望:穷人被忽视,富人穷奢极欲。克雷布呼吁的是自尊和慈善;富人应当学习这些美德;穷人则应当从中受益。在一种暂时充满活力的社会视角

中——

富足女神在微笑——唉！她只对少数人微笑

这个呼吁很感人,但这种视角最终还是变为停滞:贫穷和富裕之间的道德对立,而不是社会对立。

94

因此,克雷布作为中立的观察者(他不顾田园传统的谎言,要讲出真相)所宣传的独立性最终不过是教士或医生的独立:他们关心灵魂和躯体在一个社会体系中的状态。这种关心是如此的急迫,以至于愤慨都被集中在那些冷漠的人或躲避穷人的人身上。当劳工劳作终生,衰老不堪且疾病缠身时,他需要一个合适的医生,而不是:

一个精通人类疾病的庸医,
他先侮辱他的病人,然后将其治死;

或者一个合适的牧师,而不是:

一个兴高采烈的年轻人,他以为他在周日的工作
堪与上帝媲美,凡人无有可及。

这种例子和这种抗议当然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在整个传统中,它们又有其局限性,这在《村庄》中就表现了出来。琼森和卡鲁是资助人的乡村宅邸里的客人和诗人,他们用一种道德经济的视角来恭维他们的主人,不论这种视角多么具有理想色彩,最终不过是使地主的社会地位变得合理化。克雷布不去阿谀奉承,他把劳作的实际情况还原到田园风光之中;但是作为医生和牧师,一位圈地地主的家庭牧师,他并不是真的独立。在《村庄》的第一卷中,他清理出来一块空间来进行独立观察和道德呼吁。但最终道德被从滋生了贫穷和冷漠的那些社会关系中分离了出来。吸引注意力和引发情感的是穷人的忧虑,而不是贫穷产生的原因。

在第二卷中,一种有限的独立暂时得到了保留:穷人的罪恶——诽谤、酗酒、卖淫——并不仅仅属于穷人;这些明白无误是被富人传染的罪恶:

贵族的疾病也攻击乡下人。

双重道德标准的虚伪性——阶级社会的道德标准——在法庭上体现了出来。法官的情妇望着一位受到引诱的穷人姑娘,她:

感谢上天,包养她的人地位高贵。

这种道德义愤又暂时体现了社会独立。但是接下来:

然而为何,你问道,这些卑贱的罪恶相互关联,

为何要使穷人和贵人们一样有罪?

向贵人——那些傲慢显赫之人——展示,

最卑微者是如此接近罪恶……

……因此权贵在他自己的奴隶的身上

看到了一个和他一样的恶棍;

而仆人则在奢侈的主人的身上找到了

自己的低级享乐和卑劣思想;

彼此在对方那里发现了

一个可怜、盲目、困惑的种族的所有罪恶;

他们虽有不同的命运,但不久之后

却会平等地归于尘土。¹⁶

这些句子给人印象深刻,但这却是从城堡周围的土地返回的路。“不同的命

16 The Village; 前引书。

运”现在同死亡的“平等”在道德上联系在了一起。犯错误的是“种族”，“人类的状况”。在一种熟悉的意识形态——它自称是更崇高的真理——中，我们如此经常地被告知这一点，以至于克雷布那可怜的退却一点儿都不令人感到吃惊。但是，认为道德独立于社会环境，“高于”单纯的“不同”“命运”，这种宣传在这里，就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合理化的前奏。克雷布这样结束他的诗：

而你这仍然悲叹自己命运的穷人，
不要羡慕那些你称作贵人的人；
要知道，虽然他们拥有各种幸事，
他们和你一样，不过是忧愁的牺牲品。

看到这样的结尾真的不奇怪，虽然在读过他前面的那些精辟言论后，这个结尾让人感到沮丧。接下来所举的例子——拉特兰公爵的一个亲戚死了——当然是确有其事。但在该诗的结构中——

穷人的真实图画

——这是，而且必须是种修辞。独立观察者的洞察力、愤慨和怜悯，逐渐变成了抽象的普遍道德，然后成为一种方便的说教，使社会现实变得合理化：

不要羡慕……他们和你们一样……

这不过是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不同的命运”的现实的掩饰性冷漠，而这种冷漠（当它出现在传统的田园模式中时）正是最初引发该诗进行抨击的东西。

10 圈地、公地和社群

96

我们已经思考过了有关 18 世纪乡村诗歌忧郁传统的几个例子,而在克雷布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悲伤之情达到了顶峰。强调这些占主导地位的失落和痛苦之情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将要谈及英国乡村的一般历史概况,在其中议会圈地运动被视作破坏了稳定的传统乡村社会的罪魁祸首。

我们已然看到,阿瑟·扬从圈地运动相互矛盾的社会和经济后果而对之做出了最初的评价。没有哪个对此进行详细跟踪分析的人愿意低估这些后果。然而存在这么一种感觉,圈地(其发生时间正好被确定在工业革命开始的那个阶段)的概念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历史上转移开,成为缔造那个非常强大的现代英国神话的一个元素。在这个神话中,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被视为一种堕落,是我们社会所经历的痛苦和混乱的真正根源。在现代社会思想中,怎么评价这一神话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它是我们开始时所审查的那种情感结构的主要源泉:对一个“有机的”或“自然的”社会的永恒怀念。但它也是那种在我们时代的危机中最后具有保护作用的幻觉的主要源泉:并不是资本主义在伤害我们,而是城市工业主义那更容易孤立出来的,更显而易见的体制在伤害我们。牵扯于其中的问题的确非常棘手,但正因为此,它们需要我们进行分析,对形成这个结构的每个元素的每个点和每个阶段进行分析。

没有理由否认议会圈地运动阶段(发生在 18 世纪的第二个 20 年到 19 世纪的第一个 20 年之间)的极端重要性。通过大约四千份法案,有超过六百万公顷的土地被侵占,侵占者主要是那些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地主们:他们占据了约四分之一的耕地。但有必要看到这种侵占活动的持续性,这很关键,因为它与更早和更晚的时间阶段之间都有联系。例如,我们应当强调一下,在 18 世纪中叶改为采用通过议会法案这种方法之前,乡村土地有多少已经

被圈占了。自 13 世纪起,圈地活动就已经在进行中了,在 15 和 16 世纪达到第一个顶峰。实际上,通过漫长的征服和攫取过程,这种活动在历史上一直持续不断:通过杀戮、压迫、政治交易来获得土地。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圈地活动永远不能真正从主潮流中分离出来。这一主潮流包括土地改良、生产方式的改变、价格运动和财产关系中更为普遍的变化,这些都在相同的方向上出现了繁荣局面:不仅耕地扩展,而且所有权也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

议会程序使圈地过程变得更加公开,也更有记录可查。在这个意义上,它同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初农业改良运动加快的速度直接相关。在这一时期,主要受到影响的土地是从约克到多赛特的一片带状区域,穿过中部各郡,向东延伸至诺福克。之后稍晚,同样的过程又发生在苏格兰低地。但其他地区也有许多大块土地已经被有效圈占了:肯特、萨里和苏塞克斯的部分地区、埃塞克斯和萨福克的部分地区;德文、康沃尔、萨默塞特和西多赛特;威尔士的大部分和赫里福德边界地区的几个郡,萨罗普郡、斯塔福德郡和柴郡;兰开斯特的重要农耕地区、坎伯兰、威斯特摩兰、诺桑伯兰和达拉谟。因此,圈地运动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在历史构架中引入了一个崭新的因素,而在于通过在国家人口最多、最繁荣的地区消除掉幸存的仍采用露地耕作制的村庄和公有权,¹ 圈地运动对小地主和小村民,尤其是后者所承受的经济压力起到了补充作用,而事实上圈地运动常常就是由这些经济压力引起的。虽然现在缺乏可靠的数据,但有理由认为,由于持续实施的苛刻地租和短期租赁政策,以及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生存下来而需要更多资金,而被迫离开土地、失去了与土地相联系的某种独立状态的人们,就同由于明显的圈地活动而这么做的人一样多。

在圈地时代之前,失地者的人数无论如何都是相当多的:在 1690 年,失地劳工和土地占有者之间的比例是 5:1,而在 1831 年是 5:2。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农民——也即古典意义上负有社会和政治义务的业主居住

1 露地耕作(open-field):中古时欧洲农村将条形露地分与村民耕种的一种制度。——译者注

者,² 他们中的大多数在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修建大庄园时期就已经被买断,被迫离开了土地。G. E. 明格总结道,在这个过程中幸存下来的人一直坚持到了 19 世纪 20 年代产品价格下跌时期,然后在整个 19 世纪,在普遍压力下稳定减少:

总体而言,价格水平和农业繁荣程度对业主居住者的影响要大于圈地运动。³

98

还有另一种更为含混意义上的农民,也即小佃农们,他们当然已经是农业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了。他们的人数受到规模经济和庄园入侵的影响,但这样的圈地活动却对他们影响不大:不论从何种标准看,在 1831 年将近一半的农场都比较小。因此在 18 世纪晚期对农民的侵夺并不那么简单。真实情况是,在经济活跃地区,资本主义社会体制被一种由受益阶层的代表所制定的合法化的攫取形式推至主导地位。这非常重要,而在那些受到影响的土地——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上,其后果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但这并不能从土地所有权不断集中的漫长发展过程,相关的地主和佃农分化过程,以及失地者人数不断增加——这些是农业资本主义的普遍后果——的过程中分离出来。

同工业革命的联系还是很重要,但却比不上一种“秩序”被另一种“秩序”所取代更为重要。的确,许多失地者变成了新兴工业城镇的工人阶级,而且常常是别无选择,由此而延续了长久以来一直很明显的工资劳动者向城镇移动的潮流。但是,工业工人阶级的成长还必须,甚至主要同人口的增长联系在一起。人口的增长本身就很壮观,这虽然首先同社会在整体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发生的变化有关,但也同农产品的增长有关,而农产品的增长在 18 世纪是非常显著的:尤其是玉米,不过肉类也在增长;这些变化本

2 业主居住者 (owner-occupier): 居住在所有权属于自己的房屋的人。——译者注

3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ish History: a reconsideration”, in *Essays in Agrarian History*, ed. Minchinton; Vol. 2; Newton Abbot, 1968.

身都同圈地运动和更高效的生产有关。在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初期, 贫困危机在城镇和乡村一样醒目, 它是这一整个社会和经济过程的结果, 不能被解释为一种秩序的崩溃和另一种秩序的建立。在城镇和乡村之间一直都很明显的联系达到了一个新的、更显著的, 而且最终非常危急的阶段。在工业革命之前和期间, 英国乡村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不断加剧的渗透, 市场也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对英国乡村来说是很典型的, 因为这些一直都在它自己的结构中强有力地发展着。我们完全可以说, 到 18 世纪晚期已经出现了一个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 在任何地方, 不论是工业生产还是农业生产, 市场上所发生的事情都同样影响到城镇和乡村, 这是同一个危机的组成部分。

在这些发展变化中, 数以万计的村民和劳工和数以千计的乡村社群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剧烈的改变。我们已经在 18 世纪乡村写作中发现的那种新的语气就同生活条件的这些变化息息相关, 但又如我们所见, 也同解读这些变化的方式有关。我们在兰霍恩的作品中发现的那种崩溃感, 在哥尔德斯密斯、克雷布、柯珀和后来的卡莱尔和科贝特那里同样能够找到。在兰霍恩生活的地区, 圈地运动并不是一个主要事件, 但整个经济和社会过程的压力正在展现, 而在后几位诗人生活的郡里, 圈地运动则是最为醒目的社会现实。

不过, 在某个阶段, 圈地运动被孤立为一种主要的原因。扬的思想转变, 也即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发生在 19 世纪的开始几年里: 穷人已经被多数圈地法案所伤害, 而且常常是严重伤害, 扬想象穷人在说:

我只知道, 我有一头牛, 而议会把它从我手中抢走了。

到 19 世纪 20 年代, 科贝特已在谈论“圈地活动的疯狂”, 甚至通过许多例证否认这些活动提高了生产。他指出, 不可否认的是, 增加了的投资和资金向土地的集中已经:

对劳工造成了伤害。财富是从他的骨头中榨取出来的。财富就是提高了的价格和他那没有提高的工资之间的减除额。(黑体为科贝特自

己所加)⁴

科贝特言之有据地为农业经济进行辩护,但他不可避免是基于对单个例子的观察。例如,他计算出汉普郡某块公地上的蜜蜂本身的价值就高过这块公地被圈占时的价值,更不用提同样产于该地的牛、猪和家禽、苹果树和樱桃树了。但这属于混合农业经济与专业和规模经济之间的地区对比这一类常见情形;从长远看,就贸易而言,后者当然要占据优势。

于是,通过对旧公地上生活的观察,一个有趣的因素就被加进了辩论之中。例如,雕工托马斯·毕威克在他写于19世纪20年代的《回忆录》中提到18世纪80年代诺桑伯兰的一块公地,并做如此评论:

在这块公地上——这在过去一直属于穷人,他们可以在这里放养一些羊,或一只基洛爱牛,也许养一群鹅,而通常是一些蜂群——我带着无限的快乐久久注视着这里展现的美丽而天然的风光,如今却怀着相反的感情目睹所有这一切都烟消云散。在这块公地上,这里或那里可以看到一些农舍,或者不如说是茅屋,这些都是劳作者们自己出钱,常常也是亲自修建的;而且他们常常会再加上一个庭院和一个菜园,他们会非常费心尽力地使之有所出产。……这些各式各样的考虑激起辛苦的居民者的关注和辛勤劳动,使他们变得富裕,不屑于同社区穷人为伍。这些人……可以很恰当地被称为——

“勇敢的农民,国家的骄傲。”⁵

这是一段吸引人的叙述,完全可信。毕威克进而描述许多这类人思想的独立性和独创性,我们可以从中知道很多东西:

4 *Opinions of William Cobbett*; ed. G. D. H. Cole; London, 1944; 86.

5 *Memoir of Thomas Bewick*; London, 1961; 27—28.

我想我已经看到他了，正坐在他的菜园边上的一个土墩，或者座位上，完全不顾寒冷的天气，专心致志地注视着那些天体，热切地传授他的知识；

或者对安东尼·理德尔的描述——

他的整个性格都是由圣经所塑造的。他一遍又一遍地读圣经，非常认真。议会的法案在他看来同圣经中的律令——那是上帝的话——相冲突，因此他不屑一顾。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享用天上的禽鸟和海里的鱼；因此，狩猎法，或者保护渔业的法律，对他均无效力；⁶

或者对养蜂人托马斯·福斯特的描述。托马斯把他的许多蜂箱都藏在了棘豆中，以摆脱那些“过分好奇的人”。⁷

从这样的回忆中，从对圈地运动之前的村庄那更为有意识的、更广泛的叙述中，一幅画卷被勾勒了出来，它现在仍然具有强劲的情感力量：独立而可敬的人们，生活在一种切实可行的乡村民主中，而这种民主被新的圈地制度冷酷而“合法”地摧毁了。

我们不得不质疑的正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这幅画卷，即便我们并不情愿这么做。独立性的特点不需要争论，尽管养蜂人托马斯·福斯特把他家养的和远处棘豆里养的蜜蜂产的蜜卖给邻居，看起来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已经相当独立了：同其社区充其量保持一种暧昧关系的私人企业家。另一个特点，也即一个人有时间和精神去观察，去思考和阅读，这在村民的相对独立的状态下非常盛行，但这也是各地劳工的整个历史——荣耀和悲剧——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哪种社会状态中没有出现过这类特点，不论有多么大的困难：不论是毕威克笔下的对公地有共同权者，还是像斯蒂芬·达克这样的庄稼汉，或者苏塞克斯的牧羊人日记作者，或者兰开斯特的磨坊小镇里的业余地质学家和

6 *Memoir of Thomas Bewick*; London, 1961; 28—29.

7 同上书, 32。

植物学家,或者我们这个世纪里的那些工人出身的学者、语源学家、经济学家和地方历史学家。对这一普通人的思想史感到惊异,那是阶级社会对智力的侮辱的一部分。在所有这些情形之中,当然存在能力超常的人,他们通过长期的努力和智慧塑造他们的生活。在任何地方,这些人所践行和代表的价值观念都常常遭遇到金钱、权力和知识权威的贪婪和傲慢。在这种广泛的意义上,一种使贪婪和傲慢变得合理的制度的发展已经造成了破坏,而且继续在造成破坏。但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村民的独立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卫,而这种独立又是在多么小的生活空间中得以维持的。我们不得不就这种社会史版本提出的问题并非是否有一些人出现并且幸存下来——他们总是会出現并幸存下来,不论承受多么大的压力——而是整体而言,这种生活方式是否能够支持一种广泛的独立。毕竟,这才是对社群的考验,而不是偶然的个体独立。于是,我们立刻注意到,即便在毕威克笔下,“教区穷人”就已经作为一个可以辨认的阶层出现了。我们还要看到,毕威克还告诉我们,那些独立的村民:

极其敬重住在附近的乡绅们;而乡绅反过来也并不忽视他们,而是非常愿意了解他们是否快乐和安康。

因此,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种相对的和幸运的独立,发生在一段平静时期,许多人终生都生活在这一时期。我们应当对此感到高兴。但这未必是一种秩序,我们能够用它来否认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到那时同样是那些住在附近的乡绅,他们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展现了他们的兴趣并圈占了公地。乡村阶级制度已经存在了,人们尽自己所能在这一制度的边缘地带,在那些尚未被侵占的欠发达区域生活着,有时还过得挺不错。

多数有关损失的记录来自于这些边缘土地:公地和石南荒原。但议会圈地运动并不仅仅在这些地方展开。实际上,我们无法理解圈地运动的社会后果,除非我们区分开两种完全不同的过程来:对“荒地”的圈占,这在18和19世纪大约有两百万公顷,以及对适于耕种的露地——已经被耕种了——的圈占,大约有四百万公顷。很明显,这两种过程的社会后果肯定是迥然有别的。

荒地上遭到压制的是村民和擅自占地者那微不足道的独立,他们是在未垦殖土地上的单个的定居者。而在露地村庄中遭受压制的必然是种完全不同的社群:旧式农耕经济的紧密集中的村庄。正如 W. G. 霍斯金斯⁸所观察的那样,在文学中几乎没有有关这些村庄消失的记录,尽管对公地消失的抱怨不胜枚举。哥尔德斯密斯的《荒村》可以被读成这样的一个记录,但它又不是直接相关。但正是露地村庄的社会和经济特点的改变最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如果我们要考虑任何圈地运动前的“乡村民主”的话。肯定是这里的变化为新近开始繁荣和巩固的农业资本主义做出了最为实际的贡献。但是在旧的露地村庄里,到底实际存在过何种社会秩序呢?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混淆了生产的手段——那些露地——和很容易从中投射出来的东西,也即一个“公开”和相对平等的社会。现代农业史专家福塞尔对 18 世纪早期“一个典型的露地村庄”的描述是值得读的⁹。村里有三百人口。其中将近两百人是村民和劳工及其家眷、家仆和无所依靠的穷人——寡妇、孤儿、老人。约有七十人是副本土地村民和他们的家眷。其他有十至十二人是地主及其家眷以及牧师及其家眷。这是一种有趣的分类,但初看之下,它和成熟的农业资本主义的一般社会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无法暗示出一种迥然不同的社会秩序。事实上,这里有三个阶级:士绅,小企业主,无产穷人。该村庄所包含和支持的身份不平等是根深蒂固的,没有人,不论以何种感情,能够把它转变为一种“乡村民主”或者更为荒谬,转变为一个公社。将在圈地运动后完全形成的社会结构早已具备了基本轮廓。

不过这里仍然还有一些限定条件,而正是这些条件我们必须仔细考虑。例如,在村民和劳工中,有一些是工匠和生意人(铁匠、木匠、皮匠、搬运工、酒店老板),这些人和其他人(虽然不是所有其他人)多少可以利用附近的公共草场和荒地来放牧和捡柴禾。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容易认为这些权利微不足道,但当时至少对一些人来说可以使他们免于彻底沦为雇工。一次又一次,直到我们自己的时代,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们都在试图创造出这点儿余地来:

8 W. G. 霍斯金斯(William George Hoskins, 1908—1992):英国当代地方史学家。——译者注

9 参照 *Village Life in the 18th Century*, G. E. Fussell; Worcester, 1948; 第二章。

一块租来的土地,一个大菜园,几箱蜜蜂或几棵果树。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父亲不仅拥有一个和他的村舍相连的菜园,而且在他帮着收割的那个农场上拥有一块狭长的土地种土豆,还有两个从他工作的铁路公司租来的菜园。这些微不足道的潜在价值很重要,不仅因为它们出产东西,而且因为它们提供了直接的满足感,还使人感到能够对自己的劳动保留一点点控制权。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工资经济的长期压力下,这些例外区域已经变得极其重要:甚至在城镇里,在某些辅助性的行当中,这样的情况仍然在发生。几乎毋庸置疑的是,较之后来的任何其他类型的社群,圈地运动之前的乡村使更多的人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在这种意义上,一定程度的失落是真实的。但仅仅是一定程度:因为这些边缘性方式,没有任何完整的社群能够在经济上维持下去,它内部的阶级分层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在这样的村庄里,在何种程度上曾经存在过一个真正的社群,尽管这里存在着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这很难说,因为存在重大的事实变化(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地区研究和实例),而在时隔这么久之后,对“社群”的评估在某种程度上总会有些主观。当然我们可以研究机构。庄园法庭常被称为是“社群的”,村里的事务在法庭上根据习俗得到处理。然而这些法庭在圈地运动之前就已经在持续衰落了,仅仅保留一种不断降低的重要性,最终被完整的财产法制度所取代。地方法律和行政管理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程:权力稳步集中于地主的手中,而且在地主形成一个政治阶级的过程中,地方法律和行政管理日益代表一种自觉的国家秩序和利益,这时它们表现出更为明显(即便不是更为严重)的专制。那么社群的现实必然会是什么样的。在M. K. 阿什比¹⁰为她父亲写的出色传记(《泰索的约瑟夫·阿什比》,1961)中有对沃威克郡村庄泰索的详细记载,这就是一个相关的例子,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根据登记簿记载,直到18世纪末,泰索一直是一个由自耕农、工匠、

10 M. K. 阿什比(M. K. Ashby, 1892—1975):当代英国教育家、作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小店主和一些劳工组成的村庄——各阶层之间没有截然分开,而是互相通婚,互相学手艺,耕作上彼此合作,在其他方面也相互依靠,关系紧密。……早些年里,阶层之间的区分在泰索充其量是种功能或风俗需要,或者世俗才智获得的东西。……但在那些悲惨的年份之后,这变成了一个如此深的坑,每一个愚蠢的人都跌了进去。¹¹

然而有趣的是,这种“在那些悲惨的年份”里的变化并不是圈地运动的结果,而是发生在此之前。村庄中不断加重的贫困形成了一种贫民制度,而

在泰索,圈地运动并不对此负有责任。

在18世纪40年代,贫民被要求在衣服上缝上红色字母。在18世纪,“贫民”在丧葬记录上出现得更经常,最终被缩写为一个残忍的“P”。¹²失业记录始于18世纪80年代。巡逻制度于18世纪60年代启动。天花反复流行,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最终导致济贫基金在18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在这样的压力下,前一时期的那种友善而相对不那么正式的救济方法被抛弃了,人们开始冷漠而严酷地对待一个单独的“贫民”阶层。同时,又是在圈地运动之前(尽管圈地运动开始后变得更为严重),教区牧师和富裕农民的阶级意识变得更为明显,前者的住宅采用了新的风格,以同“他们的”教民们隔离开来,而后者现在则被称为“绅士农民”。因此,圈地运动只是这一复杂变化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造成变化的单一、孤立的原因。

我们可以了解的另外一件事情则是,永远不能回过头去观察社群。在泰索,当村民们在19世纪联合起来争取市镇土地分配权时,社群又复兴了。在英国乡村的许多地方,一种新的社群作为斗争的一个方面发展起来了,或者为了反抗地主统治者,例如在斯郢捣毁机器和烧草堆运动期间的劳工暴动,

11 *Joseph Ashby of Tysoe*; M. K. Ashby; Cambridge, 1961; 第十九章。

12 “P”代表 Pauper。——译者注

或者为了反抗整个农业资本主义的阶级制度,例如从托尔普德尔村¹³的农工组织到约瑟夫·阿奇¹⁴领导的工会组织。在许多村庄里,只有在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利并且部分获得时,例如工会得到承认,公民权得到扩展,以及拥有进入新的代议制和民主制机构的可能性,社群才成为一种现实。在数以万计的实例中,比起有记载的或想象中的过去的任何时候,现代乡村具有更多的社群性质,这是争取新的法律和民主权利过程的结果。

这是一种积极的社群,必须同另一种模式的社群区分开来。后者有时表现为被压迫者的共同性,有时则表现为生活在一个广泛的压迫制度的边缘地带的人们的共同性。这种社群可以以多种方式产生,同反抗性的社群有所交叠,或者作为地方性的传统习惯保持了下来。思索这种传统共性得以幸存的原因的一个方法,就是考虑村庄同其主要地主之间的距离。关于这一地主阶层的教化成果,我们已经从他们自己和他们所雇佣的人的口中听得够多了,以至于有必要从翻新的乡村宅邸那里,而且常常是通过他们的服务人员和受雇神职人员,来记录下一种更极端的阶级意识——对劳工和穷人有系统的丑化——的出现。如此众多的贫困家庭脱离英国国教,改信各种新教教派,就同这种地主——牧师宗教经历直接相关。英国偏远乡村的谷仓礼拜堂仍然是这种激烈的社群反应的感人见证。但偏远性本身又经常是一个要素,不论是区域的还是地方的。根据我自己的一些相关家庭经历,我常常认为,距离地主们的那些“大房子”较远对一种传统的社群的幸存是一个关键因素:宽容的邻里关系。马修·阿诺德在《文化和无政府主义》中曾对此有所提及,他写道:

当我穿越乡村,看到他们的这座或那座美丽而壮观的宅邸出现在风景之中时,“那里”,我自言自语道,“是那些野蛮人的坚固营地。”¹⁵

13 托尔普德尔村(Tolpuddle),英国多塞特郡的一个村庄,1833年一群英国农业工人在此成立工会后遭逮捕,后被流放到澳大利亚。这些人就是后来英国历史上的“托尔普德尔烈士”。该村也因此而闻名。——译者注

14 约瑟夫·阿奇(Joseph Arch, 1826—1919):英国政治家,曾领导英国的农业工人运动。——译者注

15 *Culture and Anarchy*, 第三章。

的确,自从直接的军事统治和占领时期起,它们就一直在那里;但它们已经融入了一种更为社会化的秩序。正是在18世纪,一个阶级的这些据点最为显著地发展成密切的网络,蔓延至英国大部分地区,影响了人们对于风景和自然的态度的,对此我们认为需要引起注意。

但是,请直接考虑一下它们的社会影响。它们中的一些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是建立在他人的毁灭和劳动之上的醒目的胜利成果。但扩展的非常阶段,也即发生在18世纪的重建和扩建,代表了剥削程度的显著加深:其中许多是来自贸易和殖民剥削的利润;但也有不少来自一种新的、更高效的生产模式产生的更高的剩余价值。欣赏这些数量惊人的房舍是件时髦的事情:辽阔的庄园,新古典主义式的宅邸,它们在英国乡村坐落得如此稠密。人们仍然从一个乡村到另一个乡村,手里拿着导游手册,去参观下一处,下下一处庄园,去参观那里的石头和家具。但是,站在任何一点上看看那片土地吧。看看那些农田,那些溪流,那些树林即便在今天还在出产着什么。作为劳工来进行思考,看看为了供养如此众多的大型宅邸,剥削和掠夺已经持续了多久,又是多么的系统化。反过来再看看任何一处古老偏僻的农场经过无数代人的劳作,通过任何一个真正的家庭的努力——不论他们是用什么办法延续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什么模样。然后再回过头去看看另外那些“家庭”,那些系统化的地主们又积聚了些什么,傲慢地宣示着什么。当你看着土地,然后看看宅邸,你所知道的并不仅仅是曾经一定发生过多少的抢夺和欺诈,延续了多长的时间,才产生出这等程度的贫富悬殊,这样不成比例的等级差别。在它们的身边,那些劳动农场和村舍显得如此渺小:人们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或者利用留给他们的这点儿份额,在人类成就的普通标尺上真正能够建立起什么。而那些“大”房子所做的,就是任意打破标尺,和它们对他人真正而系统化的剥削相一致。看看它们的地基、正面建筑、林荫道和墙壁、高大的铁门和看护人的小屋,挑选这些东西不仅仅是为了自内向外的效果;如此众多的仰慕者,其中有很多都是作家,曾经站在那里观看风景,发现景色非常怡人。现在你会看到,它们被挑选也是为了自外向内的另一种效果——权力、财产和支配力展示的醒目压印:一种社会不均衡,目的即在影响和威慑。现代农业真正利润中的许多并没有进入生产投资,而是进入了这种清晰的社

会宣告：处处都是对已经确立的支配性阶级权力的展示，虽然互相竞争，但仍然保持了统一。

即便是今天，站在那片树荫下，就能知道数代农民痛苦地体验到的和有意被教导的东西：这些就是家庭，这是社会的形态。你还会想到社群吗？你只会在某种局部改造的欢迎标识上看到现代社群：宅邸被用于某种一般用途，成为一座医院或农业大学。但你仍有可能看到那些旧的权力仍然显示了出来：在幸存的剥削者和他们的现代亲戚——乡村宅邸公司、工业中心、统治阶级的学校——的身上。它们就在那里：有漫长历史的阶级社会的明确形式。

但是，让我们暂时转向别处：转向那些刚好在这些宅邸视线之外的村庄；转向边界地带，那些依然保有地名的旧的公地；转向远离控制中心的那些小村落。如果你每天四处游荡，脱离宅邸的视界范围，就会发现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我毫不怀疑，还有许多幸存的、不稳定的社群，在那里情况也是如此，例如西部分散的定居点或者东部和中部的一些稠密的村庄，在那里没有什么房子比周围的屋舍雄伟壮观得多，以致会醒目地改变风景。在日常关系中，没有了那些人和他们的石制豪宅，或者至少离开他们有一定的距离，真的是很不一样。

107 在一些地方，某个地区性的有效社群仍然能够保留旧式特征。在那里，小业主、佃农、工匠和劳工能够首先做邻居，然后才考虑他们的社会阶级身份。但这永远都不能被理想化，因为在做决定的时候，现在和过去一样，阶级现实通常会显露出来。但在这之间的许多时候，在许多平静时期，仍然有一种友善情谊，一种互助关系在人们中间存在。这只是程度问题，正如在圈地运动之前和之后的村庄里一样。当制度的压力很大并在不断增加时，找到一处能够呼吸的空间，同直接而明显的控制保持一定距离就显得很重要了。对数以万计的人们来说，圈地运动所急剧缩减的正是这样的呼吸空间，这样的边缘性的日常独立。对这种损失进行哀叹是对的，但我们也必须坦率地看待它。真正发生的事情同“圈地”——这种手段——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在发展当中的制度越来越明显地被建立了起来，这个制度曾经采用了，而且还要采用许多其他的形式。那绵延数英里的新栅栏和围墙，新

的法定权利,就是如今权力正式显示自己的地方。地主、佃户和劳工的经济制度自 16 世纪起就在延伸它的统治,而现在已经明确掌握了控制权。于是,为了生存,社群就不得不自我改变。

11 法恩汉附近的三个作家

108

在这个变化的时期,你从什么角度进行观察是至关重要的。视角、阐释、对事实的选择现在可以是截然相反的。在历史上,这是一个乡村社会时期。在文学上,这是一个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情的混合体,甚至看待的是同一个地区的生活。

例如,设想有一次旅行,沿着三十英里长的呈三角形的几条道路进行,时间是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之间的那些年。地点在汉普郡和萨里郡的边界地区:从塞尔伯恩到查顿之间有六英里;从查顿到法恩汉有十英里;从法恩汉返回塞尔伯恩有十四英里。1793年,吉尔伯特·怀特¹死于塞尔伯恩。1777年,怀特的那部著名的日记已经写了九年了。这一年,一个名叫威廉·科贝特的十四岁男孩儿从他父亲在法恩汉的小农庄逃跑了。后来科贝特将要多次返回,穿越这些村庄,在19世纪20年代写出了他的《乡村漫游》。当吉尔伯特·怀特死时,住在不远处的另一座牧师住宅里的简·奥斯丁正开始写她的乡村社会小说。从1809年起,她将开始在查顿进行出版和写作更为成熟的小说。在这个小小的地区,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出现了三个人,三个作家,他们之间的差异是不可能再大的了。他们的作品中呈现的乡村和有关乡村的观念是如此之不同,以至于我们在读的时候,会被迫产生一种新的意识。

科贝特给我们的是从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角度做出的细致的社会观察。他把阿瑟·扬对劳作农业的详细运作方式的关注同一种更为持久的社会质疑和观察结合了起来。因此,在1821年:

1 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 1720—1793):英国博物学家、鸟类学家。——译者注

(阿珀哈兹本德西部):

……一群妇女劳工在陪伴测量人员测量她们的收割工作,她们聚集在一起,衣衫褴褛,即便在法恩汉的啤酒花采摘工(他们中有许多就是乞丐)中我也没见过穿的如此破烂的。我过去从未看到过乡下人,还有收割工,有过这等悲惨景象。这其中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姑娘,但也衣衫破烂,脸色苍白。

(克里克雷德附近):

……劳工们看上去非常贫穷。他们的住所比猪圈好不了多少,他们的面容显示他们的食物还比不上猪食。他们的窝棚就搭建在路边的一点点多余空地上。在许多地方他们甚至找不来两根棒条来搭建窝棚。他们看起来就像被一场飓风刮离了田野,在路边上暂且栖身!昨天早晨下了一场寒霜;这些可怜的人开始在他们的小块菜地上刨土豆。……这就是“繁荣”,不是么?²

109

科贝特的观察的一大优点就是细节。这包括地区之间的不同情况:

(格罗斯特附近):

……我沿途走来,发现劳工的住所看起来挺好,劳工们自己的穿着和健康状况也相当不错。在田里劳动的姑娘们(这一直是我的标准)也不像威尔特郡的姑娘那样衣衫褴褛,破鞋绑在脚上,脚踝上裹着破布。

这是一个新的声音,社会视角发生了显著改变:

地主和农民们都讲自己的故事。他们以抗议和祷告的方式向议会讲自己的故事。没有人讲劳工的故事。³

2 *Rural Sides*, 前引书, 13, 15。

3 同上书, 17, 233。

这种视角意识,阶级视角意识,标志着同以前大多数叙述拉开了距离;而在科贝特的先驱者那里,例如克雷布所部分做到的,广泛的细节已经展现出一个世界,它标志着从同情的诗歌向现实主义小说转变的关键的准备工作。

科贝特在思索贫穷和土地质量之间的关系:

(在肯特):

这里劳工的妻子过的生活与汉普郡和苏塞克斯森林和林地的劳工的妻子过的生活是多么不同啊!我毫无例外地观察到,土地越肥沃,就越没有树林;也就是说,越纯粹的玉米生产地,劳工的生活就越悲惨。

看到这些话,我们会想起克雷布来。正是在玉米产地,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得最为彻底。正是基于社会环境的这种反差,科贝特强调:

劳动的人们看起来挺好。他们养的有猪。他们毫无例外在林地、森林和荒原地区过得最好。在什么都处在强大的攫取者的眼皮底下的那些地方,劳工们只能得到很少的东西。

这就是他反对圈地运动的社会基础:并不是生产作为一个整体发生了什么,而是人们和土地具体发生了什么。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认为:

这个地方提供了又一个证据,证明了我的老观点的正确性:肥沃的土地和贫困的劳工。⁴

110

或者,他再次把工资劳动的缺点同提供食宿的旧体制(如果提供食宿的话,农民现在给的那点儿工资是不够用来雇用工人的)进行比较,他强调:

4 *Rural Sides*, 前引书, 34, 207, 221。

平均起来,土地出产的东西同过去一样多,但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产品分配方式。

当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地主和他们的社会结构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科贝特非常仔细地对此进行了观察,他在两类乡绅之间做出了一种熟悉的区分:

当地居住的乡绅,他们依恋土地,从小就认识每一个农民和劳工,常常同他们混在一起从事娱乐活动,忘记了所有人为的身份区别,不拘礼节地殷勤好客,而且是出于习惯,而不是为了算计;另一类乡绅,只是偶尔在乡下小住,对乡村乐事丝毫不感兴趣,举止怪异,行为疏远傲慢,只是为了租金才去查看土地,把土地仅仅视作投机的对象,对耕作一窍不通,对耕作者也一无所知,轻视他们和他们的娱乐活动,不是通过争取邻居的善意,而是通过让人们害怕他们的权力来获得影响力。战争和钞票制度生产出了在印度发财的富豪、黑奴贩子、陆军上将、海军上将、总督、军需官、承包商、领年金者、担任闲职者、司法行政长官、贷款经纪人、彩票经纪人、银行家、证券经纪人;更不用说穿长袍戴假发的法官们那长长的黑名单了。你几乎看不到哪座漂亮的房子不是属于这些人中的这个或那个的。这些人,再加上牧师们,就是现在的地方行政官。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单子,科贝特还给出了几个人名作为例子。需要对此叙述做出修正的是,至少从16世纪起就已经有了这种入侵。而科贝特没有问的则是,这些“入侵者”来自何方。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那群“当地居住的乡绅”的小儿子,他们曾经一度离开,通过新的方式发财,现在回来了。不过,不论是“当地的”还是“外来的”,地租压力,以及通过佃农落到劳工身上的压力在非常明显地急剧增加。科贝特缩短了实际的时间标尺,但却看到了随着农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他认为钱——首先是金银,然后是钞票——是变化的媒介。起初:

它的后果只是慢慢地一点点显现；它使财产发生转移，但它做的悄无声息，它使财产在新的拥有者手中安静地待了如此长的时间，以致其后果并不激烈，而且无论如何不是把整个地区的所有者统统连根拔掉，就像飓风扫平树林一样。⁵

111 这是对16世纪到18世纪的变化过低估计，但科贝特试图记录的是他自己的时代那明显的动荡：

小乡绅，向上至三级乡绅（考虑到从最小的乡绅到大贵族之间有五级），全都没有了，连带那些小农民，几乎全归一个人所有。我想，巴林一家独自吞掉了三十或四十个小乡绅，甚至都没有感觉到。事实上，他们吞掉了最大的；但也有难以计数的小人物随之而下，不被察觉，就像小香鱼滑下鲨鱼的喉咙，而鲨鱼却只感觉到鳕鱼一样。

同整个记录中的任何人一样，科贝特明确对乡村经济的中间阶层的减少做出了抱怨。但就在他看到这些的同时，他引入了一种新的评判标准。他认同劳工，一直把在田里劳动的姑娘设定为“我的标准”。他看到了小业主和一些佃农的毁灭，然后又以一种新的严苛口吻谈及小乡绅：

因此，当他们充当积极、热心而高效的工具，把劳工阶层赶向半饥饿状态时，他们自己其实也被带向了最为悲惨的毁灭：对此我要衷心感谢上帝。

或者又谈及农民：

我有足够的理由为农民们的毁灭感到高兴；而且对此衷心感谢上

5 *Rural Sides*；前引书，311，313—314。

帝；无论如何，在苏塞克斯，绝对有必要把他们现在的这一群人彻底消灭，来终止劳工（他们目前为止人数更多）所遭受的残酷和傲慢的对待。

这是科贝特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劳工的共有做法，也即把强烈的愤怒指向手边最近的目标。这是1816年东英吉利发生的“面包或鲜血”暴乱，或者1830年蔓延的劳工叛乱——“斯汶上尉”运动——的气氛。在此，科贝特写道，他本可以“挥动鞭子，不顾及许多人的体面”，他回忆道：

我出生在一个农庄里，在农田里长大，穿着长罩衫，对农民们的所有娱乐都极为喜爱，我喜欢同他们为伍，他们中有我最尊敬的朋友，因此我很自然地感到，我的确感到非同寻常的焦虑，想要尽我所能阻止正在威胁他们的彻底毁灭。但那些劳工呢？难道我对他们就没有感情吗？难道他们不也是我的乡亲吗？我怎么能不对那些农民感到愤慨呢？他们硬起心肠把铃铛挂在劳工的脖子上，肆意侮辱和贬低这个阶层，而正是这个阶层的劳动为他们带来了闲适生活。⁶

112

这种忠诚感的矛盾冲突以及最终做出的决定标志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在强制征税、为争取最低工资而发生的暴乱、烧草堆等事件中，农民是最直接的攻击目标。而他们因承受着那些远离冲突中心并受到保护的地主的地租压力，常常给不了太多。在这些骚乱中，那些破产的和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常会加入到暴动的劳工当中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然而，这是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乡村的特点。暴动事实上标志着地区冲突在直接的和个人的意义上的最后阶段。这种骚乱必然要被以工会主义以及相关的政治运动组织起来的阶级对抗所取代。直接进行呼吁和内在道德区分的那种情感结构——诸如哥尔德斯密斯和克雷布的诗歌中的那种道德问题和道德警示——如今必然要转变成一种不同的思考和感觉秩序。资本主义作为一

6 *Rural Sides*；前引书，65—67。

个制度成熟起来了,这就迫使反对它的力量也必须组织起来。

这一发展变化在英国乡村社会史上非常关键,它导致了一种新的乡村写作的出现,科贝特就是这种写作的先驱者:传统发生了改变,因此阶级间的相互作用(现在已经是确实无疑的历史事实了)开始能够被描述了;不再以回忆的方式,而是通过一种新的典型行为。这就是虚构文学向一种新的小说形式的转变所具有的关键意义,这种新的小说形式将从19世纪30年代起,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科贝特先是作为记者,最终作为公民权利保卫者对此进行了描述和宣传。他的视角的变化,以及他如此强烈地对之做出反应的那些变化正是一种新的文学方法最初的重要征兆。

但小说的这一变化并没有在科贝特的有生之年出现。在他的中年时代,社会已经在变化之中。简·奥斯丁正在从科贝特曾经路过的房子里,以一种不同的视角进行写作。当科贝特描写小乡绅的消失时,他正在骑马经过汉普郡,离查顿不远的地方。还是在汉普郡,他罗列了第一份乡村宅邸和产业的新主人的名单,从印度发财的富豪到股票经纪人。他继续进行观察:

那些大一点儿的鱼为了使自己免于被“很快吞食”,……就利用他们的声音,通过职位、年金或闲职,从所缴的税中讨回一些来。他们中的其他一些人爱上了拥有钞票的人——大酿酒商之类的——的女儿和寡妇;有时他们自己的女儿爱上了拥有钞票的人的儿子,或者这些儿子的父亲们;至于他们是不是犹太人,对于不顾一切的爱的激情来说无关紧要。但小乡绅们则没有这样的资源可用。⁷

这使我们联想起简·奥斯丁的小说世界。这是和简·奥斯丁所写的任何东西都非常不同的语气,但既然它来自庄园院墙的另外一侧,它迫使我们问道:她是在什么样的条件和压力下进行她那同样犀利的观察的?她那种精确的、探寻式的私人道德强调又具有什么社会实质?

7 *Rural Sides*;前引书,313。

简·奥斯丁故意忽视她生活的时代的决定性历史事件,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人们仍然在问,拿破仑战争到哪里去了?那是真正的历史浪潮。但历史有许多潮流,而在当时的英国,地主家庭的社会史就是最重要的潮流之一。当我们感觉历史的真正进程之时,我们发现地主家庭在简·奥斯丁的小说中占据了相当中心和重要的位置。阻碍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正是那种熟悉的回顾眼光,包括潘舍斯特、萨克斯海姆、巴克斯海德、曼斯菲尔德庄园、诺兰甚至波顿,在其中所有的乡村宅邸和居住人家都被视为属于一个单一的传统:也即有教养的乡绅阶层的传统。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宅邸和居住人家的形成和再形成被隐瞒了起来以形成一个理想化的抽象概念,于是简·奥斯丁的世界就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有些时候甚至被居高临下地看成是与世隔绝的乡村,仿佛存在一种简单的“传统”环境似的。而如果社会“背景”在这种意义上是“稳定”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而强调这是纯粹描写人际关系的小说。

但这样的强调是错误的,因为简·奥斯丁关注的并不是被觉察到的心理过程这种抽象意义上的人际关系,而是个人行为:检测和发现在某些真实的环境中控制人类行为的标准。除了行为检测中已然包含的社会考虑,我们还必须根据小说中的证据,为之加上对产业、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直接关注,这些东西被视为所有被投射和形成的人际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也不是对一个稳定的“传统”世界的先入之见;事实上,简·奥斯丁小说的主要兴趣以及许多行为根源都在于财富的变化——也即总体在发生变化和存在一定的流动性的事实。这在当时对地主家庭产生了影响。

因此,我们本可以很容易地拿《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托马斯·伯特伦爵士作为定居当地的旧式土地乡绅的例子,同克劳福德兄妹的新“伦敦”方式(这是一种常见的解读)进行对比,但伯特伦被明确描写为哥尔德斯密斯会称作“伟大的西印度群岛人”的形象,他是安提瓜的产糖岛屿的一个殖民领主。克劳福德兄妹可能采用的是伦敦的生活方式,但养活他们的收入却是诺福克的土地财产,而且抚养他们长大的叔叔是一位海军上将。《劝导》中的沃尔特·爱略特爵士属于一个从柴郡搬到萨默塞特的地主家庭,这户人家在复辟时期获得了从男爵爵位,但他的收入在这个时候却无法支撑他的地位;他的预订继承人“通过和一个出身比他低微的有钱女人结婚而买到了独立”;从男

114

爵被迫把凯林奇庄园租给一个海军上将,因为,正如他的律师所言:

天下太平了(这里指欧洲联军对拿破仑战争“1793—1815”已经宣告结束),有钱的海军军官就要回到岸上。他们都要安个家。战争期间,许多人发了大财。

相比之下,排在第二的地主家庭,邻居穆斯格罗夫家:

正处于变化之中,也许是向好里变吧。两位做父母的保持着英格兰的旧风度,几位年轻人都染上了新派头。⁸

《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是一个地主,他的家庭已经有“许多代”的历史了,但他的朋友宾利则继承了100 000英镑,正在寻找购买一处地产。威廉姆·卢卡斯爵士靠做生意发家,变成了爵士;班内特先生一年有2 000英镑,但其产业却是限嗣继承,而且他娶了一位律师的女儿,妻子的兄弟也是做生意的。在《爱玛》中,耐特利拥有堂威尔庄园,新式绅士农民马丁则是他的佃户。伍德豪斯家没有什么土地,但爱玛却将“从其他来源”继承30 000英镑。教区牧师埃尔顿有一些独立财产,但由于“在商界之外没有别的关系”,就必须尽他所能向上爬。韦斯顿先生来自“一个受人尊敬的家族,该家族在过去两至三代人的时间里上升入绅士阶层,有了地产”;他在当民兵时娶了“约克郡一个大家族”的女儿,在她死后,他开始做生意,买了“一小处田产”。哈莉叶特最终被发现是“一个富有商人的女儿”,她嫁给了她的绅士农民,有理由“指望得到更多的东西,过上安全、稳定和富足的生活”。科尔兹家依靠商业收入安静地过活,但当生意兴隆后,“在当地成了财产和生活排场仅次于伍德豪斯家的人家”。在《理智与情感》中,达什伍德家是定居当地的地主,通过婚姻增加收入,扩增女儿们的财产;他们还圈占了诺兰公地,买断了周围的农场;为了圈

115

8 《劝导》,孙致礼译,译林出版社,1996,上卷第一、三、五章。——译者注

地而必须兑现股票,这影响了家族当下增建的速度。在《诺桑觉寺》中,凯瑟琳·诺兰的父亲是牧师,他有两份不错的俸禄,相当独立。凯瑟琳跟随当地地主爱伦一家前往巴斯,在那个被密切监督的社交场合认识了一户人家的儿子。这户人家自从修道院解体后就拥有了诺桑觉寺;这家的姐姐因为恋人“意想不到的财产增益”而嫁入“富裕显赫之家”。

抽象概括这一社会历史当然只能描述小说的世界,更具体的行动在这个世界中开始和结束。但必须明白这不是一个单一的、稳定的社会,而是一个活跃的、复杂的、精明投机的过程。事实上这是英国社会史上最难描述的世界:一个高度资产阶级化的营利社会,处在和以世袭头衔和家庭姓氏制造为调解的农业资本主义最为明显的联节点上。科贝特所观察到的过程——“在印度发财的富豪、黑奴贩子、陆军上将”等等的到来——被直接插入土地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漫长而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中,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这一复杂过程造成的社会混乱和矛盾就是许多人类行为和评价问题的真正根源,而个人行动戏剧性地表现了这些问题。一个同样关心财富传递的公开营利的社会试图同时通过与生俱来的道德标准和有关改良的道德规范来进行自我评价。

因此,简·奥斯丁的悖论就在于,她在充斥混乱和变化的历史时期采用了一种单一的口吻,一种稳定的、自信非凡的看待和判断事务的方式。她很精确和坦率,但却是以非常独特的方式这么做的。例如,她对收入比对田亩要更为精确,因为前者可自由支配,而后者还得经营。但同时她看待田地的方式又和看待“其他收入来源”的方式不一样。她对房子、木料和改建细节的眼光很敏锐、精准和实际。但来自他处的钱,例如商业和殖民地种植园,却显得不具有同样的重要性;那些钱必须被转为这些秩序标记才能获得认可。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是很有代表性的。土地主要被视为收入和地位的指标;它可见的秩序和控制是种珍贵产品,而经营土地的过程却基本无法看见。然而,简·奥斯丁提醒我们改良的两种意义,这两种意义在历史上是相互联系的,但在实践中却常常彼此矛盾。一种是在农业生产中土壤、牲畜、产物的改良。另一种是房舍、庄园、人工景色的改良,这些东西吸收了真正增长的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哈巴库克教授曾观察到:

英国地主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消费阶级,他们借来的钱中的大部分都被立约用于非生产目的,如提供嫁妆,偿还因奢侈生活而欠下的短期债款,修建宅邸等;而为圈地等事情借的钱通常只占全部债务的一小部分。⁹

这不是要否认许多地主在改良运动中发挥的功能,而是要将其放入真实的社会语境中去。这是对在技术上可以被概括为农业革命的东西进行的重要评论:没有什么农业革命,有的只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社会阶级的巩固、改善和扩张。

教养同改良一样具有含混性:先是生产增长,然后被转化为地租;然后地租转化为一个高雅社会。因此,这就是“革命”:这种明显可得的生活质量。简·奥斯丁之所以能够保持语气的高度统一——那种冷静的、克制的观察,那是她的叙述手法的基础;那种同事件、描写和人物保持少许距离的操纵方法,既不需要变成公开操控,也不需要直接参与——是因为一种潜在但又看不见的有效准则:改良就是,或者就应当是改良。作为社会改良手段的劳动的改良根本是看不见的,因此社会改良就变得如此孤立,以至于能够非常清晰地被人们所看到。

但看到的过程并不讨人喜欢。好收入转化成好风度可不能自动完成。一些自觉的改良者显示的是他们的本来面目:贪婪而精于算计的物质主义者。但关键问题是道德虚荣已经被如此严肃地当回事儿了,以至于它变成了一种批评:从来不是对准则基础的批评,而是对其结果的品质和行为做出冷静而果断的批评。简·奥斯丁坚定地引导她的女主人公们走向正确的婚姻。她就像某个超自然的律师,不顾一切不利因素,根据精确的道德价值比例来制定婚姻财产契约,以确保那个一般准则的连续性。这种同传统的联系是她的自信的源泉,但在这种关系中,道德辨别变得如此急切,以至于它可以被当

9 “Economic Functions of English Landowner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in *Essays in Agrarian History*, ed. Minchinton; Vol. I; Newton Abbot; 1968.

作一种独立的价值了。文学史家们常说,她是从菲尔丁和理查逊发展而来,但事实上,菲尔丁亲切的、虚张声势的操控和理查逊孤立隔绝的狂热都已经离得很远了,属于另一个世界。在《爱玛》、《劝导》和《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发生的,则是一种日常的、强硬的道德标准的发展衍化。这种道德标准最终脱离了它的社会基础,并且在其他人的手里可以被转而用来反对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简·奥斯丁同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家们联系在了一起。那些道德家们——从柯勒律治到乔治·艾略特和马修·阿诺德,越来越对此感到不自在——不得不学着假设在阶级和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道德辨别的存在依赖于另一种独立;改良的两种意义并不能只是被区别开来,而且还要进行对比;或者,正如柯勒律治首先提出的那样,高雅在其人性意义上必然会变成一种不利于社会开化进程的标准。在这些作家的笔下,那种道德准则彻底崩溃了;改良并不是进步;不仅不一定是,而且有时两者还明确对立。显而易见,简·奥斯丁从未走得这么远;如果她涉及新的结构和语言问题的话,她的小说本来可以变得很不一样。但她只是提供了重点,这个重点只能被放在庄园院墙之外,放到一种不同的社会经验中去,成为一种社会批判,而不是道德批判。我们将在乔治·艾略特那里看到这种转换及其遇到的困难。

117

在此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科贝特的重要性。他在沿途旅行时罗列的名字其实就是阶级。简·奥斯丁从房子里面从未看到过那些东西,尽管她的社会描写非常复杂。不难理解,她所有的判断都是内在的和排外的。她所关注的是那些在改良的复杂形势下不断尝试把自己变成一个阶级的人们的行为。但是如果只有一个阶级能够被看到,那么其实就没有阶级被看到。她的人物都是从典型个人中挑选出来的,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维度里过得很好或者不好。当然,科贝特从未如此密切而细致地观察过他们;但他看到的却是他们共同具有的东西:潜在的经济进程。这样的道德视角更粗糙,更艰难。固有世界的自信让位给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它们令人烦恼、放肆、聒噪且又彼此矛盾。

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经验;它一直都在那里,但却很少被记录下来过:

我们是按照基督的样子制造出来的人,但我们却被迫像野兽一样生

活。

因为我们总是辛苦劳作；

除了安息日，无法休息：

我们的主人也不允许。

我就在这里，在大地和天空之间——所以帮助我吧，上帝。我宁可失去生命也不愿意就这样回家。我需要面包，我将会有面包。

118

我们所做的事情绝非出于我们的意愿，但你们的心和法老的一样硬……。因此，现在的这把火你们不要认为是有意冒犯，因为如果不是你们罪有应得，我们也不会这么做。¹⁰

第一个声音来自 14 世纪；第二个来自 18 世纪早期；第三和第四个来自 19 世纪早期，当时出现了新的普遍危机。这是一种与简·奥斯丁截然不同的道德观念，但它却一直是道德的，用它自己的普通语言来表达。这是那些看着自己的孩子在挨饿的男人们的声​​音，现在这个声音已经迫近那些庄严的宅邸、那些改良了的庄园和车行道终止处的那些自我专注的社会榜样。

科贝特和简·奥斯丁标志着对同一乡村的两种观察方式，两种对立的视角。不过每一种方式都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属于社会观察。但是，当我们沿着那三条呈三角形的道路继续我们的想象之旅时，我们将在吉尔伯特·怀特那里发现一种不同的观察方法，但这种观察在乡村写作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一点儿都不比前两种小。任何居住在乡村的人都会不时地体验到，或者似乎体验到一个没有中介的自然：对树木、小鸟、土地的运动形状直接而有形的感受。吉尔伯特·怀特的新颖之处，或者至少在其持续不变的热情中感觉很新的东西，就从此发展而来；一种独特的、投入的观察，似乎乡村生活唯一的关系就是同其自然事实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新的纪录，不仅是对事实的新的记录，而且是对一种新的观测事实的方式的记录：一种将被称作科学观察的方式：

10 The Great Society；引自前引书 Morton，119 页；Stephen Duck；及引自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E. P. Thompson；London，1963；第二章。

我所捉到的下一只鸟(在5月21日)是一只红背雄性伯劳。我的邻居打中了它,并说,如果不是灰莺和其他小鸟的啼叫和啁啾声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它藏身的树丛来,它很容易就逃过去了:它的嘴里满是甲虫的腿和翅膀……

……乌鸫比山鸟大,以山楂为食;但去年秋天(那时没有山楂)它以紫杉浆果为食:在春天它吃常春藤浆果,这种浆果只在那个季节成熟,在3月和4月。¹¹

这些描写来自《塞尔伯恩自然史》上发表的正式信函。他毕生使用这种语气,保持了这种关注,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写作。并不是怀特缺乏那种所谓的“描写能力”。当一个自然事件包含有情感反应时,例如在1783年那可怕的夏天,他也能够写到那种高度:

中午时分的太阳像被云遮蔽的月亮一样苍白,在地面和房间地板上洒下一片铁锈色的光线;但在初升和西落的时候却像血一般鲜红。天气如此炎热,以至于屠夫宰杀的牲畜的肉第二天就几乎不能再被食用了;苍蝇群集在小路和树篱上,它们使马匹几近疯狂,让骑马旅行变得非常讨厌。¹²

119

正如阅读他从1768至1793年二十五年间的《日记》所显示的,他习惯的关注方式是外向的:观察、探寻、评注、分类。他对周围生活的感情的性质是毋庸置疑的;这是终其一生所保持的投入而欣喜的关注,任何生活在乡村的人仍然能够从其中学到东西。然而,它不能轻易同许多之前的和一些后来的观察混淆起来,也即把独特的社会或个人经验加入所见事物的复杂性中去。怀特的记录和观察细致精确,这有时会使我们联想起阿瑟·扬和《农业年鉴》的

11 In *Writings of Gilbert White of Selborne*; ed. H. M. Massingham; London, 1938; 63—64.

12 同上书,300—301。

其他撰稿人来。但除了偶然提及外,他所观察的并不是劳作农业;他观察的是新的意义上的自然秩序:生物和环境的自然世界。当科贝特和简·奥斯丁各以不同的方式关注着人类世界时,吉尔伯特·怀特却在观看年与年的交替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无数的自然生命:如今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和人类分离开来的自然。

这是一个复杂的变化,我们必须尝试发现它同一整套其他变化之间的关系。那些变化在18世纪,然后是科贝特和简·奥斯丁的那一代,不过是以相当不同的方式,使人们对所观察到的自然的态度和感情发生了改变:对于风景的各种新的兴趣,对于别致景色的新的自觉,以及超越这些之外,与社会观察相互作用的华兹华斯和卡莱尔的新语言、新诗歌。

12 喜人的景色

120

劳作的乡村几乎从来都不是一种风景。风景的概念暗示着分隔和观察。追溯国内风景绘画、风景写作、风景园艺和风景建筑的历史是可能的和有用的,但在进行任何最终分析时,我们必须把这些历史同土地及其社会的历史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想要理解 18 世纪和 19 世纪时英国人对待风景的态度变化,这就尤为必要了。我们有许多出色的国内历史,但是根据它们那隐性的,有时是显性的视角,它们通常只是土地的社会组成——土地的分配、使用和控制——的一部分。这种社会组成被不加分辨地接受和保持了下来,甚至延续至我们的世纪,我们现在对其成就的赞扬就是对已逝生活方式所唱挽歌的典型组成部分。

同样意义深远的是,在标准叙述中,18 世纪英国风景的历史被缩写了。阅读一些这样的历史,你几乎会相信——你常会被人告知——18 世纪的地主通过他雇用的造园师,在诗人和画家的支持下,创造了自然美。在某种意义上,为什么不是?在同样的意识形态中,他还创造了慈善、土地改良和文雅,正如他和他的同类跑到别人的国家里去,那些国家就被“发现”了一样。

但真实的历史却要复杂得多。它是在特殊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对那些自身远非新鲜的观念的应用。但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在这些情形中,在一个真实的社会语境下,特定的应用产生新的、独特的效果。

“喜人的景色”:这个典型的 18 世纪短语具有必要的双重含义。我们不应假设那些可见的土地形状和运动造成的奇观、具有的意义和带来的乐趣都是专门化的产物。自从我们拥有文学起,这些情感就已经被记录下来了,我们可以肯定,在诗人之外还有更多的人曾带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自然世界的面貌和运动:山峰、河流、树木、天空和星星。有许多种类的意义,哲学的或实际的意义,曾经从这延续多少代的漫长观察实践中产生。然而一个特殊的时

刻到来了。一类不同的观察者感到他必须把这些观察分为“实用的”和“美学的”，而且如果他能够充满自信地做到这些话，他就能够否认所有他的前辈们也具有那种他在自己身上找到的“崇高情感”。关键还不在于他做出了这样的区分。关键在于他需要并且能够这么做，而这种需要和能力是生产和消费分离的社会历史的组成部分。

自觉的观察者：指不仅观察土地，而且意识到自己正在这么做的人，他把这本身看作一种经验，并且从其他地方准备了社会范本和类比来支持和证明这种经验：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人：不是一种自然，而是一种人。他拥有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他就在那里，在他自己的语境中，在田园诗人的身上，在最初的田园牧歌中。他就在那里，在彼特拉克的身上，正如布克哈特¹告诉我们的，他爬上普罗旺斯的旺都山去欣赏全景。但当他爬上顶峰时，他想起了一个矛盾的范本，也即奥古斯丁的一段话：

人们前去欣赏雄伟的山峰、宽阔的海洋、咆哮的洪流和无边无际的星星的运动，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²

这个人也在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³的身上，从奥尔本山顶描绘风景，在阿米雅塔山修建自己的宫殿。城堡和设防村庄长久以来都在居高临下地注视着自己下面的田园“景色”。正是在更为稳定的时期里，人们明确开始搜寻的不再是敌军或陌生人的行动，而是风景本身：有意识的景色。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并不知道从动乱时代起，无数世代的人们花费那么长的时间都看到了些什么，欣赏些什么。多数观看风景的人并没有留下记录。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从历史上很早的时期起，这样的风景除了被偶然发现的外，也有人为设计的。在埃及，在美索不达米亚，在中国，人们设计风景；

1 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德国文化与艺术史家。——译者注

2 *The Civilization of Renaissance in Italy*; J. K. Burckhardt; tr. Middlemore; London, 1929; 296.

3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Aeneas Sylvius):庇护二世(Pius II, 1405—1464)的原名,意大利籍教皇(1458—1464),人文主义者、诗人、历史学家。——译者注

尤其在巴比伦,那里有人工修建的公园、林荫道、花园和喷泉。这些设计非常典型地同权力中心联系在一起,而且它们有一长串后继者,直到凡尔赛宫及其现代仿制品。不过还存在另外一种不大为人注意的建筑系列,它们继承的是那些偏离中心,等级不那么森严的文明中的私人别墅以及后来的乡村房舍的风格。这在社会意义上有着重要的区别:意大利的别墅(大部分的新田园文学发生在那里)虽然建在乡村环境和景色当中,但却同城市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它们就像是人们在乡下的家;而在英国,它们却是更为分散的领土宅邸,尽管修建它们的资金常常来自宫廷里的收益。庭园在英国最迟出现在 10 世纪,最初是被圈起来保护猎物 and 打猎用的林地。到了 16 世纪,庭园的数量激增,这同新的乡村豪华住宅的增加有直接关系。多数圈地活动和宅邸修建活动都是以清除整个儿村庄和大片的玉米地为代价的。18 世纪的英国地主采取的是同样的程序,他们前面多少代的祖先都干过这种欺诈和偷窃的勾当。

122

但是从狩猎的林地到风景庭园仍然有着一种转变。很难知道变化发生的年代。16 世纪和 17 世纪有一些例子(康普顿·维恩雅茨和奥德利庄园),但成体系的转变主要发生在 18 世纪以及之后。在分析的时候,把猎鹿园、壮观的环境和设计出的景色分割开来是可能的,但在许多真实例子中这些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尽管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主要的禁猎区——又是对其他人的住所和生计造成了巨大破坏——被移得越来越远。我们必须把风景的自觉发展过程和所谓的景色“创造”重新嵌入这种领土建设的综合体中去。

主要的论点是众所周知的。18 世纪的地主去欧洲进行大旅行,收集克劳德和普桑⁴ 的画,学习新的观赏风景的方法,然后回国创造了诸般风景,例如可以从他们自己的宅邸观赏的景色:创造,也就是说,雇用布朗(农民)或者肯特,或者拉普顿。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装饰性地面的布局上发生的品味变化:从 17 世纪受法国、意大利和荷兰影响的齐整的花园,到 18 世纪改良者对庭园风景做出的改变。但如果把这称作“风景”或“景色”的创造的话,则是

4 克劳德(Claude Lorrain, 1600—1682):法国风景画家。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1665):法国画家,法国古典主义绘画的奠基人。——译者注

要混淆整个发展过程。如果认为有意识地模仿 17 世纪意大利画家的 18 世纪英国人“发现”了风景,那将是种充满讽刺的偏狭看法。但无论如何,整个运动变得更加普遍。

英国人对于风景的看法直接来自荷兰。值得注意的是,最早采用一种可以适用于英国土地的自然特点的模式进行伟大的风景艺术创作的,是 17 世纪以雷斯达尔和霍贝马⁵为代表的荷兰流派。这种艺术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对自然以及感觉模式的科学探索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于英国的改良者来说,它是一种非常接近的相似物。通过改良运动的物理方式(使用新机器掘土;排水和灌溉;把水抽上较高的地方)和通过对光以及人工视角和透视法的物理规律的理解,人们开始生产他们自己的自然,这时他们对直接注视下的土地所做的有限的、传统的象征性装饰就注定会发生改变。

天堂最初的形象是以波斯式围墙圈起来的花园,这在弥尔顿笔下已经出现了:

一处具有各色风光的快乐的田园

而“配得上天堂”的花朵:

并不是很好的艺术品
一堆堆,一丛丛,奇形怪状,但自然
丰富地出产。⁶

马韦尔在阿普敦庄园(那里有一个正式的、象征主义的花园)曾这样描述那里的淹水草甸:

5 雷斯达尔(Jacob van Ruysdael, 1628—1682):荷兰风景画家,画风精致浑厚,以善画树木著称。霍贝马(Meindert Hobbema, 1638—1709):荷兰风景画家。——译者注

6 《失乐园》,第四部。——译者注

它们看起来像在光洁的草丛中

镜子里画的风景：⁷

有趣的意象，不仅因为草甸被看作风景，而且因为有一种技巧感——17 世纪使用镜子和透视法来创作和修饰风景——被有意识地呈现了出来。蒲柏倡导和推荐一种新的园艺风格，反对提蒙的别墅所代表的人造对称。在一种同时起源于科学和艺术的模式中，他也意识到：

你从一处由树木构成的倾斜的拱廊望去，就会看到河面上的船帆突然地通过并消失，就像通过望远镜观看一样。

他的“空间才能”，也即有关“自然的”忠实度的一种明显的标准，细看之下其实是要根据一个视角来设计和重新设计自然：

不要让每一处美丽在所有地方都能够被看到，

一半的技巧均在于优雅地隐藏。⁸

这一新的阶级利用新的资本、新的设备和新的技能所做的，其实就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视角对“自然”进行设计。如果我们最后问，这是谁的“空间才能”，我们会发现是它的主人，它的经营者，它的改良者的。查尔斯·科顿在 1687 年曾描写过查兹沃斯的花园的美丽景色。他在高潮部分写道：

但是所有这一切的点睛之笔，释放出

远远超越艺术力量的光泽的，

是那伟大的主人。他高贵的头脑

只是为了这样的命运才被设计出来。⁹

7 *Upon Appleton House*; 前引书。

8 Pope; 引自 *English Landscaping and Literature*; ed. Malins; London, 1966.

9 *Poems of Charles Cotton*; ed. Buxton; London, 1958.

124 空间才能就是建造乡间宅邸的才能：这个引起社会共鸣的词回荡在整个 18 世纪，而简·奥斯丁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不无讽刺地让亨利·克劳福德在谈论改良的时候说了出来：

如果按照我的建议加以改造……那就会提高这幢房子的档次。你可以把它改造成一幢宅第。¹⁰

因此，对克劳德和普桑，布朗、肯特和拉普顿的土方工程、供水系统和树木种植，以及斯托尔海德和里索兄弟的知觉创作的爱好正是这一广泛运动的组成部分：是它的方式和插曲。从艺术转向风景，我们会看到对特定景致的许多有意识的模仿：光束、阴影和水，就像在帆布绘画中一样；建筑物和树林提供了竖直层面和强调点；用树木作为黑色前景来勾勒景物，就像克劳德和普桑的画，还像戏剧布景中所做的那样，舞台前部装置和活动景片同时显露。应当注意这些相似和对应之处，因为有意识模仿的程度告诉我们这一阶级在真正的艺术和文学上的文化平庸性的程度。但是，在它们自身的意义上，它们却并非没有独立性。科顿在查兹沃斯已经观察到这一点了：

树林卷曲的眉毛向每一片湖面投下阴影
到处都有这样飘动的风景
画家困惑的艺术虽然无与伦比
然而他却无法让波浪和树叶随风飘动。

这种能让自然根据设计进行运动的自信就是地主们的真正创造。因此我们不能把他们的装饰艺术同他们的生产艺术分离开来；这个新的自觉的观察者就是那个非常自觉的土地所有者。给像“阿卡迪亚”这样的庭园清理出地方，依赖的是庭园界线之外的土地（农业的、带有真正田园风光的土地）的完善的

10 《曼斯菲尔德庄园》，孙致礼译，译林出版社，2004，209 页。——译者注

剥削体系。庭园之外的土地也被强行加与了一种秩序：社会的和经济的秩序，但也是自然的秩序。圈地裁定书用笔直的篱笆和笔直的道路划出的数学网格，同庭园风景的自然曲线和分散景点是同时存在。然而它们是同一个过程的相关部分——表面上品味对立，但只是因为在一情况下土地被组织用于生产，佃户和劳工在土地上劳作，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土地则被组织用于消费——风景，井然有序的、私人的安详静谧，景致。事实上，不仅可以说这些18世纪人为设计的风景是农业资产阶级艺术的顶点，而且可以说他们成功地在他们的窗户和露台下面的土地上建造出了强森曾在潘舍斯特想象过的东西：没有农业劳作和劳工的田园风光；树林和湖泊构成的风景，这在新田园绘画和诗歌中可以找到一百个相似物，生产的事实被从中驱除了：道路和通道被树木巧妙地遮蔽，于是交通在视觉上遭到了压制；不协调的谷仓和磨坊被清出了视野（科尔曼和加里克的《秘密婚姻》中的资产阶级斯特林“把旧洗衣房改造成了温室，把酿造厂变成了菠萝园”¹¹）；林荫路一直通向远处的群山，在那里没有任何细节来破坏整体的风景；这一片风景被从上方注视，从新的抬升了的地方看；大窗户、露台、草坪；视觉清晰的线条；有关控制和操纵的表达。这正是皮科克在《海德龙庄园》中不无讽刺地看到的那种社会创作：

125

一幢白色的、光洁的、带有尖角的建筑物，在波澜不惊的湖面上精细入微地反射出来；里特布瑞恩爵士正从窗户向外看。¹²

但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景色，它同时也是“未被破坏的”自然的胜利，这是成就：一种有效的，而且仍然令人难忘的神秘化过程。我们必须强调这一中心特征，即便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许多具有不同动机的真实的观看风景的方式也被卷入这一社会创作，并被利用和欣赏。戴尔就认同改良者的意识形态：

¹¹ *Clandestine Marriage*, 第二十五章。

¹² *Headlong Hall*, 第六章。

圈地，圈地，你们这些年轻人！
为什么你们喜欢公共土地……？
……在混杂的
土地上，所有的耕作都衰退萎缩。¹³

但当他从格朗加尔山上眺望时，他却又具有了一种更古老的意识：

看那些河流，它们流过
树林和草地，在荫蔽处和阳光下；
有时敏捷，有时缓慢，
一浪接着一浪，它们经过
多姿多彩的旅程流向深渊
就像人的生命走向无尽的睡眠。¹⁴

这还不是从人类的自然分离出去的自然，但在 18 世纪风景诗的发展过程中，
分离开的景色最终变得非常平常。这正是汤姆森曾描绘过的时刻：

那时你登上了山巅，从美丽的山脊上
看到一望无垠的景色铺展开去。¹⁵

126

这就是柯珀为之发明了“景色”（scenery）一词那种风景。而在这一传统中，观
看风景的意识是内在的：

这边，乌斯河缓慢地蜿蜒流过一片平原
平原上有宽阔的草地和星星点点的牛群，

13 *The Fleece*, Bk II; *Poems of John Dyre*; ed. Thomas; London, 1903.

14 *Grongar Hill*; 前引书。

15 *Spring*; 前引书; 950—951 行。

河水指挥眼睛跟随它那弯弯曲曲的流动路线
 欣喜欢畅。那边，稳稳地站在河岸边，
 从来不会错过的，是我们最爱的榆树，
 它们遮蔽了放牧人孤零零的小屋；
 远方，有小溪在流淌
 就像熔化的玻璃，镶入山谷，
 倾斜的土地渐入云霄；
 在它多彩的边缘展示着灌木树篱
 的雅致，数不尽的美景，方塔，
 高高的尖顶，欢快的钟声从那里
 传入倾听者的耳朵，
 树林，石南树丛，和冒着炊烟的村庄，就在远处。¹⁶

正是在观看的动作中，这片风景形成了：河水“指挥眼睛”；倾斜的土地“展示着”它的雅致；小溪“镶入”山谷。这在严格意义上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它从分离开了的有利位置获得的控制感是一种真正抽象的美学，还有成百上千个类似的例子。秩序被构建的同时也被投射了出来。在社会的中心，这种联结是直接的。在边缘观看者看来，它成了一种诗意的或图画般的传统。

但是一个不同的问题被非常突然地提了出来：被另一个诗人，他也在俯瞰这片土地，感受它平静的创作，但却发现平静本身让人心烦意乱：

正是这种平静！如此平静，它用它那奇怪
 而极端的沉寂来扰乱
 冥思。大海、山峰和树林，
 那个人口稠密的村庄！大海、山峰和树林，

16 *The Task*, Bk. I.

伴随生活的无休无止

恰如梦境不可听闻。¹⁷

柯勒律治的这种令人烦乱的冥思标志着传统秩序开始崩溃。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真正关系,观看者和那些他能够看到之物的真实存在融入一片风景之中,然后又作为一个问题返回来:有关身份、感觉和自然本身的问题。

17 *Frost at Midnight*; 前引书。

13 绿色的语言

127

所有权发生了分离:对一片土地和土地上的风景的控制。但精神也发生了分离:对那些我们是其组成部分但又经常将其忘记,那些我们必须向其学习,而不是试图控制的力量的承认。在这两种分离中,有关自然的观念被保留了下来并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艾迪生¹问道,“一片完整的地产不能通过频繁的植树造林而被改造成某种花园?一个人可以把他自己的财产变成美丽的风景。”²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华兹华斯把一个惊讶的孩子,而不是一个有支配欲的男人作为自己世界的中心:

他是脆弱的生命,脆弱又无助,
这个活跃的宇宙中的一个居民:
因为感觉赋予他力量
通过感官不断增长的能力
进行创造,既是创造者也是接受者,
劳作,不过是同他看到的
作品一起劳作。³

1 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英国散文家、剧作家、诗人,英国期刊文学创始人之一,曾与 R. Steele 合办《旁观者》杂志。——译者注

2 引自 *The Picturesque*; G. Hussey; London, 1927; 128。

3 *Prelude*, Bk. II (1850)。

于是有关自然的两种原则就能够同时被看到。一方面,自然是一种秩序原则,管理能力是它的组成部分,而通过调节原理,人类活动能够对之重新设计和控制。但另一方,自然又是一种创造原则,创造能力是它的组成部分,我们从中能够获得有关我们自己具有同情心的本性的真理。

这种积极的同情心是心智的真正变化,是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出现新的意识,虽然只有少数人具有。在这个新的时期,对自然的有意改造,不仅对土地和水,而且对自然的原材料和要素的改造,将要进入我们如今称作工业化的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18世纪的农业自信一直伴随有失落、感伤和懊悔的情感:从汤姆森的矛盾心理,到哥尔德斯密斯的悲观绝望。现在,在华兹华斯的身上,另一种原则将得到有力的强调:对自然的信心,对自然自身的运作的信心,这至少在开始时也是对人类的一种更宽广、更仁慈的信心。

128

初看之下,这场运动很容易同18世纪后半叶发生的明显的品味变化区分开来。在一个世纪的开垦、排灌和清理后,作为副产品,发展出一种对未被改变的自然,对荒野的情感来,这是意义深远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这种情感被称作“如画的”。众所周知,阿尔卑斯山的景色是如何戏剧性地从17世纪40年代中期伊夫林笔下“怪异、可恶、恐怖的峭壁和土地”,⁴或者丹尼斯在1688年写的“废墟之上还是废墟,堆作恐怖的一堆一堆,天与地一片混沌”,⁵转变成18世纪中叶和后期以及19和20世纪的旅行者那充满敬意的赞美的:

没有一处峭壁,没有一处激流,没有一处悬崖不是充满了宗教色彩和诗情画意的。⁶

静止的急流! 沉默的瀑布!

是谁让你们在圆月明亮的光芒下

4 伊夫林(John Evelyn, 1620—1706):英国乡绅和著作家,皇家学会创始人之一,著有美术、林学、宗教方面的著作20余部,他的《日记》(1641—1706)是60余年英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生活的见证。——译者注

5 前引书 *Hussey*, 86—87。

6 *Correspondence of Thomas Gray*; ed. Paget Toynbee and L. Whibble; Oxford, 1935; rev. 1971; Vol. I, 128.

如同天堂之门一般荣耀?⁷

在变化的过程中,英国类似的地区——湖泊地区,从18世纪60年代起,在达尔顿和布朗的影响下,怀河山谷和南威尔士,苏格兰高地,北威尔士,新森林;从18世纪80年代起,在威廉·吉尔品的直接影响下——成为时髦的观光地,甚至是朝圣地。约翰逊对高地的态度——

这里的外貌就是那种物质性的,不具有任何形状和有用性,不被自然所关爱,处在它最初的基本状态。⁸

——看起来早已过时了。那种自然是一个改良者;新的自然则是原创性的。但我们不得不记得,那些前往荒野地区的观光者中的多数,尽管不是全部,都是由于“自然”没有让他们的土地处于“最初的基本状态”而能够负担这样的旅行的人。到风景如画的地区的旅行——还有宣传和纪念这些旅行的风景诗、日记、绘画和雕刻——依靠的是来自改良农业和贸易的利润。在这个层面上,这并不是情感的改变;这确切地说是品味的提高:就像使用所有方法制造自然效果的景观庭园一样,山区和森林的荒野地带多数都是明显的美学消费的对象;到过特定的地区,交换和比较旅行和观赏经验,这是时髦社会的一种形式。从华兹华斯和其他人那里我们得知,在旅行的过程中还有其他一些经历;但正是华兹华斯做出了他所认为的关键区别:

即便在享乐中得到的乐趣也是
可鄙的,不喜欢这里,喜欢
那里,被模仿艺术的法则转化为
超越所有艺术的东西;但是更——因为这,
尽管是时代的强烈影响,

129

7 *Hymn before Sunrise, in the Vale of Chamouni*, 1802, 前引书 Coleridge。

8 Johnson, 前引书 *Hussey*, 112。

从来都不是我的习惯——沉浸于
景色和景色之间的比较，
尽心研究表面的东西，
纵容自己对一点点色彩和比例上的新奇
都感到满足：时间或季节的
氛围，这个地区的
道德力量、特性和精神。
不易察觉。⁹

对于荒野地区传统的“敬畏”，约翰逊在高地时曾经对之做出过这样的描写：

没有危险的恐怖……想象力的一种消遣，头脑自发的激动，虽然给人乐趣，然而却不再被允许¹⁰

这是华兹华斯已经知道的东西，那时他正在：

寻找那种美，正如弥尔顿所赞扬的美
其中透着恐怖。

但他已经体验到了一种更为普遍的感觉：

当每天都带来某种新的
对普通事物的尊重感。
地球到处都在孕育这些
更具高雅人性的礼物……
……一种精神，被我所珍藏

9 *Prelude*, Bk. XII (1850).

10 Johnson, 前引书 *Hussey*, 113。

用来洞察神圣和低微之物。¹¹

这是一个复杂的运动,它包含了许多已经很熟悉的情感,但现在却结合在一起,甚至是被强迫结合成为人类尊重和人类共性的一个原则。

应当强调汤姆森和 18 世纪传统的延续性。把乡村和“自然”当作从人类社会和普通人的意识的退却和安慰:

我清楚地记得这些羽毛,
这些野草,和墙上高高的针茅,
被雾和安静的雨珠镀成了银色,
一次我从这里路过,在心中刻上了
如此沉静的意象,
如此安宁和沉静,在充满我脑海的那些不安的思绪中,
看起来如此美丽,
我们从毁灭和变化中
感到的悲伤和绝望,以及生存那短暂的景象
留下的所有的悲痛,
就像一场无聊的梦。¹²

非常典型的是,在这首诗里,孤独的观赏者“路过”这里,而他看到的是一种“沉静的生活”:与紧迫和变化相对的意象。

130

在另一维度上也存在着延续性:通过怜悯、慈善和社群来认可,甚至是美化“卑微”者。《迈克尔》有一个副标题,“一首田园诗”,它对乡村独立性——牧羊人和他的家人:

11 *Prelude*, Bk. XIV (1850).

12 同上。

吃苦耐劳

山谷里人所共知¹³

——以及由于不幸、资金匮乏和最终的贱卖导致的这种独立性的解体：

名叫傍晚之星的村舍

已经不见了，铧头在它曾经站立的

地面上腐烂了；最终的变化已然降临

在这一片地区……¹⁴

的描绘，已经是种相当成熟的描绘。意义深远的是，华兹华斯把自然的“温柔媒介”和把他与迈克尔这样的人联结在一起的那种同情联系了起来：这是他们已经在汤姆森那里看到的那种联系。华兹华斯经常接近真实的人，但他也认为他们正在消逝在过去之中。只有几个幸存的标记和诗歌精神能够回忆起这个过去来。在这个意义上，有关失落和解体的悲伤（这在18世纪晚期的写作中非常醒目）仍然在以熟悉的方式持续着。

但在华兹华斯那里还有一种重要的发展：也即同这种历史观相一致的，对无依无靠者、孤独的漫游者、游民的新的强调。正是在这里，社会观察和孤独的观察——他也是诗人——的感觉联系在了一起。《坎伯兰的老乞丐》一诗中的老乞丐就是克雷布曾经看到的老人的一个晚些版本，但视角的改变却是非常显著的。他现在不再是缺少社群的证据——村庄作为痛苦生活的证据。相反，他被更为真实地从村庄的生活分离出来。在他的身上，在他实际的流浪生活上，集中着社群联系和善良仁慈，那正是自然的推动力。正是通过向他施舍，那种同情感得以继续存在。没有人能够脱离“自然的法则”生存：

13 *Michael*；前引书 Wordsworth, Vol. II。

14 同上。

行善的热情和冲动，
这是每一种形式的生物都不可分离的
生命和灵魂。

乞丐就是这种潜在的，几乎丢失了的社群的中介：

同时，在事物发展的潮流引领他进入的
那片广阔的孤寂中，他看来似乎
只为了自己而呼吸和活着，
无可厚非，毫发无伤，就让他享受
上天仁慈之法悬挂在他周围的
好东西吧，而且，让他在有生之年，
去激励那些不识字的村民
多做善事和进行冥思吧。¹⁵

131

也就是说，社群精神已经遭到剥夺，被孤立在流浪的、具有挑战性的（虽然是被动的）乞丐的身上。不再是通过社群实践，或通过对缺乏社群精神进行的抗议，而是通过：

这个孤独的人，
这个无助的漫游者

人们才有了同情的本能。因此，基本的隔绝、沉默和孤独成了自然和社群的唯一载体，用以反对平庸社会的严酷、冷漠和自私的安适。

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结构，但正是在获得它的同时，所谓乡村写作的一个决定性阶段开始了。这时仍然有种强烈的感觉，认为被观察到的自然是

15 *The Old Cumberland Beggar*; 前引书 Vol. IV。

一片田园土地，
就像这其中的任何一块，在这里想象力可以自由驰骋，
尽管天空不那么宽和与平静；
但这里，自然像是为她自己，构建了
一片游乐场。¹⁶

但决定性的发展则是朝向那片风景，在其中：

天气和季节变化无常
最亲爱的工友们在那里，
人的心，这是一个四周都散发着
人性呼吸之芬芳的区域，
自由的人，为自己工作的人，可以自由选择
劳动的时间、地点和对象。¹⁷

这些是真实的乡村独立性的各个阶段，那种在坎伯兰直接观察到的，然后受到变化威胁的乡村独立性。但在新的压力下，出现了对“人”和“人性”的肯定，但同时两者也被抽象化了：

孤独、庄重之物
无与伦比……
……这就是人
在我的眼前显得异常崇高
……只有远离，在合适的距离之外注视。¹⁸

16 *Prelude*, Bk. VIII(1805).

17 同上书, Bk. VII(1805)。

18 同上书, Bk. VIII(1805)。

这里看到的形象起初是牧羊人,他在山间行走和劳动,但接下来就变成了有关人性的概念——

思想的化身,
人类的理念或抽象概念¹⁹

——这使诗人能够反抗“拥挤生活的丑恶缺陷”和生活在压迫社会中的人的扭曲形象。现在劳工同他的风景融合在了一起,成为自然的普遍形象中的一个。他被从远处看到,而对自然的肯定就是对人的肯定。这种精神既是分离的,同时又在肯定一种隐蔽的广泛联系——

132

大海、山峰和树林,
那个人口稠密的村庄! 大海、山峰和树林,
伴随生活的无休无止
恰如梦境不可听闻。²⁰

——正是在此精神中,诗歌本身的行为,也即创作的行为又重新得到了强调;正如华兹华斯如此经常描绘的,或者如柯勒律治所言,在表面的平静下蕴含的骚乱:

难道我们不应注视更有价值之物?
比那死气沉沉的冷漠世界允许
可怜的、得不到爱的、充满焦虑的人们看到的更有价值,
啊! 灵魂本身必须发出
一道光,一片荣辉,一团灿烂美丽的云朵
把世界包裹。²¹

19 *Prelude*, Bk. VIII (1805).

20 *Frost at Midnight*; 前引书。

21 *Dejection*; 前引书。

现在不是由意志来改变自然了；改变自然的是孤独想象力；是被从冷漠世界赶出来的人，他试图用自己的自然感觉和语言去寻找和重新创造人类。

这就是新诗歌的“绿色语言”。这个词被约翰·克莱尔在一首名为《田园诗》（这很有意思）的诗中使用过：

一种永远都是绿色的语言
被情感赋予万物，
就像山楂树刚刚绽放花蕾，
就把五月送入每个心灵。²²

在华兹华斯著名的《丁登寺杂咏》中，这种联系也同样存在：

因此我依然
是草地、树林和山峰的
爱好者；是我们从绿色的大地
看到的所有东西的爱好者；是眼睛和耳朵的
强大世界的爱好者，包括它们所半创造和感知的东西；很高兴
在自然和感官语言中看到，
我最纯洁思想的支柱，我的心灵的呵护者、
向导和保卫者，我肉体存在的
灵魂。²³

在一种新的意义上，这就是“绿色的田园风景”：

133

如果需要的话，这里暴风骤雨，那里
则在平静生活最谦卑的土地上长满了牧草

22 *Pastoral Poesy*; in *Poems of John Clare*; ed. J. W. Tibble, 2 vols., London, 1935; Vol. II.

23 *Lines Written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前引书, Vol. II.

四季常青,芳香永恒。²⁴

这就是哲学结论;《序曲》中“诗人的思想”²⁵形成过程的高潮。但是现在正在形成的是一类新的诗人,正如自然也是一个新的自然一样。

约翰·克莱尔作为一个年轻的劳工,曾经对汤姆森的《春天》中的几行诗句感到兴奋不已,难以言表:

春天轻轻地来了,带来了飘逸的轻柔,
从远处滴着水珠的云朵的怀抱,
当乐声响起,随着一阵
朦胧的玫瑰雨,降落在我们的平原上。²⁶

这在现在可以读作一种戏剧乞灵:对崇高的季节变换进行象征性的抽象概括。但如果我们同时也读克莱尔的一些精巧诗句的话,就能够同时发现一种延续性和一种变化:

从滴着水珠的谷物中间那暗绿色的土堆上
云雀突然开始歌唱
在雨雾之中
震颤着她那黄褐色的翅膀。

拟人化的季节变成了直接能够看见的云雀,但过程还是一样的:赋予自然一种创造性品质,这种具有新的形式的品质现在变成了内在的;因此物体越是被近距离地描绘,观察者的生活的感染力就越直接地以一种新的工作语言和韵律被看到和知晓,而在写成的诗中,小鸟就是这种感染力。

24 *Prelude*; Bk. XIV.

25 *Spring*; 前引书。

26 引自 *Selected Poems of John Clare*; introd. G. Grigson, 1950; II。

对自然更近距离的描绘——小鸟、树木、天气和光线的影响——是这种新的写作的一个醒目成分。任何有关自然描写的文选都会大量选用 1780 年之后写的诗歌和散文。这常常是种持续的、痴迷的、独特的描写：一种复杂的特殊创作，同大多数早期作品更为典型的属性（也即只具有单一的辨别性品质）正好相反。很明显，部分原因在于观察已变得更为密切，但我们必须把这种写作同那些只是想要知道其他发生的事情才热心进行观察（尽管也很出色）人的写作进行比较。因此，很容易在两类作家——例如，一方面是华兹华斯和克莱尔，另一方面是塞尔伯恩的吉尔伯特·怀特——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这三个人都很明显地致力于观察和描写自然。但我们只需回忆吉尔伯特·怀特的文字就能够看到他们之间的重要差别：

乌鸫比山鸟大，以山楂为食……

134

这种仔细的距离的观察和描写针对的是一个单个的物体，另一种生物。它处于华兹华斯和克莱尔所认为的人之分离的相反一极：个人情感向一个主观上个别化，客观上普遍化的自然做出的投射是这种分离的中介。

作为文学史的一个事实，这场运动非常著名。但克莱尔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在他的身上不仅反映了这种文学变化，而且他和他的历史也体现出社会变化的内向性。

他绝对不是第一个劳工诗人。正如我们所见，斯蒂芬·达克曾在御前写过一首优美的诗，而教会和新古典主义资助并阉割了他。他有许多拥有相似资助人的后继者：皮匠詹姆斯·伍德豪斯，他帮助申斯通布置里索庄园；织工罗伯特·道德斯雷；砖匠罗伯特·泰特索尔；洗衣妇玛丽·科里尔；水手威廉·费尔科纳；牛奶商安·伊尔斯利，她被鼓励像拉克蒂拉那样出版诗歌：

下面没有山谷，没有摇摆的庄稼举着

它那温柔的茎秆来使我接下来的时间变得愉快。²⁷

27 引自 *The Rural Muse*; R. Urwin; London, 1954; 78。

罗伯特·布鲁姆菲尔德在十四岁时从他工作的农场逃跑了,到伦敦当了一名皮匠。他在1800年出版了《农夫之子》,反响不错,人们把他描绘成“我们自己的更坚贞的忒奥克里托斯”。《农夫之子》是对汤姆森《四季》的忠实模仿。布鲁姆菲尔德“认为我对农耕的评论应当完全符合实践经验”,但即便他的细节非常精确,它们却被局限于一种外部的指示和解释,就像吉尔斯这个泛指人物来自他自己更为直接的记忆一样:

谁能够抗拒召唤? 吉尔斯

没有听见小鸟的啼鸣,没有看见升起的太阳,

如若不是仁慈和伟大的人,带着鼓励的目光,

屈尊俯就,赞扬吉尔斯,

但这赞扬并不属于他,

而属于为他的歌声带来灵感的事物。²⁸

这种卑躬屈膝的谦卑是后天学来的品味。如果它现在激起我们的愤怒或鄙夷的话,我们不当错误地攻击布鲁姆菲尔德,而应当批判那些使他和成千上万其他人沦落到这种充满焦虑的顺从状态的人和阶级。当他批评温德姆的一番话时,他可以用一种非诗歌化的方式表达非常不同的感情:

他家乡的普通人无疑是群粗鲁的人,但我不喜欢那种要让他们永远呆在泥土中的教条,因为虽然那对保存土豆很有用,但如果知道一个人的自然能力由于不会读写而遭到了扼杀,心地善良的人对此并不会感到舒服。我们怎么能够不断地赞扬文化修养无法估价的益处,但同时又不希望更多的人得到它呢?²⁹

135

事实上,扼杀是非常广泛而且是有意为之的。

28 *The Poetical Works of Robert Bloomfield and Henry Kirke White*; London, 1871; 27—28.

29 前引书 Urwim, 48, 105。

在最简陋的条件下,要使社会快乐,人们安心,就必须使大多数的人保持无知和贫困状态。

这是曼德维尔说的话,而这也是一直持续至 19 世纪里好多年的一种主流观点。赞助制度的实施看起来是和扼杀的说法相矛盾的,但它其实只是扼杀的另一种形式。劳工诗人被强迫接受一种有关学问和修养的定义,更重要的是,一种有关诗歌的定义,而这种定义证明既平庸,又傲慢。布鲁姆菲尔德几乎无法触及自己的真实经验,因为一种外部的态度已经有意识进行了干涉——

活着,琐碎小事,为我的歌增添荣耀,
它属于最卑贱的仆人³⁰

——即便在他最好的状态,他也被限制在一种诗歌传统中,这使他在句法上只能是个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也即对其他劳动者的进行第三人称式的概括和象征,通过文学暗示进行的合理化,必要的婉转姿态:

堆积的干草是他最丰富的储藏
盘绕的烟雾遮暗了他那小小的房门:
他听从职责的召唤,轻轻地前行,
就像克鲁索在他那人迹罕至的田地里漫步。
在高高的山楂树和无叶玫瑰上,
霜冻的盛宴闪烁着明亮的红光;
一串串光滑润泽的黑刺李长满枝头,
他在修剪果实累累的枝桠——一个麻烦的奖赏。³¹

30 *The Farmer's Boy; Spring*; 前引书, 28。

31 同上书, *Autumn*; 66。

此外,发展的可能性也是以资助为条件的;在文学的体面独立并不比土地的独立更容易实现的年代里,热情的赞扬过后常常是忽视遗忘。布鲁姆菲尔德转而以民谣的朴素风格创作了《乡村故事》,而克莱尔则认为他的《理查德和凯特》使他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位乡村吟游诗人”。而且,为了挣钱,他也创作风景旅行诗:碰巧他去的是我的家乡,观赏的是那些我毕生熟悉的山峦。至于他如何中规中矩地描绘那片风景,这并不重要;那不过是风景词藻的堆砌。但他也可以饱含感情地说:

这样的景色应当扩展开去,
如此恢宏的景色,
无数的人出生,然后死亡
终其一生也无福
瞥见一眼?被空间所束缚,
难道许多焦虑热情的头脑,
向缪斯起誓,泯灭尊严,
注定要被绑起翅膀歌唱?

136

这是他自己对一种真实经验的观察,他立刻和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中的彭斯形成了对照,这并不奇怪。正是当他触摸到自己在整个社会经验中的局限性时,那种被他所压制的力量才显现了出来。

约翰·克莱尔的一生也必须被放置在同样的语境下观看。他的一生更为悲惨,但也更为紧迫:更为悲惨,因为更为紧迫。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之放在乡村变化的环境中来看:把克莱尔同因圈地而造成的失落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但若要充分地理解他的生活,我们就必须超越这种做法,来研究在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变化中,他和华兹华斯共同拥有的经验和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发展。

当然,我们能够以明确的方式,在克莱尔身上发现对近来乡村变化的可见方面强烈感受到的反应。例如在《牧羊人日历》的“五月”中:

老五月啊,你的荣耀到哪里去了
一切均已不见,所有人都离开了你
你来到从前的家园和常去之处
就像陌生人一样无人注意……
……而取代你的新东西
脸上挂着憔悴的笑容
只要进行圈地的地方
就会为她的欢乐覆盖一层霉菌。³²

在“十月”中,幸存下来的吉卜赛人:

出现在没有农夫认领的公地上
那里没有残暴的正义横加干涉。

或者,在《乡村吟游诗人》中的更为自觉的辩论:

这里曾经有通往自由的自然的小路,
这里曾经有通往每个山谷的小路——
圈地开始了,所有的小路都被阻断;
每个暴君都在有路的地方设立自己的标志,
暗示现在穿越土地的人都是侵犯私人领地:
正义被他们所操控,为他们说话;
大路现在也一定都在限制放牧:
——圈地,你是降临在大地上的诅咒,
设计让你存在的坏蛋乏味庸俗……。
啊,英格兰! 自夸自由的土地,

32 *The Shepherd's Calendar*; ed. E. Robinson and G. Summerfield; London, 1964.

陌生人或许仍然相信你的头衔，
 但你可怜的奴隶们看到的却是不同的景象，
 失去了太多因此他们知道真相：
 你的自由就像候鸟一样飞走了，
 而像他们翻地的犁一样低劣的杂种小丑们
 蔑视你的法律，强行换上他们的法律；
 每个村庄现在都有了暴君，
 而教区奴隶只能随着教区君主的意志而活

……田地啊，鲁宾眼中如此亲切的景色，
 草甸上盛开的花朵啊，草场上盛开的花朵啊，再见了！
 遭到清除的树木啊，你令我深深叹息，
 圈地开始了，你们所有的荣耀烟消云散。³³

把进行圈地的士绅描写成“杂种小丑”，这里面有种有趣的愤怒之意，不过当然也有一种熟悉的置换：英国古老的自由遭到了压制，不是被可见的、活跃的地主，而是被“低劣的”和看起来陌生的“暴君”所压制³⁴。这是哥尔德斯密斯在变化的较早阶段看到的東西；那时的乡村英国是：

一幅被东哥特的狄奥多里克³⁵征服之前的意大利的图画。³⁶

在圈地以及其他过程所代表的有规律的土地征服的实际范围内，这一持续存在的入侵野蛮人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更为确定的事实，也即这些野蛮人

33 *The Village Minstrel*; 前引书。

34 *The Revolution in Low Life*; 前引书, 123。

35 狄奥多里克 (Theodoric, 454? —526): 意大利东哥特王国国王 (471—526), 征服意大利 (493), 维持和平统治 33 年。——译者注

36 *Helpstone*; 前引书。

就是出身高贵的英国人,则被置换了。因此,被选择用来描写圈地“诅咒”的煽动者的第一个通用词是“庸俗不堪”,这就切中要害了。这就同那种正在开始形成(从哥尔德斯密斯开始到浪漫主义运动的诗人,在克莱尔那里尤为明显)的情感结构联系在了一起:“旧乡村”的丧失就是诗歌的丧失;对自然情感的培养被土地改良运动的结果所剥夺;财富不仅冷酷残忍,而且乏味庸俗。

在写《海尔波斯通》的时候,克莱尔还很年轻。他把这首诗写成了熟悉的挽歌和回忆。诗里的措辞非常有趣,因为在诗里“勤劳”属于旧世界,而“财富”则属于新世界³⁷:

香甜的睡梦与安宁!你这可爱的,已然失去的魅力,
勤劳曾经将你珍藏在臂弯之中;
闲适和富足,如今只为少数人拥有,
那时却属于所有人,劳动者也有份。³⁸

我们不需要问是什么时候,因为回忆的重点是这样的对比:

138

被诅咒的财富啊!
你是所有邪恶的源泉:超越了人类法律的界限,
贫困的牺牲品,那些如我一般的可怜人,
无法不将他们的悲哀归咎于你:
你就是那阻碍我们摆脱饥饿的栅栏,
你让我们失去了工作和面包。³⁹

作为观察劳工如何被资本剥夺一切的方式,这种描述是非常精确的。但它被放置在一种情感结构中,在其中财富最为明显正在摧毁的是“自然”:在过去,

37 *Helpstone*; 前引书。

38 同上。

39 *The Village Minstrel*, CVI; 前引书。

在童年时期的那种土地的综合体,正在被衰老和变化所摧毁。这里有对实际上是更为古老的农业的景色描写——

你那已然不见了的草场,早已消失了的景象!
那里自然的自由曾经铺上一层缀满鲜花的绿色……
……那里低鸣的牛群在自由自在地漫步吃草,
牧羊人的羊群在咩咩呼唤……

——还有正在被直接改变的更原始的土地:由于排水和清理土地,溪流被改了道,柳树也被砍倒了。

一个半世纪后我仍然能够辨认出克莱尔描写的东西:某片树木,某条小溪,我孩提时代曾经在它们旁边玩耍。在最近几年里,它们正是以同样的方式消失了,目的是要更好地利用那些贫瘠的土地。接下来我们不得不考虑的则是这种观察——相对于获得的某种损失——已被扩展至“自然”的损失。这不仅仅是失去了可被称作——这么称呼有时很正当,有时则非常做作——一片“未遭破坏”的乡村的东西。对特定的人来说,失去的还有一片具有特殊意义的人文和历史风景,在其中情感的源泉与其说是“自然的”,不如说是“故乡的”:

亲爱的故乡!漫长的离别使你显得越发亲切……
乃至一根普通的柱子,或者一块年久
爬满青苔的石头,只要是故乡的
都会获得我心之忠诚,
是我心间永恒的渴望;
所有旧日心爱之物,深情眷恋之物,
目睹它们的消失,令我悲痛欲绝。

最令人悲伤的——被“深情眷恋”的“旧日心爱之物”——则是伴随童年景色的消失而不见了童年:

但是现在，唉！那些景色一去不复返；
和你一起度过的岁月风采早已不在，一如我自己的生活。

139

完全可以理解，这首诗写于十六岁。一种观看的方式同一个逝去的生活阶段联系在一起，快乐和童年之间的联系曾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不仅纯真和安全，而且宁静和富足都首先印刻在一片特殊的风景上，然后被强有力地扩展至一个特殊的乡村往昔。如今，在有关那个被称作自然的东西的记忆——相对于一种当下的意识——中，这个往昔同失去了的身份，失去了的各种关系和失去了的确定性联系在了一起。起初的感觉是如此急迫，以至于它不可避免地同其他经历广泛联系起来：

他故乡的景色！啊！亲切甜蜜的声音！
心从未如此颤动过，不论多么愁苦，
温暖的胸膛产生温柔的情感
珍爱着那片他出生于斯的土地：
就连那个在清晨种植树篱的人
砍伐着挂着露珠嗒嗒作响的灌木，
刚把手放在一根分叉的荆棘上，
痛苦的记忆就涌上心头，
提醒他，他年轻之时曾是多么快乐。

而过渡则几乎是不被察觉的，就像在《童年的快乐》中：

记忆变得无聊，头脑变得空洞，
如果往昔的甜蜜景象不能浮现。⁴⁰

40 *Joys of Childhood*；前引书。

克莱尔生活在这种起到连接作用的情感中,甚至在他进行创作的时候,他都能意识到特殊的记忆向泛指的“往昔的甜蜜景象”的转换。他最关键的认可同我们一直在研究的那个传统最为相关,这出现在同一首诗的另一节中:

幻想遍布所有乐园,不论它们在何处;
世界从它们那里迎接曙光,恰似一朵盛开的花朵,
它们只看到绿色的快乐和晴朗的天空
童年的时光就是玫瑰的时光……。⁴¹

这个童年乐园的自然形象看起来在它们最具广泛性的时刻强迫建立起一种特别的联系。自然、往昔和童年被暂时地,但也是强有力地融合在了一起:

在自然的静谧中入睡,就像贴着母亲的胸脯睡去。

打扰这一自然的犁铧同有关成熟的最痛苦的情感联系在一起:遭到驱逐、艰辛的劳作、身边世界的冷漠:这个人的,也是所有人的经验中存在的情感和意象的综合体;也存在于历史中的每一代人以及这一代人的经验中。但是相对于这种痛苦经验所获得的,则是一种感觉方式,它同时也是一种写作方式:

一种总是绿色的语言^{*}

——克莱尔现在重新创造为“田园诗歌”的语言,在那首包含有这一诗句的诗的标题中出现。这是语言和有关文学的观念的一种激进发展;它的力量在于它在发生真正的剥夺、驱逐和社会分裂的时代里,提供了一种传递人类温暖和社群联系的情感联系;而它自相矛盾的弱点在于,为了形成这一联系

140

41 *Pastoral Poesy*; 前引书。

而退缩进入“自然”，进入心的“乐园”，进入一种孤独的、无奈的和冥思的人类之爱：

深沉的静谧已
为各处带来安宁，
远离尘嚣的僻静树林
也在浓荫中休憩。

对于动乱历史和面目全非的风景做出如此反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两者的真实景象既遭到了消解，同时又在一些意象中重被创造出来。那些意象承载着含义，但又形成了一种观看的方式来抑制这些含义。正如在浪漫主义诗歌中经常出现的那样，人类情感在流离失所的时代中得以幸存：

在尘土飞扬的谷仓中为谷物脱粒
或者挤在沟渠中，挣得的
几个钱无法带来
些许快乐，来抚平我流着汗水的眉头
汗如雨下
这时，你的出现胜过了一切。

出现的东西就是诗歌，它在对种植树篱的人、打谷工、真正在改变风景的人的人性说话，也在代表它说话。那些人在为他人劳作，为他人赚钱；但是却被它的孤独所扭曲，转而反对世界的声响，真正剥削的声响，以及直接对剥削做出的反应的声响：

生长于一个充满喧嚣的村庄，
那里到处是陈旧而无聊的闲言，流氓一样的男孩儿，
农夫和打谷工，他们的谈话空洞无物
无非是关于雇工的粗野，

工作的闲散,面包价格的升降
以及谁将要死去,谁则打算婚娶。⁴²

诗人正是从这个真实的村庄(在那里一个社群生活在压力之下))退缩进宁静的自然,在那里他能够通过回忆民谣和感悟景色,为他自己以及他人的人性代言;这是一片能够进行交谈的寂静,但他却被迫痛苦而绝望地与之分离,折返人类社会,把所写的作品拿到喧嚣的市场上去:利润、恶意、嫉妒;对他的单纯表现出的一种时髦的蔑视;然后再一次(不过现在彻底绝望了)重又回到被忽视的诗人那能够交谈的寂静中去,独自面对自然和贫穷,重新用他的绿色语言创造一个世界:

141

我存在,但我是什么
谁又在乎或者知晓?⁴³

这就是心智在那个情感结构中所能够达到的极限。任何新的方向都要求对此结构以及关键传统做出改变。克莱尔的作品同真实的乡村经验发生令人惊讶的冲突,这标志着田园诗歌的终结。他无法接受兰姆的建议,那个建议曾经驯服了许多人:“把阿卡迪亚移到海尔波斯通。真正的田园风格,阿卡迪亚式的英语,我想在申斯通能够找到。”作为神智失常的天才,克莱尔更像是那个我们能够追溯到他之前一个世纪就开始的那场运动的集大成者:自然同创造它的真实劳动的分离,然后是自然在已然改变而且如今变得无法忍受的人际关系中的解体。我们在克莱尔那里找到的,不是琼森对自生自灭的风景的美化,也不是汤姆森对一种分散和守护富足的生产秩序的美化。哥尔德斯密斯、兰霍恩和克雷布都曾对此做出过有意识的反应。但他们也对任何可接受的社会秩序都被从中彻底消除了的田园做出了无意识的反应。克莱尔

42 *The Progress of Ryhme*; 前引书。

43 *I am*; 前引书。

超越了抗议诗和感伤怀旧诗所做的外部观察。他展示给我们,那种失落是内在的。正是为了作为能够思考和感觉到人生存下去,他才需要新的自然的绿色语言。

14 城市中的变化

142

但是,还有一个更为广泛的原因可以解释改变带来的压力。到了 18 世纪,习惯于通过被普遍接受的知识和文学形式来看待周围环境的人不得不注意到有关风景的另一个巨大变化:急剧扩张和变化的城市。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一个小诗人,查尔斯·詹纳(1736—1774)竟会尝试写作一系列“城镇”或“伦敦”田园诗;但是现在田园意象的缺失具有了不同的意义:

我看不到翠绿的林间空地,看不到奔腾的溪流,
看不到泉水从嶙峋的山上喷涌而出。

他正走在不断扩张中的伦敦的郊外:

不论我恍惚的目光投向何处
只看见散发恶臭的砖头排成长队,
令人作呕的粪堆摇摇欲坠
肥胖的母猪躲在下面呼呼大睡。

他得出的结论是一种简单的否定:

自那之后再没有景色装饰平原
不过是在格雷酒馆街看到的类似景象
既然尘土和噪音无法激发平静的思想
三马驿站也难以修复风景
我将不再寻找游荡的缪斯

不如回家写作,省省我的鞋子。¹

很幸运,这种反应不过是个例外。伦敦在18世纪迅速发展,它作为一种新的风景,一种新的社会而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

但在开始的时候,是很难把新的城市意象从传统意象里区分出来的。例如,在汤姆森那里就有一种新旧态度的有趣组合。他的诗中有与乡村纯真进行的传统对比,例如在《秋季》中:

这是那些因愧疚而懊恼的人
和罪恶的城市从未知晓的生活——原始
时代未曾堕落的生活。

与此相关,但又发展出的更为具体的抱怨则是:

城市拥挤不堪。公共场所
充满了各种声响和交谈的声音,
模糊嘈杂。放荡的年轻人顺着
纸醉金迷的欲望之流
迅速漂向毁灭。

(《冬季》)²

但是,这种有关浪费和放荡的道德观点不仅为它们与纯真的自然之间的对比留下了余地,也为它们与文明化的勤劳之间的对比留下了余地。对生产的颂扬曾经出现在乡村,现在也扩展至城市:

你的城市到处都是艺术之子;

1 *Town Eclogues*; C. Jenner; London, 1772; Eclogue IV, *The Poet*; 27—28.

2 Thompson, 前引书, 180, 209。

贸易和喜悦,在每条忙碌的街道上,
 可以听到两者结合的声音;甚至做苦工的人
 在车边大汗淋漓,或者满身灰尘,劈砍着
 宫殿石块,也看起来心情舒畅。

(《夏季》)

汤姆森可以把这种对勤劳的歌颂延伸为有关城市的一种完全肯定的观点:

从此每种形式的高雅生活
 都秩序井然,受到保护,欢欣鼓舞,
 走向完美。把所有人联结在一起,
 社会变得异彩纷呈,品味高雅,彬彬有礼,
 快乐无穷。城市乃艺术的呵护者,她的上空
 塔楼环绕,美不胜收;
 街道纵横,她的数以千计
 躊躇满志的孩子们在专心作画
 从绿树盘绕的去处,或者强壮的紫杉之下
 到拉紧的船头。

然后公共道路上走来
 忙于生意的商人;建起大仓库;
 支起强有力的起重机;满街都是
 外国货物;而你的河流,哦!泰晤士河,
 宽广、温柔、深邃、庄严,河流之王!
 选择此处作为他宏伟的胜地。

(《秋季》)³

3 Thompson, 前引书, 106, 137—138。

这一赞扬混合了资产阶级对生产和贸易的成就感和奥古斯都式的文明秩序感。而正因为如此,它可以被非常迅速地转化成新近得到强调的对城市的种种恐惧中的一种:对暴民的恐惧混合着对城市贪婪的更古老的恐惧:

就让这急切地穿过城市
通过合法的暴行和预谋的诡计,
社会辨别力已然消失;蓬勃的发展
刺激那群煽动分子变得狂乱,
或使他们堕落为奴隶。⁴

于是,在一种已然蓬勃发展的活动中,著名的贸易和工业在法律和金融领域的上层结构被视为与骚动和暴乱连为一体。

144

正是在这个复杂的混合体中,18世纪的观察者们发展出他们对于城市,尤其是伦敦(因为它是世界的顶尖儿城市)的观点来。伏尔泰把对工业和城市享乐的追求看作城市以及文明本身的标记。黄金时代和伊甸园由于缺少工业和享乐,因此并非是合乎道德的,而是无知的:城市,尤其是伦敦,是进步和启蒙的象征,城市的流动性则是文明和自由的学校:

堪比雅典的伦敦,的确很神圣
将暴君
和社会派系产生的偏见一道驱逐。
能够证明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者均可在此获得成功……
在伦敦,有才干的人,就是伟大的人。⁵

亚当·斯密则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城市是在保护和延伸乡村的工业:城

4 Thompson, 前引书, 178—179。

5 *Verses on the Death of Adrienne Lecouvreur (La Mort de Mlle Lecouvreur, célèbre actrice)*; trs. in *Voltaire*; H. N. Brailsford; Oxford, 1935; 54.

市是自由和秩序的中心,但作为市场和制造中心而具有的依赖性又容易产生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人。这就更为接近伦敦的真正矛盾之处了。一方面,在高雅文学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都市性,甚至包括蒲柏、约翰逊和斯威夫特世界中的传统乡村姿态。但他们笔下的是一个孤立的伦敦,尽管约翰逊在模仿尤维纳利斯⁶时能够通过其他的眼睛来看这个城市。另一方面,在贺加斯⁷和菲尔丁、盖伊和笛福那里,则存在一个更为黑暗的现实。贺加斯的《杜松子酒巷》比任何系统阐述都更为接近地把我们带入18世纪中期的伦敦;不论是他的《勤与懒》和李卢的《伦敦商人》中的道德对比,或是盖伊的《乞丐的歌剧》中表现的下层人的活力,或是笛福的《莱儿·弗兰德》,有关伦敦的真实感觉都处在文明秩序之理想的相反一极。“无耻的乌合之众”,“暴民的傲慢无礼”,“游手好闲、挥霍无度、放荡的”工人,这些都是常见的中产阶级对下层人的描述。销赃商店、妓院和贫民窟、散发恶臭的地窖、危险的出租屋,这些在观光者或中产阶级观察者对此“堪比雅典”之城的感觉构成中占据了很大分量。

混合于这一观点中的是一种矛盾的现实:有关邪恶与抗议,犯罪与受害,绝望与独立的现实。财富与贫穷的对立和乡村秩序中的并无本质不同,只不过由于集中在疯狂扩张的城市里而变得更为激烈,更为广泛,更成问题。“暴民”经常是暴力的、不可预测的,具有被利用进行反动活动的可能性,但正如乔治·路德⁸所展示的,它也是一个名称,用来遮掩“那些其本质很明显是穷人和富人之间冲突的社会抗议运动”。⁹例如,在威尔克斯的时代,这些流行的抗议活动“站在自由的一方,而伦敦的文明秩序却是自由的敌人”。

145

与此同时,这一复杂性在城市里获得了物质体现。正如菲尔丁在1751年所言:

6 尤维纳利斯(Juvenal, 60? —140?):古罗马讽刺诗人。——译者注

7 贺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英国油画家、版画家、艺术理论家,作品讽刺贵族,同情下层人民。——译者注

8 乔治·路德(George Rude, 1910—1993):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9 *The Crowd in History*; G. Rudé; New York, 1964.

不论是谁看着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看着近来新增的大面积的郊区,奇形怪状的建筑,数量众多的小巷、街道、庭院和支路,就会认为如果这些东西的用途是藏身的话,那么它们再也不能比现在这样设计得更好了。¹⁰

因此,如果考虑到18世纪伦敦在物质条件上的肮脏和杂乱大多不仅仅是急速扩张的后果,而且是试图控制这种扩张所造成的后果,这就很有些讽刺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从对瘟疫的恐惧到对社会动乱的恐惧——这本身正是农村经济发生的混乱向伦敦的转移和集中——人们一直试图控制这个城市的成长。在伦敦迅速扩张的最初阶段,也即16世纪晚期,在1580年就发布了一份公告,反对兴建新的房屋,到17世纪对贸易的控制和进一步反对修建房屋的公告,直至1709年提出反对兴建新房屋的议案,这期间统治阶级出于自身的利益一直努力约束伦敦的扩张,尤其是阻止穷人在这里定居。在那些法令和公告之下,通常会有明显的例外,允许修建“适于富裕人们居住的房屋”。穷人和流浪汉(他们是变化中的农村经济的受害者,或是处境艰难,或怀有野心,在伦敦发现某种途径能使他们逃避依附于人的命运)是明显的驱逐目标,不被允许留在这个发展中的城市。然而,总体的变化趋势却使对他们的驱逐变得不可能。不仅大批仆从进入城市,还有成千上万其他人蜂拥而至,而那些限制措施的主要后果就是出现了一个持续而漫长的风潮,人们在法律限制内兴建和改造投机房屋,这些房屋拥挤不堪,安全性差:穷人被迫居住其中的迷宫和小巷。而这与城镇宅邸、广场和时髦露台的修建——如今常被概括为“乔治时代风格”的伦敦——属于同一个过程。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一个统治阶级希望得到一种它自己推动发生的变化带来的利益,但却要控制或压制这一变化不那么受欢迎的,然而却又是密不可分的后果。对伦敦的许多抱怨(以及许多赞扬)都必须根据这种双重意义来解读。

“臃肿的大都市”¹¹形象就是如此,早在科贝特对之进行更为著名的描述

10 *Inquiry into the Cause of the Late Increase of Robbers*; London, 1751; 76.

11 “臃肿的大都市”(the great wen)是伦敦的别称。——译者注

之前,这个形象就已经存在了:

伦敦,大不列颠的大都市,长久以来人们都在抱怨它像个怪物,长着硕大无比的头颅,和躯体不成比例。然而,在最初出现这种怨言之时(大约 200 年前),伦敦的建筑物几乎全都在城市范围以内。……如果建筑物的增长(这在如此久远的时期之前就已开始)因此被看作是国家身上的肿瘤的话,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那些后来又兴建的难以计数的街道和广场呢?¹²

146

这是塔克在 1783 年的言论。随着伦敦的继续膨胀,“怪物”和病态“肿瘤”的形象被不断地使用。但是人们并不总是能像科贝特那样清楚地看到这种形象的真实含义。伦敦的扩张真正显示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真实情形和发展状况。如果国家的真实情形和发展状况被视为一种怪异的,或者病态的成长的话,那么根据逻辑,这就不得不被追溯到整个社会制度上去。不过,更容易的做法当然是去谴责发展的后果并且忽视,或者继续美化整体的状况。

在 1660 年,伦敦就已经是个拥有五十万居民的城市了,当时第二大城市是布里斯托尔,有大约三万人口。在 1700 年和 1820 年之间,伦敦人口增至一百二十五万。政治权力的集中;封建制度被农业贵族以及后来的农业资产阶级所取代,这对于土地现代化产生的所有影响;商业贸易的长足发展:这些醒目的发展百余年来已经获得了无法阻遏的势头,这是一种以自身为滋养的集中和需求。19 世纪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城市将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18 世纪的伦敦则是一种农业和商业资本主义在贵族政治体制内的惊人创造。在每一阶段,它都从国家的其他部分吸取养分:牲口贩子从威尔士或苏格兰赶来牛群为它提供肉食;成群的姑娘步行从北威尔士来这里收摘草莓;更重要的是,除了这些有组织的特殊旅行外,成千上万的人来这里找工作或寻觅

12 *Four Letters to the Earl of Shelburne*; London, 2nd ed., 1783; 44.

藏身之所;还有逃避动乱或其他难以忍受的严酷环境的难民。阿瑟·扬问道,是什么诱使这些人“离开他们有益健康的清洁田地,来到一个肮脏的、发着臭气的、吵闹的地方的呢?”他本可以在乡村的状况和“行改良的”社会制度所强制进行的人口驱逐上找到部分答案。他在提问的过程中看到了另一部分答案:

乡下的年轻男人和女人视伦敦为他们的最后希望。……逃向那里的年轻女人的人数令人感到不可思议。¹³

147

乡村和城市之间不平等的互动现在已经深入发展并变得普遍。地主为了巩固和扩展势力而诉诸法律、资本市场和婚姻市场。为了补救笛福在1713年称作“灾难”的玉米生产过剩,人们开始促进蒸馏法的使用。就这样,杜松子酒巷往回一直通到了乡村宅邸(“玉米蒸馏是维护地主利益最为关键的事情之一”,《评论》,1713年5月9日)。伦敦周围的乡村变为伦敦的补给源:为人们提供谷物,为马匹提供干草;在荒地上养猪(正如詹纳在他的《田园诗》中看到的那样);水果、蔬菜和牛奶。这与后来的工业中心由它们的农业内地供养并不相同。伦敦的情况是,它作为首都,把一种经济体制和一个社会的特点集中于其非凡的中心:秩序和混乱同时存在。

因为伦敦并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工业城市。它是一个行业 and 分配中心:金属加工业和印刷业熟练工匠的中心;制衣业、家具制造业和时尚中心;同海运和市场有关的所有工作的中心。所有这些行业随着伦敦的扩张而得到发展,尽管还存在许多地区变化。18世纪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有人在1749年注意到的“服务于王国其他地区的有利可图的中介业务、代理商业务、经纪人业务、谈判业务和保险业务”的扩展。“中介、代理人、经纪人、保险业者、银行家、谈判人、廉价零售商、认购人、承包人、出票人、票据贩子、证券投机商和……其他许多类混迹金融业的人,他们所从事业务的名称我们的祖先们

13 *The Farmer's Letters to the People of England*; 2nd ed., 1771; 353—354.

都闻所未闻”。¹⁴1719年的一份“对伦敦增长情况的估算”注意到公众资金的增长的重要性,因为这导致“新的事务所和社团”的出现,使“数量众多的其他人们来到伦敦及其周围居住”。同原有的行业(这些行业本身也对财富、贸易和炫耀行为的增长做出了反应)相比,这种金融业务尚属少数,但它同政治权力的集中一起,是首都正在获得的重要性的基础。当新的工业城市在北方出现时,它们将只是围绕一或两种行业发展而成,其物质特点将反映出这种侧重。而姑且不论伦敦的历史复杂性,它如今也是多元多样的:不仅是指这里有几百种行业,而且指它在经营和指导如此多的他人业务。国家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在伦敦反映了出来,而且就在这里发生。随着人口的增长,它开始出现亏损,不仅食物匮乏,而且物质生产也失去平衡;但这却从社会生产那里得到了充分补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正在生产和再生着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现实。

148

正是在这种18世纪的意义上,布莱克(他自己是一个工匠,也是伦敦人)如此看待首都:

我漫步在每条被包租的街道上,
被包租的泰晤士河在旁边流过……¹⁵

他本来写的是“肮脏的”街道和“肮脏的”泰晤士河,因为那是显而易见的;但他所加上的则是“租赁”的感觉:一个城市通过贸易组织起来。突然之间,在此之间,他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首都,不是早些时候和当代一些人们所观察到的暴乱、喧嚣或着怪异的肿瘤;而是一种组织,一种头脑的系统状态:

……我看到的每张脸上的痕迹
虚弱的痕迹,悲伤的痕迹。

14 *London Life in the XVIIIth Century*; M. D. George; London, 1925; 323.

15 *London*; in *Poems of Blake*; ed. Binyon; London, 1931; 59.

在每个人的每声哭嚎中
在每个婴儿恐惧的啼哭中，
在每个声音，每声诅咒中，
我听到了头脑铸就的镣铐。

哭嚎声、恐惧感和诅咒全都是很明显的，但布莱克现在将它们泛化为一种强加的，然而又是自愿接受的有组织的压迫：“头脑铸就的镣铐。”因此，他所看到的是这种资本制度隐含的联系，这相当引人注目：

扫烟囱者的哭声
令每个黑色的教堂感到骇然；
无助的士兵的叹息
变作鲜血沿着宫殿的墙壁流淌而下。

但是我在午夜的街道上听到最多的
则是年轻妓女的诅咒
让新生婴儿的眼泪变得干涸
为婚姻的灵柩带去灾难。¹⁶

这与乡村纯真和城市邪恶的传统看法迥然有别。不论是事实的还是精神上的联系，纯真和邪恶都在城市之中，并且属于城市。象征权力的庄严宫殿必须被看到流淌着鲜血：真实的但却被抑制的联系被揭露了出来，教会和婚姻习俗同那些忍受不幸，遭到歧视和抛弃的人们之间的对立也是如此。这并不仅仅是对扫烟囱者的观察；在布莱克写作之前，就已经有人对扫烟囱儿童的骇人状况进行了有力抨击并部分获得了成功。布莱克在城市的整个秩序和它所集中体现的人类制度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这是强行进入那种被压制

16 London; in *Poems of Blake*; ed. Binyon; London, 1931; 59.

的有关联系的意识。这种做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式来看待作为整体的人类和社会制度。这精确预示了狄更斯的基本文学方法和目的。

强调布莱克作品的这种特点是值得的,因为尽管他承袭了许多 18 世纪的田园意象,但他在他的整体写作中把这些意象转变成了一种普遍状况的因素。乡村和城市之间简单化的对比也因此而得到了决定性的超越。意味深长的是,他最为人所知的语句之一是“英格兰那绿色的快乐土地”,但这并不属于乡村怀旧和隐居的语言。正如他所言,他抗争的所有目的就是要“在英格兰那绿色的快乐土地上建立 / 耶路撒冷”:建立圣地以抗争邪恶的城市。

因此,这同华兹华斯之间有着有趣的联系和对比。华兹华斯《序曲》的第七卷,“居于伦敦”,是对看待这座城市的新方式早期最主要的记录之一。华兹华斯的叙述包括的一些经历比布莱克的更为丰富多样,但还有两种更为直接的区别。华兹华斯在观察这座城市时是以他的乡村经历为基础的,而且他的观念也受到了乡村经历的影响;因此,他看待伦敦的方式和布莱克的方式有关联,但该城市的特征——也即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占据了中心地位。

华兹华斯以那些生活在离伦敦有一定距离的人们的普通观点为开端:对它的历史和奇妙之处“叹为观止,欢喜莫名”。他告诉我们,即便在此时,他已感到奇怪:

人们如何生活

正如我们所言,甚至比邻而居者仍然

形同陌路,不知彼此之名。¹⁷

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惊叹和深受吸引的感觉。他回忆起初到之时,“穿过城郊星罗棋布的村庄”,进入“庞大壮观”的伦敦城,对任何“头脑之外的东西竟能获得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无比惊异,感到“数百年的重压”,“力量在重压

¹⁷ *The Prelude, a parallel text*; ed. J. C. Maxwell; London, 1971; 256.

下增长”。这是：

庞大的都市

我的国家以及世界的源泉；
这个巨大的商店，又是一部编年史
激情的埋葬之地，它们宏大威严
的家，它们的主要居所¹⁸

这不仅是看待一座城市的权威方式，也是看待首都（它体现并指导着整个国家）的权威方式。但华兹华斯也以旧的方式看待伦敦。爱并不那么容易存活：

在城市那些密集拥挤的
场所中，人心易病¹⁹（到此）

150 虽然街道“仍然嘈杂无比”：

就像逃离敌人一般，我们突然
转向某个偏僻寂静之所；²⁰

正如汤姆森所建议的，以乡村作为城市的对照：

安然自远处，聆听人潮喧闹。²¹

18 *The Prelude, a parallel text*; ed. J. C. Maxwell; London, 1971; 339.

19 同上书, 499。

20 同上书, 260—261。

21 Thompson, 前引书, *Autumn*, l. 1301。

然而,这些情感并不位于华兹华斯伦敦经历的中心。他以相当新的方式试图把这座城市描绘成一种社会形势:

没有穷尽的人流和移动之物! ……

……色彩、光线和形状的

快速舞蹈;震耳欲聋的喧嚣;

来往之人熙熙攘攘。

摩肩接踵。²²

这是对一套新的物质和感官联系的直接观察:看待新式社会中的人们的新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这种新的异化感,他进行着思索,其方式同布莱克的可以相比照,但却有所不同:

哦,朋友!有一种情感属于

这个伟大的城市,正当合理;

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

我经常随着人潮而动,并且告诉

自己,“从我身旁走过的

每张面孔都是一个谜!”

于是我看着,不停地看着,心中充满

疑惑,问着各种问题,

直到眼前的形状变成

超人的视力所看到的一个行列,滑过

静谧的山峦,或者出现在梦中。

熟悉的生活的所有基石,

现在,以及过去;希望,恐惧;全部留下,

22 *The Prelude, a parallel text*; ed. J. C. Maxwell; London, 1971; 259, 261.

有关行动、思索和言说之人的所有法则都

离我而去,不知道我,也不为我所知。²³

我认为,这些重要的诗行最早表达了后来成为对伦敦的主导经验的那些感觉。布莱克看到了一种“虚弱和悲伤”的共同状况。华兹华斯看到的则是种陌生感,联系被切断的感觉,他最初采用的不是社会的方式,而是感觉的方式:在人群中无法找到对他人的认同感,这可以追溯到一种对自我的认同的丧失,然后通过这些方式导致社会本身的失落,社会被一系列意象所覆盖和取代:“色彩、光线和形状的舞蹈”,“摩肩接踵”,而且不存在其他法则。在后来的描写伦敦的文学作品中,再没有别的什么经验比这占据更为中心的地位了。

151

然而,从这种感觉的混乱状态,这种对神秘性的承认,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华兹华斯立刻将之扩展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所有人类生活的神秘性,就像盲乞丐脖子上挂的身份牌子一样,他把这视为人类知识局限性的一个“类型”。这不如最初的瓦解有趣,但它是这类经验的一个典型因素,要想把它维持下去并不容易。每一类哲学的和社会的态度都准备填补它所制造的真空。华兹华斯在描写了他自己的神秘感之后,开始摒弃“人群”,“民众”,这种做法已经变得很常见了:

除了这儿或那儿的一两个流浪汉外,对所有人而言

对所有居民而言,

这座宏伟的城市处于一种不自然的混乱;

一个人们无法辨认的世界,

人们是苦干的奴隶,没有喘息的时间,

生活在繁琐事务的

无尽潮流中,逐渐消融,沦为

23 *The Prelude, a parallel text*; ed. J. C. Maxwell; London, 1971; 286.

一个身份,虽有差异,
但却没有法则,没有意义,没有目的。²⁴

在1850年的版本中,他变得温和了,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轻蔑的模式;这种老套模式是表达社会的和感觉的混乱的主导方式之一。但仍然存在其他方式,也同样很重要。回顾那段经历,他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观看方式,这种方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那个大都市的
民众之中,常会看到
人们的团结,激动人心,
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如此,
不论善恶之心,一种精神
战胜无知和邪恶,主导一切,
那是道德判断力,就像眼睛
追随太阳的光芒。²⁵

在伦敦的发展变化中,这种对可能实现的新制度,也即人类团结的新形式所表现出的具有解放意义的洞察力和一种新特性带来的震撼同时出现,那种新特性产生了我们熟知的主体退缩。客观上具有团结性和解放性的那些力量同时也被视为造成威胁、混乱和身份丧失的力量。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伦敦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就是这样有时被矛盾地解读,有时又被用这两种方式交替解读的。

变化已经开始成为普遍现象。尽管伦敦仍将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但也有更多其他的城市步其后尘,它们的方式既有关联,但也造成混乱。伦敦是首都,是最古老意义上的文明中心,正如华兹华斯自己所看到的那样:

24 *Prelude*; 前引书,292。

25 同上书,343。

瞧这座城市像披上一领新袍，
披上了明艳的晨光；环顾周遭：
船舶，剧院，尖塔，教堂，华屋，
都寂然、坦然，向郊野、苍穹赤露，
在烟尘未染的大气里粲然闪耀。²⁶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这是工作日的喧闹开始之前，也是后来的发展产生的烟雾出现之前的城市。但这也是一种观看任何历史城市的经久方式：它的公共建筑以及文化和知识中心。巴黎当时仍然只有伦敦的一半规模，也将进入大发展的时期；那不勒斯、维也纳、柏林、罗马、圣彼得堡、布达佩斯、莫斯科将紧随其后。在这个重要意义上，文明的城市正重新开始扩张，在文化上变得更为重要。不过其他类型的城市甚至扩张得更快。在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伦敦虽然持续快速发展，但也比不上北方工业城市更快、更具爆炸性的发展。在1821年和1841年之间，伦敦以20%的速度增长；而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和谢菲尔德的增长速度则超过40%；布拉德福为65%。正如我们注意到的那样，在其历史意义和作为首都的意义上看待伦敦的方式多种多样。在伦敦仍是独一无二的时候，它的规模会激发人们产生一种新的人类维度的感觉，视它为一种新的社会类型。但是工业城市则是另外一种东西。虽然仍处于发展早期，工业城市已经显示出城市的新的特点以及城市和乡村之间新的联系，这甚至比首都的发展更具有决定意义。

26 《威斯敏斯特桥上》，杨德豫译，147页。——译者注

15 城市中的人们

153

狄更斯的城市是伦敦,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伦敦尽管在全国性和城市化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在许多方面其实是很特殊的:这些方面同狄更斯的创造性成就有很大关系。当狄更斯看到其他的,甚至是更新类型的城市——《艰难时世》中的工业中心科克顿(普雷斯顿)——时,他做出了一种更为简单、更为修辞化的强调。科克顿是一种“事实的胜利”;在那里,你看不到任何东西,除了“那些非常有用的东西”。这是:

这是个一色红砖房的市镇,那就是说,要是烟和灰能够允许这些砖保持红色的话;但事实摆在面前,这个镇却是一片不自然的红色和黑色,像生番涂抹的花脸一般。¹

根据这种观点,该市的人文景观同它的自然景观一样,也是千篇一律的:

镇上有好几条大街,看起来条条都是一个样子,还有许多小巷也是彼此相同,那儿的居民也几乎个个相似,他们同时进,同时出,走在同样的人行道上,发出同样的脚步声音,他们做同样的工作,而且对于他们,今天跟昨天和明天毫无区别,今年跟去年和明年也是一样。

但不论这种新的和不自然的工业秩序的形象有多么贴切,它其实是同狄更斯自己特有的观察人们及其行为的方式相矛盾的。甚至在《艰难时世》中,这一

1 译文出自《艰难时世》,全增嘏、胡文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7页。——译者注

点也不时地显现出来。在小说中,很明显,人们并不“那么彼此相似”;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对比最终构成了小说的关键结构。

这一矛盾提醒我们,在狄更斯的时代及其之后普遍存在着对有关城市的观念和有关工业的观念的混淆。把这两个观念混为一谈是新的工业城镇的社会基础,这在一些重要方面误导了对狄更斯不论是整体的还是具体的理解。狄更斯可以背过脸去谴责科克顿,但他的城市经验总的说来是对与伦敦完全不同的经验的参与,而这正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也是真正体现他的天才之处。

154

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对伦敦这样的城市不可能简单地用一种修辞姿态将其描写为一个抑制性的统一体。恰恰相反,伦敦的混杂性,众多人口的多样性以及发展的随意性正是它最明显的特点,尤其是从内部对它观察之时。

的确,这种混杂性和随意性最终体现了一种体制:一种对无差异的否定体制;一种通过法律、权力和经济控制对差异性的肯定体制。但是伦敦的特征——它是一个复杂的国民和海外经济及社会实体的首都——决定了这一点并不是简单地显而易见。科克顿的秩序和体制却是相当清晰可辨的,即便我们在读了狄更斯对之做出的修辞性的描写后也是如此。在一个较短的快速扩张时期内,围绕着一个直到最近还是村庄或小集镇的地方修建起来的街道和房屋显得齐整而统一,这与狄更斯时代的伦敦的多数街道都明显不同。新的工业城镇都是围绕它们决定性的工作场所——通常是一种单一的工作——组织起来的,伦敦从来不是这样,也永远不会是这样。因此,当狄更斯被伦敦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一般意象——这些意象在科克顿和其他小城镇的例子中能够直接投射出来——所触动时,他对伦敦新经验的主要反应就更为多样化,而且我得说,也更为敏锐。在这一点上,他同布莱克或华兹华斯的看法更为接近,而不像他在1870年之后的那段时期形成的更为整体化的看法。但是他所看到的,以及他在一类新的小说中开始展现的东西直切问题的核心。因为,甚至从现代的角度看,伦敦也比那些工业革命早期出现的千篇一律的城市更深刻地体现出一种矛盾来:多样化和明显的随意性与一种最终被视为决定性的秩序共存:表面上是明显的个体化现实,但超越于此,又常常隐藏着共同的情况和命运。

狄更斯创造出的新型小说——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成就,开始时走了许多弯路,有过不少失误,但最终却是决定性的——就与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双重情况直接相关:随意性和系统性,明显的和隐晦的,这正是伦敦的真正意义,尤其是在它作为一种主导社会形式的那个阶段。

因此,狄更斯对伦敦的最终呈现并不能用地形学或地区实例来解读。它隐含在他的小说形式之中:在小说的叙事方法、人物塑造手段和天才的典型描写中。我们如何措辞,这并不重要:有关伦敦的经验是虚构的手段;或者虚构的手段是有关伦敦的经验。重要的是,他的呈现——并不是单纯的呈现,而是一种持续的戏剧化表现——就是写作的形式。

我们可以首先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来展示这一点。当我们回顾一本狄更斯小说时,我们所记得的总的运动——典型的运动——是男人和女人看起来相当随意的过往,每个人都在某个特定的阶段出现,以某种固定的表达方式呈现:也就是观看大街上来往的男人和女人的方式。起初这其中缺少一般的联系和发展。这些男人和女人不过是擦肩而过,有时碰在一起而已。他们也不经常以普通的方式进行交谈。他们对彼此说话,或者在彼此走过之后说话,每个人都力图通过自己的话语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和现实;通过固定的自我描述,提高嗓门,使自己的声音在其他类似的声音中被听到,或者压倒其他类似的声音。但随着情节的发展,未知的和隐藏的关系,深刻的和决定性的联系,明确的认可和承认强行进入了意识。这些是任何人类社会中真正的、不可避免的关系和联系,必要的认可和承认。但是,由于这种复杂的新社会制度的仓促、喧嚣和驳杂性,它们又是隐晦的、复杂的和神秘的。

因此,对意识的这种创造——认可和承认——可被看作狄更斯成熟后的小说的写作目的。这一需要位于他的社会和个人视野的中心:

啊,如果有什么善良的精灵用一只比故事中瘸腿的魔鬼更有力更仁慈的手把屋顶掀开,向一个基督教徒指明,当他在他们中间走动时,什么样黑暗的形体会从他们的家里走出来,参加到毁坏天使的随从的队伍中去,那将会怎样啊!啊,如果仅仅在一夜的时间中看到这些苍白的鬼怪从那些我们忽视过久的地方走出来,从恶习与热病一起传播的浓密与阴

沉的天空中走出来,把可怕的社会报应像雨一般永远不停地、愈来愈大地倾泻下来,那将会怎样啊!经过这样一夜之后出现的早晨将会是明亮与幸福的,因为人们将不再受他们自己所设置的绊脚石的障碍,这些绊脚石只不过是他们通向永恒的道路上的几粒尘埃罢了;那时候他们将像出于同一个根源、对同一个家庭的父亲负有同一个责任、并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而努力的人们一样,专心致志地把这个世界建设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这一天将是光明与幸福的,还因为对于那些从来不曾注意周围人类生活的世界的人们来说,这一天将唤醒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与它的关系;这一天将在他们面前展现出在他们自己偏狭的同情与估价中天性被扭曲的情形;这种扭曲一旦开始,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就会像降落到最低层的堕落一样显著,然而又同样自然,可是这样一天的曙光始终没有照射到董贝先生和妻子身上;他们各走各的道路。²

156 那个揭开屋顶的有力而仁慈的手,展露出产自冷漠和忽视的幽灵;那个使空气变得洁净的手,让人们能够看到和认可彼此,克服有违人性的冷酷;那是小说家的手;那是狄更斯看待自己的方式。重要的是,这出现在对城市的描写中,在《董贝父子》的第四十七章。通过笼罩城市的浓厚黑云的意象,他在描写一个冷漠的,“不自然”的社会产生的人性和道德后果。这是一个他反复使用的意象:那种使我们无法看清彼此,看清我们和我们的行为、我们自己以及他人之间的关系的晦涩、黑暗和浓雾。

这正是狄更斯独创性的另一个方面。他能够把普通的观察无法看到的社会体制和后果戏剧性地表现出来。他使用和展示它们,好像它们是人或自然现象一般。有时以黑云或浓雾的形式出现,人们在其中摸索着寻找彼此。有时以“迂回事务所”或“滴血之心场院”的形象出现,在那些地方一种生活方式具有了物质外形。有时它们又以人物的形式出现,就像《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沙尔斯,当然还有“远大前程”。通过这些方式,法律、民事服务、股票交

2 译文出自《董贝父子》,吴辉译,译林出版社,1991,463页。——译者注

易、信贷公司、贸易公司作为“非人化”的力量——异化的人类力量——被表现了出来。

这种观察方式与他给笔下人物所起的具有道德含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葛拙硬、麦克抽克姆恰尔德、墨斗。³但它也以一种不那么明显的方式同一种观察方法联系在一起，这种方式仍然属于城市：人们或许会说，这是一种感觉，也即城市中最醒目的居民是建筑物，而在建筑物的外形和模样与居于其中的人们的外形和模样之间既存在联系，也发生混淆。

例如《小杜丽》中的这一段话：

那庄严的宅第：坎汶迪希广场哈莱大街上的莫多尔大宅之上的阴影，并非大墙的阴影，那阴影是隔街相望的别的庄严宅第的正面投下的。哈莱大街上隔街相望的两排房屋，与无可挑剔的上流社会一样，都板着脸儿，怒目瞠视。在这一点上，大致及身居宅内的人也真那么相像，以致常见两排大宅里的人在餐桌前就座是相向而坐的，却在各自的傲慢气氛中，表现出房屋的那种毫无生气的表情，注视着大街的对面。

忠于这条大街的餐桌前的两排人，与这条大街有多么像，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毫无表情、千篇一律的二十座房屋，都须用同样的方式去叩门、拉铃，都有同样呆板的台阶相接，都有同一式样的栏杆围困，都砌着同样不实用的太平梯，太平梯顶上又都是同样妨碍手脚的固定物，而这一件件都须无一例外地给予高度的评价——谁人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过餐？面目凄然、年久失修的房屋，间或可见的凸窗，外墙涂了石灰的房屋，正面新装修的房屋，只有长方的房间的街角房屋，百叶窗放下的房屋，矮门常拉起来的房屋，收税人念头一闪，来登门拜访、却不见有人在家的房屋——谁人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过餐？谁也不愿要、因而贱卖脱手的房屋——谁人不认识？一位失望的绅士终身占有的房屋，外表虽好，却一点也不适合他居住——谁人不知道那种

157

3 葛拙硬 (Gradgrind)，《艰难时世》中的人物，意思是只讲实惠，把生活看作现金买卖关系的人。麦克抽克姆恰尔德 (McChoakumchild) 意思是使儿童窒息，墨斗 (Merdle) 则听起来像谋杀。——译者注

幽灵出没的房屋?⁴

这是一段正式的描写,自始至终把房屋同人进行类比,最终开起玩笑来。但这种描写在许多地区性描写中又重复出现,那里的房屋和居住在里面的人们之间没有区别(下面的例子还是选自《小杜丽》):

城中那座孱弱的老屋,披着烟灰的外衣,将整个身子都靠在也显出颓败模样,与房屋一起败落的支架上,它从来不曾有过健康与快活的石油,对于降临头上的一切听之任之。倘若太阳有照到它的时候,那也只不过是一道光线而已,而且那光线不上半个小时也就消失了,倘若月光有照到它的时候,那也只不过是在它那怜悯的外衣上投下几处斑痕而已,使它显出愈加悲惨的模样来。那些星星,毫无疑问,在夜色清晰、烟雾消散的时候,冷漠地瞅着它;而一切恶劣的天气则以难得的忠诚伴随着它。当别处的雨、冰雹、霜冻、消融都已过尽,而这一处阴沉的院子里,雨、冰雹、霜冻、消融都毫无例外地迟迟不肯结束;至于积雪,在它早已从黄变成了黑之后,你在几个星期里仍然可以在那里见到,积雪淌着肮脏的泪水,苟延残喘。这一处地方并没有别的信徒追随。至于街上的喧嚷声,巷内马车车轮的辘辘,只有在马车经过门口时一闪而入,又一闪而出:让侧耳倾听的艾弗莉太太感到她仿佛是个聋子,由于那突然的响声的出现让她又恢复了听觉。口哨声、歌声、谈话声、笑声,以及一切人声笑语,也都有这种情形。这些声音瞬息之间过了缺口,又继续朝前响将过去。⁵

或者再如:

已经是夏季天气了,一个昏暗、炎热、灰蒙蒙的傍晚。他们乘了马

4 《小杜丽》,金绍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338页。——译者注

5 同上书,247页。——译者注

车,到了牛津街的中心地段,在那里跳下马车,一头扎进了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大街是忧郁庄严的气派,小巷也竭力装出庄严的气派,而到头来反显得更加忧郁。在公园巷附近,街巷纵横交错,宛若迷宫。杂乱无章的街角房屋,在暮色中蹙起了眉头。这些房屋,有异邦格调的古老门廊与附属建筑,带着某个倒行逆施的时代、在某个倒行逆施的人统治下产生的恐怖气氛,仍然要人们世世代代盲目赞叹,并决然照此办理,直至房屋倒塌。依附着小住宅,整个屋架给人以压抑感,从满是马房的小山看去,更是如此,⁶从而使黄昏显得阴郁。摇摇欲坠的住宅,其式样无疑是时髦的,然而谁住了都不舒服,只能关注阴湿的气味而已,看那模样,这些宅第似乎是高楼大宅近亲繁殖的恶劣后果。这些住宅后加的小弓形凸窗与阳台都用细铁柱撑着,仿佛淋巴结核病人支了两根拐棍。到处都可看到门前挂的丧徽,包含了纹章学的全部学问,阴沉地面对着街路,仿佛一个大主教在讲解人世之浮华。商店极少见,虽有也不显眼;因为舆论根本不起作用。

158

这种手法非常独特。当然,它是以语言的某些特点为基础的:对人和物之间的联系感知。但在狄更斯这里却非常关键。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观看和展示的方法。城市被同时展示为一种社会现实和一种人文景观。在其中被戏剧化展示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结构。因此他能够对流动性商业生活的缤纷喧闹做出热烈的反应:

董贝先生的营业所的办公室是在一个院子里;院子的角落里很久以

6 “依附……”这一句在本书中的原文是“Parasite little tenements, with the cramp in their whole frame, from the dwarf-hills in the mews, made the evening doleful”,意思有些说不通。估计是本书作者引文估计有误。此句译文为本书译者自译。在常见版本中,这一句的原文是“Parasite little tenements, with the cramp in their whole frame, from the dwarf hall-door on the giant model of His Grace's in the Square to the squeezed window of the boudoir commanding the dunghills in the Mews, made the evening doleful.”,金绍禹的译文是“依附着的小住宅,整个屋架给人以压抑感,从仿照广场的主教大人宅第高大门厅的矮小的门,直至俯视马房街马粪堆狭窄的窗,无不如此,从而使黄昏显得阴郁。”同上,448页。——译者注

来就设有一个出卖精选水果的货摊；男女行商在院子里向顾客兜售拖鞋、笔记本、海绵、狗的颈圈、温莎肥皂；有时还出售一条猎狗（它能用鼻尖指示猎获物所在处）或一幅油画。指示猎物的猎狗经常在那里出现，是考虑到证券交易所的人们可能对它会有兴趣，因为证券交易所里对运动的爱好很时兴（通常最早是从对新奇事物的打赌开始的）。⁷

典型的是，当董贝先生来到的时候，没有人向他兜售这些商品。他所从事的行业在他的房子——他的“家庭－部门”——上反映了出来。这种行业以更冷酷、更稳定和更超然的方式运营；于是伦敦的另一个方面就被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董贝先生的公馆是一栋宏伟的房屋，坐落在一条阴暗的、非常优雅的街道的背阴的一面，这条街道位于波特兰十字路口和布赖恩广场之间的地区内，两旁矗立着高大的房屋。这是一栋在街道拐角上的房子，里面十分宽敞，其中还包括一些地窖，装了铁条的窗子向它们皱着眉头，眼睛歪斜的、通向垃圾箱的门向它们斜眼瞅着。这是一栋阴暗沉闷的房屋，后背是圆形的，房屋里有一整套客厅；客厅前面是一个铺了石子的庭院，庭院里有两株干枯的树，树干和树枝都已发黑，发出了格格的、而不是飒飒的响声，因为树叶都已被烟熏枯了。夏天的太阳只有在上午吃早饭的时候才照射到这条街上，那时候运水车、卖旧衣的商人、卖天竺葵的小贩、修雨伞的人、还有一边走一边使荷兰钟的小铃儿发出叮叮当当响声的人也随着太阳来到这里。太阳很快就消失，这一天不再回来，随后而来的是乐队和潘趣木偶戏。在这之后，人们只能听听风琴的极为沉闷的声音和看看白耗子的表演——有时还有一只豪猪来演杂技，以便变换一下娱乐的兴趣，到了薄暮的时候，男管家们（他们家里的人到外面吃饭去了）开始站在门口，点街灯的人试图用煤气来照亮这条街道，但每夜

159

7 《董贝父子》，134 页。——译者注

都没有成功。公馆里面和外面一样单调无趣。⁸

阴暗的建筑物和热闹的道路之间的对比非常清晰地表现了出来。房屋的特点和人的特点再一次被有意识地进行了互换：

装了铁条的窗子向它们皱着眉头，眼睛歪斜的门向它们斜眼瞅着。

这种细节置换可以延伸为一种看待城市的方式，也即将它看作具有破坏力的动物，一个怪物，完全超出了单个人的范畴：

每逢这样的时刻，她总时常怜悯地望着那些旅客沿着她房屋旁边那条公路艰辛地向伦敦走去；他们的脚已经走痛了，身子已经走累了，正恐惧地望着前面宏伟的城市，仿佛预感到他们在那里的悲惨境遇将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或海滩上的一粒沙；他们在狂风暴雨面前心怯胆寒地收缩着身子，看来仿佛大自然也把他们抛弃了似的。一天又一天，这些旅客无力地、迟缓地拖着脚步，不过她觉得总是朝着一个方向——朝着城市的方向走去。似乎有一股猛烈的魔力把他们推进这座无限广大的城市之中的某个部分一样，他们被它吞没了，再也没有回来。他们成为医院、墓地、监狱、河流、热病、疯狂、恶习和死亡的食物——他们向着在远方吼叫的怪物走去，然后消失了。⁹

这是一种看待它的方式：自外面展开的修辞性的整体视界。但是狄更斯甚至以更为确定的方式开始描写街道本身：描写街道的那一现实，也即陌生人的群体，这在今天对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在布莱克和华兹华斯看来却是怪异的和危险的。当弗洛伦斯·董贝逃离她父亲的黑房子时，狄更斯在一种新的情况范畴内重新建立并扩展了这一经验：

⁸ 《董贝父子》，28页。——译者注

⁹ 同上书，345页。——译者注

长街的林荫路景被晨曦抹上一层光泽,令人赏心悦目;蓝色的天空中飘浮着几朵轻轻的白云;白天战胜黑夜之后,精神抖擞,生气勃勃,脸上泛上一片红晕;但这一切在她破碎的心中却唤不起任何反应的感情。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任何地方都可以,只要能把她隐藏起来就行!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任何地方都可以,只要能找到一个避身之处,永远也不再去看到她逃出来的地方就行!

160

可是街道上行人来来往往,商店开着门,仆人们出现在房屋的门口,人们为日常生活与工作奔忙而引起的纷争与喧嚣正在逐渐增加。弗洛伦斯看到从她身旁匆匆走过的脸上露出了惊异与好奇的表情,看到长长的影子怎样又返回到人行道上;她听到陌生的声音在问她,她到哪里去,发生了什么事;虽然这些情况最初使她更加惊恐,促使她加快步子,更加急忙地往前跑去,可是它们却同时使她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冷静,并提醒她必须更加泰然自若,这对她是有好处的。

到哪里去?仍然是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任何地方都可以!仍然是一直往前走。可是走到哪里去呢?她想起她在唯一的另一次,曾经在这宽阔茫茫的伦敦迷了路——虽然并不是像现在这样迷了路——于是就沿着那条路走去。¹⁰

伦敦的这条街道被以非常独特的方式进行了观察。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地方,本身并不可怕,但综合效果却使它具有了“空旷荒凉”的感觉。这个地方同她的“禁闭房子”一样很难与之产生联系。但是另一个意思被表达了出来:一种物质效果(也是一种社会现实)被观察到了:狄更斯试图获得承认和善意的努力正是针对这一社会现实而做出来的:

为日常生活与工作奔忙而引起的纷争与喧嚣正在逐渐增加。

10 《董贝父子》,476页。——译者注

她唯一能找到的伴侣就是她的狗,她同它一起走:

弗洛伦斯跟这个最后的追随者一起,在早晨时间的流逝中,在逐渐热起来的阳光中,向着伦敦城赶紧走去。不久,喧嚣声更响了,行人更多了,商店更忙碌了,直到后来,朝着这个方向流去的生活的溪流载着她向前流去,它像和它并排流动的宽阔的大河一样漠不关心地流过商业中心地带,流过大厦,流过监狱,流过教堂、流过市集,流过财富,流过贫困,流过善与恶;它曾经梦到过芦苇、杨柳与青苔,这时它从这些梦中醒过来,在人们的工作中与忧虑中,混浊不清、起伏不平地滚滚流向深海。¹¹

这里强调的不仅仅是喧嚣和日常事务;不仅仅是驳杂性——“监狱、教堂”;但贯穿所有这些之中的,是一种并非有意为之的普遍意义上的冷漠:

并排流动的宽阔的大河一样漠不关心地流过……

同样的,这仍然和具体的行为或人物无关。这是一种普遍现象——生活的大河,生活的方式。这正是《小杜丽》中阿瑟·克莱南姆和他的妻子在痛苦地理解了一种不稳定的,但仍然是神圣的人际联系后,进入其中的生活的大河:

他们默默地走下去,来到了喧嚷的大街,难舍难分,无比幸福;他们在阳光下,在树荫里,朝前走着的时候,吵吵嚷嚷的人和心情急切的人, 161
不可一世的人、刚愎自用的人、虚荣浮夸的人,又烦恼,又焦灼,发出了通常的喧闹声。¹²

在“喧闹的街道上”,个人的道德品质仍然被清晰地看到和听到。这是在意识方面的一个进步,它作为虚构创作方式的一个变化直接产生了。

¹¹ 《董贝父子》,476—477页。——译者注

¹² 《小杜丽》,金绍禹译,1149页。——译者注

因为我们不能把这一观点只同描写——充满活力的描写——联系起来，还要同用物质名词戏剧化表现一个社会的和道德的世界的能力联系起来。在狄更斯那里，物质世界从来都不会和人无关。这也是为什么他赋予物质世界的形状如此重要。

在这一点上，狄更斯的方法确切无疑地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紧密相关。正是通过那种在我们总结为工业革命的过程中改造世界的能力，人类终于要面对这一选择危机；关于充当物质创作的基础的人类形态的危机。在一个极端的例子中，狄更斯以喜剧的方式看待这一危机：

土地创造出来是为了给董贝父子去经营商业的；太阳与月亮创造出来是为了给他们亮光。河流与海洋是为了运载他们的商船而形成的；彩虹向他们预示良好的气候；刮风对他们的企业有利或不利；星星和行星沿着轨道运行，是为了保存一个以他们为中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体系。¹³

这是对一种熟悉的商业信心的嘲讽，但也绝非无动于衷。这其实是看待那种强加的制度，那种被赋予了中心地位的制度的方式。确切地说，它被其他类型的物质生活和信心（人们在其中创造他们自己的世界，带着它们穿过喧嚣和拥挤的人群）所限定。并不只是说那种力量是不明确的——那种创造新世界的力量。这里还存在一种选择：对新的社会和物质环境的人类形态的选择。或者说，如果我们看到在这个发生史无前例的变化的时代中，人们在物质和道德上都发生了什么的话，就会有一种选择——我们可以进行选择：

这个时期发生了大地震，第一次震动就把整个地区都震裂了，一直达到它的中心。到处都可以看到地震留下的痕迹。房屋倒塌了，街道完全裂开和堵塞了，地底下被挖掘成深深的凹坑和沟渠，大堆大堆的泥土高高堆积，建筑物由于基础遭到破坏，动摇不牢，正用大根的木头支撑

13 《董贝父子》，13 页。——译者注

着。这里，翻倒在地、杂乱一团的大车横七竖八地躺在一座峻峭的非自然的小山底下；那里，珍贵的铁器毫无条理地浸泡在偶然形成的池塘中，腐蚀生锈。到处是不通向任何地方的桥梁，完全不能通行的大路，失去一半高度、像巴别塔一样的烟囱，在最意想不到的场所临时搭建的木房子和围栏，破烂的住房的骨架，未建成的墙和拱门的断片，一堆堆的脚手架，杂乱无章的砖块，巨人般的起重机以及跨立在空处的三脚架。这里有十几万个没有完成的形状和实体，散乱地混杂在一起，上下倒立，深埋在地下，高耸在空中，腐烂在水里，像梦一样地难以理解。地震通常的伴随物——温泉和火焰喷发，对整个场景增添上一份混乱。在颓垣断壁之内，沸腾的水上下滚动，发出了嘶嘶的声音，从那里也发出了火焰的闪耀与怒号；山丘般的灰烬堵塞了来往通道，而且完全改变了本地的法律与风俗。

简单地说，尚未竣工、尚未通车的铁路正在修建中，它从极端杂乱的中心，沿着它的文明与进步的宏伟路线，平静地、慢慢地向远处延伸。¹⁴

这是对直接的骚乱的忧惧，但狄更斯接着又看到了最终更为重要的东西：不是变化造成的无序，而是从无序中被制造出来的新的秩序：

古老、破烂的凉亭从前曾经所在的地方，如今宫殿耸立，显露峥嵘；围长粗大的花岗石柱子的路展开一片路景，通向外面的铁路世界。往昔堆积垃圾的污秽的荒地已经被吞没和消失了，过去霉臭难闻的场所现在出现了一排排堆满了贵重货物与高价商品的货栈。先前冷僻清静的街道，如今行人熙来攘往，各种车辆川流不息。原先在泥泞与车辙中令人灰心丧气、中断通行的地方，现在新的街道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城镇，生产着各种有益于身心、使生活舒适方便的物品与设施，在这些物品与设施没有出现之前，一般的人们从没有进行过这种尝试或产生过这种念头的。原先不通向任何地方的桥梁，如今通向别墅、花园、教堂和有益于健康的公

14 《董贝父子》，59页。——译者注

共散步场。房屋骨架和新的通道的初期预制品正装在火车这个怪物内，飞速地运往郊外¹⁵。

至于附近的居民，他们在铁路最初蜿蜒伸展的日子中还打不定主意是否承认它；后来像任何一位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表现的那样，变得聪明起来，幡然悔悟，现在都在夸耀这位强大、兴隆的亲戚。布店里织物上印有铁路图案，卖报人的橱窗中陈列着铁路杂志。这里有铁路旅馆，铁路办公楼，铁路公寓，铁路寄宿处；有铁路平面图，铁路地图，铁路风景画，铁路包装纸，铁路酒瓶，铁路三明治包装匣和铁路时刻表；有铁路出租马车和铁路出租马车停车处；有铁路公共汽车，铁路街道和铁路大楼；有铁路食客；铁路寄生虫和数不胜数的铁路马屁精。甚至还有钟表那样准的铁路时间，仿佛太阳它自己已经认输让步了似的。在被铁路征服的人们中间，有清扫烟囱的工长，这在过去在斯塔格斯花园中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如今他住在一座墙上灰泥的三层楼房中，在一块油漆招牌上用金色的花体字书写广告，自称是用机器清扫铁路烟囱的承包人了。

滚滚翻腾的洪流像它的生命的血液一样，日日夜夜永不停息地流向这个变化巨大的心脏，又从这个心脏返流回去。成群结队的人们，如山似海的货物，每昼夜二十四小时几十次运出运进，在这个活动不息的地方起着发酵般的作用。甚至连房屋也好像喜欢给打包起来，外出旅行似的。奇妙绝伦的议员们二十年前对工程师们异想天开的铁路理论还曾冷嘲热讽，盘问时百般阻挠，现在却戴着手表乘车到北方去，事先还发出电报通知他们即将到达。所向无敌的机车日日夜夜在远方隆隆地前进，或者平稳地开向旅程终点，像驯服的龙一般滑向指定的、精确度按英寸计算的角落，站立在那里，吐着白沫，颤抖着，使墙壁都震动起来，仿佛它们充满了至今还没有被发现的巨大力量的知识以及至今还没有被达到的伟大目标似的。¹⁶

15 “郊外”一词在原文中为“country”，即“乡村”的意思，在《董贝父子》原文中，译作“郊外”也无不可。——译者注

16 《董贝父子》，165—166页。——译者注

这种感觉的复杂性体现了洞察力的真正复杂性。对力量——工业革命的新力量——的自豪通过语言被感知：通过铁路进行的流通是“生命之血”。但是，这种力量对所有其他人类习惯和目标的践踏也得到了承认。后来，下面的段落证实了这一点：

一股力量迫使它在铁路——它自己的道路——上疾驰，它藐视其他一切道路和小径，冲破每一个障碍，拉着各种阶级、年龄和地位的人群和生物，向前奔驰。¹⁷

铁路既是“生命之血”，也是“胜利的妖怪，死亡”。在这一戏剧化的表现中，狄更斯对他所处时代的新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的真正矛盾做出了反应——主宰生或死的力量；导致瓦解、秩序和假秩序的力量。他所关心的总是如何在这些史无前例的变化中，在已面目全非的风景之中，保持人类的认识和人类的良善。

甚至连房屋也好像喜欢给打包起来，外出旅行似的。¹⁸

这就是正在改变小说的那种流动性，社会流动性。它也是人和物之间已经改变了的关系，彻底改变了的关系，城市就是这种变化的最明显的社会和视觉体现。正如他看待铁路一样，狄更斯把城市看作一种新的流动性造成的既令人兴奋，又具有威胁的后果。城市不仅作为一种异化的和冷漠的体制，而且作为未知的，或许也是不可知的如此多的生命的总和，这些生命在推挤、碰撞、瓦解、调整、认可、停留，再向新的空间移动着。正是由于此，狄更斯来到了这种变化中的社会经历的中心，活力的中心。

164

17 《董贝父子》，208 页。——译者注

18 同上书，166 页。——译者注

16 可知的社群

165

在某种意义上,多数小说都是可知的社群。小说家通过基本可知的和可传达的方式来展示人们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传统方法——一种根本的姿态和途径——的一部分。对于狄更斯而言,城市经验中有如此多的重要东西,甚至是决定性的东西不能只是被知晓或只是被传达,而是正如我刚才说的,必须被展示出来,被强迫进入意识。而只有当我们看到这一点时,狄更斯的全部才华才能够被真正体会。因此,在有关城市的虚构文学和有关乡村的虚构文学之间建立起比照是可能的。在有关城市的虚构文学中,经验和社群基本上是不透明的;而在有关乡村的虚构文学中,则基本上是透明的。作为首要的思考方法,这种比照有一定的用处。例如,当典型的社会组织的规模和复杂性增加时,作为一种感觉和一种评价,身份和社群无疑变得更成问题。到此为止,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化——从一个显著的农业社会向一个显著的城市社会的转化——都是变革性的,并且意义深远。市镇,尤其是城市以及一个大城市的成长;劳动分工和劳动复杂性的增加;社会各阶级之间以及内部改变了的重要关系;在类似这样的变化中,任何对可知社群——一个完整的社群,完全可知——的假设都变得越来越难以成立。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在体会城市的新情况时,我们仍然必须非常小心,不要美化乡村的旧的和新的情况。这还是主体,也即观察者的一个功能——什么是想要的和什么是需要被知道的。因此,同以前一样,在乡村写作中,我们需要看到的不仅仅是乡村社群的现实;还要看到观察者在其中的位置及其态度;这也是那个被探索的社群的一部分。

因此,人们仍然经常说,在城市和大城市经验的压力下,作为一种直接的,甚至是传统的对比,乡村社群(最典型的是一个村庄)是直接关系——也即面对面的接触,在其中我们能找到并判断人际关系的实质——的缩影。乡

村的这种与城市或郊区的明显差别的确很重要；乡村在规模上比较小；在乡村人们更容易识别，也更容易联系；社群的结构在许多方面都更为清晰。但是，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在乡村生活中，一个可知的社群仍然是种意识问题，有关不间断的、日常的经验的问题。在村庄里和在城市里一样，存在着劳动分工，存在着社会地位的对比，于是就必然有不同的视角。在19世纪的乡村小说中，我们必须转向的正是这些视角，因为虽然乡村和城市间的对比很富有戏剧性，也很重要，但乡村生活和乡村写作内部的复杂变化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和意义深远的。

让我们暂时回顾一下简·奥斯丁的可知的社群。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面对面的社会；它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危机都是以下列方式体现出来的：眼神、手势、凝视、面对面的冲突；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小说家一直都在注视着，观察着，实实在在把它们记录下来并进行反思。这就是整个姿态——她的道德观念的基础。然而，虽然在小说的基本词语中，这是一个完全知晓的社群，但作为一个真实的社群，它却是经过极其精心挑选的。在简·奥斯丁的笔下，邻居并不是真正住附近的人们；他们是些住得不那么近的，在社会身份上可以进行拜访的人。奥斯丁通过眺望土地看到的是一个由有产家庭组成的网络，而通过这一严密描画的社会网络的网眼，多数真实的人是根本不会被看到的。在这个世界上面对面，就已经是在一个阶级的范围之内了。没有任何其他社群是可知的，不论是在物质呈现或社会现实方面。此外，不仅仅是多数其他人在一种和本·琼森一般明确的风格化的传统中消失了。乡村世界的大部分也消失了，而只有在与那些充当小说真正情节成分的人家产生联系时，它们才变得真实起来；因为真正的乡村就是天气或者一处用来散步的地方。

从简·奥斯丁到乔治·艾略特，在这两人之间追寻道德分析的延续性是很合适的，但我们只有承认在这一文学发展中还发生了别的什么事情时，才能够聪明地做到这一点。发生的事情是：后者开始承认那些必须被赋予道德强调的其他类型的人们，其他类型的乡村和其他类型的行为。因为正如简·奥斯丁和克雷布之间的区别不是“贫困勤劳的当地人”的历史性到来，而是文学方向上的一种变化使得这些人突然能够被看到一样，简·奥斯丁和乔治·

艾略特的区别,以及她们和托马斯·哈代的区别也并非传统乡村秩序的突然解体,而是文学方向上的另一个变化,这一变化将之前一直被排斥在外或模糊不清的乡村混乱带入了人们的视野。

167

因此,《亚当·比德》的背景被乔治·艾略特设置在简·奥斯丁的时代:18和19世纪之交。当然她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主要并不是因为乡村已经变化了,而是因为已经出现了一种不同的社会传统可供她使用。

《亚当·比德》的雏形来源于我那卫理公会教派的婶婶塞缪尔给我讲的一件轶事……一件她亲身经历过的轶事……。后来我开始考虑把这同婶婶别的一些回忆糅合成一个故事,有些地方再加入了一些我父亲早年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点。¹

有产者的房子仍然在那里,为邓尼桑家所有。但我们也看到他们如今在为钱工作,在同他们的佃户打交道:

“这老房子多漂亮啊!”邓尼桑先生说着,很羡慕似的四处张望。他的话,不管是甜蜜的还是恶毒的,说的时候总是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彬彬有礼。“你打扫得干净极了,勃艾色太太。我很喜欢这座房子,你知道,我这份领地上没有哪一座房子这样叫我喜欢。”²

我们之前也曾遇到过这种“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彬彬有礼”的说话方式,但现在却不是相对平等的人之间如此谈话,正如老地主的观看方式现在并不只是性格的一个方面一样,而是性格在一种精确的和主导性的社会关系中体现出的一个方面。正如勃艾色太太所言,“那情形好像你是一只昆虫,它正要用指甲在你身上点一下似的”。

邓尼桑文质彬彬提出的建议实际上是为了庄园的方便而重新组织租

1 George Eliot's *Life*; ed. J. W. Cross; Edinburgh and London, 1885; 254.

2 译文和人名出自《亚当·比德》,张毕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425页。——译者注

赁,这将夺走勃艾色家的玉米地;邓尼桑同时还威胁到,他提及的新邻居“是个颇有些资本的人。他一定高兴两个农庄都租佃,两个农庄连成一气,经营起来方便得多,不过,像你这样一个老租客,我不愿意退租。”

这并不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事件,但它允许那些一直都存在的,而现在被从一种变化了的视角看到了的日常经验进入故事,这很关键。于是,彬彬有礼的改良必须以经济力量的残酷事实为对比衬托,一种不同的道德强调已经不可避免了。而这又得到了扩展。年轻的地主急切地想要改良田产——正如佃户们看到的,“那时候,一定新开许多水闸口,并且长年开放,一定还给石灰津贴,利息也只要一分”³。他让亚当·比德当他的林木管理人。但也正是以本质上是同样的热情,他选中了赫蒂·沙吕尔作他的女人并成功地毁掉了她。利用人们来给自己提供方便,这是性格——对此的强调并没有减弱——的一个方面,但这也是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一个方面。于是,正如乔治·艾略特充满讽刺地说道:

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我们竟像追究一位机要秘书的品德那样采取追根究底的分析态度,那一定是很荒唐的。对于一位又有身份又有财富的青年,我们得用一些圆滑含混笼统统温文尔雅的属性形容词去形容他。⁴

168

的确,简·奥斯丁就非常追根究底,也很有分析能力,但针对的却是一个有限的群体中的人们彼此间的关系。现在的分析不再带有阶级界限了;社会和经济关系必然被视为行为的因素,而且常常是决定性因素。

强调乔治·艾略特小说发展的这一个方面,比强调她以一种纪实的方式把新的社会经验包括进小说要更为重要。看到农民和工匠,甚至劳工凭他们本身的权利被呈现出来,这当然很不错。但这里存在一类非常重要的困难。人们常说,《亚当·比德》中的勃艾色一家,正如《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格

3 《亚当·比德》,100页。——译者注

4 同上书,148页。——译者注

雷格和陶德生⁵一家,刻画得非常出色(或者非常诚挚,非常丰满,非常有魅力)。但这显露的其实是作者社会意识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乔治·艾略特与农民和工匠的联系——她作为玛丽·安·伊文斯的联系——能够在他们的语言中被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她非常典型地主要通过对话来展现他们。但是,虽然他们作为一个社群被有声地展现出来,但他们只有通过出现在重大的行动中才能在性质上发生改变。当亚当或汀娜或赫蒂作为个人行动时,他们所说的话并不特别有说服力。在一部仍以分析个人行为为基础的小说中,农民和工匠能够作为“乡下人”被包含在内,但与那些个人经历的活跃的承载者相比,他们的重要性要小得多。当亚当、汀娜和赫蒂在所谓的个人危机中说话时——或者后来在一个更引人注目的例子中,也即当菲列克斯·霍尔特说话时,我们就被转换至普遍化的态度或宣言的水平上去。换句话说,尽管乔治·艾略特把乡村英国的真正居民回复至他们在那个一直具有社会选择性的风景中的位置上去,她并没有比把他们回复成一种风景走得更远。他们开始说话,集体说话,以中产阶级评论家们仍愚蠢地称为合唱或“民谣元素”方式说话。但他们作为自己,仍然只是在社会意义上在场,只有通过外部规范好的态度和观点才能呈现为个人意识。

我不会以尖刻的方式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困难很大。这是当乔治·艾略特开始写作并发展小说时,小说的形式本身存在的矛盾,也即对行为的道德强调——因此也是对统一的叙述和分析语气的技术策略的强调——必定无法与任何在其中道德意义已被扩展至实质性的和矛盾性的社会关系上去的社会——也即小说中的“可知的社群”——保持一致。我们不愿意失去勃艾色一家、葛莱格一家和陶德生一家,但我们却能够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以这种方式进行谈论,而小说的情感取向则是偏向于隔离开的个人的。正如在简·奥斯丁笔下那样,可知的社群可以是具有社会选择性的;因此它在完整的社会指涉上缺少的东西,就能通过充分使用现成的统一性语言来获得。然而,我们只需读一本乔治·艾略特小说,就能够看到,以一种发展了的分析性

169

5 译文和人名均出自祝融等译《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上海译文出版社,1957。——译者注

词汇有意识地观察行为的人,和那些被呈现为以传统方式生活和说话的人们是多么难以在同一形式中共存;因为不是细致观察的精确性,而是那种包容性的,在社会意义上迷人、散漫并具有重复性的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小说的结构上有一种新的断裂,在小说家必需的语言和许多人物被记录下来的语言之间的一种明显的断裂。

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一个有关事实的问题。真实的农民和工匠的意识同简·奥斯丁世界中地位稳固、具有操控力的地主们一样强烈和完善;而且这些人们也被展示为具有包容性,在社会意义上迷人、散漫并具有重复性;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普通的说话方式。但是,简·奥斯丁的说话习惯是同她的角色的说话习惯相联系的,在乔治·艾略特那里两者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而小说家自己也深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简·奥斯丁那里,话语、叙述和分析通过一种文学传统联系了起来。虽然“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彬彬有礼”的说话习惯是特殊的教育和这种教育所服务的闲散的、支配性的关系的产物,它也是被美化的和传统化的。小说家的影响力和精确性被毫不迟疑地赋予了她的角色,因为虽然在道德意义上各人之间存在着差异,但人们仍感觉他们是属于同一个世界的。在发生情感危机和冲突时,尤其如此。是小说家在为了她的群体而讲述一种个人经历,赋予该群体一种说话习惯。但是很清楚,乔治·艾略特并没有以这种方式同任何人在一起:对冲突,对阶级的存在以及对情感和语言的分割和对比的确认,使得统一的语言习惯成为可能。乔治·艾略特把她自己的意识(常常伪装成一种个人方言)赋予那些她真正同情的角色;但角色扮演造成的张力通常非常明显——在亚当、丹尼尔、麦琪或非列克斯·霍尔特身上。对其余的人她给予了一种泛化的感情,这种感情可以被延伸为一种泛化的清晰(可以把勃艾色一家与葛莱格一家和陶德生一家进行比较),但却无法延伸为对产自一个共同源头的单个生命的认可;相反,正如那种愚蠢的赞扬方式所说的,这些人物很“完美”。因为在乔治·艾略特那里,常有这么一个时刻,也即小说家意识到她所描写的人物和她可能的读者“不一样”;于是她主动去了解他们,使他们以一种非常不真实的,但在社会意义上却非常成功的方式变得“可知”。有鉴于她

自己的困难,她创作出那种如今已经在英国小说写作中变得如此自负强大的公式来:“善良的老人”,“亲爱的老人”,谈吐有趣,诚实生活的乡村人物。虽然她非常迅速地观察到经济权力的恩赐姿态——“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彬彬有礼”地进行残酷的操控——她仍然不由自主地采取了另一种恩赐态度:因为她在整体上敬重(当然有可信的理由)的人,以单个的身份却无法获得她足够的敬重,除非她通过替代,将自己的部分意识赋予他们。因此就出现了被非常别扭地混合在一起的三种说话方式:完全分析性的,而且常具有讽刺性的权力;这与不安的强烈情感或道德立场之间的妥协;自觉泛化的、诚实的乡村背景。

对于乔治·艾略特所面对的问题,我能够感受到足够的关联性,使我相信我可以当着她的面指出这些特点来;在某种意义上,我就是当着她的面指出了这些特点,因为她的才智通过一种独特的情感结构持续了下来并产生了联系。几年之前,英国的一个议会评论员把乔治·艾略特、哈代和劳伦斯描述为“我们的三个自学成才者”。这正是对英国文化历史的尖锐的揭示时刻之一。因为所有这三位作家都对学习极为有兴趣,虽然他们自己进行了大量的阅读,他们却并非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他们的父亲一个是郡副司法长官,一个是建筑工人,一个是矿工。乔治·艾略特在学校里一直待到十六岁,她离开学校也只是因为母亲去世了。哈代也在多尔切斯特中学待到相同的年纪,然后以建筑师的身份完成了他的职业训练。劳伦斯在诺丁汉中学上到六年级,中间隔了一段时间后进入诺丁汉大学。不仅按照当时的标准他们的教育程度算是高的,就是在现在,他们也绝对要比五分之四的人高。

因此,那种称他们为“自学者”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只与一个事实有关:也即他们三人没有一个上过寄宿学校和牛津剑桥,而寄宿学校和牛津剑桥在世纪末时不仅被视为一种教育,而且被视为教育本身:不沿着那个路线走就等于根本没有“受过教育”。换句话说,总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一或二的人接受过“标准”教育;其他所有的人都被看作“没有受过教育”或“自学成才者”;当然,他们也被认为无知得可笑,或者当他们试图学习时,被认为笨拙、过度积极和狂热。这对英国想象力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但对于我们现在的许多人来说,乔治·艾略特、哈代和劳伦斯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直接同我们自己的教养相关。他们属于一种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比相对现代和刻意排外的公立学校代表的教育路线更为古老,在英国也占据了更为中心的地位。问题在于他们继续以这种方式与后来的时代(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上了牛津或剑桥的时代)产生联系;例如,同我发生联系,我就上了剑桥,现在在那里教书。因为真正成问题的并不是教育,或发展了的智力;如果要问,那么在英国议会或其他地方有多少人能够与乔治·艾略特进行严格的智力比较?这其实是教育——并不是分数或学位,而是发展了的智力的实质——和大多数民众的真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的问題:根据任何标准看,这些民众都不是记录或研究或关注的对象,但他们却是地地道道我们自己的家人。乔治·艾略特是第一个使这一问题变得明显的重要小说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带着一种敬意和一种我们从自己的以及普遍的经验中学到的敌意——家庭的平凡——谈论她的原因。

因此,从新的角度看,有关可知的社群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

在写一部过时的人家的历史的时候,很容易用一种绝不是上等社会里的人所用的强调语气来写,在上等社会里,主义和信仰非但是极端温和的、而且都是预先假定的、只有一些能染上轻松文雅的讽刺色彩的主题才适合。然而上等社会里的人有红葡萄酒和天鹅绒地毯,有接连六个礼拜的宴会,有歌剧和仙境似的舞池;骑着纯种马去解闷,在俱乐部里休息,保持硬布衬裙的整洁,从法拉第那儿得到科学知识,从必须在最好的人家才碰得到的高级牧师那儿得到宗教。他们怎么会有时间和需要去追求信仰和强调语气呢?但是漂浮在具有轻松的讽刺的薄纱似的的翅膀上的上等社会,是一件很昂贵的产品:需要勤劳的人民大众挤在冒着臭气的、发出隆隆震耳声的工厂里,关在矿山里,在熔炉边淌着汗,磨着,敲着,在难免受到碳酸侵蚀的情况下织布,要不然,就是分散在牧羊场上,散布在黏土性的或者白垩质的麦田边的寂寞的房子和茅屋里,在这些田地上,下雨的日子显得特别凄凉。人民大众的生活完全以力量为基础——贫穷所产生的力量,贫穷促使人民进行一切保持上等社会和

轻松的讽刺的必要的活动。⁶

172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这段惊人语句既提出了问题,同时又做出了回答。在乔治·艾略特那里,对匮乏的强调毫无疑问占据了中心位置,而且她以劳动的本来面目来看待劳动,不对城镇和乡村劳力做任何感伤对比。作为阶级感情的强调:这是她所承认和接受的东西。但也必须注意的是,她以自己的讽刺手法来写作;在进行强调时,她是防御性的和不自在的,因此在这一交流结构中,穷人们成了“不时髦的人”。她的口吻是严肃的,但她也敏锐意识到其他一些常是很协调的语气,这既反映了语言的矛盾性,同时也反映了社群的矛盾性。在《亚当·比德》的两个典型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你能够的话,尽管替我们多画天使。画她穿着飘飘然的董色长袍,神光衬着一张粉白的面孔。还可以多替我们画圣母像。画她面容十分温和,正向上仰视,伸开双臂欢迎天福。可是,千万不要强迫我们接受下面这一类审美原则。按照这些审美原则,必须从艺术领域里赶出那些用由于活儿干得过多而变得粗糙的手刨红萝卜的老妇人;赶出那些在阴暗的酒店里度节日的愁容不展的粗汉;赶出那些一辈子跟锄头铁铲打交道、干过世间许多粗糙活儿的人们的拱背和经受多年风雨吹打的粗黑的脸;赶出那些放着铁锅瓦罐,养着毛发蓬松的下等狗儿,挂着一簇簇洋葱的屋子。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普普通通枯燥无味的人很多。这些人完全没有那种诗情画意缠绵悱恻的悲哀。我们应该记住,这些人存在着。记住这一点十分必要……⁷

我在这里表扬老开斯脱,自己觉得理直气壮。要知道,您和我都应该感谢他这一类人。他们那一双粗糙的手给我们不少恩惠。他们的双手很多年以前就跟他们很多年以前勤勤恳恳地耕种的土地结合在一起了。他们一辈子节节省省的,尽可能地充分吃用大地的果实,只接受很

6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361页。

7 《亚当·比德》,214—215页。

少很少的一部分生产物当作自己的劳动报酬。⁸

这些话也是非常严肃的,但在这句——“千万不要强迫我们接受……审美原则”——中,恳求的对象是谁?谁构成了“您和我”这一对组合?谁必须被展示为受到恩惠的?最后,又是谁激发了这种意识,它需要做出“我并不感到羞耻”这样的声明并使用“粗汉”和“经受多年风雨吹打的粗黑的脸”之类的相关语言,而且非常奇怪地融合了有关厨房的温馨记忆、有关运货马车的真相,以及对“那种诗情画意缠绵悱恻的悲哀”的坚定摒弃?

在这样的段落中,以及这些段落所属的小说中,乔治·艾略特比克雷布在《荒村》中走得更远,然而也显得更为扭捏,她在更加不自在地安抚和请求一类占据主导地位的特殊读者。可知的社群正是这种共同的生活,她很乐意以一种必需的强调对之进行记录;但已知的社群又是别的东西——与另一种利益和另一种情感在语言上的不自在接触。

173

对于语言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于行动来说也是正确的。乔治·艾略特扩展了她的小说的情节,把农民、工匠,还有被剥夺了权利的人包括了进来。但是,正如她发现使劳动人民个体化很困难——她借助于一种合唱形式,一种泛化的描写,或者赋予他们她自己笨拙地移植过来的意识——一样,她发现要想构思产生自这些人的生命实质,并能够根据与他们的利益的关系来完成的整体行为也是很困难的。《亚当·比德》最为接近这一点,但它最终却被一种外部的利益所推翻:赫蒂直到路上的最后一刻,在抛弃孩子之前,她一直都是一个主题;但在那一刻之后,她成了一个忏悔和皈依的对象——对苦难的态度。这正是与哈代的《苔丝》之间的重要区别。《苔丝》有力量把主题保持到最后。亚当·比德和迪娜·莫里斯——也可以说他们所代表的自重的劳工和宗教热情的尊严——则在最后变得更为重要。甚至连改过自新的阿瑟也比赫蒂重要,小说家在一个道德行为中抛弃了赫蒂,而这个行为比赫蒂自己迷茫而绝望的弃婴举动更具决定性。

8 《亚当·比德》,656—657页。

然而，她正在写的历史仍然是积极的：发现后天情感压力的持续性。《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就是这一发展和张力的危机。这是一种写自对匮乏的强调之内的行为；但现在这并不是导致普通劳作的匮乏，而是作为人类贫困的匮乏；在小农民，在陶德生一家那小心翼翼、不引人注目的生存仪式中；在吐立弗鲁莽的独立中，这种独立被他所不理解的复杂法律和经济压力所摧毁。正如乔治·爱略特所认为的那样，这些方式没有一种能够实现生命的完整，但也并不存在其他方式；只有想象中的逃避，阅读和历史，然后就是河上旅行这一无意的、暂时的逃避：幻想的安慰。因此，最终所能发生的只能是回到童年和河上去；这种返回释放了情感，不过是以死亡的方式，而不是生命的方式。在社会历史（它一直被视为是决定性的，不过是种狭隘的决定性）中，存在着一种对于不受保护的、孤单的个人的同情，只有这样的个人才被赋予了唯一的有价值的行为，唯一的具有完整人类情感的行为。因此，从一种新的角度看，《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主动的、绝望的孤立变成了一种悲伤的妥协。

因为在接下来的作品中，尽管它们明显变得成熟和克制——准确地说，是一种建立在悲伤的妥协之上的克制；正是作为那种情感而被构建起来的成熟——行为却变得越来越外在于那个普通世界，而在此普通世界中，对匮乏的强调被看作是决定性的。就像被一个孤立的有产阶级的利益造成的重负所压倒一样，后来的作品的正式情节都属于一个不同的社会。《菲列克斯·霍尔特》被设计为围绕对一份产业的继承问题展开，而这是对占据19世纪中产阶级想象的那种典型兴趣的重大妥协。当然，埃丝特最后拒绝了财产；乔治·爱略特的道德强调太具有说教性，太支持自我奋斗和自我实现的生活，以至她不会允许埃丝特接受财产，找到符合时尚的出路。那个靠继承来运作的世界（在其中安全的代价是诡计）的腐败，在特伦索姆太太和杰明的身上得到了强有力的体现。但现在对匮乏的强调被专门用在了菲列克斯·霍尔特的身体上：不受保护的、孤立的、具有潜在流动性的个人身上。这是小说发展的关键历史的组成部分，在其中可知的社群——真正的乡村（后来工业化的）英国的扩展了的和被强调的世界——开始主要作为模棱两可的关系问题为人所知：孤立个人（他们具有一种分裂的归属意识）如何形成自己的道德历史的

问题。

这正是乔治·艾略特后来的小说中的焦虑、不安和分裂的结构之根源（《米德尔马契》是个例外，但重要的是，这又是一部描写单一社群的小说；描写的是决定性历史变化发生之前的一个小镇）。但我们只需将乔治·艾略特和她同时代的人，例如特罗洛普，进行比较，就能看到这种焦虑的重要性。特罗洛普在他的巴塞特郡小说中对继承阴谋，对阶级和利益互动，对幸运的发现和成功的财产婚姻安之若素。他的兴趣完全在于这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完成的。一种平稳的、轻松的叙述口吻，尽量不进行探究分析，就能完成所有要求的東西：一种记录式的观察，一种在社会技术层面做出的解释。把《索恩医生》和《菲列克斯·霍尔特》放在一起读，就不仅会在乔治·艾略特感到焦虑的地方发现特罗洛普的轻松；发现某一层次的兴趣同情节相呼应，而不是费力试图摆脱一种忠实地维持下来的外在复杂性；发现传统的圆满结局，也即财产和幸福可以共存并受到赞扬，而不是一种别扭的、固执的、未加抚慰的屈从。而且非常明显，还会发现这些区别的源头在于一种真实的社会历史。

在《桑恩医生》的开端处，特罗洛普带着他典型的自信宣布他的乡村英国的状态：

那里有碧绿的草地，有麦浪翻滚的麦地，有幽深而又不见阳光的——我们还得补充一下——而且肮脏的巷子，有小路和台阶，有黄褐色结实的教堂，有两边种着山毛榉的大街，路边经常会有都铎时代风格的大宅，经常在乡下举行狩猎活动；人们很有社交风度；人们沾亲带故，且普遍重视这一点。所有这一切都让这里的居民觉得这是一个富饶的福地，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是农业的：这里的物产是农业的，这里的贫穷是农业的，就连这里的娱乐也是农业的。⁹

175

这里，现实主义所达到的幅度不过是种矫情的让步，承认乡间小路很脏。至

9 《索恩医生》，第一章。

于其他部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带有田园装饰的社会结构。农业穷人被轻松地放置在生产和乐趣之间。而只要这种轻松的关系保持下去,就不存在任何后果严重的道德问题来扰乱这个平滑、受欢迎的建构。

人们用“商业”一词来形容英国,但英国还不是一个商业国家,但愿也不要很快变成一个这样的国家。叫它“封建英国”或“具有骑士风度的英国”倒无不可。如果说在开化的西欧有这么一个国家,那里有高雅的先生,土地主是真正的贵族,人们认为这些贵族最优秀、最适合管理管国家、因而把国家托付给他们,这个国家就是英国。

作为对 19 世纪中期英国的描写,这很滑稽;但作为一种不带任何延伸问题来观看它的方式,这却非常完美。这种描写把那些价值视为理所当然,因此能够以一种持续的精确性来研究这个阶级的内在矛盾,尤其是世袭地主家庭同与之相联系的有前途的军官和职业人士之间的关系问题。特罗洛普对如何进入这一阶级感兴趣,他的有关财产继承的情节常常主要就是为此服务,而一旦把地主们作为贵族来描写这一基本幻想被接受了,他就能描写这个过程而不带任何进一步的幻想。乔治·艾略特则相反,她以一种深刻的道德方式质疑财产和人类品质之间真实的和假定的关系。她接受将对财产继承的强调作为中心情节的做法,然后使之变成外在的、矛盾的并且最终是不相关的东西,而她真正的兴趣则转向了孤立无助的个人,这样的个人不是悲伤地妥协,就是必须远走他乡。《菲列克斯·霍尔特》中特伦索姆的土地所发生的事情,或者《丹尼尔·德隆达》中格兰德科特的土地所发生的事情,都不再是决定性的;但是每部小说相当多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这类兴趣的相关问题构建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乔治·艾略特的小说是两种小说形式之间的过渡。前一种形式以一系列的财产继承为结局,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解决和个人成就都处于单一的一个维度上;而后一种形式则扩展了这一维度,使之复杂化并最终崩溃,以单个的人在通过疏离或解脱完成了道德成长后独自离去为结局。这是一种分裂的归属意识;因为对社会问题的解答直至个人危机的终点仍然受到严肃对待,然后,作为个人发展所获得的东西

必须以某种物质上或精神上重生来表现自己——从那个一直被描写为决定性的社会环境中离开,这既是妥协,同时又具有希望。

财产继承情节的纠葛,以及在财产和人类品质之间存在明确的关系的内在假定,其实已经在一部出色的小说中使用过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是以一个完整的情节,而不是个人分析为基础。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很出色,因为它探究了财产继承危机的全部人文价值,却并没有置换那些脱离现实的阶级的外部的和代表性的态度。在暴露的、从事劳作的呼啸山庄和隐蔽的、靠租金生活的画眉山庄之间有一种正式的对比,而两个家庭之间的复杂关系则持续地被呼啸山庄的力量和忍耐力所操控。但是,创新是如此之彻底,以至于继承的社会机制被超越了。把希斯克利夫和凯茜分开的是阶级和财产,而正是由于这些关系的良性改变,下一代人才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人的问题的解决根本不是社会变化造成的。被创造并被坚持的,是一种人性激情和联系,那是继续生活的基础。它不受财产契约的影响,超越了它们,然后在一种熟悉的悲剧强调中幸存下来,并通过死亡而被重新领悟。人性激情和任何现成的社会财产契约之间的悲剧性分裂从一开始就为小说的整个设计和风格所接受。于是情节的复杂变化就被一种单一的情感所支撑,那就是超越。与此相反,乔治·艾略特面对的是一个更为现实的世界,她构思着,但却无法支撑令人满意的社会解决方式;因此,她最终并不是超越,而是以一种悲伤的放弃来结束。作为一种创造性历史,这两种解决方式的每一种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们被乔治·艾略特和艾米莉·勃朗特的重要后继者——托马斯·哈代和 D. H. 劳伦斯所重新使用。

乔治·艾略特在《丹尼尔·德隆达》中的乡村情节发生在威塞克斯。但是,虽然《菲列克斯·霍尔特》中的娄姆郡和斯托内郡是乔治·艾略特的英国,《丹尼尔·德隆达》中的威塞克斯却可能是简·奥斯丁的汉普郡或德比郡:宏伟的和不那么宏伟的宅邸,以及精心挑选出来的“可知的社群”,正如后来又将在亨利·詹姆斯和我们这个世纪的其他“乡村宅邸小说”中那样。《丹尼尔·德隆达》完成于 1876 年,但到那个时候小说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威塞克斯:哈代的乡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一个作家转向另一个作家就是

重复从查顿周边的世界向《亚当·比德》的世界的运动：普通生活的再次呈现，再次被创造，带着它那已知的社群以及它对匮乏的坚定强调。

对于乔治·艾略特而言，写作这部唯一的以她自己的时代为背景的小说，已经显著偏离了她之前作品那完整而且已知的世界。对此她有自己明确的理由。如果决定性的历史是性格的历史和人类冲动在一个无法接受但又不可避免的世界中遭受挫折的历史，她需要做的就是为这种道德的、智性的和理想的历史创造条件。不论从何种真实的意义上讲，在她的身后都存在着进行更广泛评价的历史所需的社会条件。

我相信，这正是探讨乔治·艾略特对往昔，尤其是乡村往昔的重要态度的正确途径。例如，在《亚当·比德》中，她以一种广泛的深情回顾19世纪的最初几年，也即“那些古老的悠闲岁月”，并且总结道：

悠闲现在是消失了！凡是在纺车消失的地方，在驮马消失的地方，在慢吞吞的马车消失的地方，在那些风和日丽的下午把生意一直送到顾客门上来的行商小贩消失的地方，悠闲都消失了。那些聪明的哲学家或许会对您说，蒸汽机的伟大功德就是替人类创造悠闲。千万不要相信他们。蒸汽机只创造了一个真空地带，让热切的思想趁虚一拥而入。如今甚至于“混光阴”也是很热心的。它热心于玩儿，动辄就是坐周游列车呀，跑美术陈列馆呀，看定期出版的文学刊物呀，还有惊心动魄的传奇小说等等，甚至动不动就是设计科学理论，或者用显微镜胡乱地偷看。老悠闲却是与此完全不同的人物。他只读一份报纸，报纸上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社论”。咱们名之曰“邮期”的那种东西，使咱们发生定期的感情冲动。这种苦恼，老悠闲也没有受过。他是一位惯于沉思默想的绅士，身体相当强壮，胃口好极了。他喜欢静观万物，一切假设推向都不会去烦恼他。他不能了解万事万物的所以然，他倒觉得很高兴。因为他宁可去观赏事物本身，本来就不想去追究事物的成因。他主要住在乡间，经常出现在农民的家宅和农场附近。顶喜欢在一排排的果树下漫游。当杏子被早晨的日光晒得暖暖的发出香味的时候，他就跟踪追寻。中午的时候他就在果树底下躲太阳。这时候，熟透了的梨子往往从树上

掉下来,落在他的脚边。他根本没有听说过礼拜天之外还有做礼拜的时候。礼拜天的宣教他也觉得不坏,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宣教的时候要准许他从讲解经句起到祝福为止都有睡觉的自由。他最喜欢下午的礼拜式,因为祈祷时间最短;他公开这么说,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他的背很宽,可以扛一大坛啤酒或葡萄酒。他的良心就有跟这肩膀类似的地方。这颗良心悠然泰然,自得其乐,绝对不会让疑惑和不安以及灵感等等弄得拘泥起小节来。在他看来,生活并不是一件苦差事,倒是一个领千薪不办公的好职位。这种职位的全部任务是:用指数数数袋子里的薪金,吃饭,睡一个无事一身轻的觉。因为他既然每个礼拜天下午都到教堂去做过礼拜,手里就有了特许状了,对不对?

多舒服的老悠闲呀!咱们对他不能苛求,不要拿咱们新时代的标准去要求他。要知道,他是从来不进厄克塞忒会堂的,也从来不去听一个民间的宣教士宣教,也从不读牛津论文集或者衣裳哲学。¹⁰

178

这是对往昔(已经被扩展为一种历史的往昔)的讽刺性思索,但却轻描淡写;一种拟人,使用最简单的虚构技巧,与狄更斯的主动拟人手法有显著不同;也即当代的塑造性力量。古老的悠闲是历史,是一个时代和一段时期;但他的杏树,他的果园,他的私人报纸,他的深紫色胎痣和他口袋里的基尼,标志着他是一个负担得起闲暇的阶级形象,他的闲暇来自于其他人的劳动汗水。这种省略,这种选择,这种特殊的纵容,都是现代乡村怀旧的主要形式的特点。

然而,通过轻描淡写的方法,传递一幅清晰的图画但又时刻准备去修正,去微笑,去更换话题,这种写作方式似乎受到保护,使它不受那些它有效地充当中介并进行压制的情感,包括对匮乏的强调的影响。因为当“古老的悠闲”抚摸他的基尼时,干扰他的不是《时论册集》或《衣裳哲学》,或者报纸,或者科学,而是——但当微笑的回忆继续之时,这又如何能够说出口?——那些就

10 《亚当·比德》,650页。

在这些年被无穷无尽的劳作和饥饿压垮的人们;作为巡夜人的“古老的悠闲”,背上带着贫民字母的“古老的悠闲”,在田间劳动五十年后,作为回报被赶进贫民习艺所的“古老的悠闲”。不过还有另一种悠闲,一种安静的悠闲,在某些童年岁月里,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位父亲正在熟睡,但这却可能在不经意之间,突然变成一个完整的往昔和一种历史诡计。

乔治·艾略特最广泛的乡村回忆——很重要,因为它不是被以炉边之梦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作为有意识的历史阐释——就是《菲列克斯·霍尔特》的前言。它比“古老的悠闲”之梦更具说服力,更真实,但它的整个构成却甚至更为清晰地展示了那种正被放置在乡村身上的情感结构。对草地和灌木篱墙的描写带有观察和记忆的温暖;这正是克莱尔的绿色语言。但是,那个坐在驿站马车车厢之上的旅客(通过他的眼睛我们被引导着去观看)却不仅仅是一个自然诗人。他已经在这些感觉之中混入了一整套社会预想,这很自然。当他看到牧羊人“缓慢懒散地走着”,他通过某种法术知道,牧羊人“除了贫民劳工的事情和坏运气送来的坏天气以及羊腐蹄病外,没有烦恼”。

179

“贫民劳工”会带来什么烦恼?是不是他将变成他们中的一员?这一直都有更能,现在甚至更是如此。或者他们给地方纳税人带来了麻烦?在这一刻的观察中,当静谧的风景“仍然带着不变的沉寂,似乎时间本身都停止不前了”,当“旅行者很容易认为镇子和乡村脉搏跳动不一致”时,却突然出现了合并,也即一种有关“乡村英国人”的类型化描述,他们“有关改革的概念是一种混乱的综合体,包括烧草堆者、行业工会、诺丁汉郡暴乱以及总体上一切召唤自耕农行动的东西”。

那么,当时光停滞,旅行者也许会问,谁是那些被召唤出来面对的自耕农?谁——总是在其他地区——又不顾流放之刑的威胁而烧毁草堆或进行密谋?这些其他人被“乡村英国人”的概念有效地消除了。

箱子上的乘客看得出,这里的人们非常乐观,他们确信原来的英国是最好的国家;如果有什么事实他们没有考虑到的话,那也是一些不值得考虑的事实。这里有干净而又没有工业的小市镇,这里生活富足,贵

族当牧师,贫民救济税很低。¹¹

因此,这不是已知的社群,而是可知的社群:一个通过精心挑选的视角精心挑选出来的社会。低济贫税——那个表示匮乏的指数:它们是种讽刺,还是种安慰?因此当穷人突然出现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强壮的、繁殖力强的贫困状态”出现的——那个词,“繁殖力”,当谈及穷人时乔治·艾略特常常使用该词,仿佛他们是牲畜一般;无论如何他们不是人,而是一种状态,一种“主义”。而“强壮”呢?——无疑,是济贫税让他们变得强壮和肥胖。

于是,这种心甘情愿的幻觉的意义就在突然间显现了出来:是制造业和铁路破坏了这个古老的英国。完整的现代神话变得相当清晰了。

工业城市很大,白天阴沉沉的,晚上又红彤彤的,与周围的农村融在了一起,充满了急迫而躁动的气氛。这里的人们相信,原来的英国并不是最好的。

也就是说,动荡是工业化的产物;通过被这样放置,也即在田园牧歌之后,动荡本身就能够找到位置并在整体上遭到摒弃。因此,这种在马车驭者座上进行观看的视角所带来的是一种政治安慰:这是一种立场,也即承认造成激进主义的一系列原因,但却与古老的乡村秩序那种安稳的满足进行令人欣慰的对比。观察者的社会立场于是就很清楚了:一个完整的现实被容纳进工业地区;一个精心挑选的现实则被放置在了乡村地区。

180

马车吱吱呀呀在工业城市人行道上驶过的时候,这位乘客会看到暴乱的景象、工会集会的场景;十分钟后,他又会到一个农业地区。只是因为附近有一个交易玉米、奶酪和甘草的市场,才让人想起附近就有一个工业城市。该地区有些人银行户头颇有规模,还习惯性地“他们从来

11 *Felix Holt the Radical*: Introduction.

不亲自掺和政治”。

当然;因为在整个情节中,镇子上可见的动荡并没有和乡村地区的整个可知社群进行对比,而是与“有着可观银行存款的人”的状况和视角进行对比。对于古老的乡村生活的心甘情愿的、催人入睡的幻觉现在已经支付了它的政治红利。自然的乡村悠闲同不自然的城市动荡进行对比。“现代世界”在它的苦难,更重要的是它对苦难的抗议中,通过指涉一种失去了的状态(这种状态胜过两者并能够安置两者)而得到了调解:从一片风景和一种精心选择的观察与记忆中被想象出来的状态。

因此,这就是那种我们必须关注的结构,因为它同乔治·艾略特的发展紧密相连。一种评价性社会,也即可知社群的共同状态,完美地属于往昔。在那里,它可以为了一种范围广阔的道德行为而被重新创造。但真正迈出的一步则是从对现存社会的任何完整的反映中退却。价值存在于往昔,作为一种广泛的回溯状态,而在当下则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和私密的情感,个人的道德行为。

这两种结论相结合就变得非常强大;它塑造和培养了整个文学传统。这正是乔治·艾略特的威塞克斯的意义,在她唯一的一部以她自己的真实时代为背景的小说里:人和情境缩减到那些能够(按传统的说法)局限于一种个人道德行为的人和情境上去;其他的东西全都淡出了,正如在那个马车驭者座上观看的视野中大多数乡村人们都淡出了一样;在所有早期那些对匮乏的强调之后,这是对乡村宅邸英国的重新创造,这是一个阶级英国,在其中只有某些历史具有重要性,而且就它而言,孤立的道德观察者的情感——苦涩的、坦诚的情感——可以变得很恰当。她能够心安理得地缩小她的范围,因为广泛的社群,对匮乏的日常强调,被认为已经随着古老的英国消失了。剩下的就只有一套人际关系和智力及道德见识,在一个历史中,这个历史对于所有评价目的来说都已经灾难性地终结了。

181

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利维斯先生(他是这一情感结构最出色的代表作)能够继续勾勒那个伟大的传统,从乔治·艾略特到亨利·詹姆斯。这是从《丹尼尔·德隆达》(当然也被扩展到欧洲大陆,包含了所有地方的观念,例如

德隆达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中的那个乡村宅邸英国向詹姆斯的乡村宅邸英国的明显转变。然而,英国小说的重要发展不是在詹姆斯那里;它出现在同一个威塞克斯,出现在哈代的小说中,一段广泛而不可逃避的历史重又回来了。

17 被遮蔽的乡村

182

回顾 19 世纪早期真正的英国乡村,的确很容易就能看出一种旧式的生活方式被新兴工业体系发展的喧嚣所遮蔽。工业和金融的总体发展和贸易危机是国家经济中的决定性力量。在某些方面,英国乡村成了承受最终冲击、付出最终代价的地方。但这并不是因为农业作为一种可孤立的活动正在经历衰落。一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人口迅速膨胀,对谷物的需求有 90% 是由国内种植来满足的,食品生产也继续着其从 18 世纪改良以来一直持续的上升局面。然而,1815 年之后,乡村中劳工和穷人的遭际却同漫长的剥削和屈辱史上的任何情形一样糟糕。对当时许多观察家来说,情况比他们以前见过的还要糟糕。

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若想究其根本原因的确非常困难。1815 年后贫穷和困苦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水平;基本来说,在农业中建立资本主义秩序是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这一漫长的转变到 18 世纪中期就已经得到了决定性的确立。自那之后,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知识,因而知道在资本主义的条件和秩序之中,生产的增长与广泛的失业及大量的贫困化共存并不是什么悖论。因为在使经济受制于工资劳动和市场的规则之时,资本主义也使人面临新的危险,因为其信用危机和价格危机贯穿始终。然而在英国农业资本主义中一直存在着一个矛盾:其经济是市场秩序下的经济;其政治是自封的贵族和地主阶级的政治,实施的是相当不同的“传统的”规则和管控。这个矛盾曾被(霍布斯鲍姆和路德)视为臭名昭著的斯宾汉姆兰体系及其影响最令人信服的解释¹。这一体系始自 1795 年,它通过计算面

1 参见 *Captain Swing*; E. J. Hobsbawm and G. Rudé; London, 1969; ch. ii。

包的价格和孩子的数目,从地方税中补贴低工资,目的是维持乡村的社会秩序。这是最后的尝试,且事实证明这次尝试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它是一个老式社会在政治上的反射——单凭存在本身以及作为地方社区成员这样的事实就证明拥有“生存权”,不论这样的成员身份有着多大的从属性。同 19 世纪 30 年代具有明确资本主义性质的济贫法相比,这一尝试的出发点还是很值得赞扬的。但这是在一个明显不道德的事件之后的一个道德反射:地主阶级试图为所有劳工和穷人提供保障。那些劳工和穷人由于同一个地主阶级长期的、不断重复的行为(也即提高他们的产量、他们持有的土地份额和他们的租金)而流离失所,饱受苦难。我们不必理想化劳工早期的境遇,就可以看到他现在为他主人們的困惑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从前他就一直承担着扩张与改良的真正代价;但现在他是在以贫民的身份、以施舍对象的身份来承担这些代价,而且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之前许多代人的经历已经在不同地点、不同时期预示了这一命运,但现在这种命运在扩大的危机中变成了某种体系。而且由于长期的垄断、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租金不断上涨,一直有小农户被逐出他们租用的土地,加入到没有土地的劳工和背井离乡的佃农这一行列中。拿破仑战争期间物价高涨,许多这样的小农户都度过了这场危机。在战后的萧条里他们当中数以千计的人破产,失去土地、在绝望中移居国外的人数迅速增长。

先让大量的人变得贫穷、不得不依附他人生活,再向他们提供慈善救助,这种行为或许可以被视为人道之举。但拥有土地的阶级要求这种依附性,无论是在社会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如此。在这一时期,许多村庄中慢慢开始出现直接的政治斗争。与贫民救助的提供和管控同时进行的是对渔猎法的强调和执行。“偷猎者”的形象变得很典型,他们如今仍然叫这个名字。大自然最后的财产(大自然古老的野生动物,但现在却是将野生动物作为“猎物”而施行的“保护”)不断遭到人们直接的挑战;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在他们自己的家园过日子、讨生计,现在却被独断霸道的法律变成了罪犯,变成了流民,变成了被边缘化的人。

渔猎法和那些反渔猎法的人的历史,是 19 世纪乡村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中心特点。在传统的描述中,所谓的拥有者——正是在这段时期他们发展了

射击和狩猎的休闲方式——他们的道德观念和美学观念得到了广泛宣扬，而在很久之后——当这变得无关紧要时——才出现了一种对“偷猎者”小规模崇拜，“偷猎者”被视为一个杰出人物；一个富有魅力的无赖。但一直都存在着另外一种道德观念，我记得是从小农户和劳工的谈话中听到的。贵族的这种对飞禽走兽都要宣告所有权的专断蛮横——

每一只牲畜都主动
将自己献出²

184

——既被粗暴地坚持，同时又遭到了巧妙的反抗。我曾听祖父讲起“劳工的晚餐”，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祖父讲这件事的时候带着一种可以理解的骄傲：在树篱后打晕一只兔子，从路旁采一棵芜菁甘蓝：这就是八个孩子的一餐饭。如果现在还有人想要哀悼消逝的乡村生活方式，就让他们哀悼那些被捉后受到残酷惩罚（一直延续到一种不同的、城市式的是非感发挥一些控制作用）的“偷猎者”吧。或者如果有人想要攻击那些摧毁了乡村习俗的人，就让他们去攻击那些把觅食变成了偷窃行为的窃贼吧。

我要说的话比较难以让人接受，但尽管人们总是在谈劳工境况的恶化（加诸其身的客观条件如果放在今天无可争辩地会被称为“灭绝人性的”），我从这个糟糕的时期中主要注意到的却是一种精神和技能的发展。人们常说在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所有有能力的人都离开乡村去了工厂和城镇，或者决心移民，只留下了迟钝的人、没用的人和无知的人。就连激进的历史学家都在谈论18世纪“勇敢的农民阶级”和19世纪“消沉的乡村无产阶级”。数以万计的人破产，心灰意冷。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出现过他们这样的人。但在18世纪让我们到哪里去找强有力的人物，可以组织像斯郢烧草堆暴动、“不给面包就得流血”的对抗、捣毁脱粒机或托尔普德尔工会这样的运动？

2 To Penshurst; 前引书。

人们常常用一种自由主义的居高临下的眼光来看 19 世纪的乡村历史：除了将乡村理想化、使之与城市对立的保守观点外，这种眼光是唯一可供选择的角度。但尽管困苦和贫穷深刻持久，乡村劳工之中却出现了比他们更受好评的先辈们更为积极的精神、更为自觉的自我组织，以及最终更多的成就。我认为烧干草暴动是导致人们错误认识的原因。绝望和无知之人的绝望之举！我对此抱有怀疑态度。他们的工资不够填饱肚子。他们看得到自己身边的财富，而法律保护的却是十足的的不平等。他们要足够自己生活的衣食，“为此我们将不择手段”。在一项缓解极度贫穷和饥饿的事业中，他们敢于行动、愿意行动，会去寻找能够有所影响的行动方式，这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因而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们为之奋斗的这项事业，在现在会得到每个人的支持（但“现在”并不重要；他们的孩子那时正在挨饿）。

现在不像以前，你要对付的不再是那类该死的平板车（顺从的人）了。³

这是 1830 年一个车匠对地方官说的话。他说出了很多人要说的话，必须得到尊重。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吗？顺从也解决不了问题。小脑筋勋爵赞赏顺从的做法，他给自己的住宅又添加了一侧厢房。

185

如果我们不放几把火，我们每周的工资最多 10 先令；现在我们每周拿 11 先令。⁴

这是诺福克劳工的结论。一位肯特郡的副牧师报告了他的村庄中一句流行的话：

暴动和纵火可给穷人们带来了不少好处。

3 前引书 Hobsbawm and G. Rudé, 138。

4 同上书, 298。

的确有一些好处,但却不够,如果我们考虑整个历史的话。要反抗地主们的贪婪,反抗不断循环发生危机的农业体系那些貌似客观的条件,就必须要有长期的斗争,而斯郢暴乱和“不给面包就得流血”暴乱仅仅是斗争的开始。在斯郢暴乱的时代,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大部分人已经是没有土地的劳工了:没有土地的劳工同占有土地的人的数目比为五比二。乡村各郡的人口有了增长:1750年到1830年间人口增长了一倍;在爆发危机的几年中人口增长最为迅速,这种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1830年。乡村社会的衰败和骚乱导致了大范围的失业,而且在这一时期移民国外的比率远低于人口自然增长率。1830年,在68.6万个农业劳工家庭中,约有30万人靠贫困救助生活。至于那些有工作的人,他们的工资非常不稳定,而且讽刺的是,他们工资常常根据他们居住的村庄同新城市和工业中的工作地点之间的距离而变化:在西赖丁这样的工业区,劳工在农场工作一周可以拿到14先令,而南部和西部各郡仍然为全农业区或以农业为主,那里的劳工一周只能拿到7先令——最多9先令,但这种情况非常少。

这是“旧英格兰”的大部分家庭的真实处境。尽管如此,农业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仍然继续发展。农业方面的工作仍然在增多,但由于总人口急速增长,农业工作所占的比例下降了。在土地占用方面,当时存在着一种进展缓慢的总体趋势,即趋向于占有较大的农场。有一半的农民仍然依靠自己的家庭耕种土地。到1851年为止,面积在300英亩以上的农场占了耕地数量的三分之一,而面积在100英亩以下的农场只占大约五分之一。同时还有我们熟悉的乡村中间阶层的划分方式:小农户(土地占用面积低于100英亩)13.4万户;中等农户(土地占用面积在100英亩到300英亩之间)6.4万户;大农户(土地占用面积高于300英亩)1.7万户。在这之中,既占用又拥有土地的农户在19世纪初期持有大约20%的土地;到了世纪末则降至约12%。

186

大地主位于这一结构的顶点。在18世纪,约半数的耕地为5000户家庭所有,此外仅400户家庭就占据了近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1873年,这种优势地位十分明显:当时大约有一千万农业人口,而乡村的一半掌握在约七千人手中。19世纪,随着选举改革的实施,地主的政治权力减小了,尽管决定性的削减到了70年代才得以实现。但与此同时,英格兰乡村的社会结构已经

无法再从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中脱离出来了。这是事实,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后,尽管农业本身并没有遭到削弱,但它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却小了很多。19 世纪初期,农业产出占国家产值的 40%;到了中期是 20%;19 世纪末,仅占不到 10%。19 世纪初全国工人中有三分之一受雇于农业相关工作;到了中期这个比例为五分之一;19 世纪末仅有不到十分之一——尽管受雇工人的数目仍没有很大变化(1801 年和 1881 年的数目是完全相同的,都是 170 万人)。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无法从发展中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将工业阶级和地主阶级完全区分开来。18 世纪的地主已经涉足早期的采掘和制造工业。在 19 世纪整个进程中,地主其他方面的收入——

政府和银行债券,运河和铁路股票,城市土地租金,港口设施和各类矿场、采石场、钢铁厂、砖厂以及其他企业的利润和特许使用费。⁵

——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地主也不是一个排外的阶级,因为从 16 世纪起,地产和其他形式的财产及收入之间就一直存在着相互交换。研究 19 世纪英国地产社会的历史学家 F. M. L. 汤普森评论说,其他阶层的人和财产被吸收入地产利益,这

必须算作无法清晰划分资本家和地主之间界限的主要原因。⁶

这种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可以在许多方面得到验证,有关谷物法的争议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复杂性使我们无法简单地将“乡村英国”同“工业英国”对立起来进行理解。相反,正因为农业——尽管农业仍保留了许多与其他生产方式对立的特殊利益,而且当然,在其内部同时还存在着彼此冲突的利益(例如放牧和玉米种植之间)——在向一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这种发展的本质使得

5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G. E. Mingay and J. D. Chamber; London, 1966; 166—167.

6 “The Landed Market in the 19th Century” in *Essays in Agrarian History*, ed. Minchinton; Vol. 2; Newton Abbot, 1968.

187

农业无法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提供进行对比的基础。19 世纪英国的社会危机反映在乡村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独特的问题;但这仍然是一场全面的危机,因为城市和乡村财产之间、工业和农业产出之间以及工业和农业劳动力及定居方式之间都有着复杂的相互联系。19 世纪乡村英国的危机有多种形式:地主和佃户之间关于租金和租期的长期斗争;在自由贸易经济发展过程中关于价格以及国内同国外产品之间关系的长期斗争;雇主和工人之间关于工资以及组织工会权的长期斗争;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和男人、女人及儿童的权利,特别是受教育权之间的长期斗争。在乡村英国的社会结构中,所有这些斗争都在激烈地进行着,但这些斗争不仅发生在整体社会和经济的环境和压力下,而且每一项斗争都是一个明确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一种形式,而且也越来越被如此看待。

农业作为经济的一个构成部分,其重要性逐渐减小,这深刻地影响了整体形势,我们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英国和农业英国之间随之发生的相互作用中,关键的关系无疑是市场。19 世纪晚期,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经济政策的相应变化引发了这样一种模式,也即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廉价的外国食品。当然这并未成为一种总体模式。直到 1868 年,约有 80% 的食品仍然来自国内种植业。19 世纪 70 年代起进口开始迅猛增长,但市场也仍在不断扩大,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总体人口的增长,二是因为同面包的需求量相比,肉和奶制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这是总体生活质量提升的结果。这一进程对农业产生了重要的总体影响,加速了农业的相对衰落。但这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比起需求上涨而国内价格回落小得多的肉制品和奶制品,谷物生产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影响来自对草原的开垦以及汽船和铁路)。市场的这些变化造成了关键性的区域变化:南部和东部种植玉米的各郡的地位大大异于北部和西部以牧场为主的各郡;此外在市场压力下,当时的总体趋势已从谷物种植逐渐转向家畜养殖。19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的大萧条(在传统历史著作中对此已经说了很多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这次萧条中,总体来说谷物种植者丧失了优势,而家畜养殖者则赢得了优势(部分原因是市场扩大,还有部分原因是由于谷物种植者遭受了损失,喂养家畜的成本大大降低)。在市场的这一变化中,农业产品的发

188

展改变了方向;反过来,这一转向也在资本主义英国乡村社会的社会和经济危机里发挥了作用。

也就是说,农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模式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市场起落的影响,而市场上的波动就通过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来施加它们的最终作用。在这一社会经济结构中,乡村英国的典型问题——土地所有权、生产资料、投资资金的占有和作用,以及长久以来的工资、住房和教育问题——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主要问题。现在有一种很重要的观点,即已确立的某些乡村社会结构阻碍了乡村和城市工人之间就这些问题形成一致。但最终城乡之间还是形成了某种联系。从19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大量人口从村庄迁移到城镇,这种情形在一些地区尤为显著。但严格来说,这不能算是乡村人口减少,尽管有些郡的人口数量遭受了永久性的缩减。总体来看,事实是乡村人口没有增长,而城市人口随着整体人口数量的增长而继续猛增,同时移民国外的人数也显著增加。

在这一时期离开乡村的家庭,其成员首先是没有土地的劳工,然后是许多年长的手艺人——他们被各种形式的工业生产取代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当时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在一个主要的方面体现在迁移上。戏剧性的是,人们离开土地恰恰表明了到目前为止土地是如何分配的。

但在19世纪末,居住在乡村地区的人口比一个世纪前整个国家的人口都多。尽管发生了很多变化,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乡村秩序当中:少数地主,大量的佃农和没有土地的劳工。这一体系存在于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的“黄金时代”,也存在于70年代到8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不论有利的还是不利的贸易都同样要通过这个主导系统的过滤。值得稍稍庆祝一下的是,最终有许多地主脱离了这一体系,不过这也是到了20世纪才发生的事:土地所有权转到了农民手中,最大的一次转移发生在1914年之后:13年之内,英格兰和威尔士有四分之一的土地从地主那里转到了业主居住者手中。这当然是有代价的;往别处更有利润的地方投资总需要折现的资金。

在这段变化的历史中,一直都有着劳工的身影:随着工业和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劳工在整个劳动人口中占的比例小了很多,但在19世纪末,其数

量同世纪初相比并没有减少。这些男人和女人就是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的“农业工人”。

在亚历山大·萨默维尔的《田边吹口哨的人》(1862)中,我们可以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的谈话。萨默维尔是一个苏格兰劳工的儿子;他照料牛棚,当挤奶工,也曾当过小贩沿街叫卖,他的家庭是个小农户、劳工和手艺人的家庭;女人们就在男人旁边干活。他在《一个劳工的自传》(1848)中对自己早年生活的描写可谓经典:其经典之处不仅在细节方面——他的父母有一小块玻璃窗格子,他们每搬到一处“新家”便用这块玻璃格子当窗户用,尽管他们只是从茅舍搬到篷屋——还在于这部作品描写了边缘化的劳工那颠沛流离的处境。萨默维尔自己的命运非同一般:他先是偷猎、给别人做活,几年后为了免于失业他参了军,入伍之后他给一家报纸写了封信,说军队不会出动镇压支持改革法案的示威者。这件事被发现后他被狠狠地鞭打了一顿。他成了激进派的英雄,但生活依然漂泊不定,最终他成了一名告密者。《田边吹口哨的人》就是他在反谷物法联盟的办事机构里写成的。后来他移民去了加拿大。

这本身就是一段意义深远的历史,它让我们想到了那些乡村劳工生活的观察者们,尽管他们能说会道,但他们的观点都是暧昧不清的。同“农民诗人”一样,这些观察者要想出版作品或是找份工作,都需要依靠赞助人;像萨默维尔这样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会遭到严厉的惩罚。然而萨默维尔和其他人历经重重困难记录下来事实却同其他事实一起,将“古老的悠闲”或者说“旧英格兰”打得粉碎,将其真实细枝末节都暴露出来。在一种可耻的依赖状态下感受到的恐惧是永远无法忘记的。在萨默维尔描写威尔特郡一个劳工讲话的时候,这种恐惧就存在于他的记录中:

在我看来佩里大概三十五岁上下。他中等身材,戴一顶草帽,围着一
条红色围巾,身上穿件粗棉布外衣……一开始他十分不安,犹犹豫豫
的,直到一些邻居们实在受不了,喊着“别害怕,说出来啊威廉”。听了这
话他才说自己没有什么不敢说的……

……他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十岁,其他四个分别是八岁、六岁、四岁、
三岁。他一星期挣7个先令来养家糊口……今天他走了三英里半去上

工。他随身带点面包和水；回到家后也没有太多可吃的。（“这是事实，我们都知道。”一个声音说：“你为什么抖得这么厉害？”）佩里说，要是我回到家能饱饱地吃顿晚饭，再喝上一夸脱好啤酒，我就不会抖了。⁷

另一个住在附近的劳工觉得本地的庄园还没有禁猎实在是糟糕；如果实行了禁猎的话，“那他们要想找点吃的就不会这么难了”。

“可这是要坐牢的，”我说，“你们可能会被抓住，被送到牢里去。”

“坐牢啊，”他们回答道，“牢房不见得比工场差到哪里去；干什么都比挨饿强。”⁸

后来当萨默维尔去拜访佩里时，他发现雇佣佩里的农户来找过他的妻子，告诉她尽管她有这么多的幼小孩子，她也要到田地里去干活；“干草堆需要人料理”，农户还说：

“他希望能弄清楚他雇的人里面是谁第一个在会上发言的；他会想办法叫他们后悔。”

但佩里并没有反对萨默维尔出版他的记录。

他们觉得自己的境况已经不可能更糟糕了。⁹

这段描述不仅仅记录了许多普通人的处境——这是我们应当记住的——也记录了他们要鼓起勇气有多么困难。我曾听别人讲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发生的时间从以前一直持续到我父亲这一辈为止；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让

7 *The Whistler at Plough*; Alexander Summerville; Manchester, 1852; 383—384.

8 同上书,387。

9 同上书,388。

我不能不相信它们的真实性。我们当然应该强调,劳工和他们的家庭遭受了很多艰难困苦,但如果我们带着传统观点来看待他们,认为他们是一群颓丧无知的人,这样的评价就太失公允了。我非常了解我的祖父。1914年前他被迫从自己的茅舍赶出来的时候,他在一次村庄集会上说到了这件事。我父亲告诉过我,他当时听着他严厉强壮的父亲讲话,非常吃惊地看到父亲说着说着就垮了,哭了出来。威廉·佩里之后许多年,仍有许多人和他有类似处境。

想想约瑟夫·阿奇吧。他生于1826年;他的父亲经常找不到活干,母亲就和许多人一样,从前做过仆人,后来靠在家给别人洗衣服养活全家人,给孩子们吃切成片的大麦面包。要是不偷猎,就没有鲜肉吃:“毫不夸张地说,你随便碰到谁,他都是个偷猎者。”阿奇这样为他们辩护。1872年阿奇同别人一道创建了工会:

我站在我家的猪粪上,坦率而激烈地为工会辩护。¹⁰

191 男性公民权最后一次普及后,诺福克劳工的选票最终把阿奇送进了议会。同大多数城市劳工代表一样,阿奇早年的那种精神最终大部分被安抚和同化。但当我们从他的《自传》当中读到他的讲话、他组织的活动以及他反抗威胁的勇气时,我们就碰触到了一股非凡的力量。

或者想想泰索的约瑟夫·艾什比。他在女儿 M. K. 艾什比笔下是一个非凡的人物。约瑟夫·艾什比生于1859年,是一个仆人的私生子。他在自己的村庄和教区里干活,不仅有力量和勇气,还非常聪明,有着非常强的自学能力。他收集的地方历史是这一被遮蔽的乡村文化的一部分;他争取民主的技巧也同样了不起。不论在乡村还是在工业城镇,像艾什比这样的人有很多:聪明,自学成才,强壮,可敬。他们一辈子做的是重活,拿到的工钱却极微薄;现在他们要为跟他们一样的人再奋斗一次。

我们需要先记住他们的故事,然后再来看理查德·杰弗里斯。杰弗里斯

10 *Autobiography of Joseph Arch*; London, 1966; 43.

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入文学传统的。约瑟夫·阿奇组建工会的时候，全国上下一片争议，此时《泰晤士报》上登出了三封信，署名是斯温顿镇科阿特农庄的理查德·杰弗里斯，《泰晤士报》在其社论中把这三封信大大赞扬了一番。这三封信都说了些什么呢？

据我观察，我从来没听到过做活的男工或者女工说过一句感激的话；但我可以非常确定地说，除了这些农业劳工外，英格兰再也没有哪个阶级能从他们的上层阶级那里得到如此多的关注和利益。¹¹

这是在跟阿奇唱反调。但写这些信的是什么人呢？

1848年，杰弗里斯出生于斯温顿附近的科阿特农庄。他的曾祖父是斯温顿一家磨坊的磨坊主，兼做面包生意。1800年，他在离城镇两三英里的地方买下了40英亩左右的土地。1816年，理查德的父亲接管了斯温顿的生意，从伦敦搬了过去。1822年，杰弗里斯家族在科阿特盖了一座房子，但这座房子闲置了很多年。后来理查德的父亲写道：

我是头一个住进那座房子的人，那时我14岁，已经离开了学校——我的大姐既做管家又做奶场女工，为父亲管理这座房子。

后来他的父亲在评论理查德对科阿特农庄的描写时说：

他怎么会想到把科阿特描写成这样一个好地方，他怎么能这样骗人，简直无法想象。实际上他所提到的东西几乎没有一个是在科阿特的。唯一属于科阿特的也是个不令人高兴的东西——斯诺德西尔是我的运货马车的名字。他把那里称作科阿特农庄，真是名不符实，那只不过是不到四十英亩土地而已。¹²

192

11 *The Times*; 14 November 1872.

12 引自 *Richard Jefferies, Man of the Fields*; ed. S. J. Looker and C. Porteous; London, 1965; 4 and 6.

19世纪60年代末,这片庄园有14英亩地不得不被卖掉了。1878年,就在杰弗里斯开始写《霍奇和他的主人们》之前几个月,他的父亲卖掉了全部土地,搬去了巴斯,在那里他做些花匠的零工。

理查德四岁时搬去西德纳姆,与一位姑母同住。他在那里一直待到九岁,每年回科阿特度一个月的假。等他回来与父母同住后,他被送往斯温顿的一些小私立学校。16岁时,他同一个堂兄弟一起离家出走,在法国待了一个星期,最终被利物浦警方抓住,送回了斯温顿。1866年到1868年间,他在斯温顿新保守派报纸《北威尔特郡先驱报》担任非正式记者,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后来他又在《威尔特郡和格罗斯特郡报》担任非正式记者,这份工作他一直做到1873年。1874年,他娶了邻家一位农民的女儿并搬到了斯温顿。他写给《泰晤士报》的信给他带来了更多机会,让他成为一个创作关于农业和乡村生活文章的作者。1875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住在瑟比顿,同住的还有他小时候一同生活的姑母。1877年,他携妻带子搬往斯温顿,在那里他写成了《霍奇和他的主人们》。在70年代,他发表了很多文章,除此之外他还出版了三部小说,《红色披肩》、《躁动的人心》和《世界的尽头》,以及三部关于乡村的著作,《故乡的猎场看守人》、《南部一郡的野生动物》和《业余偷猎者》。经历了多年的贫穷和漂泊不定,杰弗里斯慢慢确立了他作家的地位,《霍奇》就是 he 在这段时间创作的。80年代,他继续进行文章创作,并出版了很多部著作:《木头魔法》和《比维斯》;《伦敦附近的自然》、《原野生活》、《旷野》;《绿蕨农庄》、《带露的清晨》、《伦敦之后》、《集市上的乡下姑娘》、《我心灵的故事》。但他年轻时疾病缠身,80年代初开始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他搬到了苏塞克斯,1887年8月14日在格林去世。据记载,他死于“慢性纤维肺结核”。当时他38岁。

当我们试图理解杰弗里斯作品的特征和发展时,这段社会和个人历史是非常值得回顾一下的。他是英格兰乡村社会史的一个主要贡献者。然而,不论人们承认与否,这段社会历史都是一部艺术作品,而且同大多数情况一样,写成这段历史的人同他的写作素材之间的联系在一些方面既微不足道,又似是而非。杰弗里斯的作品制造了一个杰弗里斯神话:这个杰弗里斯祖辈代代都是自耕农,一辈子都生活在乡下,紧密关注所谓的“基本而永恒的农业模式

在道德上的重要性”。事实并非如此,而且要有趣得多。他是个生活在城郊的作家兼记者,在一块苦苦支撑的小农场上重新塑造他青少年时期的乡村;他是个病人,同时或许还是19世纪树木、动物、花朵和天气的最聪颖、最有想象力的观察者;他一直都在观察、写作,直到最后他说:“自然界没有什么是属于人的……除非他有来生”,或者直到他在最后一篇散文中说,“或许总有一天,当我的肉体死亡的时候,我也会发现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俗世”。他是一个雄心勃勃、刻苦努力的年轻人,他的作品代表了地主和雇主的利益。在他从斯温顿“科阿特农庄”寄往《泰晤士报》的信中,写着“‘威尔特郡一个劳工的儿子’讲的话……让我觉得必须要代表该郡农民表达我们的愤怒”。

社会现实也同样重要。这里是威尔特郡北部和格罗斯特郡南部的乡村,携带式脱粒机是在这里发明的;杰弗里斯的父亲搬去科阿特不久,这里暴乱的劳工同当地的自耕农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一家铁路机车车辆工厂在斯温顿建立,这个城镇迅速扩张,变成了交通枢纽和维修中心;杰弗里斯还是个年轻记者的时候,农业大萧条在这里开始了。正如他自己所写的:

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发生的重大变化一桩接着一桩,人们很有理由认为目前已经到了极限,接下来的几代人将忙于让自己适应生存的新环境。但事实绝非如此;现在所有的事实都不可避免地指向这一结论:发展的时期才刚刚开始。¹³

19世纪70年代早期,杰弗里斯还是个在《威尔特郡和格罗斯特郡报》工作的年轻记者,《霍奇和他的主人》的大部分素材就是在这一时期积累的:第二卷第三章中的“旧报纸”就是《威尔特郡和格罗斯特郡报》,正如“弗里斯伯罗”就是巴德明顿附近的赛伦塞斯特,和“朱克地区”一样。人们并不认为他是个特别好的记者,但是当时他的观察是为了自己,完全是随自己的兴趣。他细致地观察光线对景色的影响,正如在“霍奇的田地”的开始部分出现的精

13 Preface to *Hodge and his Masters*.

彩描写；他在“晒干草”里描写了往火车上搬运牛奶这样的事情，在“家庭女教师”里描写了乡下的火车站；他的这种观察创立了一种习俗模式，正如“律师”或“银行”里写的那样；他还对人物和生活方式进行冷静的观察，如“离开他的农庄”，“下山”，“一个雄心勃勃的乡绅”或“霍奇最后的主人”。每一类观察和描写中都显露了他的天赋，特别要提的是最后他写的主要是小说。他准备把他的《集市上的乡下姑娘》作为“一部小说”或者作为“乡村生活场景”出版，二者皆可，这很典型。在他的那些真正的小说中，他在想象力之外加入了他的散文和小品文所体现的人物、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被深切感知的联系，这些增加的因素既证明了他那个时代小说在形式上的缺点，也证明了作家们个人的缺点，也即他们倾向于一种虚弱的、晚期的拉斐尔前派式的理想化和浪漫主义。另一方面，当我们读到《霍奇和他的主人们》的第一句——在“伍德伯里的杰森旅馆”门口——我们感觉到我们正在接触的是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力量。

在我们接下来的阅读中，各种局限性出现了，其中之一特别需要界定其定义。尽管杰弗里斯声称自己本着“一种公正无私的精神”，他绝不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他有时是观点鲜明的作家，深刻了解这一乡村文明的整个危机，情感坚定而明确。但有时他也是派头十足的记者，甚至是党派的雇佣文人，如“弗里斯伯罗”最后几页那令人不快的古怪奉承，“冬日清晨”结尾处刻薄的叫嚷，或是“茅舍女孩”中老一套的读者来信专栏。很明显，有些时候，他写的正是读者们在一场社会危机中想要听到的东西，正如他写给《泰晤士报》的信曾成为阿奇和农业劳工工会的阻碍。他的读者们所看到的——有时也是他自己所看到的——并非是被“人物的个性”所标志的男人和女人，而是一个总体的、抽象的“劳工”或“霍奇”的形象。

要想理解这一过程；这些明显的、有时又有些可悲的幻象，这些自相矛盾又常常是强有力的共鸣，我们必须把杰弗里斯放在他模糊不清的社会立场上进行审视：他的父亲是个苦苦挣扎的小农户，最终卖光了自己的田地，成了个做零工的劳工；这种地位上的不安全感导致的是对上的逢迎和对下的笼统化以及丑化，这种做法要在城镇里则会被称为小资产阶级行为。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杰弗里斯同劳伦斯一样是个有天赋的年轻人，他靠写作摆脱了这种境况

(做到这一点自然要借力于社会地位比他高的读者),同时也承受着严峻持久的复杂压力。

因为杰弗里斯没有在他起步的地方停下。在他晚期的散文中(从劳伦斯身上也能清楚地看到同样的发展)就出现了一个不同的立场。

耗费这么大力气挣得的钱真的值得拥有吗?看看田地里忙收割的女工的胳膊——瘦且有肌肉,结实有力,几乎晒成黑色,这说明她经受着长期的过度疲劳。长期的劳累让她身材走形,她的脖子不再浑圆、变得多筋,胸脯也平了下去……小麦有着丰富的内涵,许多书里写的都是小麦触发的沉思,它是人们心中的珍视之物。这些美丽外表背后的现实是人的辛苦劳作——一小时接着一小时的高温和疲劳;这些美丽外表背后的现实是粗陋的生活和少得可怜的最后所得。小麦是美丽的,但人的生活只有劳作。¹⁴

195

杰弗里斯认可了劳工的辛苦劳作,这是十分人道的;除此之外,他还增加一种逐渐强硬的经济和政治视角——难怪这一点并未得到强调。在《对劳工问题的思考》中,尤其是第二部分“资本的神圣权利”,他的观察已经不再限于艰苦的劳作。

“但他们拿了钱就是要做这个的”,生活舒适的体面人说……你自己要走这条路的……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饥饿和口渴所迫;那些是可怕的灾难,是比鞭笞更痛苦的折磨,它们站在资本的背后,给资本以力量。

看到公民权普及带来的政治变化后,他回顾了旧体系和劳工对旧体系的想法:

14 *One of the New Voters*; 重印于 *The Open Air*; London, 1885。

简单地讲,那个时候他们很排斥牧师、乡绅、佃户和监护人的统治。
他们宁愿离开。¹⁵

他为乡村民主的发展辩护:

如果完全不存在任何权威、任何中心,就将会产生彻头彻尾的冷漠。

但是:

只有在村民由自己的议事会来管理,不受牧师、乡绅、佃户和监护人
影响时,才会产生独立感。¹⁶

一个教区理事会,一间阅览室,一个健身场所,理事会所需的房舍,妇女协会:
这些是实现新的乡村独立的几种方式。

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同我自己的感觉联系了起来,即现代村庄中
要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存在更多的真正的社群,这是我从一个拥有同样经历
的家庭那里得知的。来自民主发展和经济斗争的变化将一个旧秩序变得更
温和、更纯净。但是要坚持这个事实就要认可一种延伸的联系,因为严格意
义上说这根本不能算是一个乡村景象。至少当我们把它同那种在某种意义
上源自杰弗里斯早期思想的情感结构做对比时,它看上去并不像是乡村
景象。

196

我必须在头脑中追溯这种联系,类似于一种自我分析,而通过杰弗里斯
则是最能碰触到这种联系的方式。他对自然世界的感情非常强烈——一种
孤独的强烈感情:这是将他和克莱尔、劳伦斯联系起来的绿色语言。但是劳
作中的乡村世界,那个随处都可体验大自然的乡村世界,无疑正经历着变化。
劳工们坚定地选择改变。这样,在一种思想的整个调整过程中就可能发生某

15 "Thoughts on the Labour Question"; *Pall Mall Gazette*. 10 November 1891.

16 In *The Hills and the Vale*; London, 1909.

种差错。对“消失的乡村”——“旷野”和“原野生活”——的捍卫可能会同对旧乡村秩序的捍卫混淆起来,而地主、收租人和与他们观念相同的文人无论如何正在表达对旧乡村秩序的捍卫。就像杰弗里斯的《伦敦之后》中写的那样,对城市中喧嚣吵闹的憎恶可能被转化成这样一种清晰而辛辣的景象:大都市重新被沼泽取代,林地封建社会再次出现(威廉·莫里斯“中世纪精神”的“乡村”版本)。这样,对树木、花草和鸟儿们的喜爱实际上被不自觉地拓展,同一个不公正的专断社会的价值和情感联系在了一起。“灌木树篱不存在了,乡绅们也不存在了”¹⁷:我确实确实听到过人们这么说,就好像这是同一个过程一样。直到今天,这种混淆的根源仍然纷乱不堪、根深蒂固。

杰弗里斯没能解决全部困难就去世了。我们在阅读他晚期的散文《我们村里的樱草金》时,只要想到当时“保卫乡村”的社会结构,就可以感觉到这种困难有多么强大。在该文中,杰弗里斯辛辣地描述了托利党在乡村英国中新政治组织:之前曾经抵制劳工参与选举的那些人的后代接替了他们,巧妙地组织劳工的选举。“樱草金”:这个词是如此贴切。这种花象征了政治操纵;花朵的颜色是黄色,也是金钱的颜色——是权力真正来源的颜色;有自然的天真,也有政治的统治:全包含在内了。

花朵与特权;工厂的浓烟和民主。在工业和城市发展的阴影下被遮蔽的乡村中,这个形象正在渐渐形成。这个形象一直持续到今天,但一直都存在着另外一种传统:科贝特、阿奇、艾什比;晚期的杰弗里斯、托马斯·哈代。

17 “Primrose Gold in Our Villages”; *Pall Mall Gazette*. 8 June 1887;重印于 *Field and Farm*; ed. S. J. Looker; London, 1957。

18 威塞克斯和边境区

197

托马斯·哈代的出生地离托尔普德尔有几英里远,在他出生前几年,联合组成行业工会的农场劳工遭到了放逐。仅是这一个事实就应提醒我们,哈代生于一个正在经历改变和斗争的乡村社会,而不是像他经常被人认为的那样,生在一个不受时间影响的死气沉沉的落后地区。这一事实同样提醒我们,在哈代进行创作的时代虽然仍然存在着地方社群,但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强大的社会整体网络:法律和经济;铁路、报纸和便士邮政;新式教育和新式政治。

哈代的乡村当然是威塞克斯:即主要是多赛特及其各邻郡。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真正的哈代的乡村是种边沿乡村,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曾在这种地方生活过:在风俗和教育之间,在工作和思想之间,在对地区的热爱和经历的变化之间。无可置疑,哈代对他的乡村有着深深的眷恋,这种眷恋自然而然也延伸到了乡村的过去,我们可以从他对威塞克斯的命名上看到这一点。但是他的小说却越来越多地写到了变化。小说的时间设定在他出生前不久到他实际进行写作的这一时期之内:他最后也是最为深刻的小说——《苔丝》和《无名的裘德》——是与他的写作时代最直接相关的。小说中总是有大量内容是关于旧乡村世界的:在风俗和记忆上是旧的,而且在感官上也是旧的,而这种观感来自新时代的意识教育,也即历史,甚至史前史的陈旧性:受过教育的人对变化的事实的意识。在哈代的几部主要小说中,经历变化和困难抉择都是处于中心地位甚至是决定性地位的,尽管方式不尽相同。

如果我们把哈代作为一个区域性小说家来看待,将其视为他的威塞克斯无与伦比的年代编记者、旧乡村文明最后的声音,我们忽略的正是变化在他的小说中具有的这种中心地位、这种复杂性。这种认识,包括刚刚提到的对哈代热情的赞颂,都是同这样一种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即哈代作品的实质正

离我们越来越远：他不再是我们这个世界抑或 19 世纪世界的一个人，而仅仅是旧英国或农民阶级的最后代表。

哈代小说中极为复杂的感情和观点，包括关于乡村生活和乡村人民极为复杂的感情和观点，都属于一个在不断发展的世界。哈代在描写某些仍然同我们息息相关的事物——不论我们生活在哪里——时，他的笔触比任何一位我们现代的小说家都更加有连贯性、深刻性：这些事物可以被抽象地描述成传统的生活同受过教育的人的生活之间关系的问题；传统的感情和观念同受过教育的人的感情和观念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从乔治·艾略特作品中看到的问题，也是将要从劳伦斯的作品中再次看到的问题。这是他们之间重要联系的背景。

198

我们中的多数人在接受任何形式的文学教育之前，都会了解并重视传统生活，也会感受到它带来的压力。我们看到自己家庭生活和维持生计的方式并从中学习；这是一个关于工作和身份的世界，一个信仰的世界，那些信仰深深融入了我们的日常活动，我们甚至一开始都不知道这些是信仰，是可以改变、可以质疑的。我们受的教育常常教给我们一种看待生活的方式，让我们能够看到生活之外的其他价值；就像裘德的目光越过田野望向克里斯敏斯特的高塔时看到生活之外的价值一样。我们内心深处常常都很明白，当传统习惯成为一潭死水或是陈旧的错误观念仍然被人们当作超越时间的真理不断重复时，我们是多么迫切地需要那些我们从教育中学到的价值和那些对知识的追求。我们尤其明白如果我们要理解改变的话，是多么需要这些价值和追求——如果我们要理解发生在我们生活、工作和成长之地的改变的话。

我们当然能够接触到这些观点、价值和接受教育的方法，条件是如果我们能到一个像克里斯敏斯特那样的地方去：如果我们不会像裘德那样被禁止进入的话。但是一旦我们能够满足这个条件，随之而来的总是这样一种观点：有关日常劳作和普通家庭的世界是一个劣等的世界，遥远的世界；既然现在我们了解了这个智慧的世界，我们可以不必再尊重——当然也不必再爱——另外那个我们依然非常熟悉的世界。如果我们心中还存留着对那个世界的爱，克里斯敏斯特会将其命名为“怀旧”。如果我们心中还存留着对那

个世界的尊重,克里斯敏斯特会将其命名为“政治”,甚至是更让人畏惧的“社会学”。

但这远远不止术语和语调的选择那么简单。这是当我们试着调和这两个对鲜明的世界,当我们和裘德(不过是一个被允许进入克里斯敏斯特的裘德)站在一起,或者当我们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在观念和情感上都明白了还乡的意义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真真正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一点对于某一代人来说尤其重要,他们出身普通家庭,接受了大学教育,不得不通过生活来了解这样的一种经历意味着什么。但这一重要性也具有一种更普遍的意义;因为总体来说,这正是不列颠一直在经历着的事情:脱离旧有的方式、处境、思想和感情;在新的条件下发现某些不曾预料的问题,不曾预料的尖锐危机,以及欲望和可能获得的机会之间的冲撞。

199

在这个典型世界中,哈代的形象就像一个里程碑,他既植根于这个世界,同时又充满了流动性,他既是熟悉的,同时又具有新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他并非是从一个旧乡村世界或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对我们讲话,而是从某种仍然活跃的经历的中心,从熟悉的和变化的事物的中心对我们讲话。我们可以将这种经历理解为一种观点,但这种经历最终对在那些体现为个人压力的东西——各种关系的建立和失败,肉体和精神个性的危机——非常重要,而哈代作为一个小说家,对那些压力同时进行了描写和展示。

但是,我们当然忽视了这一切,或者我们发现了,但如果我们在这里或那里感受到了贬低哈代的语气,却不知道该如何对其进行谈论和评价。现在对哈代的这种贬低非常普遍。

所有女士都离开去了客厅,这时我发现我旁边坐着的是托马斯·哈代。我记得他个子矮小,长相很粗糙。即使他穿着晚礼服和上过浆的衬衫,戴着高高的衣领,他仍然有一副奇怪的乡土相。¹

1 In *Preface to *Cake and Ale**; 1970.

这是毛姆²典型的餐后故事之一。人们或许会认为,这是一个哈代永远不应靠近的世界;他永远不应让自己暴露于其中。但是,从餐桌和客厅一路到远方乡村的“乡土相”,其间的语气和反应意义重大。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一路延伸到田里和田里的劳作——它们以蔬菜的形式盛在银器里端上桌;或是延伸到进入那群人——那群合乎习俗的文明人——中间的被认为有着粗糙长相的劳工的身上。当亨利·詹姆斯提到“好心的小个子托马斯·哈代”的时候,当F. R. 利维斯说《无名的裘德》以“笨拙的方式”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候,这种语气和反应又再度出现了。

由对出身残酷而直言不讳的推想支撑的社会性恩赐语气同文学上的恩赐语气通过一些方式有趣地联系在一起,而这些方式对哈代小说的实质做出的强硬而直接的推想,其目的本来就是破坏性的。如果哈代是个乡下人,一个农民,一个长着乡土相的人,那么这就是他小说的视角,是他的小说根本的文学立场。也就是说,这些小说不仅仅是关于威塞克斯农民的,它们还是由这些农民中的一员写成的,当然这位作者想方设法受了一点教育(尽管这点教育还远远不够)。必须做出一些语气和事实方面的区分。

首先,我们最好完全放弃“农民”(peasant)这个说法。正如我们所见,哈代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同英国多数其他地方一样,实际上不存在农民,尽管作家们仍然用“农民”这个概述词来指代在乡村生活的人。真正的乡下人是地主、佃农、商人、手艺人 and 劳工,这种社会结构——在某种社会意义上,这是小说的实际素材——跟农民的社会结构是极为不同的,比如说它的多样性、它的层次变化,以及它的很多基本人性态度。其次,哈代不属于以上提到的任何一类人。在写作之外,他只是在这一社会结构中许许多多从事专门职业的人中的一个,他们经常无法确定在这个社会结构中自己的归属究竟在哪里。无论在何地,阶级划分进展缓慢都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乡村资本主义的这一特征非常明显。哈代的父亲是个建筑工,手下雇了六七个工人。哈

200

2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英国小说家,因洞察而怀疑人类的善良与智力,作品基调愤世嫉俗,著有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等,其短篇小说尤其脍炙人口。
——译者注

哈代不喜欢听别人把他们家的房子称作农舍,因为他意识到了这种雇佣关系。他们的房子的确很小,但房子后面有一个小窗户,工人们从窗户这里领工钱,而且沿乡间小路的其他村舍要小得多。同时,他在上学路上看得到金斯顿墨尔沃德宅邸(幸运的是,那里现在是一所农业学院),他父亲曾为这座宅邸做过一些地产管理方面的工作,而这显示了级别上的一种突兀的区别。哈代成了一名建筑师,并成了一个牧师家庭的朋友(他的妻子就出身这种牧师家庭),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因此发生了改变,他同有教养的人士,而不是地主阶级有了联系;同时,他通过他的家庭还与小雇主、商人、手工艺人和佃农这一多变的群体——这些人自身在门第上从未完全同劳工区分开来——保持着联系。

哈代在自己的写作中也有着类似的地位。他既不是地主也不是佃户,既不是商人也不是劳工,而是一个常常对自己的实际关系感到不确定的观察者、历史记录者。此外,哈代并非在为地主、佃农、商人或是劳工写作,而是在写关于他们的故事,针对的读者则是主要由大都市里没有联系的人构成的文学大众。这两点产生的作用就是把人们的注意引回到应该受到关注的地方,即哈代描写并评价某种生活方式的意图——他同这种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紧密却又很不确定——以及伴随这种意图的本质而来的文学方法。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当前的社会俗套一旦被移除,关键问题就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显现出来。

这正是19世纪以来——19世纪英国社会具有一种切实存在的流动性,但这种流动性并不完全,而且意味不明——如此多的英国小说存在的关键问题。这既是一个内容的问题,也是一个方法的问题。人们通常把哈代的小说简单理解为城里来的外地人对英国乡村生活那种“不受时间影响的模式”产生的影响。尽管有时候这种理解是正确的,但更常见的模式则是乡村生活不断变化的性质(这种性质由乡村生活本身的压力和“外部”的压力共同决定)和一个或多个角色(这些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同这种乡村生活分离开来,却又因为家庭的某些联系不可避免地卷入乡村生活之中)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里,社会价值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被戏剧化地呈现出来;哈代实际作品中的大部分问题似乎也正是在这里产生。

一个小论据和一个稍大些的论据可以初步证明这个论点。几乎每个人都简单地把苔丝看作一个被外部因素引诱的热情的乡村女孩,因此当读者在小说接近开端的部分读到有关社会流动性的最为清晰的描述之一(这已经成为流动性的一种标准经验)时,他们会感到非常吃惊:

德贝菲尔夫人一向说惯了土话,她女儿在国立学校跟着一个伦敦毕业的女教师读了六年书,所以会说两种话:在家里或多或少说土话,在外面或跟有身份的人说话时,则讲普通话。³

《森林之恋》中的格蕾丝和《还乡》中的克林姆更加全面地代表了这种经历,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主题,其重要性远远大于比口音这种琐事。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时,我们不能再倾向于把《无名的裘德》当作另外一种类型的小说而将其同哈代的其他小说割裂开来——在近期的文学批评中,这种做法经常出现且非常值得注意。

这种割裂的做法背后的含义以及涉及的内容可以用一个更显著的例子来说明,这就是对《还乡》中克林姆的描写,这段描写非常符合我在《文化与社会》中查到的论点:

姚伯是爱他的同类的。他有一种坚定的信心:总认为大多数人所需要的知识,是能给人智慧的那一类,而不是能使人致富的那一类。他宁肯把一些个人牺牲了,而为一班人谋福利,而不愿牺牲了一班人,而为一些个人谋福利。并且还更进一步:他很愿意马上把自己作首先牺牲的一个。

这种牺牲的观点整体上同这样一个熟悉的主题相联系:被一桩错误的婚姻阻碍或破坏的职业才能;我们必须再次审视这个典型的哈代式僵局。但这种

3 《苔丝》,孙致礼、唐慧心译,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18—19页。——译者注

观点也同变化这一总体行为相联系——变化一直是个持久存在的社会主题。正如所有主要的现实主义小说所展示的那样,个人的品质和命运总是被与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品质和命运放在同一维度进行审视,而非作为可以分开看待的问题。为个人失败设定了这一语境的正是观察者哈代:

从务农的生活变到求智的生活,中间经过的阶段,通常至少得有两个,往往还超过两个;而其中之一差不多一定得是世路的腾达。我们很难想象出来,由农田的恬静生活,不通过世路腾达的目的作为过渡的阶段,一下就能转变到努力学问的目的上去。现在姚伯个人的特点是:他虽然要努力于高远的思想,却仍旧坚守着朴素的生活——不但那样,在许多方面,简直就是狂放简陋的生活,并且和村夫俗子们称兄道弟。他就是一个施洗的约翰,不过他讲的主题,不是劝人悔改,而是劝人高尚。在思想方面,他是站在乡村的先锋里的;这就是说,在许多方面,他跟和他同时那些主要都市里的思想家看齐。……因为姚伯有了这种比较先进的情况,就可以说他是不幸的了。乡村的人还没成熟到能接受他那种程度呢。一个人只应该部分地先进;要是他的希望心愿,完全站在时代的先锋里,那于他的声名就是致命伤了。……要是那个人,只赞成高雅清逸,不赞成功名利禄,那他的话大概只有那班在名利场中打过跟斗的人才听得懂。对于乡村的农人们来说,文化先于享受是可能的,也许能够算是真理;但是那种说法儿,却总是把一向人所习惯的事序物理加以颠倒了。⁴

19世纪70年代产生的这种论点,其微妙和智慧之处来自一个惯于进行相对性和历史性思考的人,不仅仅是抽象思考(正如他从穆勒或达尔文那里学到的那样),而且是对观察个人流动经历的过程的思考。这并非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甚至不是风俗与自觉的智性之间的简单对立。这是更为复杂、更

4 《还乡》,张谷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61页。——译者注

为紧迫的历史进程,在其中教育同阶级社会内的社会地位提升联系在一起,因此既想获得教育,同时又保持社会团结是很困难的(“他希望使整个阶级得到提升”),除非是通过某种奇异的个性展示。同样在这一进程当中,文化和富足被视为两个非此即彼的目标,不论达成这两个目标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还有一种扭曲了的认识,也即在任何真实的历史当中,后者永远是第一选择。

离开自己原来的群体、迁移到一个新群体去的人,他同旧群体之间的关系尤为复杂。他在忠诚的驱使下做出的事情在旧群体的眼中没有任何意义,旧群体那些公开的价值观支持将教育和个人提升联系起来,这一点他的新群体已经做到了,而正是这一点让他无法接受这种联系。

“克林,你这个话我听了太奇怪了。你还能想出比现在这个更好的事儿来吗?”

“但是我讨厌我现在作的这种事情……我要在我死以前,作点儿有价值的事。”

“费了那么些事,好容易才把你培植起来了,现在你只要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发财了;你却说……克林,我现在知道了你是打了这样的主意才回到家里来的,我心里很乱。……我一点儿也没想到,你竟会自己诚心乐意在世路上往后退。”

“我这是没有法子,”克林口气错乱地说。

“别人都能作……你为什么就不能跟他们一样哪?”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只觉得,有些一般人很在意的事物,我却一点儿也不在意……”;

“只要你有恒心继续下去,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有钱的人了……我恐怕你这是像你爸爸——像他那样,懒得往有出息的地方作吧。”

“妈,究竟怎么才算有出息?”⁵

5 《还乡》,266—268页。——译者注

这个问题很熟悉,但话说回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没有什么问题能比这更相关或者更激进。在这些复杂的压力之下,还乡不可避免地变得没有价值,他唯一可能公然做出的行为也会显得很不正当。因此,与劳工进行社会认同的需要导致了克林姆特有的那种对劳工的否定性认同;他自己成了一名劳工,使他最初的事业变得困难得多:“他工作的单调性抚慰了他,这种单调本身就是一种乐趣。”

所有这一切都为哈代所理解并为他所控制,但这种压力还具有更加深远且更难以意识到的影响。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选择去做体力活,这其中也包含了类似的动机,但最终这是对人的选择而不是对一种抽象的自然的选择——选择与人一起工作,而不是选择一种自然力量,然后迷失其中。但是,这一关键性的区别被有关哈代对乡村生活的感情方面的一般讨论遮蔽了——这种乡村生活包含了“不受时间影响的”荒地或森林以及在荒地上和森林里工作的人们。最初的人本主义冲动——“他深爱跟他相同的这类人”——的确可能变成反人类的性质:人可能被视为在这不受时间影响的广袤大地上爬行的生物,荒地的意象和克林姆在荒地上的工作非常强烈地暗示着这一点。在那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转变,但它一直让哈代很不舒服。正如在《无名的裘德》那样,那种最初的冲动一直在重现,并进行更加精确的认同。

同时,还乡之人并非仅仅离开了“外面”那个教育程度高且富足的世界的标准。他不可避免地某种程度上也离开了那些没有像他一样旅行的人;或者,这种分离更像是能够以一种浪漫感情的外表出现——对一种生活方式的依恋。在这种生活方式当中,人们只不过是某种工具:如画风景当中的人物,或者不用文学格调的时候,他们就成了民谣中的人物。因此,很容易以一种貌似热忱的方式,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不仅去观察“田园世界”的原始性和局限性,而且也观察它那如画的风光、粗犷的幽默和穿长罩衫干活的农民的天真淳朴。哈代小说的复杂性正显现于此:他涉及的范围从对风俗习惯和离奇趣事的外部观察,由一种明显居高临下的感情进行调节(例如《绿荫下》),到自然直觉和共同工作的价值与人性深度和忠诚之间的非常积极的认同(例如《森林之恋》),再到更让人印象深刻,也更加困难的对局限性的人道感知。这

些局限无法经由怀旧、魅力或是对简单的自然神秘主义来获得解决,但小说的所有人物在他们全都身属其中的真实生活中都曾经历过这些局限,受过教育和富足的人的局限性同无知和贫穷的人的局限性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例如《还乡》的某些部分,以及《苔丝》和《裘德》)。但是,为了做出这些区别并清晰地看到各种不同的反应,我们必须跳出那些自学成才者和乡下人老套形象的影响,把哈代放在他的真实身份中进行观察:哈代身处一个普遍发生激进变化的时代,他既是有教养的观察者,又是一个富有激情的参与者。

哈代的作品,或者抽象来说,他的风格,明显受到了我一直在描述的危机——还乡——的影响。我们知道哈代很为自己的散文感到担心,在他那个时代的一般设想的影响下,他只好去学习笛福、菲尔丁、艾迪生、司各特的作品以及《泰晤士报》,就好像他们能对他有所帮助一样。哈代写的是乡村生活,而他的读者几乎都免不了要把乡村看作是空无一物的大自然,或者是比他们低劣的人工作的地方;作为一个作家,哈代这种复杂的身份在上述语言问题上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关键的。在人们眼中哈代的力量所在——民谣体的叙述、对传统语言形式持久的文学模仿——在我看来却主要都是弱点。这些是他的读者们准备看到的:一种“传统”,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哈代的主要小说成了让人不安的因素,而不是在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连续性,在这种情况下,上述文学手法无论如何也无法对哈代的主要小说有所帮助,因为那些小说所要传达的正是对传统的一种扰动,而非一种延续。人们很容易把哈代的风格问题同苔丝会说的两种语言联系起来:在意识层面上是有教养的,而在无意识层面上是受风俗习惯支配的。但是,尽管这个比较很有启示性,它本身并不恰当,因为事实是这两种语言不论哪一种都无法帮助表达哈代的经历,因为最终来说这两种语言都不够清晰明了:有教养的语言没有力度,在人性方面也有着局限性;习惯的语言为无知和习惯性的自满所扭曲。哈代的作品中当然存在着表明他屈服于这两种模式的标记,但他成熟期作品的主体是一个更有难度、更加复杂的试验。例如:

时光流转,又到了鸟语花香的季节。一年一度的花、叶、夜莺、画眉、燕雀,以及诸如此类的短生之物,又出现在各自的地盘上,而仅仅一年

前,它们只不过是些胚芽和微小的无生物,占据那些地盘的还是另外一些东西。朝阳射出的光线,催生出一支支幼芽嫩蕾,使其舒展成一根根长茎,滋养起一股股液汁,无声无息地涌动着,绽开一朵朵花瓣,在无形无踪的呼吸中散发着芳香。

克里克老板的男女挤奶工们,都过地舒舒服服,平平静静,甚至快快乐乐。在社会各阶层中,他们的地位也许是最快乐的,因为往下比,他们不用愁吃,也不用愁穿,往上比,他们不用因为拘泥礼仪,而抑制天然的情感,也不用因为追逐俗不可耐的时尚,而不能知足常乐。

在绿叶蔽荫的时节,树下乘凉仿佛是人们在户外唯一要做的事情,可是眼下,这个时节就这样过去了。苔丝和克莱尔不知不觉地相互审视着,总是在情感的边缘摇摇欲坠,却又分明不肯坠入情网。由于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驱使,他们一直在往一起聚拢,就像一条山谷里的两道溪水一样。⁶

哈代的这一段话既不是他写得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更确切地说,它表明了看似单一的意图下同时起着作用的许多复杂的压力。“在绿叶蔽荫的时节,树下乘凉”这个例子表明了倾向于使用夸张语言的“有教养”的文风,但“礼仪”这个法语词汇的使用(或许这看上去仅仅是时髦一些)却负载着一种准确的感情。“一年一度的”和“短生的”出现在一个在主要表现出有教养的观点才具有的力量的句子中,也是一种准确的用法。对于哈代想要描写春天那种更加直接、更为人所享受的景色和香气的目的而言,“胚芽和微小的无生物”(哈代当然是从达尔文那里学到了这些词语,在知识方面对哈代起到影响作用的主要就是达尔文和穆勒)这些词语中所表现出的对自然过程的感知是非常必要的。当哈代回到“克里克老板的男女挤奶工们”这样更为简单、更为粗糙的抽象表达时,这不是妙处,而是一种失策;表面看来这好像应该是一个乡村人在说话,可实际上却是一个不带感情、兴趣不大的旁观者的声音。作

6 《苔丝》,141—142页。——译者注

为一个细致的旁观者,哈代越是充分使用有整个语言的资源,他作品的文风就越是恰当。比起“一条山谷里的两道溪水”来,“不知不觉地相互审视着”这个表达更为有力,既文雅又恰当。而前者跟“不可抗拒的力量”一样具有斧凿之迹,好像一个人在故意扮演乡村小说家的角色。

哈代成熟的写作风格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受到了威胁:一是受到了有意将措辞和句法结构“拉丁化”的威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详细的例子(这一点我们都做到了,因为我们非常努力地接受过教育),二是受到了这种不太引人注意的凿饰的威胁,根据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恩赐态度,这很容易被接受,会被当成是一个乡村人说的话(有时候在人为矫饰的如画场景——这种美景现在看来是小说家对笔下乡村人物的恩赐之物——中,这倒的确确是乡村人说的话)。这种成熟的写作风格有着丰富的词汇量和复杂的句法结构,本身毫无疑问是一种有教养的风格,它对于体现哈代的本质立场和特征的那种观察的强度和准确性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黎明时分和黄昏时分,天都是灰蒙蒙的,尽管它们的阴暗程度可能差不多,但那半明半暗的朦胧色调却不相同。在朦胧的晨曦中,似乎光亮是活跃的,黑暗是沉寂的;而在朦胧的暮色中,黑暗却是活跃的,并在渐渐加深,光亮反而在昏昏欲睡。⁷

这是个受过教育的观察者,他仍然深深迷恋于他所观察的世界,这种文风的地区性色彩正是哈代主要小说的决定性基调。

206

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对哈代来说这是个易受攻击的不利位置。若是没有刻意学习过历史并对自然和行为有着专业化的深刻了解,就不会有随之而来的洞察力,他也就根本没法在更为广泛的人文层面上进行真正的观察。甚至是那种所谓的“永恒”感——实际上,这是对历史的感知,对古坟、罗马遗迹、家族兴衰以及教堂里的石碑和墓碑的感知——也是教育的一种功能,这

7 《苔丝》,141—142页。——译者注

一点我之前也已经提到过了。只有在书上读到过传统的人才能够真正体会传统,尽管他通过传统看到的是他的故乡,他同自己的故乡已经由另外一种回忆和经历深深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的家庭和童年;与人和地点之间紧密的联系,这已经成了他自己的历史。能够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审视传统——这的确是哈代特有的天赋:一是将传统看作故乡和故乡经历,一是将其看作教育和有意识的探究。但是,要在对过去和现在这种复杂的感知当中审视活生生的人们,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这个审视过程中,哈代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这就是压力的来源。因为在哈代的时代,能让他得以进行观察的整个过程是同阶级情感和阶级分离联系在一起的,它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决定性的疏远。

如果说两个哥哥发觉安琪越来越不合世俗,安琪则发觉两个哥哥越来越心胸狭隘了。在安琪看来,费利克斯一身教会风范,卡思伯特满是学院气派。他们两人,一个把教会会议和主教视察视为世界的主动力,另一个把剑桥视为世界的主动力。这两位哥哥都坦率地承认,在文明社会里,还有千千万万无关紧要的局外人,他们既不在大学里,也不再教会里。对于这些人,只可容忍,不能看重,不能敬佩。⁸

这就是有时人们所谓的哈代式尖刻,但实际上这只是冷静公正的评论。在哈代那个时代,有教养的社会被牢牢锁在其深深的社会偏见和随之而来对人的疏远之中,哈代对这个社会的所见所感明显是非常正确的,唯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现在的批评家竟然仍然认同那个世界——那个粗暴冷漠地拒绝了裘德和成千上万其他人的世界——并愿意在文学界执行这种最陈腐的政治策略:把尖刻(这是一种纯粹的阶级性的思考方式)从排外的群体那里转移到抗议的群体那里。但是,观察者坚持使用受过教育的人的方式进行观察,却又无法在感情上认同当下受过教育的阶级,随之而来的孤立感会非常

8 《苔丝》,176页。——译者注

严重。这并非是穿着城里人衣服的乡村人感到的不自在,而是被自己的历史困在了教育和阶级之间关系(实际上是智识和同情之间的关系)的普遍危机当中的人所感到的更为重要的压力——当然这种压力也有其不自在感和不时迸发的尖刻与怀旧情绪。正如哈代对克莱尔兄弟的评论那样:

也许,他们像许多人一样,观察的机会没有表现的机会多。⁹

在一个教育被用来训练阶级成员,将他们同其他人分隔开来,也同他们自己的热情分隔开来(因为这两个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的时代中,这话其实就是否定。哈代把这看作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发生在一个阶级当中的过程,但他真正的写作历史则表明他自己就非常清楚这种分隔的经历: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分隔,因为一种更普遍的经历仍然是密切而真实的。

我们在审视哈代描述的乡村时,必须要考虑到这种复杂的压力。他能够这么敏锐地做出反应是因为他自己的流动性存在于一个流动的、变化着的社会中。这就是他在自己关于《多赛特郡劳工》的文章中看待别人的方法(这篇文章可以同杰弗里斯所作的关于《威尔特郡劳工》的那篇文章相比较):

他们渐渐失去自己的个性,但他们在拓宽自己思想的范围,让自己变得更自由。若是为了取悦浪漫主义的观众,就要让他们保持原来那种迟钝、陈腐的状态,这就过分了。¹⁰

这种有关损失和解放,暴露和优势的双重运动正是哈代同他现实中的乡村世界所共有的特点。

9 《苔丝》,177页。——译者注

10 重印于 *Hardy's Personal Writings*; ed. H. Orel; London, 1967; 181。

一个现代的威塞克斯,有铁路,有便士邮政,有割草机和收割机,有联合济贫院,有安全火柴,有能够读写的劳工,有上得起公立学校的孩子。¹¹

重点并不在于哈代对这种现代生活的承认,而在于他列出的现代生活的每一个特点都是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在他7岁的时候多赛特郡通了铁路)。变化带来的影响当然还在持续,整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复杂影响,以及它给乡村社会(当时仍有离开乡村向城镇发展的趋势)不同地区和不同部分带来的不同影响,都在慢慢发挥着作用。乡村并非不受时间影响,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确,正是因为变化耗时太长(哈代也知道这一点),这场危机才有了其独特的形式。哈代看到了社会作为整体的广泛影响,也看到了其内部发展过程和这些发展过程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复杂影响,于是他非常详细地记录并解释了这个过程,正如《苔丝》中写的那样:

然而,乡村生活中越来越显著的变动,并非完全出于农业界的动荡不安。农业人口也在不断减少。以前和农工一起住在乡村里的,还有一班很有意思,也比较有见识到人,显然比农工高出一等——苔丝的父母就属于这一类人——他们当中,有木匠、铁匠、鞋匠、小贩以及其他一些难以归类到非农场工人;这些人有点像苔丝的父亲一样,是房产的终身承租人,或副本土地保有者,偶尔也有不动产的终身保有者,因此他们的目标和职业都比较稳定。但是,他们久住的房子租期一满,就很少再租给他们这样的人居住,如果房主并不急需把房子租给雇工住,就往往把房子收回去拆掉。那些并不直接从事农业的村民,一般都不受人喜欢,他们之中一旦有人搬走了,别人的生意也受到影响,只好跟着搬走。这些人,过去本是乡村生活的中坚力量,是乡村传统风俗的贮藏所,现在却只得逃往人口稠密的大地方,去寻找避难所了。这一变化过程,照统

11 引自《远离尘嚣》前言。

计学家的幽默说法,是“乡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趋势”,其实是一种水受机械驱动,而往山上倒流的趋势。¹²

这里有的不仅仅是城镇对乡村的豪夺这么一个粗糙又伤感的故事。乡村社会自身内部的原始压力被清晰地看到了,并且被赋予了一种人性的、社会的,而非机械呆板的维度。

的确,如果我们往哈代描写的实际关系上强加一种新田园主义的习惯做法,也即将乡村人看作一个古老的形象,或是强加上一种观念,也即繁荣的乡村因谷物法的废除或铁路或农业机械而分崩离析,我们就会错失几乎全部哈代想要展示给我们看的東西。举例来说,谷物法的废除以及进口低价粮食对多赛特郡影响不大:这个郡主要依靠牧业和混合耕作,铁路的开通使其能够直接向伦敦提供牛奶,从而给了它一个直接的商业优势:哈代在《苔丝》中以他特有的准确笔触描述了这个经济进展过程:

他们来到了那微弱的亮光跟前。原来,这亮光是一个小火车站上一盏冒烟的油灯发出来的。与天上的星星比起来,这盏灯就发出那么一点亮光,实在显得可怜。但是对于塔尔伯塞牛奶场和人类来说,这颗地上的星星却比天上的星星更重要。装着新鲜牛奶的大罐,都在雨地里卸下来了,苔丝钻在附近一棵冬青树下,稍微可以躲躲雨……

……“伦敦人明天吃早饭的时候,就能喝上这些牛奶了,是吧?”她问道。“都是些我们从没见过的人?……他们压根儿不认识我们,也不知道牛奶是从哪儿来的,还想不到我们俩今晚赶着车,冒雨在荒野上跑了这么多路,好让他们及时喝上牛奶。”¹³

209

这种新的现实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内部存在的信息和条件的断裂,是这个现代乡村社会的特殊形式。此时在作为整体的经济当中,在越来越有组织性的

12 《苔丝》,397—398页。——译者注

13 同上书,207—208页。——译者注

城市和工业市场中,发生的变化对农村经济(这一经济本质上是附属性的,而且其生产如今只是部分面向国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盲目的影响——这里有了新的需求,其他地方则是经济崩溃和价格下滑。但是在一定距离之外运行并发挥作用的市场力量也深深植根于乡村经济本身:在出租和贸易系统之中;在所有权和租赁制度的危险当中;在劳工在优质和劣质土地上的不同境遇之中;或者在社会构成不同的村庄(就像塔尔伯塞和燧石山之间的对比)之中;在社会发展的总体力量和个人历史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在人们和家庭身上的变化之中——一个有关毁灭或生存、暴露和延续的复杂领域——的时候,这种市场力量还存在于发生在人们和他们的家庭身上的变化当中。这就是哈代的真实社会,我们不能够因为支持“乡村生活方式”这个天衣无缝的抽象概念而压抑哈代的这个真实社会。

在这个主导性的社会现状之外,在某些特定社区的生活当中,的确还存在延续性(尽管在一个仍然部分通过口口相传这种方式进行延续的文化中,两三代的人常常保有“不受时间影响”这样的错觉)。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大部分的乡村地貌中都有非常古老的,常常是从未改变过的自然特征,它们保持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时标。哈代对此非常重视,如果我们考虑到他整个感情结构的话,我们也就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但是所有这些因素都因人们之间直接和现实的关系(这些关系产生于当时存在的压力之中,至多只是通过现有的延续性进行调整和解读)而变得无效,而对哈代这类小说家来说,这是必然会发生的。

因此,哈代笔下人物承受的压力来自于一种生活体系的内部,如今这种体系本身已是一个范围更加广阔的体系的一部分。并不存在内部是乡村生活,外部是城市化这样简单的划分。加布里埃尔·奥克从一个独立的农民变成雇佣劳工然后再去给地主当管家,导致这一切发生的不是城市化,而是小资本耕作的风险。毁掉亨查德的并不是一种全新而陌生的交易,而是他自己的生意的发展,而这一发展正是由他一手造成的。正是卡斯特桥的亨查德在做谷物投机,就好像他也用人进行投机一样;在一种受到观察的生活状态中,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商人,而且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商人;他的力量因此受到了连累。格雷丝·麦尔布里并非一个被上层社会“引诱”了的乡村女孩,她是

一个成功的木材商人的女儿,以这个商人的成功地位来看,他在社交方面的期望就包括了让女儿受更加时尚的教育。苔丝并非一个被乡绅引诱失身的乡下女孩;她是一个房产终身承租人兼小商人的女儿,被一个退休制造商的儿子引诱。后者花钱买了一座乡下宅邸和一个古老的姓氏。苔丝的父亲,以及为压力所迫的苔丝,被一个类似的过程所伤害。在这个过程中,古老的姓氏和骄傲是一个方面,而冠以该姓氏的人们暴露在压力之下则是另一个方面。一个家族衰落,另一个家族崛起,这是千百年来发生在有权阶级以及其附属阶级身上常见而富破坏性的故事。春季结账日移民群、招聘会、傲慢的教区牧师、临时从事农业生产的绅士、把钱财花在别处的地主:所有这些都同敬业的手艺人、劳工群体和草地上的舞蹈一样,属于“乡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哈代不仅看到了劳工工作的现实——正如从马蒂·萨斯¹⁴扛圆木的双手和从在芜菁地里干活的苔丝身上看到的那样。他还看到了经济进程——财产继承、资本、租赁和贸易的严酷,这些进程发生在延续的自然进程之中并且不断与其发生抵触。当这种资本主义农业和商业自然发展的时候,在上述相互作用中产生的社会进程是一种有关阶级和分离的进程,同时也是一种持续不安全感的进程。这样一来,哈代记录下的深刻的骚乱就不能够以伤感的新田园主义方式来看待——不能简单将其看成乡村和城市的对立。哈代把那些失去庇护、遭到分隔的人物放在他小说的中心位置,这些人物不过是整个失去庇护、遭到分隔的群体当中最典型的例子。但他们绝非仅仅证明这种生活方式上的改变。每个人都有一段占主导地位的个人历史,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其历史同这种变化的社会特征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一个本身就在变化的结构当中,流动性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之一就是婚姻选择的艰难性。这种情况不断出现,既与个人有关,又与社会有关:芭斯谢芭在伯德伍德和奥克之间选择;格蕾丝在吉尔斯和菲茨皮尔斯之间选择;裘德在阿拉贝拉和苏之间选择。具体的阶级因素,以及不稳定的经济造成的

14 哈代小说 *The Woodlanders* 中的主人公。*The Woodlanders* 一书的汉语译法不太统一。有不少学者在论著中将其译为《林地居民》、《林中人》等,本书采用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解楚兰译本的译法,译为《森林之恋》。——译者注

相应影响,都是个人选择的一部分,而这种选择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在同别人进行认同时对自己身份的选择。意义深远的是,错误的婚姻(哈代常常对此表现出深深的关注)可能以两种形式发生:同菲茨皮尔斯这样受过教育的、冷冰冰的人结婚,或是同阿拉贝拉这样粗俗的人结婚。这里最具戏剧性的是,我们可以深刻了解到国内流动工人的生活状况。社会疏离进入到了人的个性之中,并破坏了其去爱的能力。奥克和芭斯谢芭的婚姻是经历诸多动荡后得到最终宁静的一个例子,但即使是他们的婚姻也带上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无可奈何和姗姗来迟的意味。的确,哈代迫于压力有时会将这些非常具体的失败归总投射到一种宿命论上——在他那个时代的颓废观念中,有关宿命论的说法都是现成的。同样地,哈代看到人同土地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在被土地经营问题所破坏,有时他会把自己对这种亲密关系和延续性的坚持投射到空无的自然、史前巨石柱时的部落时代和古坟这样一些消极的形象上——至少在那些地方孤独的观察者可以感受到知识的直接流动。但即使是这些刻意带有坚硬质感的消极形象——不可耕种的荒地,光秃秃的石头遗迹——也证实了人性的消极,就像是故意同田园文学唱反调一样。整体性疏离在这些消极的形象当中有着特有的纪念性标记,尽管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来说这些标记都离当下占掌控地位的骚动非常遥远。

但是,尽管有着种种困难,有关哈代最重要的一点却在于他不顾各种压力,成功将自己主要小说的中心定位于生活和工作的普通过程;在这一点上,他比自这种艰难的流动性开始以来的任何其他主要小说家都更为成功。当人们以一种总体的疏离观念——将乡村力量同城市力量对立的抽象观念——来审视哈代时,会故意把哈代努力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分割开来,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所忽视的正是哈代的这一点。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苔丝》中对脱粒机的那一段著名描写,人们经常将它摘出来当作证据,证明这部小说的基本情节就是外来的工业主义同乡村人性的对立:

紧靠着垛檐底下,就是女工们前来伺候的那个红色的暴君——一个木架机械装置,带有皮带和轮子——不过当时还看不大清楚。这就是那

脱粒机,它一旦开动起来,就变得毫不留情,使女工们的肌肉和神经始终处于紧张状态。

再过去一点,又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这家伙黑黢黢的,总是在嘶嘶作响,表明它体内储备着巨大的能量。它那高高的烟囱耸立在一棵树旁边,一股热气从那个地点散发出来,就凭着这些,也用不着天很亮,人们便可以看出,这就是那台要在这小小世界里充当主要动力的机器。机器旁边站着一个一动不动的黑东西,只见它形体高大,满身都是煤灰和污垢,好像有些昏昏沉沉,身旁放着一堆煤,他就是开机器的工人。他那特有的颜色和样子,让人觉得他仿佛来自地狱,偶然走到这片清澈无烟的黄麦白地中间,来惊扰当地的土著。¹⁵

但是,我们绝不能让这样一个描绘强有力的陌生机器的场景遮住自己的眼睛,使我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也是发生在一个故事中的行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脱粒机的行为。这架机器立在田地里,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工作,是因为它受雇于一个农场主而非受雇于产业主义。而且还有很多人力图同这架机器和这个农场主保持进度:

212

就这样,下午的时光慢慢过去了。麦垛越来越低,麦秸垛越来越高,麦子给一袋一袋拉走了。

到六点钟的时候,麦垛还剩下差不多和肩膀那么高。但是,那贪得无厌的机器吞下无数的麦捆,可是没有打过的麦捆还是数不胜数。那些打过的麦捆,全是那个男工和苔丝喂到机器里……

……打麦子的人们,个个都腰酸背痛,气喘吁吁。那个喂料的人已经筋疲力尽,苔丝可以看出,他那红彤彤的后颈上沾满了尘土和麦壳。苔丝还站在原来的位置上,她那红扑扑、汗津津的脸上,也沾满了麦壳,她那顶白帽子也让麦屑染成了棕色。女工里面,只有苔丝一个人站在机

15 《苔丝》,365—366页。——译者注

器上,随着机器的旋转,身子也在跟着震动。由于麦垛越来越低,玛丽安和伊兹就与她离得越来越远,她们也不能像先前那样替换她了。机器在不停地颤动,她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在跟着震颤,搞得她晕晕乎乎,就连两只手的活动,她也全然觉察不到。¹⁶

这段描写关注劳工的面孔和身体,我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同克雷布的关系,而且可以看到从他之后的发展:这是朝向个性化的决定性发展,但也不排除对普遍境况的关注。因为这就是作为女孩子和劳工的苔丝:她意识和动作之间的断裂既是她情感生活的一部分,又是她劳动生活的一部分。她正是在这里或别处工作的时候做出了关键的情感决定;她正是在经历了脱粒机带来的痛苦和扬起的麦灰之后又再次见到了亚力克。这样,哈代达到了一种完满,而这种完满所具有的深度在所有描写乡村的作品中都是相当新的:爱和工作,劳作的痛苦和选择的痛苦,都存在于同一维度当中。

这也并非仅仅是对压力或是痛苦的一种强调。哈代具有很强的洞察力,他经常将劳作视为学习和人际关系的一种重要形式:

他们一起植树、一起伐木;数年来他们一起把那些从未见过的符号和记号记在脑海里——简单说来,这些符号看起来就像是些未知的古代文字,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字母表。当他们身处黑暗之处,阳光穿过树枝照射到他们的脸上时,他们就能给判断树的品种、在何处生长;从风穿过树枝发出的声音中,他们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大老远就能说出树的种类。¹⁷

这一段选自《森林之恋》,描写的是对“自然”的直觉感知,但更具体地说,它描写的也是“数年来”共同工作的经历。哈代深刻地感受到被分隔的长久危机,

16 《苔丝》,375页。——译者注

17 *The Woodlanders*; ch. xlv.

最终遭遇被孤立的悲惨结局,而且他的结局比身处这一传统中的任何人都更具有悲剧性,但他还是不断创作出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的那种力量和温暖:在工作中,在爱情中;在某个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地方。

你若是站在地里不慌不忙地干活,觉得雨水在你身上慢慢流淌,先是在腿上和肩膀上流淌,接着在臀部和头上流淌,然后在后背、前胸和两侧流淌,一面还得继续干活,直至铅灰色的亮光渐渐暗淡下来,表明太阳已经落山;像这样的淋雨,显然需要具备一点吃苦耐劳的精神,甚至需要具备一点英勇顽强的精神。然而,她们尽管让雨淋湿了,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觉得难受。她们两个都很年轻,同时又谈论着以前在塔尔勃塞同住一间屋、同爱一个人的时光,谈论着那片令人赏心悦目的绿色大地,夏季里向人们慷慨地馈赠礼物,在物质上是人人有份,在情感上却只优待她们。¹⁸

如果哈代小说中只有疏离、挫败、分隔和孤立,以及最终的悲剧,那么他感情的总体结构就没有那么令人信服。在《森林之恋》的结尾,或是《苔丝》的结尾,又或是《裘德》的结尾,虽被击败却未被摧毁的是爱情和劳作的温暖、严肃和恒久性,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它们定义了哈代熟知的、已经消逝并为之感到悲哀的事物。非常重要的一——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是哈代同劳伦斯不同的地方;这是时代的不同、历史的不同,也是性格的不同——哈代并不赞美孤立和分隔。他为孤立和分隔感到悲伤,却总是勇敢地直面孤立和分隔。消逝的一切是真实的,是让人心碎的,因为人们的欲望是真实的,一起完成的工作是真实的,未经满足的冲动是真实的。在哈代的整个想象当中,工作和欲望是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马蒂或苔丝或裘德的热情是来自一个相互联系的劳动世界的积极动力;这种热情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着自我实现。哈代作品的关键情节即是这些热情都遭到了挫败;在分离、分隔和摒弃等这些复杂

18 《苔丝》,321页。——译者注

的过程面前遭受挫败。人们做出错误的选择,但他们的选择是在受到极大压力的情况下做出的:阶级混乱,阶级误解,以及对分离开来的世界的故意拒绝,所有这些带来的压力。

214

哈代坚持把普通人的世界定为他主要小说的基调,仅此一点就足够重要了,当然,让他偏离这个世界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这些压力促使人进入的那种生活更有商讨的余地,因为在这种生活中人们不必那么苦苦挣扎,也没有那么泾渭分明。更重要的是,哈代始终同他的中心人物在一起,以此作为对他们的肯定;在实际的情节发展中他还会进一步靠近他们,所以对苔丝和裘德的肯定——通过追溯他们的失败并为之感到悲伤,他对他们做出肯定——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是最强的。

“受人轻视,坚忍顽强”:这并不是哈代这种人的故事,不是那种遥远的、有局限的、美丽如画的故事;而是人物在他们成长的挣扎中受到轻视——他们挣扎着去爱,去做有意义的工作,去学习,去教导;他们在这种共同的冲动中坚忍顽强地生活着,这种冲动会冲破并超越特定的分隔和失败。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延续,而且是一段历史和一个民族的延续。

19 黑暗之城与光明之城

215

1887 年,哈代写道,伦敦:

似乎看不到自己。每个人都意识到自身作为个体的存在,却没有意识到他们作为一个集体的存在——除了可能有那么几个可怜人,带着几分白痴的样子四处呆看。¹

对伦敦的这种看法很明显延续了华兹华斯在《序曲》中的观点,只不过比华兹华斯的观点更加有力。此外,在与之形成对比的“集体意识”这一观点中,对伦敦的这种看法为 19 世纪的民主和工业经历以及语言所改变和拓展。但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意味却依然存在:这个大城市,这个为集体意识所有的地点和代理——至少看上去应是这样——其特点竟然是缺乏共同情感,也即过度的主观性。

这种感觉并非只有哈代才有。一种更加尖锐的不同社会批评始自卡莱尔,华兹华斯也与此一脉相承。柯勒律治和骚塞都曾将城市和工业革命视作社会原子论的媒介。1831 年,卡莱尔曾经这样描写伦敦:

这里的人们是那么地行色匆匆;就好像身后有什么在追赶着他们,让他们把自己的速度再加快一倍;他们的速度实在太快,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他们不能停一下看看彼此!²

1 *The Early Life of Thomas Hardy*; F. E. Hardy; London, 1928; 271.

2 *Journal of 1831*, 引自 *Thomas Carlyle*; J. A. Froude; London, 1882; Vol. II, ch. ix.

然后他接着分析城市中人们之间的分隔,现在被人们称作“群聚环境”之中的分隔:

他们坐在自己被砖块或木板隔开的小隔间里,彼此是陌生人。……这是一个巨大的集合体,由许多小系统构成,每个系统又处于一种无组织的混乱状态,它们的成员不是在一起工作,而是在一起互相争抢。³

根据惯常的传统做法,这种观点会被归为浪漫主义的反城市主义思想;如果这个结论下得太过仓促,那么我们至少应当注意到这种观点直接延续了恩格斯在《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观点:

216 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难道这些群集在街头的、代表着各个阶级和各个等级的成千上万的人,不都是具有同样的属性和能力、同样渴求幸福的人吗?难道他们不应当通过同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吗?可是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只在一点上建立了一种默契,就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边走,以避免阻碍迎面走过来的人;同时,谁也没有想到要看谁一眼。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虽然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可是,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⁴

3 前引书 Froude, Vol. ii, ch. ix。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304页。——译者注

这是一个新的论点。华兹华斯曾将这种感觉的混乱和矛盾明晰化,现在它又被简化并发展成为城市和工业资本主义中人类状况的一个形象。狄更斯在观察这种状况时,努力展示了人类的爱和同情这种实际暗藏着的联系。恩格斯和马克思继续进行观察,他们则努力展示了一种不同的暗藏着的状况:新的无产阶级意识和自觉,这将改变以工业和城市为根基的社会。不过,人们通过直接经验所看到的仍然是社会在一个聚集的过程当中分崩离析。

当然,旧的看待城市的方式仍然保持了下来。哈代认为伦敦是“一个有着 400 万个头颅和 800 万只眼睛的怪物”,⁵ 他在描述 1879 年伦敦市长游行中的人群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让人难忘的描写:

随着人群变得越来越密集,它渐渐不再像是一个由无数个体组成的聚集体,而是变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一种跟人类完全没有相似之处的黑色的软体动物,它伸展到哪些街道上,就随着变成那些街道的形状,并向相邻的巷道伸出可怕的隆起和肢体;这个生物的声音是从它鳞片状的表皮渗出来的,它身上每一个毛孔中都有一只眼睛。阳台、看台和铁路桥上都是从同样结构上脱离下来的各种形状的组织,但它们的动作更柔和一些,仿佛是它们中间那个怪物产的卵一样。⁶

观察者现在不再出现在街道上,而是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在他们的高处。观察者所处的这种距离是一种新元素,但这段描写一直突出拥挤的人群那种非人类的、恐怖的形象,这种对人群明显的恐惧同一直以来人们对民众的反应有关,并延续了这种反应——这种反应千百年来一直都非常明显,城市的巨大发展又大大使其尖锐化。直到 20 世纪初,人们对城市的主要反应之一还仍然将城市的拥挤定为社会危险的一个来源:从人类传统情感的丧失,到大规模非理性的爆炸性力量的积聚等诸如此类的危险——无论在狄更斯或哈代的身上,还是在最反动的政客或地方官身上,这种反应都是非常明显的,尽管

217

⁵ *The Early Life of Thomas Hardy*; 179.

⁶ 同上书,171。

语气有所不同。

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的城市人口超过了乡村人口;在人类历史上,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这个时间标志了向一种新文明的转变,它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将永远不会被遗忘。19世纪末,城市人口占了全部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此外,这并非仅仅是内部的人口转移。整体的人口数目也在大幅增长。1801年英国人口总数为900万,1851年已经增长了一倍,到1911年又翻了一番。但是,要想更细致地了解这整个过程,我们必须超越“城市化”这个粗略划分的限制。如果我们要理解城市的重要性,这一点是尤为重要的。即使是到了1871年,还是有超过半数的人口居住在村庄或者人数小于两万的城镇里。只有四分之一多一点的人口在城市居住,而按当时情况来算,城市人口的标志是十万人:以城市之后的发展来看,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小的。早在1840年,作家们就开始把这一时期称为“大城市的时代”(罗伯特·沃恩1843年写的一本书的书名),这个叫法更多是因为当时城市带来了极大的新鲜感和它们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意味。即使是到了我们这个世纪,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城市生活仍然只是少部分人的经历,但它却被广泛而准确地视为一种决定性的经历,因为它对社会整体的特点所产生的影响大得不成比例。

同时,在我们审视19世纪文学的发展时,我们必须记住城市化进程的各个真实阶段。19世纪的文学大部分还是描写乡村和小城镇的(哈代评论乔治·艾略特说:“她从未接触过田野里的生活;对她来说,她写的乡村人更像是小镇居民,而不像是乡下人”)。文学作品持续以乡村和小城镇为背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记得那个真实进程的话,尽管它们持久而正式地充当文学背景必然还需要其他因素。但与此同时,同大城市的发展相呼应,一种新的文学也在迅速发展。

19世纪早期关于伦敦的作品强调它的多样性:比如说,皮尔斯·伊根的《伦敦生活》(1821)中那种纯粹的混杂性和逍遥的享受。人们对各种奇异的职业和古怪的人物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小本故事书继续流行,而这种传统在城市则已经以更有组织的形式呈现出来,即新发行的星期日报纸。当时的

人们还对犯罪很感兴趣：也即“纽盖特监狱传统”，⁷例如杰罗尔德的《圣吉尔和圣詹姆斯》。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些广受欢迎的元素是如何大量出现在狄更斯的素材中的：他的创造性发展本质上来说是这些元素的变形。但它们的影响比这还要广泛。举例来说，亨利·梅修在《伦敦的劳工和穷人》（1861）以及他在《纪事晨报》上发表的其他文章中对成千上万的伦敦工人进行了观察，他的观察与伊根那种轻松的观察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在梅修和狄更斯的作品当中，这种观察的模式是经过改变、被普遍接受的：工人们和穷人们不再仅仅是些“活跃的家伙”，尽管在梅修对交谈无可比拟的记录中，他们仍然以一种非凡的活力跃然纸上：

要是我买上三磅水芹，我就把它们分开扎成小捆，能扎多少捆就扎多少捆。我得让这些水芹看上去够大，不然就没人买，有些人能杀价杀到不能再低。我挣的钱都存到储蓄会里，要买衣服的时候就去取出来。这比把钱花在甜的吃食上要好，对讨生活的人来说就是这样。再说，喜欢吃甜的就跟个孩子似的，根本不像个要正经讨生活糊口的人。我可不是孩子，到了20岁才是个女人，可我已经过8岁了，真的。⁸

我们清扫那些房子，所有人都说我们的办法目前是最好的。他们说，“我们不要掏粪工了。”先生，你知道，我们的办法根本不会给房子里住的人添多少麻烦，也没有什么难闻的味儿——起码我闻不到，而且价钱也便宜。迟早掏粪工都会消失；总有一天他们都会消失，因为人们总有各种新的借口，总会有一个劳动阶级被毁掉。即便没有蒸汽，也会有其他东西冒出来，和蒸汽一样快地打掉他们嘴里的面包。⁹

给人印象深刻的并非仅仅是这段令人信服的话。还有梅修对种类如此繁多的工作的细节、对金钱和开支还有各种生活方式的广泛了解和关心。他还清

7 纽盖特 (Newgate)：伦敦的一所著名监狱，1902年被拆毁。——译者注

8 重印于 *Mayhew's Characters*；ed. P. Quennel；London，1969；96。

9 同上书，176页。

醒地认识到：

在贝尔格雷弗广场一年挣5千英镑的人和和在贝斯诺格林地区靠可怜的一点工资过日子的人，他们的道德是完全不同的。¹⁰

219

然而真正将这些经历写进小说的只有狄更斯。梅修的兄弟奥古斯都写过几部关于伦敦生活的小说——《凯蒂·拉米尔》(1855)、《遍地黄金》(1858)、《布鲁姆斯伯里最美的女孩》(1861)，以及亨利同他合写的《生命中最大的瘟疫》(一位夫人寻找仆人的故事，1847)以及《为貌而生》(1855)。尽管作品中的记录大多非常准确，但向主题的转换——说得详细一些，向情节和连贯的人物塑造的转换——都为早期的模式和结构所限制。金斯利的《奥尔顿·洛克》则是不同的情况。这部作品愤怒而有力地揭露了制衣业的血汗工厂，而它对伦敦后街的总体描写令人震惊并富于启示性，同狄更斯看待焦煤镇的方式一样。这就是迪斯雷利《柯宁兹比》或是《席璧珥》这样描写北部工业城镇作品的修辞模式和外部模式；一个一般性的社会场景以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命运决定于一种抽象的政治道德。在《艰难时世》当中，狄更斯是最接近这个模式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描写伦敦的小说中，他的视角更加精密、更加复杂：拒绝的因素从根本上来说依赖于接受的元素；对人来说是这样，对街道和城市这样更具一般性的场景来说，也是这样。

19世纪，唯一一个能像狄更斯那样精确地描述城市经历的错综复杂和矛盾性的作家是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但她的成就不同于狄更斯，因为她所写的是不同的城市——曼彻斯特处于明显的工业冲突的中心位置，在这方面它同伦敦是有着不同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伦敦就没有工业冲突，而是说在行业种类方面，在政府、法律和金融当中资本的作用方面，伦敦呈现出一种不同的、不那么孤立的特点来。狄更斯对劳动的描述——人们有时会说他忽略了这一点——就属于这个复杂的整体。在伊丽莎白进行写作的城市，工业生产

10 引自 *The Unknown Mayhew*; ed. Thompson and Yeo; London, 1971。

和占主导地位的市场是其决定性的特征,而且在这个城市当中,以和伦敦相当不同的方式,出现了阶级对抗这种实实在在的新语言。《玛丽·巴顿》(1848)在一个深刻的、也许也是令人迷惑的层次上演绎了阶级斗争对人产生的全部后果。与其说这个故事描写的是穷人和流浪汉,不如说它描写的是饥饿的劳动者和他们的家人——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共有的现状,开始团结起来对这种现状进行修正。重要的是,创造出约翰·巴顿这个“得到了我所有同情的人”¹¹的作者,在她的出版商和她自身的不确定性(这是可以理解的)的压力之下退缩了,没有完全认同这种有意识地用暴力对压迫者进行反抗的行为:这种行为以一种明晰的、非典型的方式表达了劳动阶级新组织的力量。但是,她能够进入必然的阶级意识的世界,并且走得那么远,同时又从未与那些在有系统的剥削下被迫发展出这种新思维的个人失去联系,这一点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同时这又真真正正地标志着一种彻底的改变。

因为这一点正是这一时期伦敦同其他新兴工业城市之间非常明显的区别。伦敦在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由来已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基主要是熟练的手艺人和工匠:这是一种比较老的工人阶级。带有阶级意识的工业激进主义更大程度上属于那些正被按照更为单一、更为明显的模式建设的城市,而在19世纪前50年这些城市是占主导地位的潮流。从严格意义上讲,曼彻斯特、利兹、布莱德福德、伯明翰、利物浦和谢菲尔德的人口增长是非常惊人的,尤其是在1820年到1850年间(有些城市的人口在10年之内增长了40%多)。但这并不仅仅是数字的问题:这些城市建好后是当作工作的地点用的:从物质环境上来说,制造厂和引擎统治着城市,浓烟熏黑了建筑,污水染黑了河流;从社会环境上来说,家庭的组织——“住宅”——是围绕工作地点建立的,因此那种主导关系始终存在。不足为奇,许多调查者和参观者都报道说“社会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没有互信,没有感情的联系……”,而且雇主们自认为是一个阶级,甚至是在“技工们”面前也会这么说,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竞争性的工作。伦敦有的贫民窟跟曼彻斯特的一样糟糕,但伦敦的社会

220

11 引自 Elizabeth Gaskell; A. B. Hopkins; London, 1952; 77.

关系更为复杂、更为神秘化,因此对一般观察者来说伦敦的社会关系不仅更难以捉摸,而且人们更倾向于使用过去那种“富人”和“穷人”这样的词汇,而不是“雇主”和“雇工”来诠释这种关系。

在19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这种不同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见证工业革命及其后果——实际上工业革命的后果已经在改变着伦敦了——作家们纷纷去往北方的工业城市,这是可以理解的。直到更晚一些——直到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以及19世纪末其他多数作家的作品中——的时候,作家们的视线才逐渐超越工业生产现象和紧随而来的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后果。与此相关联的是,工业革命在伦敦这个城市当中的真实反映——如码头地区及同其相连的大型工业的发展、银行业的扩展、证券交易在金融方面新兴的重要地位——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科贝特最初谴责伦敦这个“臃肿的大都市”时,是将其视为一种政治制度。狄更斯在逐渐理解金钱和股票那种冷漠力量的过程中,将伦敦视为一种金融制度。但直到19世纪后期,一种长久以来一直在发展的外在对比才开始作为一种阐释意象被广泛使用。到了19世纪80年代,似乎每个人都能看出来伦敦东区和西区不同,并且从二者之间的对比当中还能够看出新社会的突出形象,而这种新社会已经在全国范围当中普遍产生了。

221

但是,早在17世纪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现伦敦内部这种意义重大的划分。1662年,配第将伦敦向西发展的趋势解释成一种逃离的方式——借助盛行的西风,逃离“整个东部的浓烟、蒸汽和臭味”。1780年,一位名为阿兴霍尔茨的观察者记录道:

20年来人们一直在从伦敦东边向西边迁移……伦敦西边每天都有肥沃的土地和最令人愉悦的花园变成住房和街道。¹²

在西部的这些地区,土地所有权的模式——大片贵族地产的所有权模式——

12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前引书 George, 64。

同东部那种有限、混杂的所有权模式完全不同,其对物质环境的影响也始终非常明显。但19世纪工业向东部的迁移也十分明显。伦敦东部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工业城市,这跟1800年到1850年间码头以及相连的运河和铁路大发展是不同的。东区和西区之间的社会划分在世纪初就为一些观察者所注意,现在则更为深化,而且不可避免地更加明显了。在19世纪中期,东区的境况被描述为“未知的”、“未经勘察的”¹³(做出这种描述的是那些能够将自己的言论出版的人),而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最为黑暗的伦敦”已经成了一个习惯性的称号。约翰·霍林谢德写了《1861年破败的伦敦》,詹姆斯·格林伍德写了《济贫院的一晚》(1866)和《伦敦的荒野》(1874),之后乔治·西姆斯写了《穷人如何生活》(1883),沃尔特·贝赞特写了《基遍的孩子》(1886),亚瑟·莫里森写了《穷街陋巷的故事》(1894)。社会民主联盟先是做了相关研究(1885年《蓓尔美尔街公报》出版了这些研究),之后查尔斯·布斯又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的研究是从1889年的《伦敦人民的生活与劳动》第一卷开始的(这是一项基于统计数字的调查,布斯做这项调查的最初原因是他对早期激进的报告持怀疑态度),同时期还有救世军的工作,这在威廉·布斯的《在最为黑暗的英国》(1890)当中有所描述。以伦敦东区为标志性范例,伦敦的黑暗和贫穷形象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文学和社会思想中都处于中心位置。

对这一点的认识来势汹汹、令人难忘。但正因为此,看到这种形象在文学中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得到调和,这就非常重要了。举例来说,19世纪中期梅修的《伦敦的劳工和穷人》同查尔斯·布斯的《伦敦人民的生活与劳动》之间就有着非常大的不同。现在人们更喜欢梅修,的确,他的著作更有可读性,观点也更容易理解。他的研究基于同人们的直接接触,这些人们用他们自己的话语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尽管梅修打算系统地囊括全部内容,并经常向他所描写的那些人核实他的发现,但他的观点模式仍然属于一个较早期的世界,那时这个问题的规模以及人们一直以来想要系统地修复这个问题的想法还尚未改变社会的观点。布斯则特地要做到客观——在登门拜访之前先进

222

13 *A Picture of England*; W. Archibald; Dublin, 1971.

行计划和评估;制定系统的表格——这使他作品的可读性较差一些,也不那么吸引人,但他的作品属于一种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法,这正是新社会自身的产物:这是社会学假想的实证版本,而这种社会学假想将在罗恩特里、韦伯斯和我们当代的社会研究者手中得到发展。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在很多方面都有缺陷,例如:这种方法的本质是将穷人物化成研究的对象;它使用的分类和评估的方法表明它是去人性化的;对于社会特点它缺乏普遍性的观点。但相应地它也有两个长处。这种方法本身是一种模式,只有在用社会服务来替代随意的施舍时,这种模式才适得其所;这些社会服务本身(过去跟现在一样,这些社会服务是本着研究的精神实施的,但尽管如此这些服务还是得到了实施和扩展)是对城市问题的一种新的反映。此外,尽管对狄更斯和其他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人道主义者来说这种统计学模式似乎非常具有毁灭性,非常可恨,但对一个具有如斯规模和复杂性的文明来说,它却是一个必要的反映。现代社会调查中使用的统计学模式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开始在曼彻斯特有效使用,这一点也不奇怪:它本身就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然而若是没有这种模式,那么在一个复杂的、常常是晦暗的并且总体分裂的社会中本应为人们所认识的事物就完全不会得到认识,而这些事物本应是人们共同经历和共同反映的基础。

这是因为大城市的观念在许多人的脑海当中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这使得人们常常用一种单一的眼光来看待大城市的住民:把他们视为一群人,“民众”或是“劳动力”。这种形象可以带有同情的色彩,也可以带有轻蔑的色彩,但其不变的特性却是持久而有力的。在《狄摩士》(1886)和《新世界》(1889)中,乔治·吉辛从绝大多数人身上看到了这一种特质或者说是状况,并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这种经历的压力之下,个人和社会的问题呈现出了一种苦涩的新维度。个人必须逃离或者试图逃离这一令人反感的、可耻的群体。吉辛回顾了狄更斯,承认“他教给了英国人一种看待大城市的方式”,但就吉辛本人来说,或许就19世纪80年代的伦敦来说,愤怒和认同这种自相矛盾的狄更斯式运动已经分裂形成了一个更加简单的结构:对人类总体的愤怒或者说是厌恶的观察;对少数个人例外的、自觉的认同。在这个结构当中,吉辛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观察力,正如下文他对更加明显一些的工作组织的观

察一样：

现在是人们工作结束的时间。克拉肯韦尔的大路小道上挤满了从一天的苦工中暂时解放出来的人们，男女老少都有。他们从工厂和作坊里涌出，急切地想要最大程度地利用好这几个小时，因为只有在这段时间之内他们才是为自己而活的。还有很多人仍在弯腰劳作，还要再过几个小时才能收工，但大部分人已经离开往各自的牲口棚里走了。沿着大路延伸的车轮痕迹非常危险；每一辆咯吱咯吱驶过去的公用马车都载满了乘客；有些人坐在了马车外面，膝盖上的防水油布闪着微弱的光。灯光被这样那样的东西遮挡，变成一团团雾一样的光晕；头顶上是漆黑的一片天，雨像鞭子一样抽打下来。泥浆不停地飞溅；路上时不时会堵车，夹杂着粗鲁的嘲讽和气愤的咒骂；人行道上挤满了推推搡搡的人。酒吧开始亮灯，让自己打起精神来准备迎接晚上的生意。从大清早开始街道就成了闹市，满是干这干那的人，现在却完全被抛弃了，只剩下寂静、黑暗和席卷而来的风。¹⁴

但早期观察中的人群不是这样的。现在的观察中描写的是动作，不论如何推挤、如何混乱，它都是可以预料的，这样一种动作已经代替了从前的随意性和多样性。现在的观察者是通过人们的总体状况来对他们进行审视的：“大部分人已经离开往各自的牲口棚里走了”既是一种讽刺性的谴责，也是看待一种毫无希望、严酷艰难的总体状况的方式。

对城市物质环境的看待方式也有了不同：早期的伦敦在观察者眼中是多样化的，现在却只呈现出一种压制性的、功利主义的统一。

法灵顿街上的那些建筑真是些可怕的简陋房舍！宽宽的一片都是光秃秃的墙，连点加个装饰的意思都没有；楼房表面是泥巴一样的颜色，

14 *The Nether World*; London, 1889; 23—24.

上面是一排排的窗户,不断向上,不断向上,像毫无生气的眼睛,这些黑暗阴郁的开口向人们讲述着楼房内部的空洞、混乱和不适……大片大片这样的高楼大厦,它们灰尘一般的色调显示出建成的大概时间;当你注目凝视的时候,成吨的砖头和灰泥就残忍地摧毁你的精神。这的确是一些简陋的房舍;里面住着工业主义的军队,一支自己同自己作战的军队——不同的等级、不同的人之间相互战斗,幸存者就靠这个存活。

对相对较新的工业伦敦的这种系统的观察和诠释同早期那种有关混乱和多样性的描述相差实在是太大了,吉辛甚至在描述新伦敦的时候插入了一段对一幢旧式建筑的评论:

人们不得不说射手花园是更好的住处。带一个内院,铺着沥青,清扫得非常干净……

但即使是这样的房子也被纳入了新伦敦的系统中:

……就好像从监狱里抬头看天一样。¹⁵

224 即便是吉辛认可狄更斯审视城市的能力,他还是改变了整体效果:

……伦敦满是肮脏的秘密和恐怖,满是可怕的畸物,满是迷宫一般的阴暗和阴森可怕的魔力。¹⁶

这不太像是狄更斯的风格,倒更像别人,比如雷诺兹或是奥古斯都·梅修,但无论如何这写的是就伦敦,包括“秘密”和“阴暗”。即使吉辛是在对狄更斯进行描述,他自己的观点也更加单一化、更加有组织:

15 *The Nether World*; London, 1889; 58—59.

16 *Introduction to Oliver Twist*; Gissing, G.; Rochester Edition, 1900; xvii.

一个黑暗阴沉的大城市,陷入网中动弹不得,就好像被一只巨大的毒蜘蛛吐丝缠住一般。¹⁷

或者用另一种语气来说,“黑暗拥挤、正在腐烂的伦敦”。即便是境况的变化也只是证明了普遍的绝望,而非积极意义上的差异:

南边是霍克斯顿,这一地区满是散发着恶臭的市场街道、工厂、木材厂、肮脏的仓库、挤满了小生意人和小手艺人的巷子,还有污秽的庭院和通道,尽头是让人厌恶的黑暗;到处都是做着最不体面的苦工的人;大路上满载客人和货物的马车隆隆驶过,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都是最粗鄙的劳工,各个街角和旮旯都展示着最为丑陋的贫穷。再往北走,人们会发现周围的空气变得自由些,街道宽阔些,他们正身处一个只建有住宅的街区;路上似乎只有送牛奶的人、卖喂猫用的肉和水果鱼类的小贩。在这里,有的街道两旁的窗户上都贴着广告卡片招揽房客;其他的街道更加体面一些,房子前面都有一片片的园地,有的还带石膏柱子和阳台。从毫无尊严地为生存而挣扎,变成享受这种低劣的、消磨志气的闲适;在庞大的奴隶大军中,那些工钱较高的人就在自己有时间吃饭睡觉的时候退到这个地方来。¹⁸

后一种命运与前一种不同,却不比前者好到哪里去。唯一的出路是为那些例外的个人所有的,但他的命运也是一直在变化的,混乱不堪,含糊不明——大多数情况下,他要么在努力多年之后仍然失败(《新寒士街》中的里尔顿或比芬),要么最终发达却道德沦丧(《狄摩士》中的莫迪默,《新寒士街》中的米尔凡),因为在这个毁灭性的总体环境下,唯一能为成功事业所托的形式必将导致对他人劳力或是脑力的剥削,而且这种剥削之所以能够存在,仅仅是因为被剥削者的愚蠢、冷漠或野蛮。

17 *Introduction to Bleak House*; Rochester Edition, 1900; xvii.

18 *Demos*; London, 1886; 178.

这是一种刻薄却清醒的看法,只有在最后对旧式的知识分子生活和旧式乡村——这些明显是逃避和救赎的方式——进行简略审视的时候,这种看法才有所软化。吉辛记录国内迁移这段历史的笔触同哈代一样有力,但却比哈代更辛辣。《狄摩士》中的莫迪默可以同《还乡》中的克林姆·依奥布莱特相提并论,但这里却有着某种时间和精神上的距离,而在这个迅速变化的社会当中,这种距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实际距离;裘德离开马里格林搬到克里斯敏斯特去的时候,这种距离又重新出现。在城市当中,越来越多的事情变得有争议,越来越多的事情面临风险;城市的支撑更加不稳定、更加危险;它的主要支持点更难辨认;城市中成功和失败形式发生了变化,与原来不同,却比原来的问题更大。在《注定流浪》和《不入流者》中,吉辛从内部对这场意义重大的迁移进行了经典的描述。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曾提出的问题——狄更斯将其作为总体状况的一部分,乔治·艾略特将其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道德挑战——在一代人之后,现在变得更加严苛、更加混乱。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范围涵盖了吉辛的辛辣和马克·拉瑟福德的绝望,哈代的悲剧和威尔斯令人深思的洋洋得意。所有的这些情绪产生于这个逐渐安定的时代,流动性减少的时代,转变的时代;它们也将在我们这个世纪得到直接传承。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一部分作家专门写作关于伦敦的作品,他们被称为“伦敦佬派”;将吉辛同这些作家区别开来的就是吉辛注意到了流动性带来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如果多数情况下是间接引发的——观察者的问题。

比利·乔普懒洋洋地从对面走过来,蹒跚穿过人行道,两人碰面的时候,他从口袋里伸出离她近的那只手来,抓住她的胳膊一拧,把她推到墙上。

“别闹!加恩”莉兹伦特开心地说:“放手。”因为她知道这是爱的表现。

“你要上哪去啊,莉兹?”¹⁹

19 *Working Class Stories of the 1890s*; ed. P. J. Keating; London, 1971; 29.

这是城市的新声音。它生气勃勃,叙述起来非常直接,在19世纪90年代的小说尤其是短篇故事当中,这种声音已经成了一种特点。从简·奥斯丁到乔治·艾略特,从狄更斯到吉辛,这些作家的小说中都有拥有意识或自我意识的叙述者,尽管叙述者的模式多种多样;但现在这种叙述者已经消失,为一种标准化、职业化的讲述所取代。按照这种逼真模式,伊莉莎白·亨特不仅被昵称为莉莎·亨特,甚至变成了莉兹伦特。她“知道”被拧着胳膊推到墙上“是爱的表现”,因为她可以知道,而这正如这类塑造生动、名字时髦的人物所特有的。这种用语模式没有经过修饰,也未被以解释的方式嘲笑过(吉辛的作品有时候会这样做);它之所以出现完全凭自己的正当性,但这种正当性需要依靠新形成的在叙事距离方面的普遍传统。

表音法方面的认真模拟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英语拼写同其本地多种不同发音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问题多多,这几乎都出了名了。故意改变表音方法的例子早在伊丽莎白时期就可以找到:莎士比亚本人用表音法的改变来模仿威尔士人和法国人的发音;各种版本的“乡村”口音——各地口音的一种融合——也非常常见。狄更斯采用了伦敦口音的一些变体。但系统地使用用语模式来表现不同阶级的做法到了19世纪晚期才开始盛行,在这一时期人们的阶级意识明显在增强,而且正在向口音这些方面扩展。对表音法进行重组有时是出于一种热爱的感情,如威廉·巴恩斯的多赛特诗歌。但值得注意的是,哈代却反对任何系统地改变表音法的做法,理由是这种做法会产生一种疏远的糟糕作用,并且把人们类型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亚瑟·莫里森和吉普林对伦敦口音的仔细描写变成了习惯做法;前者在1893年创作了《莉兹伦特》,在其中使用了“伦敦腔”;后者则在《巴达莉亚·赫罗兹福特的故事》(1890)和他的士兵歌谣中也使用了“伦敦腔”。吉辛的作品中也出现了这种类型化做法——其原因正在于哈代反对的那种观察和关系的模式。读者学着带着他们所认为的诚挚敬意和他们所同样认为应当保持的距离去追踪这种类型化描写的细节。

“你要上哪去啊,莉兹?”(“Where yer auf to, Lizer?”)但原文中的“Where”是标准的习惯拼法,几乎同任何发音都不一样;“yer”和“Lizer”带有

一种普遍的用语习惯;而“auf”直到现在都还让人难以确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拼法——其变体是“orf”,因为在“伦敦腔”和中产阶级上层的多种用语模式中,长音“o”(或许后面可能还会加个“r”的音)是很常见的。所有这些细节都无法敲定,拼写和英语发音模式之间的潜在关系实在太复杂了。但这种表音法标志着一种审视方法,这种审视方法广受赞扬,因它具有自然主义性质,而且它明显地避免加入具有作者自我意识的评论。真正的关键在于这种“评论”现在已经被完全融合了;它现在是在一定的“社会学”距离上开展的一种完整审视方式的一部分。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时期的这些作家具自信而迷人的写作风格,这类风格往往能够获得真正的成功,而其成功依靠的就是那种描述性的、具有代表性的、被小心遵循的自然主义。在自然主义当中,意识的问题以及明显和有争议的观点带来的问题都被搁置。人们就在那里;可悲的或是坚忍的;施暴者和他们的受害者可用的生活碎片也即著名的自然主义“切片”。

227 这种笔调属于新的城市经历,但如果细致来看,这种笔调也是诠释的一种直接形式。亨利·奈文森的《罗切斯特的圣乔治》(1894)或埃德温·普的《闲聊》(1895)更多地延续了梅修式的倾听记录和观察;但在吉普林和莫里森的作品当中,这种记录和观察演变成了生动呈现,效果也有显著的不同,而其他作家(如爱德考克和鲁克)的作品当中则同时使用了这两种模式:一会儿是记录,一会儿又是对城市的人们进行生动呈现。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森最初在进行总体观察时,同吉辛的共同点非常多,然而在《雅格的一个孩子》和《墙上的洞》两部作品中,他却对犯罪行为和暴力极为关注。犯罪和暴力广泛存在于新旧城市当中,但就其特点来说,它们比更具多样性的完整结构更适于呈现,更称得上是故事。城市小说对暴力的选择从某种维度上来说可以追溯到“恶棍做派”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但这一题材变得越来越流行,我们最好还是将其视为体验城市生活的一种模式,该模式在城市生活的孤立领域和事件当中不仅捕捉到一种可以理解的高尚兴趣(着迷和恐惧,以一种单一的模式保持距离),而且在被观察和描述的对象不是一个社会,而是整体人口时,捕捉到那种最明显、最易被分离出来的行为方式。

但是,莫里森的小说一直关注犯罪和暴力,它们因而具有一种与制造神话的吉普林非常不同的特质;或者说,如果要从伦敦内部与同时代的作品做一个重要比较的话,莫里森的小说同柯南·道尔的小说有很大不同。在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中,伦敦又变成了有着“迷宫一般的阴暗和阴森可怕的魔力”的城市。这个城市侦探在狄更斯和威尔基·科林斯的小说中就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影子,现在他确确实实开始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物正式出现了:这个人能够在迷雾中找到自己的路,能够看透伦敦街头的一切错综复杂。犯罪代表了现代城市生活中晦暗的复杂性,社会的探索者被简化为单一动机的发现者、可被分离出来的媒介,尤其可能被简化成只剩下他的手段,他的技术。随着时间的流逝,柯南·道尔笔下的伦敦慢慢带上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氛围,有些人在回顾这种氛围时会带有一种怀旧的情绪,同任何对乡村的回忆一样明显、一样系统:雾、煤气灯、单马双轮的双座出租马车、街头的顽童,以及这种怪异的敏锐头脑,这种几乎无有实体却又极具地方色彩的智慧,它能够解开谜团,影响地方当局,然后由于调查结束了,又将案件移交给警方和法庭:超越所有喧嚣和迷雾之外的清晰而抽象的体系。

这是一种带有强烈地方色彩的审视方式。在吉辛、莫里森和其他作家的作品当中,这种审视方式为人们留下了关于伦敦这座城市的许多难忘的形象。但正如这座城市有着另一段历史,它也有其他的形象。这座城市的黑暗、压抑、罪恶和肮脏,还有沦落的人性,当然也会以不同的方式为人们所经历:这种不同的经历不仅出现在鲁克的《骗子比利》(1899)这样活泼的故事当中,在威尔斯的作品当中也表现得非常显著,而威尔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属于一种已被那些更难忘的形象所遮盖或排除的历史。

因为这座城市仍然可以被视为光明之城。即便是简单地从事实来看也是如此。早在1780年,阿兴霍尔茨就写道:

228

这些灯都有两根或四根分枝,装在圆形的水晶罩里面,相互之间间隔一定距离固定在柱子上。不论冬夏,也不论有没有月光,太阳一落山这些灯就亮了。仅仅是牛津路上的灯就比整个巴黎市的还要多。即便

是七八英里长的大路也安满了路灯,使得这一景象更加宏大。²⁰

从19世纪初开始,煤气灯就被用来照明、制造景色效果和进行展示。19世纪中期,许多居民和游客都同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德森有着一样的印象:

在我下方,这个世界性大都市像是用火光画出来的一样。²¹

19世纪末,勒·伽利安纳写道:

伦敦,伦敦,我们的欢乐,
只在夜晚开放的花朵。
午夜太阳的城市,
白天结束时它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一盏一盏的灯光映着天空,
好像突然睁开的闪耀眼睛,
左右两旁都散发着光芒
斯特兰德大街上盛开的铁莲。

这时首都的财富和公共效应都在明显增长,而诗中所写的灯光则是首都这种醒目的文明所有的一个明显意象。不论在东区发生了什么,西区正被重新设计和改进,而且常常是有意与东区联系起来:特拉法尔加广场,一座新宫殿,新议会大厦,新建的公园和新修的公路。一位名叫科尔曼的美国游客着重强调了种种明显的反差:

就在这非同一般的富足景象当中,有因饥饿而奄奄一息的男人、女

20 前引书 Archenholz。

21 引自 *Great London*; C. Trent; London, 1965; 200。

人和孩子;路上行驶的是豪华马车,带着镀金的全套用品、丝般光滑的里衬和穿制服的男仆,而这些马车的旁边就是些贫穷绝望、无朋无友、几乎是赤身裸体的可怜人,他们看上去不过是人性残存下来的碎片而已。²²

18 世纪乡村宅邸那种刻意展示的富丽堂皇,那种施予被统治的大多数民众的身上,叠加在他们所处的明显的贫困之上的奢华炫耀,正在这个阶级分明的富裕城市当中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作为贸易和政治影响力的中心,首都也在以熟悉的方式吸引着世界许多地方的各种人才。在基本上被分隔开来的东区,“最黑暗的伦敦”这种感觉的产生是由于这个作为国家首都和国际都市的城市的有一部分实在是光芒万丈。柯南·道尔在福尔摩斯这个形象身上创造出一个纯粹智慧的化身,能够穿透迷惑常人的晦暗难解之处。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柯南·道尔很可能收集了很多统计学数据来证明伦敦在才智方面的卓越之处,而这种卓越既是城市本身固有,同时也来源于“各行各业最聪颖的精英”的大集中。这种对耀眼、强势的大都市文化的描述,能够提供足够的事实来支持城市作为光明与学识的中心这种传统观点,只是现在这种支持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无论在哪个层次上来看,此时英国的文化集中已然比任何可比的社会都更为明显。即便是要反对城市、拒绝城市,人们也要先来到城市;没有另外的可行方法。

229

尽管这一点很重要,但它还是一种较为表面的影响。城市文化在代理或消费人类天赋上是非常卓越的,而它却总将与人类天赋的那些常常各不相同的、多样化的真正来源混淆起来。当我们衡量新城市文化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严肃地说,颇具特色的新社会思想和新社会组织正在其中诞生,不论是作为对城市文化的混乱状态的反应,还是作为城市文化的明显刺激所导致的在资质上的提高。哈代曾悲叹伦敦缺少“集体意识”,但正是从英国的各个城市——不论是工业城市还是首都——中,新的民主形式和思想正确切无疑地发展起来的。从威尔斯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发展的一个方面。跟

22 *European Life and Manners*; Colman; Boston, 1849; Vol. I., 155.

其他人一样,城市的社会状况让他感到惊骇,尤其是居住状况,那是“长期性的灾难……屠杀、堕落和对生命的摧残”。同吉辛一样,他看到:

人行道上永远都有一层黏糊糊、滑溜溜的薄泥,头顶上是阴沉的天,对这一大群邋里邋遢的人来说,这阴沉的天气简直断了他们对任何事情的希望,到死为止他们能指望得上的只有邋遢和肮脏。²³

他把东区看作是“肮脏的旷野”,这里的人们“皮肤苍白,毫无生气,在一个西区人看来,这样的外表既颓废又不祥”。²⁴这些人并不具有悲剧色彩,而是虚弱、焦虑、缺衣少食。不论是在东区还是在更体面、更焦虑的其他市郊地区,逃离这种贫穷、处处受限的生活几乎就等同于搬往乡村,或者可称作理想化的快乐逃亡。但威尔斯也看到了英国乡村的真正秩序,就像《托诺-邦盖》所最为清晰展现的那样,他在伯雷茨欧描述的那个满是乡村别墅的英国:

230

大房子、教堂、村庄,还有地位各不相同的劳工和仆人……这是一个封闭的、完备的社会体系。我们周围是其他村庄和庄园,在一幢一幢隔行而建、相互联系的房子之间,来来去去的都是些乡绅,都是些不一般的人物。

不论工业革命和城市革命带来怎样的变化,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体系都没有消亡。实质性的改变也不过是入侵这个体系或是使它更加有光彩。不论是在伦敦的中心还是在村庄中,这一体系的本质特点都一样明显。它阻碍所有真正的成长。因此,在城市中发生的一切其实是这一更为简单的秩序的一个赘疣,一个凸起。就其本身而论,它就是一颗毒瘤:

某种肿瘤般的生长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无组织的物质,而这种增长过

23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British Intellect*; A. Conan Doy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ugust 1888.

24 引自 *Victorian Cities*; Asa Briggs; London, 1963; 17, 358.

程撑破了受感染宿体的所有轮廓。

这就是一个城市和一种文明病态的外形。但这只魔鬼现在已经不那么可怕了,它有了一个更人性的外形。它:

就像个肥胖、得意的谄媚者,像傲慢,像懒惰,像生活中一切正在变暗的、沉重的障碍。它是脓,是黑暗,它是反灵魂,它是这片土地的统治力量——愚蠢。²⁵

要用这种眼光看待城市也就是要强调完全不同的事情。威尔斯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人都清楚地看到了城市统治力量和乡村统治力量之间的联系。如果这种力量的共同特点是傲慢、懒惰和愚蠢,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反抗:不是靠怀旧性的纯真,而是靠自觉的进步:通过教育、科学和社会主义。

于是,威尔斯收集并结合了整个世纪当中那些非常不同的,甚至是另类的传统。如果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丑恶和卑劣是一个增长过快,但却仍然僵化、愚蠢的体系的癌样后果,那么还有一种新的方式可以用来对抗城市,这种方式不仅不会依靠一个理想化的乡村秩序,反而把这种秩序看作疾病的一部分。此外,如果事实的确如此,还会有现成可用的、活跃的真实力量来与此抗争:这些力量由新的文明能量释放出来,却又被错误的社会秩序所压制。

我们不能将这种威尔斯式的观点简单看成是不加限制地盲目推崇科技(尽管这一直都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而且在真正的社会困难中还时常会被提取出来),这种观点同正在稳步发展的社会主义观点有所联系。因为让人们看到新文明的希望的并非只是科学和物质生产所取得的成果,而是城市之中新式社会组织的成长。多数一般性的谴责的确常常会忽视这一点。正如卡莱尔和其他人提出的那样,当时的确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聚集现象和个

231

25 Tono-Bungay; 第一卷第一章及第二卷第一章。

人利益至上主义的观点。但这绝不是事实的全部。当时也存在着为建立新的形式的地方政府而进行的斗争：这些新的形式本是对城市中过度拥挤和混乱的一种反映，但事实证明要比旧式地方地主那种横行霸道好上许多——地主的横行可是以前唯一的体系。此外还有为取得投票权的斗争和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同样是以城市为中心进行的。还有为能够接受教育而进行的斗争，从城市开始，最终在乡村推进时却很有难度，因为乡村还在地主及其食客的统治之下，民众的无知符合地主的既得利益。市政文化和大都市文化也在积极增长：城镇有了新的需求，人们为了能让他们感到愉悦的新事物而斗争——图书馆、学院等等。这种自由主义进步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后在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维度当中还有着其他的事物的存在。工人阶级本身的组织正在成长，这是对工业暴政和无政府主义的一个伟大的文明反应：城市互助组织构成的网络中发展出来的工会（那是对一种新的、积极的友善情感的表达）。并且除此之外，人们还将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看作是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合作组织和社会主义——同样是属于新城市的。这个运动贯穿在 19 世纪的整个进程中，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它还是慢慢成长起来。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这个运动甚至影响到了伦敦东区——吉辛和其他作家所描绘的那片象征性的荒原。对恩格斯来说，它在经历着变化：

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藪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死水潭了。伦敦东头抖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立了所谓的“新工联”，即广大的“没有技术的”工人群众的组织的发源地。²⁶

那时的时代是煤气厂工人建立工人组织的时代，是卖火柴的女孩们罢工的时代，是发生 1889 年码头大罢工的时代。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这些新的工会和斗争同早些时期的行业工会主义之间还有不同：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5，324 页。——译者注

(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始人和领导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²⁷

对社会的新看法带来的文明力量从斗争当中产生,从新兴大都市的混乱和贫穷中产生并扩散开去,为国民情感重新带来活力。这种力量聚集了代代受压迫、受剥削的人的苦难和希望,并以这种出乎意料的、极具挑战性的形式充当着对城市和乡村中长久以来丧失人性的一切的回应——来自城市的人性的回应。

在城市当中,在它毁灭性和转化性的环境当中,华兹华斯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人类的团结”。对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合作的这种感知以各种方式延续着,并在城市当中找到了其新的形式——而城市正是剥削和野蛮最集中、最明显的地方。尽管经历了许多失败、失望,这种感知仍然持续着、成长着;教育、合作、民主、社会主义——各种观点和制度在慢慢地积聚力量。吉辛对这个过程很了解,最初对其也非常支持,但渐渐地他像其他人一样,开始认为这个过程会被城市同样也在不断制造出的无知和畸变所压服、腐化。他看到了“社会残暴的力量,简直能用残骸填满地狱的深渊”。进行改变的梦想同样也会消失在这深渊当中。《狄摩士》,这个“英国社会主义的故事”,带着典型的尖酸口吻驳斥了社会主义式理想主义的可能性。正是穷困的这个第二阶段——不仅仅是残酷的苦难,还有希望的崩溃——让他重新萌发“在小茅屋的屋檐下读荷马”这种梦想。威尔斯则更有活力、更有信心,他不仅看到了这一点,还看到了其他危险:他在《托诺-邦盖》的世界中看到了商业煽动行为的胜利,就像吉辛在《新寒士街》中看到了商业出版社和商业文学的胜利一样。新的自由和新的教育可能会被腐蚀、被同化,城市会以无法想象的规模来培养自由和教育的堕落的替代品。即使是新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它们是文明的承载者——也可能会变得混乱、腐败,被同化;毒瘤般的

232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324页。——译者注

发展可能完全压制这些新兴运动。

但至少对威尔斯来说,对新社会主义来说,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历史可能向两种不同的方向发展;若是没有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唯一的可能就是陷入越来越糟糕的混乱中,城市会将自身粉碎。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这仍然是一场无止尽的斗争。人们必须再次关注它。但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我们仍然可以记起哈代的话,只不过其意义有了变化。工人运动的新组织、教育和民主的新制度,这些是伦敦和其他城市以及如今在它们统治之下的整个国家开始审视自己的方式:它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且在这种意识当中——在这种集体意识当中——它们开始看到一个不同社会的各种形态。

20 城市中的身影

233

然而从一开始,对现代城市新特性的感知就与一个人独自在城市街头漫步的形象联系起来。在布莱克的诗中,一开始就有这个形象:

我走过每条独占的街道,
徘徊在独占的泰晤士河边。¹

这个形象也存在于华兹华斯的诗中:

常常在这熙熙攘攘的街道中,
我随人群漫步向前,
对自己说,每一张
经过我身边的面孔,都是一个谜……
……直到眼前的一个个身影变成
魔幻般的长长队伍,好似飘过
寂静的高山,又好似在梦中出现。²

城市小说家的作品中,这种经历常常会重新出现在作品人物身上,例如狄更斯笔下的弗洛伦斯·董贝:

1 《伦敦》,王佐良译,引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王佐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5页。——译者注

2 *Prelude*; 前引书,286。参照“这是城市中的孤独;众人如行尸走肉般在行走”;Clare, *Child Harold*; *Canto Third*; xxvi。

人们为了日常生活和工作奔忙而引起的纷争与喧嚣正在逐渐增加……从她身旁匆匆走过的脸上露出了惊异与好奇的表情……长长的影子又怎样回到人行道上……她听到陌生的人在问她，她到哪里去……到哪里去，仍然是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任何地方都可以！仍然是一直往前走着。可是走到哪里去呢？她想起她在唯一的另一次，曾经在这宽阔茫茫的伦敦迷了路……³

在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作品中，这种孤立感是同社会对比联系在一起的：

两旁的店铺灯烛辉煌。街上非常好看，煤气灯晶光雪亮。橱窗的陈设比白天更显得精彩。所有的店铺里面，那个药铺可真像我们小时候听到的那些神怪故事：从阿拉丁仙果累累的花园，到罗莎梦紫色的凳子，一应俱全。可是巴顿却并没有这种联想，他只觉得这些堆足货物、充满光线的店铺和那间昏暗凄凉的地下室正好形成一种对照，不禁十分难受。这些人生的神秘问题，他和许多人都想不明白。他不知道在这些东奔西走的人群里面，有没有一两个也是从那种悲惨的家庭里来的。他们看上去都很快活，他的心里于是又大为不平。每天有不少人在大街上跟你擦肩而过，可是谁也猜不透他们的心思。⁴

234 这就是狄更斯的心情——尽管可能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大的戏剧性：坚持认为人是有同情心的，因为各种障碍、冲突和神秘事物都如此清晰地摆在眼前。从狄更斯到威尔斯，作家们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节：一个人物走进了一个沉睡的城市，他想到这个城市当中隐藏了那么多生命、与他如此接近——他被这个念头所慑服。这样的情节是真实的。但很明显，这种经历有两种发展方向：它可以跨越拥挤人群之间的陌生感造成的障碍，发展成为对共同人性的肯定；或者发展成为对孤立感的强调，对神秘感的强调——

3 《董贝父子》，975—976页。——译者注

4 《玛丽·巴顿》，荀枚、余贵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78—79页。——译者注

神秘感本是一种普通的情感,它有可能发展成恐惧。华兹华斯对这两种反应都进行了探索,而19世纪文学则从这两个方向上对华兹华斯的探索进行了拓展。

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在巴尔扎克、波德莱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当中,城市都发展成为某种主导性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这种发展的方式有所不同)。巴尔扎克展示了城市的社会复杂性及其持续的流动性;既然他的目的在于对此进行描述,那么由此产生的形象尽管很复杂,但同时也很清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的是神秘感、陌生感和联系的缺失等元素;然后他开始努力设计最后的识别,这同狄更斯是有可比性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围绕不同的最终反应进行的。他同狄更斯之间的区别在于,他的识别并非来源于社会给人造成的窒息感,而来自一种精神上的承认,来源于孤立的绝望的另一面。波德莱尔则颠覆了所有这些价值观。孤立感和联系的缺失是新的、更生动的感知产生的条件:

大众与孤独:一个活跃多产的诗人能使这两个词语含义均等,可以相互替换。⁵

城市是“对生命力的放纵”,是一个充满“狂喜”的转瞬即逝的世界⁶。它教导人们的灵魂要:

把自己连同自身的诗意和慈悲都交付给预料之外突然出现的一切,交付给偶然发生的未知。⁷

波德莱尔说人要让自己沉浸在人群之中,这其中有新的乐趣,有对自己身份的新的扩展。

到了20世纪,这将成为人们的一种主要反应。城市的这种社会特

5. *Short Poems in Prose; in The Essence of Laughter*; ed. P. Quennel; New York, 1956, 139.

6 同上书,140。

7 参照 *Baudelaire*; ed. M. Turnell; London, 1953; 193。

点——转瞬即逝、无法预测,还有它那实质性的、令人激动的隔绝和人事变迁——被视为人类整个生活的现实。这并不总是意味着人们愉快接受了波德莱尔的观点;但通过后来出现的一种宗教宿命论,通过一种美学上的超然,或是人们对多样性和瞬时性带来的快乐有更普遍的感知,这种观点流传开来,甚至渐渐占据了西方文学中的优势地位。或许仍然存在着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比,凭借的是乡村定居和纯真这样比较古老的观念。但这种对比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意识同无知之间的反差;活力四射同例行公事之间的反差;当前的、实际的事物同过去的、失去的事物之间的反差。城市经历现在已经非常普及了,绝大部分作家又深陷其中,就好像其他任何一种生活模式都没有什么真实性可言;感觉的所有源头似乎都始于城市、终于城市,如果还有什么城市中没有的,那它也不应当出现在生活中。

这种反应的每一丝、每一缕我们都应当进行探索,这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我所说过的,在吉辛的作品中,漫步街头的孤独身影被城市的人群和丑恶所淹没。他对自己名义上的感觉源泉做出如下描述(这一描述对他要比对狄更斯更为适用):

黑暗的、拥挤的、腐化的伦敦——任何一个有想象力的人在心情低落时漫步伦敦街头,都可以用这句话精彩地描述出他对伦敦的印象。⁸

在之前引用吉辛对伦敦的描述时,我略去了这句孤立出来的强调,目的是在这里可以更清晰地对它进行审视。在经过霍克斯顿,抵达北方之后:

在这样一个街区散步是一个人可以经受的最沉闷阴郁的锻炼;这里处处可见的肮脏和贫穷足以摧毁人的心灵;人们知道,这里每一幢死气沉沉的房子,每一扇假窗,都代表着一个“家”——这个字所代表的一切含义都散发着浓浓的绝望。⁹

⁸ *Introduction to Bleak House*; 前引书; XX。

⁹ *Demos*; 178.

或是对法林顿路上简陋房舍的描写：

夜晚经过这里，极力要发挥想象来描写在这些可怕的墙壁里面挣扎翻腾的一切：人的疲劳、兽性、本不应属于他们的悲哀、毫无指望的希望、被摧毁后的屈服。¹⁰

但吉辛同更有信心的威尔斯一样，仍然是在对一个现实中的城市进行直接的社会观察。但是在他开始写作之前，类似的绝望已经以一种不同的文学样式得到了表达：这种样式将城市看作是一种象征。

一直以来城市都有着这种象征的作用，最明显的就是城市作为圣城，也即上帝之城的宗教形象。威廉·布莱克在审视伦敦和英格兰时就使用了这种文学样式的一个变体，他想要重新建一个耶路撒冷。但现在又出现了急剧变化。在英语当中，这种改变在詹姆斯·汤姆森的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作于1857年的《城市末日》以及作于1870年到1873年间的《暗夜之城》。当我们阅读这些卓越的诗篇时，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同我们之前讨论的一些不同文学样式之间有着相当的联系。我们常常会想到狄更斯，也可能会想到理查德·杰弗里斯在《伦敦之后》（1885）中关于城市毁灭的幻想——这产生于狄更斯之后，而且更为人们熟知。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在这些各不相同的作家的作品中，一种共同的情感结构正在渐渐形成。但除了所有这些联系外，我们发现汤姆森作品还有其独特之处，也即他笔下的城市是一个设计出来的非常完整的幻象：城市作为人类生活状况的符号的幻象。

236

尽管《暗夜之城》更为有名，但《城市末日》中蕴含的力量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汤姆森完成这首诗的时候年仅23岁。在这部作品当中，他有意地离开现实中的城市，进入了一座想象中的城市——死亡之城。他离开了他的房子——那也是他的牢笼，在那里：

10 *The Nether World*; 59.

巨大的城市沉睡在一片寂静当中，
在睡梦中把它的骚动、劳苦和纷争都抛诸脑后；
但沉睡，还有沉睡时甘美的梦都不属于我，
不属于被诅咒的我。恐惧和痛苦
来自无望的梦想和穷困的生活……
……我在它们的驱赶之下前行，宛若恶灵附体。¹¹

这种在城市街头独自漫步的形式同之前的作品所描述的又有不同：

我走过荒凉的街道，发出微光的
街灯只照出我那乱成一团的生命……
……在这个被埋葬的城市的石头迷宫当中；
这里满是尸首，他们梦到
出生或者死亡——梦到错综复杂的生活
他们的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
都满是笑声、呻吟和眼泪，
他们同自己和命运进行永不停歇的
争斗，有失亦有得。
是的，这些尸首就躺在他们的坟墓里，一动不动。¹²

他穿过“荒凉的海”，“没有航海图和星辰的指引”，来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正是上述幻象的实体；一个石化了的躁动不安的邪恶城市：

石像布满了各个街道和广场，
有的寒暄般聚在一起，有的则独自一人；
黯淡无光的石头商人手里展示着各色货物

11 *Poems and Some Letters of James Thomson*; ed. A. Ridler; London, 1963; 12.

12 同上书,13。

想要吸引石头买主的眼光。¹³

这正是他一直以来被迫寻找的寂静城市：

我在原来那个普通的世界中，被无数
和我一样的人所包围。
恐怖和致命的痛苦抓住了我，
驱赶我去寻找那可怕的未知。¹⁴

这是死亡之国“无边无际、无处不在的孤独”，但死亡也终结了动荡的生活：

我四周是整片宽阔的生命之海，
热情的、起伏的、不安的、堂皇的生命……
……终结在它极度骚动的斗争之中。¹⁵

最后，这是大都会。人要通过孤立才能到达那里：

237

同情的绳索本应用甜美的交流将我
同世间的手足情谊系在一起
我却将它越拉越紧，紧紧地绑住自己，
为了某种心绪，扼杀我迷失的存在。¹⁶

这是“大城市中的孤独”，在这个城市中“每件事，每句话，每个眼神，每个手势”都通过无数住民传播开来，影响着其他的每一个生灵；但这种神秘的联合

13 *Poems and Some Letters of James Thomson*, ed. A. Ridler; London, 1963; 25.

14 同上书, 21。

15 同上书, 23。

16 同上书, 25。

体已经被打散,其结果就是这个死亡之城。他之后看到的是这个城市的毁灭——被火焰、风暴和到来的野兽所摧毁。居住在城里的石头人同城内那些他们混杂其中的建筑一起被毁灭:

城市富丽堂皇的骄傲
各行各业的人做出的成就……
……消失得无影无踪。¹⁷

当他回到原来的城市时

城市里糟糕的生活压抑着我的灵魂;
空气也不再自由,
而是变得浓厚、闷热,被人们呼出的气体
牢牢掌控着,
从形状怪异的房子和丑陋的船只中
散发出的雷云,能够遮蔽
白天灼热的太阳。¹⁸

风暴最终也会来到这里。城市歌颂自己说,它“富裕、强大……睿智、美好且自由”,但城市的邪恶同它的力量一样显而易见,它的罪行同它的财富一样昭然若揭。它从先人那里继承来的一切虽然丰富庞大,但它那:

严格制定的主要社会法律似乎就是为了确保
一个人富到堕落,一个人穷到一无所有,
而另一个人则快要饿死;你的神殿和
骄傲的高楼大厦

17 *Poems and Some Letters of James Thomson*; ed. A. Ridler; London, 1963; 31.

18 同上书,39。

被肮脏简陋的小屋包围,那里挤满了贫穷的
可怜人……

它的:

花哨的街道每晚都侮辱着宽容的天空,
用它那残忍的灾难、罪孽、贪欲和衰渎。¹⁹

因此这样的城市,这样的伦敦,若不忏悔就必将毁灭。

在《暗夜之城》中,城市的这种投射映象更加完整。

夜晚之城,却非沉睡之城;
在那里疲劳的头颅无法享受甜美的睡眠;
无情的时间慢慢流逝,无比漫长,
夜晚就像无边的地狱。这种可怕的张力
不停地折磨着人的思想和意识,
还会因一时的恍惚而不断增强威力,
这比灾难还要糟糕,让那里的可怜人们陷入疯狂。²⁰

238

在这个城市的映象中,一种特定的生存模式得到了实现,尤其是“折磨着人的思想和意识的可怕张力”。

他如何来到那里,没有人知道……
……但到了那里,人们就会感觉他是一个市民……
可怜的家伙,那个曾经漫步于这个悲伤城市的可怜人,

19 *Poems and Some Letters of James Thomson*; ed. A. Ridler; London, 1963; 52.

20 同上书,180。

仍将常常在这里漫步,无可挽救。²¹

对于这个暗夜之城的住民来说,他们常处的状态是:

他们非常理性却又疯狂
这种外在的疯狂无可控制;
大脑中心有着完美的理性
但却软弱无力,只是苍白冰冷地呆在那里,
它看到了疯狂,也清晰预见
前路上必有的毁灭,但却徒劳地试图
欺骗自己,拒绝去看。²²

不论富裕还是贫穷,他们都是:

世界上最悲伤、最疲惫的人。²³

但“我们这些被孤立的个体”有可能被集合起来“为了某种共同目标一起行动”吗?因为人类的各种行为,一支长长的队伍来到大教堂,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对生命的新的感知——那是一种对错觉的感知:

哦忧郁的兄弟,黑暗,黑暗,黑暗!
……这是一个梦的黑暗错觉……
……这渺小的生命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忍受……
……我们屈服于宇宙的法则
其中没有一项条款是为人类而定。²⁴

21 *Poems and Some Letters of James Thomson*; ed. A. Ridler; London, 1963; 184—185.

22 同上书,191。

23 同上书,192。

24 同上书,195。

不再信仰关于上帝的虚假的梦,或者信仰任何可信的生存目标,这就是现在城市所处的状况和人类所处的状况,就是。然而这种目标的丧失却产生于人们前所未有的亲近当中:

不论何时,当人们聚集时,空气中满是
人的感情、人的思想;
每一声吼叫、呼喊和大笑,每一句咒骂和祈祷,
都必定融入空气的振动当中;
未说出口的热情,不着一字的沉思,
都随着我们的呼吸进入到空气里;
空气中充盈着、满溢着的,都是我们的生活。

所以那里没有人呼吸世间单纯的空气
就如独处于山间或是海上时那样;
他们用快乐和悲伤,健康和可怕的疾病,
智慧和愚蠢,善行和恶行,
滋养着温暖的生命或是加速着死亡的到来
他周围一直都有群集的邻居;
反过来他也在影响着所有这些邻居。

239

城市的空气是黑暗、沉闷的,
尽管并没有多少被放逐的人在这里徘徊,
他们带来强大的邪恶影响,
每个都向已经中了毒的空气当中继续添加毒药;
难以言表的悲伤的侵染,
不可计算的疯狂的侵染,
无药可救的绝望的侵染。²⁵

25 *Poems and Some Letters of James Thomson*; ed. A. Ridler; London, 1963; 196—197.

这一强大的幻象通过一个影响极大但却常常不为人承认的结构把关于城市和新的痛苦意识的事实聚集在一起。挣扎、冷漠、目的的丧失、意义的丧失——这些都是 19 世纪社会经历的特点,是人们对新的科学世界观的普遍解读的特点,它们都在城市当中找到了自己的栖身地和名称。因为在这个幻象中,城市不仅是现代生活的一种形式;它还是一种决定性的现代意识的物质体现。

在 20 世纪文学当中,我们可以以各种方式追踪到这一点,并直接追溯到 T. S. 艾略特。

并无实体的城,
在冬日破晓的黄雾下,
一群人鱼贯地流过伦敦桥,人数是那么多,
我没想到死亡毁坏了这许多人。
叹息,短促而稀少,吐了出来,
人人的眼睛都盯住自己的脚前。
流上山,流下威廉王大街,
直到圣马利吴尔诺斯教堂,那里报时的钟声
敲着最后的第九下,阴沉的一声。²⁶

这就是生活中的死亡之城,就像汤姆森看到的那样。这是现代的荒原;自此之后,对城市意象的一种有力的习惯描写几乎处处可见。艾略特早期笔下的意象更加详细、更加孤立,但其中的连续性是非常明显的:

呵,冒烟的日子剩下的烟尾。
而现在,凄风夹着阵雨,
裹着泥污的

26 《赵萝蕤译诗选:〈荒原〉》,中国工人出版社,赵萝蕤译,1995,4 页。——译者注

枯叶一片片吹送到你脚边，
 并把空地上的报纸席卷。
 ……清晨醒来而意识到了
 轻微的啤酒酸腐味
 发自那被踏过有锯木屑的街道，
 因为正有许多泥污的脚
 涌向清早开张的咖啡摊。
 随着其他一些伪装的戏
 被时光重又演出，
 你不禁想到那许多只手
 它们正把脏黑的帘幕拉起
 在成千带家具的出租屋。²⁷

240

这最终同田园文学一样无情，一样传统。的确，它实际上是新城市意象，与孤立的新田园文学同属一个文学种类。精心挑选的城市景象将一种普遍的绝望传递给了孤立的观察者。重要的是，它也传递了一种社会蔑视，这比吉辛那种蔑视还要尖刻：

她们在地下的厨房里叮当洗着早餐的盘子，
 而沿着踏破的人行道边
 我看到了女仆的阴湿的灵魂
 从地下室的门口忧郁地抽出幼苗。²⁸

在他后期的诗歌中，艾略特将城市中意义的丧失同上帝的丧失联系在一起。不论是通过暗示，还是通过直接的表述，人类过去的定居生活被赋予了一种不同的意义，而乡村定居生活——在城市看来，它孤立且偏远——则获得了

27 *Prelude*；前引书，21。

28 同上书，22。

一种传统的意义,即便只是由于它的缺席才如此。将乡村生活同过去、同传统联系在一起,然后又通过象征性的而非历史性的联系同宗教信仰挂钩——这些惯常做法变得非常普遍。城市似乎是人类未假上帝之力自己创造的一样。

你能与这个上帝抛弃的城市同在吗?

一千名指挥交通的警察

没有一人能告诉你为何来此、去往何方……

……没有圣殿的地方就没有家,

尽管你有栖身之地,

付钱租来的临时住处,

老鼠横行的地下室

或是带门牌号的干净住所

或稍胜邻居一筹的房子;

当陌生人问道:“这个城市的意义是什么?”

你们亲密地挨挤在一起,是否是因为你们彼此相爱?”

你将如何作答?“我们之所以住在一起

是为了从彼此身上赚钱”?还是“这是个社区”?

这个陌生人将会离去,宁回到不毛之地。²⁹

诗中借用了汤姆森的陌生人形象,但反映的意识形态却有所发展。举例来说,陌生人的问题从来未用到克雷布笔下的村庄上。“按部就班的城市”³⁰暗含着同血液、日夜和季节的自然节律之间的对比;乡村往昔与信仰或纯真混合在一起;通过对城市的否定强调形成的新的田园文学。于是街头经历,这个捉摸不定的陌生人的经历,从最初那种社会的和感性的困惑发展成同炼狱的类比:

29 “Morning at the Window”;前引书,27。

30 “Choruses from ‘The Rock’”;前引书,166—167。

在黎明前的那一不能肯定的时刻
 接近那漫无止境的长夜的终结
 在漫无终结中重现的终结
 当黑色的鸽子吐着闪亮的舌头
 在他归途的地平线下经过
 而枯叶仍像罐头一般砰砰作响
 在听不到其他声音的沥青路上
 在浓烟升起的那些区域中
 我遇到一个人漫步缓缓而又匆匆
 就仿佛金属的树叶一般向我飘来
 叶子飘零一任城市拂晓时的风。
 当我凝视着那张低垂的脸
 用我们在暮色中向第一次遇到的陌生人
 所作的挑战似的打量凝视着他
 我看到某个逝去的大师的意外的眼光
 我曾认识他，后来忘却了，又回忆起一半
 一个和许多个：在晒成棕色的容貌中
 一个熟悉的混合的鬼魂的眼睛
 既是亲密无间，又是难以区分。
 于是我用一种双重身份，喊道
 听到另一个声音高喊道：“什么！你在这里？”
 虽然我们不曾在这里，我过去也是一模一样，
 知道我是自己但同时又是另一个人——
 而他一张脸正在形成；但这些话足够
 促进他们已开始了的相认。
 这样，顺着共同的风，
 相互太过陌生，因而不会误解，
 与空前绝后地，无处相遇中相遇的
 时间的交叉点上一致

在死一般寂静的巡逻中我们奏折人行道上。³¹

汤姆森的怀疑论悲观主义,吉辛的社会悲观主义,艾略特的宗教悲观主义:它们都在城市当中找到了自己的景象。但是对城市的成见也以其他方式发展着其独有的意象。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从美学角度审视城市的断裂性和个人主义,将其视为一个感知问题。这个问题进一步引发了有关身份的各种问题,并且非常典型的是,在抵达乡村的时候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老肯特街在1928年10月11日,星期四非常拥挤。人们从马路上涌流下来。有带着采购袋的女人们。有孩子跑出来。有的布匹店里正在大甩卖。街道变宽了又变窄了。长长的远景都一起在稳固地缩小。这儿有一个市场。那儿有一个葬礼。这儿有一队打着小旗行进的队伍,旗上写着“Ra - Wn”,但还能写什么呢?肉色非常鲜红。屠夫们站在门边。女人们的鞋跟几乎都被人踩掉了。那是在一个门廊的上方。一个女人从卧室的窗子向外看,固带着深沉沉思的表情,非常平静。没有什么可以被尽收眼底或者被从头到尾地阅读。你看到了开头的东西——比如两个朋友穿过街道开始会面——永远不可能去看到结束。二个³²分钟后,躯体和心灵像撕碎了的纸屑,从麻袋中撒落。确实,摩托车飞速驶离伦敦的过程,与那撕碎了的躯体的碎片是那么相似,以致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奥兰多曾存在于“目前的时刻”,成为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因为那躯体是先于无意识甚至也先于死亡本身的。实际上,我们本该把她当作一个被完全肢解的人,若不是这时右面最终伸出了一块绿色的屏幕,在屏幕的映衬下,小纸屑下落得更慢了,接着,左面又伸出了一块屏幕,因此,我们得以看见零碎的纸屑独自在空中翻腾;然后绿色的屏幕在两边不断交替地伸出,因此,她的心理重新获得了在事物本身把持事物

31 引文出自《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5,219—220页。——译者注

32 原译文如此。——译者注

的错觉,并且她看到了一间茅草屋、一所农场庭院和四头奶头³³,一切都与原物一般大小。³⁴

这种碎片式的经历——现在因“飞快的汽车”而大大加速了——仍然还是一种感知条件。它同现代意象的几个典型形式密切相关,在绘画方面这一点非常明显,在电影方面更是如此,因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包含了这种经历的大部分内在活动。一个在街头各种环境中进行近距离观察的观察者,他所特有的活动同电影之间的确有着一种直接联系,尤其是在电影剪辑和蒙太奇的发展这一方面。但我们应当由此注意到,感知经历本身并非一定就包含有某种特定的情绪,更不要说意识形态了。这种对城市运动的经历被用来表达从绝望到喜悦的所有感情,不论这种表达方式是严肃认真的还是轻松愉快。烟、叶子的碎片、尘垢、肮脏——艾略特的这些典型意象所形成的单一幻象非常有力,但却也并非压倒性的。如果我们看一下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我们的文学当中,《尤利西斯》以最广泛、最难忘的方式实现了的这些被根本改变了的感知和认同模式。

华兹华斯几乎在一开始就失去了他所熟悉的意义:

所有在做事、在思考、在说话的人,

他们的法则都离我而去,它们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它们。³⁵

但随着这种经历的延长,我们越来越清晰地发现,要解读“法则”我们必须先解读“习俗”。世代代的男男女女都学着以新的方式去看待事物,尽管他们需要

243

有乔伊斯式的天才,才能把这些新的方式变成文学方式本身的深层主旨。在乔伊斯的作品中,传统的观察和交流所用的法则和习俗明显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碎片式的意识,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意识是主观性的,但

33 原译文如此。——译者注

34 《奥兰多》,韦虹、晏乐译,哈尔滨出版社,1994,198—199页。——译者注

35 *Prelude*; 前引书,286。

其主观性又恰恰包含了其他的形式,而那些其他形式与建筑物、喧闹声、城市的景象和气味一起,都是这个飞速运转的单一意识的组成部分。在布卢姆漫步穿过都柏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参与到这种经历当中去:

他躲开七十五号门牌的地窖那松散的盖板,跨到马路向阳的那边。太阳快照到乔治教堂的尖顶了。估计这天挺暖和。穿着这套黑衣服,就更觉得热了。黑色是传热的,或许反射(要么就是折射吧?)热。可是我总不能穿浅色的衣服去呀。那倒像是去野餐哩。他在洋溢着幸福的温暖中踱步,时常安详地闭上眼睑。博兰食品店的面包车正用托盘送着当天烤的面包,然而她更喜欢隔天的面包,两头烤得热热的,外壳焦而松脆,吃起来觉得像是恢复了青春。清晨,在东方的某处,天刚蒙蒙亮就出发,抢在太阳头里环行,就能赢得一天的旅程。按道理说,倘若永远这么坚持下去,就一天也不会变老。沿着异域的岸滩一路步行,来到一座城门前。那里有个上了年纪的岗哨,也是行伍出身,留着一副老特威迪那样的大口髭,倚着一杆长矛枪,穿过有遮篷的街道而行。一张张缠了穆斯林头巾的脸走了过去。黑洞洞的地毯店,身材高大的可怕的土耳其盘腿而坐,抽着螺旋管烟斗。街上是小贩的一片叫卖声。喝那加了茴香的水,冰镇果汁。成天溜溜达达。兴许会碰上一两个强盗哩。好,碰上就碰上。太阳快落了。清真寺的阴影投射到一簇圆柱之间。手捧经卷的僧侣。树枝颤悠了一下,晚风即将袭来的信号。我走过去。金色的天空逐渐暗淡下来。一位作母亲的站在门口望着我。她用难懂的语言把孩子们喊回家去。高墙后面发出弦乐声。夜空,月亮,紫罗兰色,像摩莉的新袜带的颜色;琴弦声。听。一位少女在弹奏着一种乐器——叫什么来着?大扬琴。我走了过去。³⁶

这里,东方城市的幻想从博兰的面包车里传出的香气开始,但每一幅景象、每

36 《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译,译林出版社,1995,154—155页。——译者注

一个声音和每一阵气味都能够触发布卢姆个人的先入之见。在他的需求的压力之下,他脑中的城市同他走过的城市同样真实。

这是非常深刻的改变。这种改变的力量已经内化,从某种角度来看城市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有一个穿过城市的人。我们还记得,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经由一个杂货店的窗口来到了“阿拉丁那结满神奇果实的花园”,但她仍然处于一个受到严格控制的客观框架之中:“我们童年时代的童话”——作者和读者都有着这样的记忆;“巴顿可联想不到这些”——在读者客观审视下的这个人物,同当时的场景和文化都格格不入,这样的人物才得到了清晰的凸显。在《尤利西斯》中,动作和意识之间的关系以及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关系都经过了调整,直至语言的整个形态都发生了改变:

244

他走近了拉里·奥罗克的酒店。隔着地窖的格子窗飘出走了气的黑啤酒味儿。从酒店那敞着的门口冒出一股股姜麦酒、茶叶渣和糊状饼干气味。然而这是一家好酒店,刚好开在市内交通线的尽头。比方说,前边那家毛丽酒吧的地势就不行。当然喽,倘若从牲畜市场沿着北环路修起一条电车轨道通到码头,地皮价钱一下子就会飞涨。

遮篷上端露出个秃头,那是个精明而有怪癖的老头子。劝他登广告算是白搭。可他最懂得生意经了。瞧,那准就是他。我那大胆的拉里啊,他挽着衬衫袖子,倚着装砂糖的大木箱,望着那系了围裙的伙计用水桶和墩布在拖地。西蒙·迪达勒斯把眼角那么一吊,学他学得可像哩。你晓得我要告诉你什么吗?——哦,奥罗克先生?——你知道吗,对日本人来说,干掉那些俄国人就像是八点钟吃顿早饭那么轻而易举。

停下来跟他说句话吧,说说葬礼什么的。——奥罗克先生,不幸的迪格纳穆多么令人伤心啊。

他转进多塞特街,朝着门道里面精神饱满地招呼道:

“奥罗克先生,你好。”

“你好。”

“天气多么好哇,先生。”

“可不是嘛。”³⁷

在这里不同维度之间的对比是非常直接的:布卢姆的观察、思索和记忆的内容沿着叙述这条线发展,这在想象的思想话语中是一种积极的互换,甚至是一种积极的共同体,尽管当布卢姆遇到奥罗克时实际说出的话是平淡的、表面的:这就是普遍接受的惯例演变成的最后结果。实质上的现实,城市的活生生的一切,都存在于漫步者的思想当中:

他沿着人行道的边石走去。生命的长河……

……整整一座城市的人都死去了,又生下另一城人,然后也死去。另外又生了,也死去。房屋,一排排的房屋;街道,多少英里的人行道。堆积起来的砖,石料。易手。主人转换着。人们说,房产主是永远不会死的。此人接到搬出去的通知,另一个便来接替。他们用黄金买下了这个地方,而所有的黄金还都在他们手里。也不知道在哪个环节上诈骗的。日积月累发展成城市,又逐年消耗掉。沙中的金字塔。是啃着面包洋葱盖起来的。奴隶们修筑的中国万里长城。巴比伦。而今只剩下巨石。圆塔。此外就是瓦砾,蔓延的郊区,偷工减料草草建成的屋舍。柯万用微风盖起来的那一应蘑菇般的房子。只够睡上一夜的蔽身处。

人是毫无价值的。³⁸

在作品的这些部分当中,乔伊斯的创意是非同寻常的。如果在语言的新结构中,这种观察方式——碎片式的、混杂的、孤立的方式——能够新的语言结构中实施于感官之上,那么乔伊斯的创新就是非常必要的。

《尤利西斯》的天才之处在于它将三种形式的意识(从这种意义来说也是三个人物)——布卢姆、斯蒂芬和莫莉——进行了戏剧化表现。他们之间的互动以及联系的缺乏是城市结构本身的张力。每个人展现在另一个人面前

37 《尤利西斯》,155—156页。——译者注

38 同上书,388—389页。——译者注

的是一个象征性的角色,而且他们最终可能与之发生联系的现实也不再是某个地点、某个时间,尽管那天在都柏林发生了忧虑重重的约会。这是男女之间、父子之间一种抽象的,或者更严格地说是一种内在的模式;是家庭又不是家庭,互无联系,通过传说和历史找寻着彼此。历史并非存在于这个城市之中,而是存在于城市的迷失之中,存在于人们之间关联的迷失之中。唯一可知的共同体则在于这些互相竞争,但又彼此隔绝的意识形式的需求和欲望之中。

然而,当我们审视这个新结构时,必须提到的是最为人所深知的人类共同体是语言本身。矛盾的是,在《尤利西斯》中,通过迷失和挫败的模式,不仅有寻找,还有发现:一种普通的语言,在《尤利西斯》之前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我们无比清晰地听到过它;一种更为广泛的人类话语流的积极流溢,这种话语流一直受到主流社会习俗(真实历史中进行隔绝和约束的习俗)阻隔和牵制。这种话语的共同体就是《尤利西斯》的伟大之处。这就是它同《芬尼根守灵夜》的不同之处:在《芬尼根守灵夜》中,单独的一个声音——要求为所有人和所有事物说话的声音,“每个人都来了”——使已经发生的性质变化最终走向解体。由于这种性质变化,在《尤利西斯》稍后的部分(在最后的独白之前)之中蕴含着非常明显的张力得到了大大的加强,从而导致交替出现的声音——公众的和个人的声音,人们有意无意听到的城市的声音——让位给了一个替代品,一种普适的孤立的语言。如果说《尤利西斯》是高潮,那么《芬尼根守灵夜》就是我们一直追溯的发展的危机:小说和城市的发展危机;关于“在做事、在思考、在说话”的人的小说。

但是这一发展有着另一重意义。它让我们又重新想起了哈代对伦敦的观察——在哈代眼中的伦敦

每个人都意识到自身作为个体的存在,却没有人意识到他们作为一个集体的存在。³⁹

39 *Early Life*; 271.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感知上的主观性,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得到了有力的发展。它不仅同“意识流”或称“内心独白”有直接联系,也同现代主义版本的象征主义直接相关。在这种象征主义当中,重要观察对象的孤立和凸显是观察者主体分离的后果。这些过程构成了对城市经历(即便是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的经历)的强烈反应,但即便是当它们被直接放在美学层次上进行审视时,它们也同潜在的生活和社会模式深刻地联系在一起;这是相当清楚的,同它们最终与一种根本性孤立、疏离或社群的缺失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相互重合时一样清楚。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对乡村过去的现代演绎都不过是这些方法和意识形态的常规和辅助因素——即联系或社群或信仰在修辞上的投射。

但仍然存在着另一种发展模式,它同乔伊斯的联系更为直接。考虑到有关孤立,有关明显不可逾越的主体的各种事实,一种“集体意识”又重新出现了,不过已经换了形式。这就是神话和原型的“集体意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在那些强烈的主体之间,并且通过它们,一个形而上的或心理的“共同体”被假定了出来,而且就其特性来说这个“共同体”是普适的——哪怕仅仅是在抽象结构上;现实社会就像三段论中的中项一样被排除出去了,因为它被认为是短暂而且浅薄,最多也只是偶然的、次要的。这样,社会认同感和社会意识的缺失在某种意义上就变成了一种美德:是理解力和洞察力的一个条件。于是,强烈的主体和永恒的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直接联系:二者互为成就对方的方法,其他的替代方法徒让人分心而已。“个人与社会”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变化多端的问题,但现在它获得了一个明确且特别的定义,因为“社会”变成了一种抽象概念,集体意识只会沿着最内在的渠道流淌。于是,不仅对明显孤立的一般性体验,就连整套自我孤立的方法都被汇集起来维持对一种终极集体性的矛盾体验——这种终极集体性超越了共同体,位居共同体之上。共同体的各种社会形式被视为“神话”——也即被编码了的意义——的变体,无论这种“神话”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都是唯一可得集体意识。既有头脑的语言(更严格地说,常常是身体的语言),也有这种假定的普适语言。在两者之间,是作为事物、标记、物质、媒介的城市、小镇和乡村:现实存在的人类社会。

这种集体性已不断出现。在 20 世纪,这种集体性的重现(采取的是形而上的和心理的形式)和其他反应之间一直有着深刻、混乱、没完没了的冲突。那些其他反应也存在于城市中,通过新的制度、新的社会观点和运动创造着哈代和其他人认为城市缺乏的东西:也即一种集体意识,它不仅能看到个体的人,还能看到他们已经改变了的和正在发生改变的关系,并且在观察这些关系及其社会根源的同时,找到进行改变的社会途径。

247

实际上,正是从城市中产生了这两种伟大的、变革性的现代观点:神话和革命,二者的形式都多种多样。二者都在压力之下想要让对方向自己这边转化。但我们最好还是将二者视为不可共存的反应,因为在成千上万的城市中,即便它们以各种混乱的形式出现,它们也都时刻处于尖锐的、直接的和必要的冲突当中。

21 生存着的乡村人

248

从 19 世纪晚期开始,乡村不列颠就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并且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但这个国家的过去,它的情感和它的文学同乡村经历息息相关,而乡村经历中有关惬意生活的观点——从乡村宅邸的气派到茅舍的简朴——又多数保持了下来,甚至还得到了加强;这种情势使得 20 世纪乡村经济的重要性和乡村观点在文化上的重要性之间形成了反比。这一点影响了乡村观点表达和发展的方式,但这是一种复杂的影响,既有积极的结果也有消极的结果。

我们可以追踪到三条主线,每条主线都很复杂。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乡土”小说的持续存在和发展,这很重要。“乡土”小说的部分根源在于乔治·艾略特和哈代的作品当中,但范围却有着明显的局限。我们将会看到,这条主线将会因“乡村宅邸小说”的延续和退化而变得复杂。第二条主线就是对土地和自然成长所抱有的情感的发展,这种情感或许始于梅瑞狄斯的作品;在某个模式中,这种情感可能会使用克莱尔式的绿色语言,继续使用风景描写和自然诗篇的形式,但换个模式它可能就是人类关系的意象,尤其是爱与欲望的意象。第三条主线与对自然的描写有重合之处,即有关乡村生活的回忆录、观察资料和报告的重要发展:很多这样的回忆录、观察资料和报告都充满了一种消逝的过去引发的情感,并在这种意义上慢慢向传说集,甚至是民间传说集发展;而其他的回忆录、观察资料和报告则侧重于土地的使用和滥用,侧重于人类同一个受到威胁的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侧重于人文环境的条件。在这三条主线上,我们不可能做出任何简单的评判。的确,许多问题都是由以下事实引发的——那就是真实的和虚假的情感、真实的和虚假的观点、真实的和虚假的历史总是比邻而居,时常出现在同一部作品当中。

我们现在就可以描述一种颓废到无可争辩的形式。在《丹尼尔·德隆

达》的乡村宅邸世界中,一个新的脆弱形式正在形成,清晰可见:不是建立在土地之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之上的宅邸。这样讲并非是要美化早期的乡村宅邸;有关那种宅邸的事实真相我们已经见得多了,因此不会再进行美化。但的确存在这一种明显的改变,比如亨利·詹姆斯的乡村宅邸中就存在这种改变。他笔下的乡村宅邸已经变成了一个都市和国际社交聚会进行宴会活动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上演更广泛的社会戏剧的舞台。将这种改变强加到作品当中的并非詹姆斯;他之所以这样描写,是因为他常常批判地进行审视的生活就是这样存在的。现在这种生活的决定性维度已经不再是土地,而是金钱;房屋、庭园和家具都明显是消费和交换的对象。人们讨价还价,彼此互相剥削利用,把这些房子当作他们野心和阴谋的炮弹。来自别处的金钱是一个明确的、主导性的主题。社交修养在简·奥斯丁的作品当中仍同改良这一整体过程联系在一起,现在则成了一个源自更广泛社会的复杂过程。在这些偶然保留下来的,已经改变了的宅邸里,独立的资本、独立的收入、独立的消费、独立的社会交往进驻又撤离,来到又离开。内部的资本化、消费以及对现实中的邻居的冷漠变得表面化,也更有流动性,更凸显了它所有内在的罪恶。各种事件在别处酝酿,在别处继续,却在这些房子之内发生,转瞬即逝而又错综复杂。

249

有人说詹姆斯并不知道或是并不了解乡村宅邸英国的最好的一面,但在在我看来,事实似乎是他对之太了解了。因为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外壳和表面才是现在的现实。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外壳封锁起来,像艾薇·康普顿-伯内特夫人和其他的后来人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在外壳内部的一切纠缠上。但更常见的情况是,这种表面往往以越来越粗鄙的外形呈现,詹姆斯的道德焦虑也沦落为技术层面的短暂和复杂。任何想要隔离人际关系的人现在都有了具有孤立性和戏剧性的普通舞台场景,可以在其中表演。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在那些标榜自己是严肃作品的小说里一直都有一些非常可笑例子。还有一些作品有意识地对这个想象出来的阶级及其生活方式进行反动性美化,就像伊芙琳·沃的作品那样。

但乡村宅邸小说的真正命运是向中产阶级侦探小说的转化。正是由于乡村宅邸的抽象特质,但其得以幸存的事实又具有肤浅煽情的效果,才使得

它能够变成一群孤立之人的聚集地。这些人之间短暂直接的关系可以通过侦察这种抽象的模式进行破译,而不是通过对任何更为普遍的理解力进行关联性的全面分析。有时候这种惯用模式不过是工具性的,就像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其他人的作品一样。有时候则像在多萝西·塞耶斯的作品中那样,它与中产阶级对传统居民的人性产生的幻想联系在一起。但在其他地方,传统被简化为旧建筑、老树和偶尔出现的鬼魂。在我看来,人际关系的一种分析模式(该模式来自贝克街、来自那个瞬息万变的城市的雾霾之中)能够在这种表层生活方式中找到一个暂时的休憩地,然后再回到它最终的归宿,也即街道上去,这是十分合适的。因为乡村宅邸在保有其情感上的支配力的同时,的确是产生一片混沌的适宜场景——这片混沌只能从一个维度才能穿透: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所有真正的问题都被抛到一边,只留下它们挑动进行工具性破译的能力。在离我们较近的时代,乡村宅邸又成了计划犯罪或是间谍活动或是秘密警察聚集的中心。但关键在于,在20世纪乡村宅邸刚好具备这种抽象的随意可用性和功能上的无关紧要性。这些房子可以是学校、大学、医院,也可以是休养所、房地产办公室、接受补助的博物馆,等等。同样的道理,从情感角度来看,它们也可以是孤立权力的中心、贪腐或阴谋的中心,或者是人们所谓的“地位象征”——指的是抽象的感念——成功、权力和金钱的象征,这些东西建立在别处,但却被方便地置于视线之外。这并非一个悲伤的结果;这是一个相宜的结果。最本质的特点一直都在那里,而改变了这些特点的历史则又基本上源自这些特点,源自它们从最初开始一直持续着的统治和疏离。

梅瑞狄斯笔下的乡村宅邸已经是摇摇欲坠了:传统形象中不断穿插入越来越多的混乱和罪责。梅瑞狄斯真正的激进主义就在这个维度当中开始,又在这个维度当中结束。但在这个维度的边缘,一种更有趣的现象却逐渐发展起来:也即对“一般人”美德的一种描述。从一开始这种现象的意味就暧昧不明,正如它在乔治·艾略特的部分作品当中所表现的那样。乔治·艾略特最糟糕的作品之一大大影响了梅瑞狄斯:那是她1856年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德国生活的自然历史》,在近期的一些文学批评当中这部作品又重新活跃起来。她对李尔的讨论发展成为对“农民”的描写,并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

结果。

在他的身上,风俗习惯占据了情感、观念,在很多情况下还有爱情的位置……农民从不质疑家庭联系带来的责任——他从不质疑风俗习惯——但温柔的爱情是存在于那些文雅人当中的,对他来说就像雪白的手和形状圆润的指甲一样陌生。¹

显而易见,乔治·艾略特不加批判地把德国的情况搬到了根本没有“农民”的英国来。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苛刻的词语当中慢慢浮现出了一个陈腐的形象,从那之后我们一直都听到他不满的咕哝。不过这都是些诚实坦率的不满;而这通常就是关键。他不是华兹华斯笔下那个简单自然的人物;他几乎可以被称为基本元素了。粗陋的土地,同自然的艰苦搏斗,粗糙的情感,粗糙的坦诚。他仍然受到别人的鄙视,就好像毛姆看不起哈代一样:“长相很粗糙……有一副奇怪的乡土相。”但他有着浪漫的命运,不论他是否知道这一点。他被晒黑的胳膊强壮有力,他清瘦的脸庞饱经风霜,他熟知公牛和小麦当中蕴含着热情的成长,同这些比起来,雪白的手和形状圆润的指甲又算得了什么呢?

251

梅瑞狄斯的小说主要侧重于局限性;乡村人倔强、固执、坚韧、狭隘。但在新的重要繁殖力的意义上,大地的美德呼之欲出。如果你去读《朗达·弗莱明》,你会看到后来的许多小说的轮廓,但如果你去读他的诗,你就能听到那种新的韵律:

教给我如何自己去感觉那树木
而不是那枯萎的叶子。
我一动不动,等着黑暗的降临。
哦,慷慨的绿色大地!

1 “The Natural History of German Life”; *Westminster Review*, 1856.

我们的母亲，酒神的女祭司！总是严厉地对待
那些不在你欢笑的心中居住的人；
爱着你，我还会在死亡面前畏缩吗？……
……大地不知何为荒芜
从腐朽的湿气当中
她闻得到重生的味道。²

这是《秋季大地灵魂的颂歌》。同其他诗歌一样，它可以溯源至华兹华斯和早期的浪漫主义运动，但它正逐渐变成一种新的、更具启发性的行为，正如《现代爱情》中清晰表现出的那样：

但在夜晚大地的宏大之中
我们并肩前进时，我们的精神也在成长。
时间变成了她的丈夫，变成了我的新娘。³

或是他的诗集《解读大地》中的诠释：

她在扬谷，粗粗地扬谷；把筛选
出的精品浸润在她的源泉中。⁴

如果我们从 1912 年开始回溯，就能明白当查尔斯·索雷说出下面这段话时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

很明显，为自然和大地大唱颂歌的丁尼生毫无价值且非常浅薄。不久之前他还在用押头韵的空话把大地紧紧束缚起来，好像给她穿上束身

2 *Poetical Works of George Meredith*; ed. G. M. Trevelyan; London, 1912; 176—177.

3 同上书, 154。

4 同上书; *Hard Weather*; 320。

衣一般。梅瑞狄斯第一个冲破这层障碍,发掘出真实的大地。⁵

这种同大地的有意交流同农业和性的形象(见劳伦斯在《彩虹》第一章中对耕地和挤牛奶的描写)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模式;这种主导地位还有一个特殊含义,即农业和性的这种形象是一个男性的形象,而大地是一个女性的形象。在这里能够找到对粗笨的农民爱人的情感根基,对这种耕耘土地的生活的深切激情,但这只是它众多形象中的一个。

因为在这些被观察的乡村人物身上也有着一种投射,并同城市那种疯狂的物质主义形成了众所周知的反差,这种反差使得乡村人物身上的投射更加鲜明。从华兹华斯笔下单纯的田园人物到梅瑞狄斯的乡村人物,之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52

简,这个乡下劳工的寡妇,
突然间明白了:
一开始她的身体剧烈地颤抖,
然后整个人成了一把竖琴
风掠过琴弦;她听到了
但却既无音调也无歌词。⁶

这种对肉体无声无息的强调是一种对“自然力”能量的释放,是对机械文明带来的挫败感的反抗,它深深触动了人们迷乱的想法。先是简单的身体动作——大地搏动的生命,然后同样可见的是赤裸裸的回复原状——抚慰性的融合:

虽然深陷贪婪之地,
到处都是地震一般可怕的拜金狂热,

⁵ Sorley, 引自 *George Meredith*; J. Lindsay; London, 1956; 373。

⁶ 前引书, *Jump-to-Glory-Jane*; 372。

但我之烦扰只为生之必需；
安于平凡，与世无争。⁷

也就是说，劳作的乡村正再次变成肉体和精神重生的地方，不过这一次的方式有所不同。乡村现在代表着孤立自然的丰富生命，或者是生命根本进程的季节性节奏。这些情感都不新鲜。新鲜的是它们同一种情感框架相融合，在这种情感框架中大地和它的一切生灵——动物和农民都一样——是对生命力和休憩的可能性的肯定，而这与城市那种呆板秩序，那种人工制定的日常程序形成刻意的对比。这种融合最有力的时候表现为一种应用于社会范畴的泛神论。而最奇怪的时候则成了维多利亚解放运动这一尴尬过程中的性欲置换：一个过渡性的意象，在其中性交即耕作，而种了野风信子的花床则是乳房。两种行为都没有被清楚言明，两种特点也都不是那么显而易见；这是它们混乱的秘密中紧张激烈的部分。但如果你持有怀疑态度，这里还有金钱和城市那种冰冷病态的神经；还有财产、压抑和丑恶；还有世俗习惯和例行公事带来的挫败感。

乡土小说并非仅包含这些元素，尽管乡土小说当中这种乡村和性的比喻有着强大且持久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明显是存在于劳伦斯的作品中的；也存在于 T. F. 波厄斯的作品中，尽管他的寓言属于一个更有讽刺性的观察维度；存在于一系列描写野合激情的小说中；存在于乡村情色故事这一活泼的传统当中。劳伦斯和波厄斯有着更宽泛的兴趣，但那些更为明显的作品形式实际是对 19 世纪成就的一种消解和利用。一些更易受攻击的作品其实是对《寒冷舒适的农庄》的明显戏仿，但要想对那篇奇怪的作品发表些见解可不是件容易事。一些乡土小说的矫情做作直接导致了这类讽刺作品，但这些讽刺作品也利用了郊区生活的不安情绪，吸引和排斥之间的张力，一种脆弱的智慧——其实是通过讽刺来进行逃避。《寒冷舒适的农庄》常被归于女性小说家——玛丽·韦伯和谢拉·凯耶－史密斯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两个——创作

253

7 前引书，*Jump-to-Glory-Jane; The Flourish in February*；328。

的一组不明确的作品,但这组作品其实应当同其他作品一起读,比如《呼啸山庄》、《亚当·比德》、《苔丝》。因为如果只是将表象同表象相比较,也即将传奇文学同模仿文学相比较,而不去细究导致所有这些作品都脱离现实的原因,就很容易忽略真正发生的事情。

从某种程度上讲,失去的只是一个可信的共同世界。19世纪小说中真切切的孤立隔绝在这些小说明显的后继者那里很容易变得做作、不自然。《呼啸山庄》中如果只有呼啸山庄而没有画眉山庄,这部作品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现实张力。乔治·艾略特和哈代也承认并探究了一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环环相扣的社会中的张力,尽管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努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探索的不仅包括城市主义和工业主义带来的变化,还包括新的社会流动性和有关一种扩张文化的观念和教育。“乡土”小说最大的弱点在于,作为一种防御性反射,它们排斥了除自己地域之外的一切,不仅排斥了其他地方,而且也把在其内部十分活跃的深层的社会和人性力量排除在外。因此这些小说不断把岛的边缘地区作为故事背景,例如康沃尔或者坎伯兰,在那些地方这看起来更可信一些。但正如波厄斯(他和哈代隔了几乎两代人)笔下的多赛特成了一个刻意想象出来的抽象概念,比哈代描写的任何地区都要古老、都要不合时宜,同样,在那些受到更细心、更热情观察的景色当中,为了保持有关自然的比喻以及同城市之间的对比,凡是被视为格格不入的元素就被排斥在外。即便有的作品明显包含了这些元素,例如弗兰西斯·布莱特-杨格的作品,它们也只是被当作一个出发点、一个根基,由之出发去探索那些未被破坏的事物;试比较《拉克顿先生的自由》。人们深爱的地方是“未被破坏的”地方,没有谁比那些住在“已被破坏的地方”的人对此更深信不疑的了。

有时候这种做法是无害的,至少其本意如此;从某种角度来看,想象中的排斥越是完全,作品集中描述的部分就越是可信。但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一种非常不同的潜在倾向:从社会角度来看,这同二战当中接收那些撤离被轰炸城市的孩子的情况有些相似之处。在田园符咒的魔力下,市民被看作是笨蛋和顽童,不仅以垃圾、破坏和噪音这些显而易见的形式表现出来,还被以对暴民、工会和“旧英国”的破坏者的憎恨这样深层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如果乡村模式中对现实变化(变化就发生在那些牧场之内)的排斥不是那么彻底的

话,这种做法可能会更容易理解些。但乡村生活的作用不仅仅是充当自然激情的一个意象。它还成了孕育无意识政治反动的适宜场所,后来又变得更尖锐些,成了孕育那种有意识的政治反动——要么是固有的好斗的保王主义,要么是如在个别重大事例中那样,发展成法西斯主义或是法西斯主义的联盟——的适宜场所。

生存下来的乡村英格兰应该得到比这更好的对待。总体来看小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康斯坦斯·霍尔姆的作品来了解乡土小说最好的一面,并从《孤独的犁》当中发现一种张力。这种张力的一端是她称为“视界的绿色大门”的模式——这是克莱尔式绿色语言存留下来的真实证据,只是这种模式更为专门化——另一端是对人物和事物进行的相当敏锐的、引人深思的、有根据的观察。这种观察虽然对象是乡村的人和事,但无论在视角还是在语气上都属于另一个社会:它使用的是中产阶级观察者的语言。

但对乡村地点和人物最成功的描写模式存在于定期刊物和回忆录当中。当我们读到 W. H. 哈德森的《牧羊人的生活》或是《很久以前在很远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有力且真实的视角,既简单又紧凑,始终处在思想的调节之中。当我们读到梅瑞狄斯、福斯特和劳伦斯笔下大地的形象时,当我们读到乔治王朝时代一些人笔下简单的泛灵论时,我们也只能回头重新去读哈德森的《很久以前在很远的地方》里面“一个男孩的泛灵论”的那一章。在其中我们看得到那种冲动的力量,尽管它在做作的城市智慧面前无比脆弱,但却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记录、考量和恰如其分的评价,以致我们没有不加批判地接受,或者不加批判地拒绝或戏仿,而是不自觉地将其同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有过并能回忆起的经历联系起来:这些经历需要我们用哈德森式的见地来描述、审视。

这也是重读乔治王朝时代作品的正确方法。这个时代的作品有许多地方都容易受到攻击,但我们在下批判定义时仍需极为小心。我们看到在梅瑞狄斯的作品中渐渐成型的那种模式有着明显且值得注意的弱点。例如在艾伯克朗比的作品中:

就像她不经意间碰到的一根悬钩子枝
 一只满是肌肉的手臂伸向她的胸脯
 带着渴望的尖刺,撕裂她的衣裙,抢夺
 并伤害她深藏的洁白童贞。⁸

用悬钩子来表现罪恶,或是用天空来表现“伟大的蓝色庆典”,在这里都变得更加意味深长。这也存在于约翰·德林瓦特的《月光照耀的苹果》当中。在这首诗中,一排排放在房顶上的苹果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月光照耀的梦想苹果”并且

255

在果园的树枝上
 它们同月亮幽会。⁹

这是朴实和通俗的东西与一种意志薄弱的幻想之间的特殊联合。对人和物的认真观察毫无过渡地分解成了各种形式的幻想,不过这些幻想最终倒是具有更为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我们最好还是从该运动最有力的部分来看待这种转化:比如,从爱德华·托马斯的作品入手。

托马斯写作是为了谋生。在他的作品当中,托马斯沿用了杰弗里斯的一些观察模式(尽管他观察的乡村已经不如杰弗里斯时代的那般具有劳作性质了),并对其稍加改动。他理解科贝特的模式,尽管他同史蒂文森和博洛的世界之间的联系更直接一些——若论这个世界最简朴的形式,可以一直追溯至吉尔宾。各种相互冲突的冲动混合在一起,短暂流行,这就是真正的乔治王朝时代模式,它清清楚楚地存在于散文当中。

尽管快 70 岁了,他还是很坚定、很正直,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马上度过,粗糙的脸上五官分明,神色沉静……

8 *Oxford Book of Modern Verse*; ed. W. B. Yeats; Oxford, 1936; 208.

9 同上书;215—216。

这是一段很不错的观察；只有“坚定”[staunch]这个词另弹别调。但还没到这句话的结尾，这位农民：

……使人联想起半人马兽。……3000年前他如此和谐地同大地共存，在人们的记忆当中他的形象一直是一个半神，或是所有农牧神中最受喜爱的一个。……他的诙谐让整个房间或是整条小巷都沐浴在黄金时代的光辉中……

只不过他还(真的是这样吗?)：

连一句叹息都没有就转过身，在凉爽的谷仓里使劲吸了一口苹果酒，大口喝了下去。他很早起床，当第一个到达田地的时候他总是很高兴，开心程度不亚于晚上上床休息。¹⁰

以上选自《英格兰之心》，表现出的正是乔治王朝时代问题的中心。作者的观察常常是清晰、认真的，但随着观察模式逐渐形成，陌生的意象逐渐涌入：经过古典传统过滤的那一整套关于“乡村”和“田园”的观点。那些观点同任何古典乡村文学都大异其趣，但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其中一些延展部分甚至一直存留到我们的时代)却被知识界深信不疑：那是人们手中的镜片，人们特地骄傲地把它举起来，放在正实实在在进行观察的眼睛前面。农牧神、潘神、半人马兽、黄金时代、牧羊人、黎西达斯、乡村青年、幽会、坚定的农民、教堂、古老的历史、半神、鬼魂、季节永恒的节奏。如果没有在可觉察的发展中亲身经历过，是很难推演出这种奇特的组合的。“回到土地上去”——一些工业主义的批评者一直这么说。但当乔治王朝时代的诗人们在莱德伯里附近定居、创立《新数字》季刊时，却又变成了另一种情形：当然是逃离城市；还是对乡村的美丽和宁静的坦诚欣赏；也是对劳动的尊重。爱德

256

10 *The Heart of England*; London, 1906; 73—74.

华·卡朋特的例子很有意义：这个敏感的人放弃了特权和老一套的理智主义，去追求简朴和普通的生活：这是对平凡的感情，对精神的感情；对穷人应享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以及教育普及的感情；对性自由以及对同一运动中自然性别转移的感情。

这样的人来到了乡村：这才是关键。他们的神经已然绷紧，观念也已固定了。琼生曾在肯特郡的森林中看到过林中女仙，但这些女仙的形象都是传统的、未经过滤的。但这些新来乍到的人却都精神紧张；这是他们之所以离开城市的原因。他们的冲动同很多人的生活有过联系，也依然有着联系：那是对他们正在回避的事物的真实经历。如果他们离开城市，只是抱着旁观者的态度——有时候他们确实会这样做——整个模式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他们从城市、从学校和大学中带来了乡村历史的一个版本，该版本令人惊奇地混杂了一种被模糊解读的文学诠释。坦诚的过去，异教徒的精神：不仅在乔治王朝时代的人心中，甚至在两三代的知识分子和文学观察者心中都结下了这个结。而这个结之所以如此重要，之所以延续不断地存在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模式当中，正是因为它在这种被广泛阅读的文学中（在这一版本中，通过并超越该版本）捕捉到了一个在人们眼中仍然存在并运转着的乡村英格兰。

乡村人快要灭绝了，当我们在乔治·勃恩的《贝茨沃斯手册》里听到他的声音时，感觉比法国话还要陌生。¹¹

这种悲伤的、反复出现的语气很重要，由于它提到了勃恩等人的作品，那些是对他人的详细记录。真正的乡村人口其实只占少数；农业的地位已经变得边缘化。但这种不同的、挽歌般的新田园模式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在援引勃恩等人的作品时，作家们对彼此说的话，或批评家们对彼此说的话。

11 *The Country*; London, 1913; 21.

当《新数字》季刊在莱德伯里附近的茅舍里创刊时,我外祖父一家就在那里的农场上工作,我曾听到过他们之间的不少谈话。对我来说他们的谈话并非“比法国话还要陌生”,在那个真实的劳作乡村社会中,这种谈话一点都不陌生。实际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半人马兽和黄金时代这样的事物更陌生的了。但尽管有些人不经意听到这些谈话时,把它们当作是当地人、乡巴佬说的话,这些诗人们在不经意听到时——有时候甚至是有意去听的——却带着一种尊敬甚至是崇敬的精神,这种精神马上就修饰以一种巨大的历史遗憾:过去美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的家人总是说,时代在变得越来越好:过去的日子是糟糕的日子;现在村庄不再那样受压迫、受剥削;我们有了投票权,有了火车,有了学校。或许他们错了;有些事情是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但他们不是那种代表衰落的形象,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他们的确经历过英国乡村的危机,品尝过其真实后果,但这一危机并非是从城市和大学中投射出来的那种危机。这场危机是工资、生活条件和价格的危机;是土地的使用和在土地上劳作的危机。当别人无意间听到这样的话题时,当然会把它当成是抱怨和牢骚,是在寻求他人的同情。但这却不同于林中女仙的消失,也不同于对她们的追寻。事实是,乡村人的谈话仅限于他们自己的圈子,而乔治王朝时代的观察者谈话时也仅限于他们自己的圈子——这对双方都是一种损失;这就是那种社会。

历史的陈规在文学当中留下了很多记号。比如,我想到了爱德华·托马斯的《罗普》。在这首诗中,作者看到:

一张老人的面孔,刻画着岁月和风霜的痕迹
和色彩——像坚果一样,粗糙、棕褐、甜美¹²

但随后却不知所踪。作者试着找到这个老人,向那些可能认识“我的老人”的人打听,最后一个乡绅的儿子告诉他有这么样的一个古老形象:

12 Collected Poems of Edward Thomas; London, 1961; 54.

……跟这扇门,这些花,这块泥潭一样,地道的英国风格¹³

他给花朵取了它们在当地的名字,创造了当地的俗语,在滑铁卢、黑斯廷斯、阿金库尔、夏莫塞去世,身负所有的乡村姓名——从罗宾汉到杰克·凯德再到火炉边的罗普。这的确是从阿诺德的吉普赛学者——流浪的知识分子——的一次转向,但转向的结果仍然是一种智力投射:也即历史的一个版本,它能够成功地删除历史。所有的乡村人,不管他们来自何种境况、哪个时代,都融合成了一个传奇般的人物。特定的乡村社会各种不同的表达方法——比如说,花朵在不同地方都有个当地的名字——都被简化,不仅只剩下一个“乡村”表达法,而且有了一个超越时间的传奇的创造者,这个创造者比任何一个真实存在的人都要清晰易见。乔治王朝时代的想象正是在这一点上崩溃的:对真实观察的尊重被一种亚理性层次的幻想取代:一个劳动的人变成了“我的老人”,然后变成英格兰之梦中的随意一个人物。在这个英格兰之梦中,乡村的劳作和反抗,外国的战争和内部的王朝战争,历史,传说和文学,都被毫无区别地裹入一个单一的情感姿态中。罗普或是罗德,远古的农民,或是自耕农,或是劳工:这个人物已经确定下来,它的名字就是旧英格兰。英帝国主义全盛时期的那种自私的爱国主义在乡村历史的一个版本中找到了它最甜美、最阴险的形式。

258

这跟哈代是完全不同的:

没有火焰,只有轻烟
从一堆堆茅草上冒出;
不管过了几朝几代
这都会一直继续下去。¹⁴

13 *Collected Poems of Edward Thomas*; London, 1961; 55.

14 “In Time of the Breaking of the Nation”; in *Selected Poems of Thomas Hardy*, ed. G. M. Young; 1940; 67.

这是对田间劳作的感情,虽然经历政治历史上那些看似遥远的事件,这种劳作依然持久不变。但乔治王朝时代的版本却把乡村英格兰当作代表自身内部情感和观点的一个意象。

在这个时期有很多这样躲躲闪闪的阐述,它们的来源看上去各不相同。例如那种不加批判的、摘要性的文学人类学,其中民间故事和传说变成了一个没有地方色彩和历史依据的过去的一部分;或者例如那种对神话的不加批判的兴趣,这种兴趣把土地和人变成了场景和角色,什么都可以投射上去,没有一鳞半爪的古典教育都无所谓。这一时期以乡村为基础的幻想有了巨大发展,从巴里和肯尼思·格雷厄姆到 J. C. 波厄斯和 T. H. 怀特,然后再到托尔金。这一时期对“民歌”有了限定性且抽象的定义,在西塞尔·夏普的作品中这种定义的基础是关于“农民阶级”“幸存者”的所有乡村神话,而且这种定义特地排除了工业和城市劳动人民一直流传的歌,理由是这些歌不属于“民间”。这些劳动人民虽然不符合定义中的形象,但他们一直在一个真实的流行文化当中进行创作,而他们的作品对这一时代和这一阶级而言很合适,可以用来假装存在一个已经一去不返的世界。因此,不仅是真实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遭到了伪造;而且一个传统的、幸存下来的乡村英格兰也被草草创作出来,几乎被一种实际上属于市郊的、半文盲式的胡乱描写遮蔽起来。¹⁵

这种损害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但讽刺的是,带来这种损害的人当中有一部分的确观察过乡村英格兰并在那里学习过,他们同爱德华·托马斯一样,内心的确怀有非常真实的情感。托马斯本人在谈论第一部《乔治王朝时代诗选》时说:

它表现出了极大的美、力量和神秘感,还有那么一点魔力——很多的渴望,较少的蔑视,完全没有厌恶——它非常聪明地表现出现代人对纯朴和原始的那种热爱的许多方面,这种纯朴和原始存在于孩子、农民、野蛮人、早期人类、动物以及整个大自然当中。¹⁶

15 参见 David Harker, *Rhymes of Northern Bards* 重印本导论; Newcastle, 1971; xlix—1。

16 *Daily Chronicle*, 14 January 1913.

这段话双刃剑的作用可谓发挥到极致了。但《罗普》中的情绪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我们甚至在它形成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种情绪。镇上的男孩被带到乡下，看到市场送货马车上一个女人：

她那种快活、精明、慢吞吞的样子，就像诗人和小说家笔下的女人一样陌生、一样有吸引力，也跟她们一样遥不可及。

当他开始工作时，他看到了（引用他妻子的话）：

这些慢吞吞的有经验的劳工，他们获得知识就好像橡树上长橡果一样自然，获得技能就好像燕子一样轻巧，他们对自己的艰难生活非常满意，就像橡树和燕子对它们的生活非常满意一样。¹⁷

这样，真正的尊敬慢慢变成了一种称赞，这种称赞把人类的学习能力排除出去，并把这些劳工从人类降格成了一种“自然”状态。稍后他在旅行时又观察到：

割草的人，在洋葱田里锄地的人……旅途上的孤独为我们准备了这些，让我们把他们变成梦中的生灵。……他们不比田园文学中的男人和女人更显得真实。……最不可思议的住民是麦蒂拉、弗洛里麦尔、科林、艾玛丽莉斯、多利露丝、多伦、达芙尼斯、西尔维娅和阿米塔，还有对着羊群唱歌的牧羊人……¹⁸

如果这些就是全部，我们大可不必在意。但还有一种更真实的反映也包含其中：

17 *The Childhood of Edward Thomas*; London, 1938; 53.

18 *World Without End*; Helen Thomas; London, 1956; 107.

农庄倾斜的房顶，
屋瓦闪着朦胧的光……¹⁹

——这是一种平静、安定的情感，它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老一套的陈词滥调里去了：

因为
这个已经非常古旧的英格兰，被称为欢乐的英格兰。²⁰

这些诗歌中一再引起我们兴趣的，就是看到的事物被这些外部的偏见所裹挟的方式：

他们把挑篷从长长的甘蓝堆上用黏土
搭建的棚顶上拿下来。他们让阳光照进来
照在那些见不到太阳的白色、金色和紫色的
卷叶上。²¹

但即使人们看到了、记住了这一现象，它还是被比成进入一座埃及坟墓，那里“躺着……长眠无梦的阿蒙霍特普”。一位现代批评家说，“这些毫不唐突的标记慢慢积累，最终人们意识到外部的场景是内部剧场的附属”，这明显是赞扬之意。的确是附属，因为真正需要指出的是人们观察到的细节总是非常可信，而几乎把它们全毁掉的正是“内部剧场”这样的传统。托马斯在他的笔记本中这样写道：

破土而出的再生草或再萌草/在一场急雨后绿得

19 *The Heart of England*; London, 1906; 62—63.

20 *Poems*; 前引书; 25。

21 同上书, 27。

那么美丽……²²

写成诗后这一段却成了含糊不清的插入成分：

又是那湿漉漉的完美绿色。“再萌草
会长得很好。”那陌生人这样说，
那个流浪的人。尽管我静静地站着，
欲望却使我兴奋不已。²³

还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这个发展过程——从笔记本上“老人的胡子”这样的记录到诗歌《老人》，在这首诗中植物成了记忆和损失。“内部剧场”塞满了老旧的故事和戏服，²⁴不过即便如此，观察力和情感依然无法被完全遏制：在《源头》当中；在《晒干草》当中，一个超脱时间的世界得到了仔细的观察和精致的描绘——

比克莱尔和科贝特、莫兰和克罗姆还要早²⁵

——这里提及的几个作者的名字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做法现在被视为一种渴望而为人所知，那是一种真实的渴望：“我们都超出了变化所及的范围。”《拉犁畜口的头儿》中又出现了这种情感：悉心观察的土地；让人信服的谈话碎片：

我最后一次
看到犁铧和蹒跚前行的牲畜走过后

22 *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 F. R. Leavis; London, 1936; 69.

23 引自 Edward Thomas; W. Cooke; London, 1970; 106。

24 *Collected Poems*, 69.

25 同上书, 71—72。

土块被踏得粉碎²⁶

这是“最后一次”，因为托马斯必须返回战场；这次经历把普通的劳作和安宁深深刻在他的记忆里。

在《二月的午后》中，他听着八哥的叫声，心中的情感被两头撕扯着，一头是这种超越时间的感觉——

人们听到这吼叫……

千年之前，一如今朝²⁷

——另一头是战争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时间自我面前游过”，意义却完全不同。抛开那些惯用的支持成分和引经据典，可以看到一种更深刻的失落感，就像《我从未见过那块土地》一样：想象和真实的乡村——

牛群，草地，光秃秃的水曲柳……

……沿着小溪生长的黑刺李

带着黄色的伤，像是番红花的颜色

这是昨天劳工的镰刀

一下子划过的地方²⁸

——以及穿插在这两种乡村中真实的不确定感：

我既不期盼什么

也记不起什么；但那时我触摸到了

某种目标……

26 *Collected Poems*, 30.

27 同上书, 108。

28 同上书, 100。

这其中蕴含着这样的感觉,即被迫回到一种隐秘的语言中,“一种不可背叛的语言”,一种无法表达的疏离感。最后,这种更深刻、更复杂的情感还存在于《为了这些》当中,在这里乔治王朝时代的隐居避世所具有的惯常意象:“海岸和群山之间的一块土地”,房屋,花园——被复述出来,最后却又被摒弃掉:

我不要求得到这些,只希望不要太晚
也不要太早,能够达到人们所说的心满意足,
也希望我能向命运讨要来
什么可以让我觉得满足的东西。²⁹

这就是更强烈、更必要的渴望。

那么潜在的模式就很清晰了。对整个现代生活的批评,以及随之而来的许多必要的一般性问题,都得到了表达,但又都被缩减成一种惯例,这种惯例采取的形式就是对半是想象出、半是观察得来的乡村英格兰进行详细描述。这种惯例确定了自此以后许多生命的形态。在我们这个世纪,关于乡村的作品从真实记录转到惯例写法然后又转回来,这种转换有时明显有时难以察觉,最后这两种描写方式似乎已经纠结不清了。即使在回忆录和定期刊物这些看似最普通的体裁中也是如此。乔治·勃恩的作品就是这样一种混合体,混杂了详尽的纪实描写(例如《车匠铺子》,那是对一门手艺的记录)和按惯例做法省略过的历史(如《村庄里的变化》)。有些纪实描写是无可取代的,如弗洛拉·汤普森的《雀起乡到烛镇》以及罗纳德·布莱斯新近的《阿肯菲尔德》。像阿德里安·贝尔的《灯芯绒》、《银色草地》和《樱桃树》则是一些更有限的个人描写。就再下来就是一些惯例模式的作品,也即现实记录占三分之一,意识形态占三分之二,麦辛汉姆的《英国乡村人》就是最现成的例子。20世纪的乡村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完全逃离这种奇怪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观察、传说、纪实和一部分历史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乔治·依华特·伊万斯是

29 前引书 Cooke, 224—225。

最好的纪实作家之一,我从他的书中借用了有关自维吉尔以来的连贯性的评论,这一讽刺最终让我感到深深的悲哀。本来是与我经历和记忆上都有很多共同点的作家,却突然在引经据典的那一瞬间,在以不同方式看待历史的那一瞬间,变成了他们本不应当成为的陌生人。而最深刻的讽刺在于,我们所了解的真实历史将会证明这些作家笔下保持生命力的那种真实的观察、真实的情感的价值。

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来对此进行检验。《乡村人》是一份非常著名的定期刊物,这一点从它的发行量就可以看出。如果我们读到《乡村人》的任何一期,就会发现这些不同的要素被以一种惯例捆绑在一起。不论读到哪一期,人们总会发现对树木、飞鸟和动物的描写;而且不仅仅局限于自然历史,也包括劳动的许多真实过程。但是同这一切捆绑在一起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游戏:中产阶级用那种通常遭到扼制的玛迈赛特正字法来对乡村人离奇有趣的旧式俗语做出的记录:³⁰不经意间听到的当地人的话语。那么在这种惯例之中,乡村人究竟是谁?使用雇工的雇主,雇佣仆人的主人,观察獾的人,种水果的人。当然这是一个阶级的构成;这个阶级几乎就涵盖了人们对于乡村的概念。据我所知,《乡村人全书》这一部选集最为完美地记录了乡村写作在这种惯例当中的演变结果:精细的观察和记录,首相们户外运动的往事,社区的历史,老旧的食谱,关于巫婆和迷信的故事,作者们的乡村茅舍,滑稽的乡村俗语,精美的照片和绘画。面对这种非比寻常的混合体,我们很可能想要放弃。乡村终归要被一个阶级完全吸收:所有真实的事物也都一同随之而去。

但这还不是事实的全部。还存在着其他的声音。斯温顿的阿尔弗雷德·威廉姆斯在一个铁路仓库工作的时候曾经从事过有关乡村的写作。他笔下的各种联系更加真实、更具一般性,而且在观察“方言”的时候他写道:

30 玛迈赛特(Mummerset):一个由演员们虚构的英国西部乡村及其方言。——译者注

城镇里的居民不说方言,但喜欢读用方言写的文章……乡村人说方言,但不喜欢读用方言写的文章。³¹

更重要的——对我们来说也是极为幸运的是,我们拥有一个现代农场劳工的自传:弗莱德·基钦的《公牛的兄弟》(1939)。就连这本书也在出版商的要求下加了一篇序言——按照旧式做法农民诗人要有赞助人,于是这本书前面附上了波特兰公爵一封荒谬可笑的推荐信。但弗莱德·基钦可以为自己写作。对于任何一个只读过按中产阶级式惯例描写乡村的书籍的人来说,《公牛的兄弟》最不寻常的一点就是它平实清晰地记录了各种各样的乡村工作和乡村状况,表达了对田野和生灵的真实的爱,却不带任何怀旧的或是田园式的规定性作态。弗莱德·基钦住在乡村茅舍中,谈论这些茅舍的方式就跟大多数乡村人一样,包括里面的湿气和老鼠。他住在一个矿区村庄的生活区里,以非常机敏、积极的笔触描写现代城市社区。在书中他描述了铁路上和炼焦厂里的工作;尽管他又重新选择了农村工作,人们仍然可以感觉到不同的工作当中有一种连贯性,而这种连贯性正是被惯例做法所掩盖的。他以相反的视角对观察者进行审视,例如他的教区牧师。当有人告诉这位牧师基钦喜欢读书,他跑去质问基钦是否的确如此,但之后又不太友好地让他去读经典著作;基钦在一座图书馆里找《经典著作》,但还是不得不返回头去读他能读懂的东西,包括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的著作。当他触摸到文明世界时,他又一次站到了观察者的位置上:

263

艺术家们描绘过这样的优美图画——牧羊人赶着他的羊群来到长满青草的高地,或是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落日,但我们从未见到过牧羊人站在泥泞的萝卜田里;没见过他和他的伙伴拿上盛着切片萝卜的筐子在泥泞的羊圈里走来走去,脚底还打着滑;也没有见过他弯腰清理食槽的时候,被过于顽皮的公羊狠狠顶在屁股上……这些才是我对见过的牧羊

31 参见 Alfred Williams, *his life and world*; L. Clark; Newton Abbot, 1969。

人的描绘；尽管在我的描绘中他有一间小茅屋，但这间小屋只能在吃饭时供他遮身而已。³²

《公牛的兄弟》真实地记录的艰难的日子和美好的日子，受到的挫折和感到的满足，它是生存下来的乡村人的真正声音；这些乡村人生存在一个以城市和工业为主的世界，通过同劳动和社区的真正联系在这个世界中进进出出。让人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这部作品中完全没有传说、引经据典和虚假的历史，还有其背景的真实感：在一个多变的经济当中，没有土地和钱财的人们不停地换工作；直接经历那些即便是在真实历史中也通常被抽象化了的事物。这就是一个有着敏锐智慧的 20 世纪劳动者——在这个例子中，他是一个一生的大部分（但不是全部）都从事农场劳动的劳工——的世界，一个非常清晰可辨的世界。矿工、炼焦工人和挖土工人都站在他的身边；他们接受着细致的、不带任何阶级成见的观察。还有一件事也是非常重要的——弗莱德·基钦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了多年阅读之后，工人教育协会的一门课程鼓励他进行写作。为了服务矿山、工厂和农场工人，城里建立起了这个协会。

《公牛的兄弟》是少数直接描写乡村劳工生活的作品之一，正因如此，它必须等待 20 世纪的来临，必须等待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进程。但毕竟大部分劳动的乡村人就是这样看待他们的历史的：从基钦小时候就去过的劳动市场，到《农业工资法》以及为了没有地也没有钱的大多数人能通过农业劳动过上像样的生活而继续进行的抗争。被小心仔细观察的一段特别的历史必然地融入了共同历史当中。

32 *Brother to the Ox*; F. Kitchen; London, 1940; 125.

22 又见边界区

264

把乡村和城市分开是件很容易的事,把两者的文学模式分开也很容易:乡村的或地区的;城市的或大都市的。在 20 世纪,这些相互分离的模式是对连贯的历史的一种回应方式,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但总有一些作家坚守着这些模式之间的联系,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认为,在价值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冲突中,转向本身就是决定性的。

这样看来,把 D. H. 劳伦斯同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做比较是很有用处的。劳伦斯的著作范围更广、名声更大,这使得他同吉本的比较从某些方面来说十分困难。但两个作者都非常努力地投入到对乡村和城市之间运动的某种描写当中,两个人都以非常积极的方式意识到了危机的来临:边界区和边界(充满着艰辛,但又必须跨越)的危机。

劳伦斯成长的地方用他的话说来说就是“旧英格兰和新英格兰奇怪的混杂体”:农业地区从事采矿业的村庄。

那里的生活非常奇特地混杂了工业主义和莎士比亚、弥尔顿、菲尔丁和乔治·艾略特时代的旧式农业英格兰。¹

我们可以在各个作家笔下看到这个“旧英格兰”,这很有趣,也很典型。但劳伦斯生活在边界地区,这可不仅仅是农场和矿山之间的边界。在他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点一再出现在他的笔下),他处于一个文化的边界上。他不仅要在矿山和农场之间做出选择,还要在这两者和教育与艺术的开放世界之间

¹ Phoenix; London, 1936; 135.

做出选择。从这方面来说,他是乔治·艾略特和哈代的继承者,但他却以一种极为不同的方式审视流动性的危机及其背景历史。

《儿子与情人》中唤起了两种风景,两种工作,两种生活方式,但在这一切当中有着内在的、主观的冲突;这是成长和离开的历史;是在父母的挣扎和那个让他们沮丧的世界中,为身份而进行的抗争和维持关系的能力的历史。同母亲的那种艰难的、有趣的关系是如此亲密,最终它甚至盖过了同时被唤起的更具一般性的境况。在下一部小说《虹》当中,他以一般性境况作为开始,但却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呈现,从而使其不可能完全脱离他从自己的家庭当中得知的一切。他追踪着布朗文一家几代人的脚步,一直到厄休拉身上的那种熟悉的危机——那教育、关系和身份的危机。但这场危机的形式把压力又抛给了人们审视历史的方式上去。

《虹》的第一章读起来非常动人,但如果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意识到历史是如何发生的,人们对此的早期反应又是什么样的,那么《虹》的第一章就立刻变得既新颖,又令人吃惊。这里有世代务农的人对自然生命的著名祈祷:

光阴荏苒,这一切又何尝能够停歇!……他们明白天地是相通的,大地把阳光吸进自己的肺腑,让雨水流入自己的胸膛。田野在萧索的秋风中变得草木零落……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与所见所闻所感仅此而已。触摸着大地的脉搏和身躯,会感到它们在向犁铧敞开胸襟。刚翻过的土地新鲜而蓬松,以沉甸甸的欲望攀附着人们的双脚。……他们翻身上马,将生命紧夹于两膝之间……²

这种模式将会得到认可。这是有关大地和田间耕作的性的意象,从梅瑞狄斯到乡土小说家的笔下这种意象在一直出现。但更具体地说,这是一种男性的性意象,而在对历史的这种描写当中这一点是决定性的。

2 《虹》,杨德译,九州出版社,2000,第2页。——译者注

并且对于男人们,只要土地还存在,它还可以继续播种……可是女人们却不想老过这样的日子,她们渴望着不被血缘束缚的生活……可以远眺到有着城市和政府机构的外面的世界以及生活在那个世界的来来往往的人们……在她理想的国度中,男人们高高在上,雄心勃勃,被某种创造欲驱动着……³

这样,田耕生活已经成了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因一种特别的存在而被赋予了历史地位:这一存在是活跃的、物质的、无意识的;是与头脑相对的身体;同自然的进程密不可分。其他人已经改变了这种生存方式,进入“城市的世界,政府的世界”,为的是“扩大他们自己的范围和自由”。这个女人站在自己眼中那个有限的自然环境中向外看去,她鼓励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

这位母亲企望她的儿女也可以获得这种教育——教育可以引导生命到达更高的境界,企盼他们也能过上那种优越的生活。⁴

但这种感情已经同阶级纠缠在一起:教区牧师和副牧师,还有乡绅太太(女人们认为她高人一等)的生活:

因为她的儿女们,至少她的掌上明珠,有一种与生俱来似贵族般的高雅的气质。他不应该甘于和那些靠出卖体力谋生的人为伍。⁵

266

这是通过一种历史性叙述的明显形式展现出来的,尽管我们很难不把它看成这个母亲的态度的一种映射,就像劳伦斯在《儿子与情人》中描绘过的那样。但更有趣的是,历史中的真实张力有那么多都被创造性地重写进了这个特殊形式当中。生命力被同时从两个方向进行审视;一是活跃的体力劳动那没有

3 《虹》,3—4页。——译者注

4 同上书,5页。——译者注

5 同上书,5—6页。——译者注

思想的生活,一是探索的思想。对这种探索的召唤是不可抵挡的,但要跟随这个召唤就要穿过一片丑陋和空虚的荒原:工业体系及其思想上的呆板习惯。这一切最终将被取代,取代它的是从这个严苛、破碎、异化的世界里挣脱出来的新生活:

新的、洁净袒露的身体将萌发出新的生命,获得新的成长。⁶

但劳伦斯要讲的话永远不能缩减成一句争论。一个历史性的设计对他而言非常重要,而且也以各种形式被反复引入,但他要说的主要是各种关系当中的生命和死亡,社会和历史力量也会被提及,但却被以生命和死亡的形式重写。然而,工业主义及其财产和占有形式一直被视为死亡的标记。但在劳伦斯的一系列作品中,同这些死亡标记对立的并不是一个农耕的社群;而是一种原始主义,有时这种原始主义会被赋予某种社会的或历史的根基,就像新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原始主义一样,但它更多地是以一种与自然过程直接接触的生活形式而为人所知——动物、飞鸟、花朵、树木,还有人的身体,赤裸裸的探求和关系。

那么,对“旧农业英格兰”的那种熟悉的反映必须被视为一个次要主题,尽管它也同样存在于劳伦斯的作品中。这是传统上历史形成的方式,但它只是劳伦斯那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强调的一个形式,有时还很有误导性。如果我们看一看他关于城市的言论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大城市意味着美,高贵和某种壮观。这就是英国人那被扭曲、被背叛的一面。⁷

抑或是:

6 《虹》,670页。——译者注

7 *Phoenix*; London, 1936, 139.

当我们定下自己的文明形式时,我们选择住在城里。对乡村的怀念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城市是虚假的城镇——每条大街都是一次打击,每个角落都是一道刺伤。⁸

而且这必须与他所坚持的更为传统观点一起被审视:

267

在我看来,英格兰的真正悲剧就是丑陋的悲剧。乡村是如此可爱:人造的英格兰是如此丑陋。⁹

因为丑陋的症状不是城镇,而是虚假的城镇,其虚假的根源就是占有性个人主义的体系和精神,这种个人主义

挫败了社群的本能,而那种本能本可以让我们在骄傲和尊严中团结起来——不是以村民,而是以市民这种更大的姿态。¹⁰

他称赞城市,也抱怨说“英国的特性没能培养出人性中真正属于城市的一面,文明的一面”,但他的称赞和抱怨不仅仅限于那些他经常拿来做例子的意大利城市。他甚至说:

以罗马时代的标准来看,比起伦敦或者曼彻斯特,美国的新城市更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城市。¹¹

他对英国城市的控诉沿袭了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19世纪的模式:

8 *Letters to Bertrand Russell*; ed. H. Moore; London, 1948; 80.

9 *Phoenix*; London, 1936, 137.

10 同上书,139。

11 同上。

诺丁汉是个广阔之地,冲着百万人口懒散地伸展开,它不过是个没有固定形状的结块而已。根本没有什么诺丁汉,就像根本没有什么锡耶纳一样。¹²

结论是进行重建:

把我出生的村庄拆得一块砖也不剩。计划好一个起点。固定好中心。建设要从中心向四周辐射,要做得漂亮。然后建起高楼大厦,漂亮的高楼大厦,慢慢形成一个文明的中心。¹³

意味深长的是,这个项目最先出现在几家期刊上,其中一家就是《建筑评论》。但我们很难把对建设和城市的强调同劳伦斯一直以来的深刻的坚持协调起来——一直以来他坚持要恢复同自然的直接接触和最简朴的生活进程。这种协调难以进行,因为说到底这不是一场争论,不是一种立场;这是在相互冲突的时代压力下,对如此多的冲动的创造性记录。劳伦斯带着一种热烈而痛苦的坚持目睹了几乎所有的事情。他深陷于一种肉体承诺(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更为热情而可信地对此进行了描写)和一种精神承诺(这种承诺使他在一个挑剔的世界中做出反应和思考)的撕扯之下。的确存在一个花的世界,就像他常常描述的一样,但同样存在的还有一个显微镜下的细胞的世界,它给最深刻的生活进程带来一种新眼光。社会的冲突——无意识的存在,有意识的社群——既激烈又严峻。

268

可以说,劳伦斯把这些冲突缩减成了一种对发现主要关系的强调,在《恋爱中的女人》中这一点尤其明显,但在这部作品中,其他维度中的压力仍然紧迫,因此对主要关系的发现始终很成问题。《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一种很有必要的肉体的发现,这与对丑陋的工业城镇的摒弃和对看护自然生命的喜爱相联系。但这种发现还不是高潮部分,问题仍然是如何才能让这生命之火在

12 *Phoenix*; London, 1936, 140.

13 同上。

一个必要的劳作世界中继续燃烧下去。在一部比较晚近的《自传片段》中,他转而使用那个时期的模式之一对未来之梦进行展望。他看到自己从小生长在其中的那个采矿村庄发生了变化:

即使在我亲眼看到的时候,我也知道那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满是肮脏红砖的采煤小镇。即便在很小的时候,我离开穆尔格林回家,抬头看到公司建给矿工居住的街区立在小山顶上,在下午阳光的照耀下就像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我曾希望那是一座金色之城……¹⁴

这幅幻象很像莫里斯在《乌有乡的消息》中所描绘的,重要且矛盾的是,这既是一个城市又是一个农业村庄:一种对肉体的强调,“柔软金黄,就像一个城市金色的肉体”。

劳伦斯在作品中关注的是冲动和情感那相互纠缠的综合体。在 20 世纪,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就像头脑和感情之间的关系)是这种综合体最明显的形式。如果我们读了劳伦斯的作品后再读格拉西克·吉本的作品,如《苏格兰人的书》,就可以发现很多相似之处,但最终我们也会发现一处非常重要的不同;对于这些观点后来的发展,这个不同之处无疑是非常关键的。劳伦斯一次又一次拒绝的就是使用何种社会媒介来进行变革以及如何使用的问题,尽管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对此进行考虑,这一事实同样重要。劳伦斯总是在重生和变革两种观点之间踌躇。比起过去他更强调未来,变革要进行得绝对、彻底。但在他眼中,可行的变革运动只是些抢夺财产的争斗;在他投身变革之前,他想要一种不同的前景,一种有关生活的新感觉;不然就不会有重生,只会有最终的崩溃。

格拉西克·吉本的《苏格兰人的书》是一个三部曲,沿着由城市到乡村这一经典历史进程发展。这部作品从一个高地上的小农庄开始,在人们参加饥饿游行的街道上结束。其中的第一部《日暮之歌》,是对所谓的农民阶级之解

14 *Phoenix*; London, 1936, 829.

体的一种经典陈述。意义深远的是,格拉西克·吉本就是通过这种观点来审视历史的。乡村英格兰历时长久的转变迫使一个真正的农民阶级走向了解体,代之以资本主义农业地租加工资的结构方式,这一变化比其他任何地方发生得都要早。但这一转变却在其边缘地带留下了清晰可辨的社会区域:爱尔兰、苏格兰的某些部分以及威尔士的某些部分。如果我们阅读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文学,一直读到20世纪的作品,我们会看到一些生活方式,它们在18世纪的变革发生后在英格兰村庄中就几乎不存在了。但这个不同之处可能被夸大了。它同在外地主和外地地主的体制有关,同一种存留下来的强烈的民族感、社区感有关,也同经济发展的不同有关——边缘地区的事实又大大突出了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同。不论这一点如何有争议,但从未曾在这些边缘地区的乡村中出现过的正是英格兰资本主义农业秩序的社会整体性,尽管该秩序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渗透要比在爱尔兰更厉害一些(而且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某些地区广泛的工业化也带来它自己的变化)。与英格兰不同的社群形式长久持续了下来,它们受到独特的民族感情的滋养,并反过来也滋养着这些感情。这种社群已经不太能算是农民阶级了;它是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相对孤立的农业社群,能够通过旧的和新的方式清晰地意识到其艰难但独立的生活。阅读爱尔兰和威尔士乡村作家的作品——不论其感情色彩是如诗如画还是愤怒怨恨,总会发现一种精神上的自立,不论其形式为何,不论它是创造性的还是毁灭性的。比起实际的所有制来,这种精神自立更能称得上是决定性的社会模式。

这也正是格拉西克·吉本通过一个沿用地租、租契和乡绅地产模式的农业体系所展示的东西。事实上,他就是用能够展示这一标准演变的历史作为开始。但在这一历史当中存在着一种不同的社会观点:这种观点属于“小农场的佃农,那些流着皮克特人血液的阴郁家伙”¹⁵,存留下来的正是他们的精神——存留在这片粗糙土地上那些同时从事种植和放牧的农民心中。这种精神历史从史前巨石阵的时代就被唤醒,一直延续至今。在人们对一个20

15 A Scots Quair; London, 1950; 17.

世纪的社群的追溯中,它一直在情感上占据主导地位,直到这个社群被认为终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高地清洗留下的苦涩回忆,苏格兰高地的悲伤,还有史前传说都被织成了一块布,既遮掩贫穷,也藐视贫穷。这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式的强调:这是一个自我定义,由于一些当时的原因它吸收了属于一片特定土地的各种元素,不论这有多么不可思议。它在这里是成功的,因为创造它的环境是吸收了当地节律和语言的一种特定的、有力的散文。在吸收更具依赖性的乡村回忆的常见元素的过程中,一个生动的当代世界被创造了出来,它在精神上依然是自立的。那里甚至连黄金时代都有:

黄金时代的猎人们在这些小山上徜徉,他们赤身裸体、光彩照人,没有恐惧、希望、恨或是爱,随风而生,畅享生命。¹⁶

270

这就是劳伦斯所想象的,也是他想要重现的,同格拉西克·吉本口中“所有黑暗、疯狂的希望”相对立。但《日暮之歌》的力量并非存在于那样一种表达之中;而是活生生的人的力量:恰克·斯特拉坎、长腿罗勃、克里斯·格里。战争波及到这里,打破了这种稳定的状态,当人们必须进行哀悼时,为“最后的农夫,最后一个旧式苏格兰人”而感到的悲伤是一种哀悼的方式。

但令人激动的是,接下来人们在向小镇和城市的迁移过程中,这种精神遗产被认为仍然存留了下来,尽管其所处环境已经大大改变了。一个掠夺性的新体系把人们派去为它打仗,把他们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但是:

如果今天他们还活着,他们会选择站在战争的哪一方——这一点还需要我们怀疑吗?¹⁷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感结构。在新的斗争中,对土地和劳动的圣洁情感,也即大地意象中一直潜在的那种带有“异教性质”的特点(这同刚开始动笔写

16 A Scots Quair; London, 1950;300.

17 同上书,496。

《虹》的劳伦斯非常相像,尽管两者的节律不同)得到了利用和强调:这一直贯穿在新的斗争中,从《去雾中的豪乌山》时代的大罢工,到《灰色花岗岩》时代的饥饿游行。甚至连传说故事也支持这种转变,因为这些故事对精神的侧重使人们能够摒弃站在有产阶级压迫者一边的教会。更具历史意义且更具说服力的是,小农、手工艺人和劳工的独立被视为通向工业工人战斗精神的过渡阶段。整个历史就这样经历了决定性的转变。

克里斯·格斯里——土地的孩子——认为变化就是命运,“没有任何人的梦想能让它停止”;只有土地永恒不变。但她的儿子是个革命派:非常真实;他所面临的困难和弱点在小说中被娓娓道来,而这部作品比其他任何一部小说都更为清晰地展示出 30 年代活跃的工人运动。

正是这种转变形成了同劳伦斯之间、同有关乡村失落和记忆的文学之间的有趣对比。因为这不仅仅是重新整理某个观点的问题。这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我们历史中一个真实阶段的方式——该阶段基本上没有留下记载,但毫无疑问它确实确实存在于这漫长的转变当中。流离失所的劳工、手艺人 271 和小农民来到城市的时候并没有学会激进主义。在变化的环境中,他们学到了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指导思想,这一切形成并扩展了一种历史久远的精神,愤恨、独立和渴望的精神。

这是整个传统当中一个重要的分支。从乡村来到城市的男人和女人不需要别人来告知他们失去了什么,也不需要别人告知在他们的新世界里他们需要通过斗争得到什么。然而,在他们努力重新调整的时候,他们的乡村经历——现实中全部的乡村经历,从对土地和自然欢愉的热爱,到强加给他们的痛苦:剥削、繁重低薪的劳作、丧失工作和栖身之所——对他们有利还是有弊,这却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这些经历被进行挑选——地主或住民的观点,“田园的”或是“传统的”描写——并作为一种抽象观点被用来反对他们的孩子,以及他们孩子的孩子:反对民主、教育和劳工运动。在这种现代形式当中,乡村怀旧的反动性越来越清晰,而且考虑到连贯性的断裂,来自另一方的声音也是寥寥无几。这就是格拉西克·吉本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为那些从未能以可留下记录的方式为自己辩护的人充当了喉舌。

当我们回头再来看劳伦斯的时候,这一点也表明了一个相关问题:他的

重要性在于他的天赋。正如我们所见,他只是按照惯常的做法来对乡村进行简单的回顾。他超越了这种回顾,使其扩展成有关自然独立和复兴的观点,而且他非常清楚地将物质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业体系视为敌人。但典型且重要的是,他把人类独立和复兴的观点——有关自然本身的观点——同对民主、教育和劳工运动的反对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一种不安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敌对态度:在战争和20年代中期这段时期这种态度变得最为恶劣;只是在他晚年的反思性文章当中,他才带着更多的真正情感,对这种敌对进行了重新思考和修正。他的心结是如此之紧,现在已经无法解开了:那是在毁灭性的冲突和压力之下的生命的结。然而,虽然我看到这个结最终变成了如今的一种惯例——尤其是在文学教育中——我也将它视为在持续不断的危机中,在持续不变的边界上的一种义愤之举。土地的歌,乡村劳动的歌,还有对生命各种形式——我们同它们一起分享这个物质世界——感到快乐的欢愉之歌,它们是那么重要、那么动人,我们不能乖乖地放弃它们,把它们出卖给与真正的、重要的独立和复兴为敌的狂妄之徒。

23 城市和未来

272

都市经验催生了有关未来的经验。在都市经验的危机中,关于未来的故事经历了性质上的改变。这类预测有着传统的模式。在所有记录下来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死后的归所:天堂或是地狱。千百年来的探索和旅行当中,人们在新的土地上发现了新的社会,不论是作为乐土还是警示之地:往往是些岛屿:是欢乐的岛屿,其本身就是构成这个神话的一个因素。但在都市经验中,尽管这些模式受到广泛利用,但最终它们都发生了变化。人类没有实现自己的命运,或是发现自己的幸运之地;而是骄傲地或错误地看到了他们改变自己和自己的世界的的能力。

早在18世纪,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就写了一部当代地形学作品《巴黎浮世绘》(1782—1789)以及一部世俗未来小说《2440年》(1770)。但直到19世纪晚期,这一深刻的转变才发生,且在伦敦的转变意义最为深远。我们可以从风格极为不同的作者笔下看到这种转变,如威廉·莫里斯和H.G. 威尔斯。每位作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利用了当时伦敦的这种转变经历——当时这种转变占据了社会和文学领域的关注焦点。每位作家也同样以自己的方式利用了新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是城市经历的社会产物,即便在某些地方这种集体意识的冲动是对城市经历的批评和拒绝。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让他的观察者在—场政治争论后度过了辗转不安的一夜,当第二天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处21世纪的伦敦。有两个特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莫里斯预见的伦敦在性质上有了突破;二是创造了这个伦敦的社会观点和感情与莫里斯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是有连续性的。如果我们只关注那个想象中的伦敦,我们发现的是一个做着梦的、保守后退的莫里斯:

肥皂厂连同它们那吐着浓烟的烟囱都消失了;工程师的工厂消失

了;制铅厂消失了;从桑尼克罗夫特工厂那里吹来的西风中也再也没有了钉铆钉和锤子敲打的声音。那么桥呢?我可能曾经梦到过这样一座桥,但从没有在配插图的手稿之外的地方见到过……

……我冲着阳光又睁开了眼睛,看着四周,然后在这一片喁喁低语的树木和芬芳扑鼻的花朵当中大声喊道,“特拉法尔加广场!”¹

伦敦已经被分散了,以前最好的部分只留下来了其中一些,但还保留着一些贫民区,以便把小城镇和乡村划分开。从事工业制造业的城市“就像伦敦这个砖头和灰泥的沙漠一样,消失了”。²大多数小一些的城镇生存了下来,但镇中心已经被清理了;郊区则“逐渐融入了乡村”。³这是一种结合体——一方面回溯历史,主要参照中世纪的和乡村的模式来重建城市,另一方面这是城市规划,是在创造城市秩序和管控。这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工业化和都市扩张之前的旧伦敦,又是一个当时的花园型城市理念投射出来的新伦敦。这些相互矛盾的冲动从未得到完全的解决,而如果不考虑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新的社会观点——的话,这其实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因为人们认为,正是从19世纪伦敦那苦苦挣扎的苦难中,从因这苦难而生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导致变化的能量:那是愤怒拒绝的能量;新的合作和信任的能量。新的社会运动曾经只是一种想象,但在斗争中变得坚毅刚强,例如特拉法尔加广场的血腥周日这样的斗争。这一运动还找到了组织者带领它走过必要的国内战争,去往和平的新社会。

我们只需把这一点同一些作品相比较,比如说汤姆森的《城市末日》和《暗夜之城》,就能看到关键的变化。做出的判断是相似的,叙事手法也基本一样。但进入并改变了这一经历的却正是这种有关一场运动的成长的历史感。汤姆森的社会批评同样严苛,但他笔下的观察者却始终是孤立的。在莫里斯的作品当中,否定性的能量找到了一个积极的目标。

1 *News from Nowhere* in Morris Centenary Edition; e. G. D. H. Cole; London, 1946; 8.

2 同上书,39。

3 同上书,64。

威尔斯的观点更加严苛。他增添的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还是一个进化的维度。正如他对 1899 年《当睡者醒来时》(这部作品发展了汤姆森或莫里斯那种正式的叙事模式,但又沿用爱德华·贝拉米的做法把它发展成为对历史运动的进一步强调)的评论那样,这

从根本上说是对当代趋势的一种夸张:更高的大厦,更大城镇,更邪恶的资本家,还有更受践踏、更加绝望的劳工。⁴

但更确切地说,正如《未来的故事》(1899)里描写的那样,还存在着对一种更为老式的城市幻象的直接扩展:

一种疯狂的增长,在下层制造出不断延伸的野蛮洪流,在上层则制造出更加脆弱的文雅和更加愚蠢的浪费。⁵

274 这一幻象曾在《时间机器》(1899)中被赋予一个进化的维度,穷苦的劳动者那“下层的野蛮”已经演化成了盲目而残忍的摩洛克人,富人那种脆弱的愚蠢则演化成了洋娃娃一样的依洛伊人——既是种玩物,也是摩洛克人的食物。这种形象经常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吉辛笔下的“地狱”变成了被奴役的工人们地下空间。人们被划分成牲畜般的劳力和微不足道的消费品,城市也从形态上发生变化来体现这两个世界——作家们一次又一次地表达这种灰暗阴沉的幻象。这种观察城市的方式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20 世纪 20 年代朗的电影《大都会》就是最著名的继承者之一。

因此,威尔斯阴郁的幻象与莫里斯更为温和、更为田园化的幻想形成了对立。但正如莫里斯的理想不能同他对一场新的社会运动的感知分割开一样,威尔斯的启示也不能同他对一种新的社会观点的感知分割开。二者的形式多种多样,但都源自城市经历。在威尔斯笔下,解决方法只是部分依靠技

4 *Experiment in Autobiography*; London, 1969; Vol. II; 645.

5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H. G. Wells*; London, 1948; 786.

术,尽管技术得到了强调:新的通讯和交通方式将消解掉 19 世纪工业和大都市发展那种可怕的集中;建立新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定居点也会变得切实可行。但这一切从根本上来说都取决于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威尔斯称之为“人类生态学”:这是一种新的集体意识,既是科学的又是社会的,它能够对一个环境进行总体掌控,并指引其朝着人类成就的方向发展。这个思考维度是全新的,而引发这个思考维度的是一种观察——观察无计划的、无知的和攻击性的发展对人与动物、对乡村与城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新城市诞生时,那将是新科学指引下的一个新世界。

我们应当在大都市与工业文明的危机这一背景下审视莫里斯和威尔斯的这些反应,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观点常常被描述成无所事事时的白日梦或是刻意设计的、自以为是的预想。但比起之后一些反对他们的作家来,莫里斯和威尔斯更加接近那场一直持续且不断深化的真正危机。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1)和奥威尔的《1984》(1949)常常被视为对威尔斯式反应的必要的纠正。但它们也是对莫里斯式反应的“纠正”,其实也就是对那场积极的社会变革运动的“纠正”。赫胥黎展示了一个使用威尔斯的方式(科学的养育,经过改善的生产和运输,药物以及一个科学的社会秩序)达到了莫里斯的那种安逸舒适的世界。他诊出了这个世界的空洞,并把它同一种原始的幻象相比较:有关一种简单的乡村活力的新版本,它的产生部分是因为劳伦斯。在此版本中,乡村活力现在不再是天真的了,而是很原始;那是血液的节奏。奥威尔则通过展示社会主义运动如何在英社党的手中达到巅峰,从而把这种幻象切得粉碎:英社党建立了一种谎言、酷刑和思想警察构成的极权体制,而它所在的城市肮脏不堪,处于半瘫痪的状态,深陷永无止境的战争。这类反应在 20 世纪是有其广泛根据的,但重要的是,莫里斯和威尔斯曾对之做出那样有力反应的那场中心危机却在一种非常重要的意义上被忽视了。变革运动,而不是催生这些变革运动的环境成为了批评关注的中心。在由一种通常非常合理的批评带来的满足感中,危机本身似乎变成次要的了。奥威尔恰在很多方面都延续了吉辛的风格:比如他同样对城市的肮脏贫穷进行了详细发掘,并与吉辛一样对此表达了不安和厌恶,但最终却做出了一种更为优雅、更为包容的人性化反应:这一解决办法在他对革命之

275

城巴塞罗那的赞扬中达到顶峰。由于奥威尔对社会主义发展彻底幻灭了,他在后来的作品,如《起风》(1939)中,把注意力转回到了一种乡村幻象上,这种幻象把古老的、未遭破坏的乡村看作是人类引退和休憩之地,那是新的文明——不论是资本主义文明,还是社会主义文明——正在肆意破坏的纯真。《1984》中破败、丑陋、孤独的城市正是这一总体幻象的对立之物。

这些都是一场观念运动中的重要转折。但自始至终危机本身变得越来越尖锐,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在19世纪早期这还只是主要发生在英国的一个现象,现在却正变得国际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变得全球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扩展至工业化的西欧和北美,20世纪前半叶又延伸至亚洲和拉丁美洲。美国现在常被人视为大都市文明的典范,但在1910年时,美国的乡村人口还仍然多于城市人口,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被城市人口反超。从整个世界来看,居住在城镇(五千居民以上)的人口数目原本只占总人口的7%,在1850年到1950年之间增长到了将近30%。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前半叶,居住在城市(一万居民以上)的人口数目增长了250%。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当总人口进入迅速增长的时期,老城市也发展进入了大都市阶段。这并不仅仅是人类定居模式的一个根本转变。它还将人类直接暴露在许多新问题面前:如人口和食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土地使用和污染的问题;以及深刻影响人们想象的各种大规模攻击问题,比如二战中的抹杀性轰炸及其最高形式——原子弹对城市的毁灭。詹姆斯·汤姆森曾经想象过一场摧毁了石头人之城的自然风暴。威尔斯曾经想象火星用人“黑烟”和“热光线”攻击伦敦:惊呆了的市民面临这场来势凶猛的毁灭时束手无策,只是由于细菌感染事故才幸免遇难。在一个频繁爆发战争,人口激增,各国都发生社会危机的时代里,城市的形象又经历了更为快速的发展。

这一点在科幻小说当中非常明显:科幻小说直接继承了威尔斯对城市的反应。此外还有一个同样发展自威尔斯的附加元素:其他星球和星系的不同文明。詹姆斯·汤姆森从城市看向星星,曾经写道:

如果我们能做一次前无古人的飞行接近它们
我们只会发现它们不过是些同这里一样悲哀的星球,

或是一如我们的太阳,都在自我衰竭
周围环绕着许多行星,那里一样出了差错。⁶

在科学传奇故事当中,与此完全相反的感情——把这些星球当成新边界,用于人类的扩张和进步——成了一种明显的元素。人们想象成千上万的星球上存在闪闪发光的城市,那里有着各种各样的技术奇迹。(布里安·阿尔迪斯的《弱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直接引用了威尔斯式的观点;此外还有亚瑟·C. 克拉克的《城市与群星》。)此外人们还想象出一种文明,其演进程度已经超越了城市和技术的阶段:可以辨认出人们生活的地方就是旧式的田园——空阔的田野、小村庄——但却拥有强大的力量,因为它们已经内化了城市-科学-工业阶段的通信和生产能力(唐·A. 斯图尔特的《健忘》是一个例子)。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漫长历史中的每一种元素都这样得到了投射。

但重要的是,我们也要注意还存在一种对城市本身的极其消极的投射。现在这已经是一种习惯做法了。达蒙·奈特曾编纂过题为《奇迹之城》的一部未来故事选集,其中的一些故事实际上直接继承了19世纪的城市小说以及城市小说在威尔斯笔下经历的变形。例如,在J. G. 巴拉德的《千禧年之后》中

95%的人口被永久性地困在了大都市圈地区……这样的乡村已经消失了。每一平方英尺的地面上长出一棵这样或是那样的庄稼。过去曾是田野和草地的地方实际上成了工厂的地面。⁷

还有几乎被轰炸和辐射摧毁殆尽的城市,如沃尔特·M. 米勒在《自动升降机》中描写的那样:这个城市依然在行使自己的物质职能,并由中央服务协调程序进行电子管控,但人已经不能再踏入这个危险的地方试图进行挽救。在亨利·拉特纳的《滑稽的飞行员》中,城市为了解决其内部的饮水、食物、电力

277

6 前引书 Thomson, 199。

7 *Cities of Wonder*; ed. D. Knight; London, 1970; 92.

和垃圾处理问题,已经“人造化得非常严重,以致没人能够使用它”,居民的生存只能依靠集体催眠。在这种自我封闭的自动化城市中,居民无法相信在高墙外面还有别的世界;这样的城市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人们的想象中,常常还带有试图冲破城市、走进乡村野外的主题。E. M. 弗斯特的《机器休止》是一个早期的例子,在结尾时,由于一艘失事飞船的撞击,“整个城市……被撞得像个烂蜂窝”,而外面那些“薄雾和沼地中”的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等着要接管而非重建这毁灭性的机器。还有的城市变成了一种组织,如罗伯特·阿伯纳西的《一对一的战斗》中描写的那样:

三百年来城市一直在成长……就像癌从一些疯长的细胞中萌芽。……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从成百上千英里远的边远地区吸取营养,为了它土地献上自己的丰饶,森林像谷物收割一样遭到砍伐,人和动物活着只是为了满足它不断增长的口腹之欲。……它一边吞食,一边把废物排泄进海里,往空气中呼出自己的毒气,它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肮脏。它一点点发展起绕满线圈和埋藏电缆的中枢神经系统。……它从一团疯长的无骨巨物演变成了一种更高等的生物,有了意志、目的和意识这样的主观概念配套的明确特征……⁸

最后还有詹姆斯·布利什在《地球人,回家》中描写的飞行城市,这些城市飞往乌托邦和星系中的其他地方,去往新的世界,但却在它们的整个环境当中重演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

这些描写未来之城的小说在人们的头脑当中同田园小说相互作用。但当田园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远离乡村生活现实的趋势时,这种城市小说也出现了与性质相当不同的作品的明显重叠:如城市社会学和城市规划;对城市政府的研究;研究工业和大都市文明的物质环境的作品:在所有这些作品当中,城市的问题——从交通到污染,从社会影响到心理影响——常被视为

8 *Cities of Wonder*; ed. D. Knight; London, 1970; 64.

势不可挡的,而且根据某些观点,也是无法解决的,尽管这些作品强调的方面可能有所不同。

这是一种奇怪的情况,因为它不仅同大都市的快速增长,而且常常是无规划的增长并存,还同一种更大规模的详细规划并存:线性排列的城市,长达一百英里;带着对测绘和计划的饱满自信构思并建造的新城市。在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当中有一种明显的不均衡。从某种意义上讲,似乎只要是同城市相关的事物——从宏伟的到富有启示性的——人们就会马上相信。这种不均衡的来源之一就是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但另一个来源没有这么容易找到,这就是城市作为一个孤立的巨大问题的抽象性以及为此提供了极大支持的传统的城市意象。当我们审视城市的现实和意象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两者的发展都是在一个更为广泛的世界历史的范围之内。在这一历史当中,城市和乡村都在一个新得令人惊异的维度中被赋予了新的定义,而且最初可能很少有人辨认得出这些新定义。

278

24 新都市

279

在现行的对世界的描述中,主要的工业社会常常被描述为“大都市的”。乍看上去这可以看作是对它们内部发展的一种简单描述——在这些工业社会的内部发展中,大都市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如果我们把这种描述放在它真实的历史发展当中,更近距离地进行审视,就会发现其中真正的含义:在19世纪时仅限于一国之内的职能划分现在已经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西欧和北美的“大都市”社会是“先进的”、“发达的”、工业化的国家;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的中心。同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被视为是“欠发达”的其他社会(尽管在两者之间还有很多中间阶段):那些社会仍然以农业为主,或处于“欠工业化”的状态。“大都市”国家通过贸易体系以及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联合管控,从那些偏远地区获取食物和更为关键的原材料——这些原料的供应地占据了地球表面的绝大部分,也承载了地球人口的绝大部分。这样,经济和政治关系当中的城市与乡村模式就越过了一国的边界,被视为是整个世界的模式,并在这样一个地位上受到挑战。

这个模式的现代形式始于英格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英格兰内部,城市和乡村的真实历史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是一个扩张的历史——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模式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但这里讨论的却不是这里“发展”其他地方“没能发展起来”的情形,虽然有时候看起来是如此。在“城市”、在“大都市”经济当中发生的事情决定了并取决于被设计要在“乡村”中发生的事情:首先是当地的偏远地区,然后是更遥远的地方、其他人们的土地。从那时起,曾经发生在英格兰的一切就不断发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生于所有工业化国家和所有其他“欠发达”,但在经济上却很重要的地方之间相互依存的新关系当中。

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向世界其他地方的扩张已经给它带来了巨大的财

富,这些财富又转而进入欧洲的内部体系。从16世纪到18世纪,乡村宅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靠这种贸易的利润建立起来的。香料、糖、茶叶、咖啡、烟草、黄金和白银:这一切都作为商业利润流入了英国社会秩序当中,多过了英国的农牧业收入。在那个时期,这还主要是一种贸易利润:把货物从一种经济带到另一种经济当中,尽管这常常需要武力的支持。这样,作为地方剥削系统顶点的乡村宅邸就同这些遥远的土地发生了多重联系。但另外一个过程也已经开始了:这是另外一种“改良”。对这些贵重的异国商品的需求稳步增长,欧洲社会以及向外移民的欧洲殖民者开始组织越来越大的生产。为此,他们开始在热带地区组织“劳力”:他们用这个彬彬有礼的词语来指代从非洲贩运奴隶的贸易——17世纪有三百万奴隶被贩运出非洲,18世纪这个数字达到了七百万。生产糖、咖啡、棉花的热带种植园式的新乡村经济就建立在这种贸易的基础上,所得的利润同样流回了乡村宅邸体系:不仅仅是商品贸易的利润,直到18世纪末还包括奴隶贸易的利润。1700年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额占其商业贸易总额的15%。到了1775年这个比重占到了三分之一。经济上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贸易国家之间为了控制材料供应地而掀起的战争则大大支持了这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组织的殖民体系和工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英国社会的本质。

19世纪发生的事件是前所未有的,英国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业社会、城市社会,它的农业已经衰落,只占据边缘地位。然而如果没有殖民发展,这些就根本不可能发生。新工业产品大量出口。世界贸易的大部分都是由英国从其在航运、金融和保险领域的主导阵地——伦敦的新“城”——进行并维持的。经历了这些利润丰厚的发展(这些发展还往往抑制了其他一些本来或许可能的发展),到了19世纪中期经济已经发展到国内产品无法满足国内人口需求的程度了。于是城市和乡村的传统关系又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彻底重建。偏远国家变成了工业英国的乡村地区,这随后对英国自己幸存下来的乡村地区造成了严重后果。同时,对工业市场和原材料的需求又将这个事实上的社会扩张至半个世界。18世纪,位于北美的最重要的殖民地获得独立,更富戏剧性的是它最终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崛起的工业社会之间就为了争夺市场、原材料和势力范围开始了激烈的竞争。

这种竞争体现在贸易和许多殖民战争中。它使英国正式建立了对殖民地的新型政治统治:政治意义上的不列颠帝国。在 20 世纪这样的竞争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式在它的欧洲基地爆发。

这种发展态势给英国人的想象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要想探寻这种影响并非易事。国内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也从很多例子上看到了这一点。但至少是从 19 世纪中期起(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而且非常重要),出现了这样的大背景,在其中每个观点、每个意象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受到影响。我们可以从 19 世纪中期的工业小说中看到向殖民地移民的观点是如何被当作救命稻草的——人们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城市的贫穷和拥挤问题。成百上千流离失所的乡村工人已经去了殖民地。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玛丽·巴顿》的结尾安排在加拿大,带着乡村田园和避世的气氛,这一氛围同早期任何有关英国的意象同样有力。在《呼啸山庄》、《远大前程》、《奥尔顿·洛克》及这一时期的其他小说当中,存在着一种逃离英国社会内部斗争,到那些遥远的土地上去的出路:这不仅让人们能逃到一块新的土地上去的出路,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它还能让人们获得财富,然后从更高的层面重新回到社会的斗争当中。亚历山大·萨默维尔和托尔普德尔蒙难者当中的一些人是乡村社会危机的牺牲品,他们就在海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城市危机牺牲品中的很多人,包括宪章派的领袖们,也走上了相同的道路。帝国的这些土地是一个富有田园风光的避世之地,是逃离债务和耻辱的地方,或者是发财致富的机会。随着这些遥远土地上的战争和管理变得更加有组织,不断膨胀的中产阶级在海外找到了自己的固定职业。新的乡村社会进入了英国人的想象当中,处在政治和经济管控的阴影之下:比如吉卜林、毛姆和早期奥威尔的种植园世界;比如康拉德和乔伊斯·卡里的贸易世界。

从 1880 年开始,地理和社会关系的这种戏剧性扩展就开始了。将英格兰视为“家”的观点也显著发展起来,这是作为一种记忆和一种理想的特殊意义上的“家”。有关这个“家”的一些意象是有关伦敦中心的——这个强有力、有威望、消费的首都。但有很多的意象则是关于乡村英格兰的:乡村的绿色和宁静同劳动场所的炎热和贫瘠形成对比;乡村的归属意识、社群意识同殖

民统治的紧张压力、在异地居住的孤立境地形成对比,而这种对比又让乡村的归属和社群意识变得理想化。我们可以在 20 世纪乡村英格兰的许多意象中看到这种观点的力量。毕竟,这些人们大多数来自世界上城市化和工业化最成熟的社会,而且他们去殖民地的原因常常是为了服务于国内的这个怡人的环境。或许这只会加深他们对乡村的渴望和美化。此外,从实用角度讲,对这种服务的回报——尽管期待的人很多,但得到的人却很少——是返回这个城市化、工业化英格兰的一处乡村地区:回到“宜于居住”的乡村英格兰,“乡下的一个小地方”;除非从服务中得到的回报非常大,能够让人追求“乡村宅邸”,真正的住宅。英格兰的飞鸟、树木、河流;跟自己说着基本相同的语言的当地人:这就是许多想象中的和实际的定居地的条件。现在,乡村已经成为了一个退隐的地方。

在许多代的殖民地军官、文官、种植园经理和商人中,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一点。但在他们自己的阶级中,他们的成就是最小的。在工业化和帝国主义化的过程中,土地贵族阶级已经基本失去了它的特殊身份和政治力量。但该阶级的社会形象继续占据着主导地位。地产和投机买卖的收入网络现在不仅是工业化的,而且是帝国主义化的。同以往一样,这些收入流入了一个自觉的乡村展示模式。我们可以看到,晚年的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以及他们之后那些毫无活力的作家笔下的乡村宅邸更应当算是资本的宅邸,而非土地的宅邸。比以往更重要也更为仪式化的是,在工业发展和帝国主义发展带来的利润之上,一种乡村模式作为文化上层建筑被发展了起来。这是一种游戏的模式,是对潘舍斯特的那些古老意象的轻松实现:野外运动,钓鱼,还有最重要的赛马;对谈话和“古老的乡村方式”的兴趣往往不是很大。

与此同时,在英国内部仍然存在着一个很小的乡村无产阶级,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了业主居住者:他们常常是费力地适应家庭农业的从属地位,不过效率却越来越高,这得益于一个科学和工业化社会的资源。以前的真实意象中有一些低调存留了下来。但现在新的意象终于在数量上超过了它们,它们自己本身也因变化的功能而发生了改变。退隐的宁静之地,或者过乡村生活的地方:这些现在变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不论是在文学中还是在历史中。

但在人们的目光无法达到的遥远之地一直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乡村无产阶级。奥威尔曾经见过这样的无产者，正如他在 1939 年写的那样：

我们总会忘记英国无产阶级的绝大部分并不在英国生活，而是生活在亚洲和非洲。¹

283

这的确就是当时正在发展之中的体系。数百万的奴隶；数百万签订契约和合同的劳工；数百万薪水微薄、难以维持生计的乡村工人。就是在这些“乡村”地区，争取政治独立的运动在鲜血与斗争中爆发了。在不同的阶段，来自乡村宅邸的年轻军官们为了保护这样一种秩序，带领其他的英格兰人以及丧失财产的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前往殖民地打仗，许多人命丧战场。这真是奇怪的命运。来自城市贫民窟的失业的人，人数众多的没有土地的乡村工人，丧失土地的农民：他们每个人找到的新工作就是对附属国的乡村穷人进行杀戮和惩戒。

如今人们常带着一种罪恶感说，英国人民作为整体从帝国主义体系当中获益。如果我们把财富流动的数字都加起来，就不能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英国总体生活标准的提高主要依靠对千百万人——他们只被视作落后民族或土著——的剥削。然而讽刺的是，殖民地的失业情况激发了反向的移民潮，“乡村”地区流离失所的人按照一种古老的模式，追随着财富和有关财富的故事来到了“大都市”中心；此时，那些世代代积累起来的大部分罪恶、憎恨和偏见仍然没有消失。这些“乡村”人来到“大都市”后马上就被挤进了当地的穷人堆当中，跟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样。但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样一个事实：过去进入英国且现在仍在不断进入英国的财富并没有得到平均分配。伦敦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城市的时候正处在它的巅峰期之一，此时它在东区制造出了贫穷和苦难聚集的绝望的中心。因为来自帝国的财富——经过如此有限的人的手——是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一个关键来源，而行使这种力

1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London, 1968; Vol. 1; 397.

量的仍然是同一个统治阶级。在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生活的好处当然普及得更广了,即使是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底层。即便在当时,这些工人们还是在内部受到了直接的剥削。但是为了这些好处,英国工人们必须要付出代价:他们要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付出自己的鲜血,尽管这些战争同他们的直接利益关系不大甚至是毫无关系;而在更深的层面上,他们迷茫、失去方向感,忍受着精神的畸变。这是城市和乡村故事最残酷的版本,现在在一个难以想象的复杂规模上展开。

现在在英国,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体系已经终结了。但政治上的帝国主义只是一个阶段。它以经济和贸易控制为先行官,必要时会用武力支持自己。之后它被经济、金融和商业控制有效替代,而每当受到的反抗加剧时,政治、文化和军事干涉就会支持这种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占据统治地位的关系仍然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只是城市对乡村的剥削达到了最高点。

284

人们用来掩藏这种剥削的观点是“改良”这一旧观点的现代形式:这是一把人类社会的标尺,理论上,它在全球的工业化当中达到顶峰。所有的“乡村”都将变成“城市”;这就是这种观点发展的逻辑,这一个简单的线性标尺上面可以标上“发达”与“欠发达”的刻度。但现实是不同的。很多“欠发达”社会的发展恰恰是因为“大都市”国家的需要。这些民族本来经营的是自足的农业,却在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强迫下变成了种植园经济、矿区和单一作物市场。这些地区为了满足大都市的需要而专门生产特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价钱就是它们的生命线,然而这些价格却完全取决于大都市的商品市场。大量资金被投入原材料的供给及其经济和政治基础设施的建设,从那些从事专门化生产的“乡村”地区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主导性的相互关系。不论“乡村”生产的是咖啡还是铜,是橡胶还是锡,是可可、棉花还是石油,从根本上来说都没有区别。而给予这些贫穷国家的所谓的“援助”也几乎毫无例外地加强了这个过程:也即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是为了满足大都市的需求;为了维持它们的市场和势力范围;或是继续维持政治上的间接控制——支持一个合作政权;反对一切能够让这些社会独立自主发展的进展,必要时还会进行武力干涉。20世纪中期的世界历史的大部分都是这种决定性的关系及其引发的动荡后果。这段历史在意识形态上被“发展”

这样一个抽象概念掩盖起来：一个贫穷的国家正处在富强的“道路上”，就好像19世纪的工业化英国；一个穷人只要有了正确的观念、肯刻苦努力，就会走上变成富人的“道路”，只不过他暂时处于这个发展过程的较低阶段而已。然而事实是贫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其造成的后果影响又是如此广泛，以致这些后果正在决定着世界的历史。

在这个影响广泛的作用之内，城市和乡村过去的那些意象似乎消失了。但有一些仍然具有关联性；它们的历史和观点都具有关联性。无论何时，我们都还能找到最传统的乡村文学，只是我们要到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地方去寻找它。我们能够找到遥远之地的故事，但之后仍然能在这些故事当中发现我们自己的某些传统的经历。具体地区的细节是不同的，这在不同的民族当中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许多历史经历从本质上说都是相似的。如果我们去读雅沙尔·凯默尔描写安纳托利亚移民摘棉工人的优秀小说《平原来风》，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人民中许多人都曾有过的经历：一个社群成了其他地方的季节性投机企业的可用劳力；长途跋涉的艰辛；故事结尾为人熟知的欺骗。我们可以在詹姆斯·恩古吉的《一河之隔》（1965）中读到两个民族、两种乡村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此外还有艾尔奇·阿马迪《情妇》（1966）中的乡村世界，威尔逊·哈里斯《欧丁的漫长之旅》（1961）中的稻米之乡圭亚那，R. K. 纳拉扬《大师和朋友们》（1935）中的印度南部乡村生活，以及穆尔克·拉吉·安纳德《村庄》（1939）中的乡村冲突。

这些故事中有许多都包含有典型的内部主题：同地主的斗争；庄稼歉收、负债；资本对农民社群的渗透。这些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和传统当中都是内部的张力，我们经常能够辨认出它们都是我们较早时期历史中的典型形式。但对我们来说，它们最能引起我们兴趣之处是当它们触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经历的时候。在英国本土岛屿内部，殖民过程显得非常遥远，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记载，尽管在苏格兰、威尔士尤其是爱尔兰的乡村文学中能够看到该过程所引发的后果。这一过程已经成了漫长的定居生活的一部分，而这种定居生活被理想化为旧英格兰或是自然经济；那是多个世纪不断侵入和统治的产物。殖民地民族的这一现代文学的重要之处，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历史是如何从英格兰这个基地发生的，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而这个英格兰同我

们自己的文学中所描画的那个英格兰迥然不同。

因此,在这一殖民过程——该过程创造出的财富在英格兰被转化成乡村宅邸以及乡村宅邸式的生活方式——的接收端有着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蔗糖种植园的经历和奴隶贸易的经历。对这个发展过程最有组织、最有扩张性的阶段有着很多直接的描写。对于那些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产生的张力的英国人的作品我们已经很熟悉了:E. M. 弗斯特的《印度之行》,奥威尔的《缅甸岁月》以及乔伊斯·卡里非常重要的非洲小说《被拯救的爱莎》、《非洲女巫》、《约翰逊先生》。从特点上来说,这些都是吉卜林之后具有批判和自我质疑精神的那一代人以自由主义的方式对此经历进行的审视。但如果我们想要获取一个既不同、有必要的视角,只需去阅读印度、非洲和西印度群岛作家的作品。穆尔克·拉吉·安纳德的《两叶一芽》(1937)从另一面对茶叶种植园进行审视。在齐努阿·阿切比的《崩溃》(1958)的结尾处,一个白人男子在为一本关于“平定尼日尔河下游原始部落”的书收集材料,这个颇具讽刺性的挑战非常说明问题,因为我们都曾读过这样的描写,但现在我们却是从一个乡村社群的内部,在白人——传教士或是地区官员——同他们雇佣的士兵和警察到来的时候,来看待这一过程。《崩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在于,正如一些描写乡村变化的英国文学(迟至哈代)作品,这部小说清晰地展示了社会内部的紧张状态,这样我们就能够了解乡村被侵入(这种侵入在扩展过程中无论如何都要发生)的模式。最初皈依异国宗教的是传统社会中的边缘人。人们深深厌恶并抵制异国的法律和宗教,但作为对刀耕火种的洋芋种植的补充,棕榈油交易站却很受欢迎。在内部矛盾和外部侵略交织的复杂过程中,奥康科——这个最强大的人——被毁灭了。

286

我们可以在乡村人民对英国统治的反抗运动中看到同样的复杂情况,只不过阶段不同,社会背景也不同;詹姆斯·恩古吉《孩子别哭》和《一粒麦种》中的肯尼亚,韩素音《餐风沐雨》中的马来西亚。过去被正式呈现在英国读者面前的东西——先是被描写为野蛮,之后是恐怖主义——现在却被展示出了它们的真实面貌:如此多的各不相同的乡村社会——没有被理想化,包含着它们自己的紧张态势——遭到一个不了解它们、常常十分残暴的陌生体系的入侵和改变。重要的是,现代英国中产阶级传统中对农民的理想化并没有扩

展到这些被占领的社会中的农民、种植园工人和苦力身上,尽管这种扩展本可能十分重要。但从一种新的、普遍性的意义上说,这正是“城市”对“乡村”的入侵、改变和征服;历史久远的乡村社群被发展中的大都市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连根拔起并被改变了发展方向。这也并非仅仅发生在过去或是不久的过去;我们只需阅读南非作家伊奇基尔·慕帕赫列列的作品就能明白这一点。

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更为复杂的次要过程。帝国主义国家被描述为“大都市”,作为这一描述的基础,乡村具有被城市入侵、改变和征服,并且学会用旧的和新的方式进行反击的意象。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这种意象是很能站得住脚的。但帝国主义统治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在这些被统治的社会当中引发了一些在内部沿着异国发展路线发展的进程。乡村和城市的内部历史发生在殖民和新殖民社会当中,而且常常带有很大的戏剧性。这显得尤为讽刺,因为在西方思想当中,城市常常同其本身最为现代化的发展方式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20世纪在全世界范围内最显著的城市发展发生在那些“欠发达的”和“发展中的”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社会内部,城市化依然在进行着,尽管在一些像英国这样的社会中城市化的比例已经相对稳定了。的确也有某种远离城市(过去意义上的城市)的重要趋势,例如要为商业和政府管理的发展而清理城市中心;又例如作为相关疏散政策的一部分,市郊、新城镇和工业区在乡村和半乡村地区得到了发展。在工业社会中,集中化的城市正在被一个事实上的运输网所取代:大都市圈、城市区和伦敦-伯明翰轴线。这样城市进入了其第三个发展阶段,这时的城市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省,甚至是一个国家。

与此同时,在帝国主义进程的另一端出现了极度拥挤的城市,那是强加的经济发展及其引发的内部后果所直接导致的结果。这些城市最初是殖民贸易和殖民统治的中心,正如我们历史上所发生的那样,这些城市吸收了乡村地区的剩余人口和失去家园的劳工。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长期过程,总人口的迅速增长又刺激了这个过程。城市在混乱中扩张时产生的为人们熟知的问题又在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重现。那些说到城市危机时,脑海里想的是伦敦或纽约或洛杉矶的人,他们也应当想想加尔各答、马尼拉或者亚洲、非洲

和拉丁美洲上百个其他的城市所面临的更为深重的危机。流离失所的原乡村人口涌向了金钱经济的各个中心,而操控这种金钱经济的则是远离他们自身利益的各种利益。在前殖民时期和新殖民时期的世界里,城市的最后一个意象就是一个政治中心或是贸易港口,周围是盖满简陋小屋的城镇和城市贫民区——这些陋屋城镇和贫民区往往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快增长。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秘鲁有一块几英亩的沙漠在两个星期之内变成了一座拥有三万人口的“城市”;在遭到改变并解体了的乡村社群和资本主义农业与工业化进程(该进程有时依靠内部驱动,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依靠外力指引)的长期相互作用当中,这还只是一个特定的例子。

这样一来,若要等富裕的工业化社会就这个戏剧性过程的后果发出警告就为时过晚了。社会当中存在着一个保守主义、反动的错误强调;就像哈代评论乡村英格兰时所说的那样,这种强调实际上是让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观察者的利益而止步不前,保持原来那种风景如画但一贫如洗的状态。即使这是一种更为严肃的强调,例如对人类将要承受的全部后果的合理强调,但如果它认为社会的发展进程应当停留在现在这个相对的优势和劣势状态、不再变化,那就是一种欺诈。因为人们必须要承认的一个事实(不仅是历史性的事实,也是当代的事实)是,这些发展路线不论引发了预期之中,还是预期之外的后果,它们都要返回到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中心去。破碎的乡村社会不仅包括拉丁美洲的各个经济体,也包括被轰炸和烧毁的越南。因此,要想使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增长,独立发展是唯一可能的机会,而只有艰苦战斗才能获得独立发展。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发展或是没能成功的发展都加起来,就会发现整个世界的危机非常可怕;这无疑事实,但这个危机已经无法被阻止了——在它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无法被阻止。的确,如果真的会发生决定性改变的话,这些改变将来自“大都市”国家内部——这些国家的力量现在扭曲了整个过程,使得任何真正满足共同利益和进行共同控制的体系都变得不可能。但当我们审视大都市发展趋势的力量和驱动力——往往是由其内部危机加速的——时,我们无法怀疑这样的——一个事实,也即要想改变发展方向——如果能够找到不同的方向的话——就必须进行革命性的变化。危机的恶化程度,以及那些继续掌控危机的人的强大力量,这些使得任何更

288

为简单或更为温和的变化都无济于事。

我们世界的日常生活具有变得广泛的流动性;在这种流动性当中,文学继续体现着几乎变化无穷的各种经历和阐释。我们仍然能够记得我们自己的早期文学当中对流动性和城市堕落的发展过程的描写,也看到了这些主题在非洲、亚洲和西印度文学当中再度出现——这种文学的特点是它使用了大都市的语言,而这本身就是流动性带来的结果之一。我们能够读到许多遥远的国家里那些躁动不安的村庄:如恩坎姆·恩万科的《丹达》、乔治·拉明的《在我皮肤的城堡中》。作家也从这种流动性中学到了一种混合的语言,这出现在 V. S. 雷德的《新的一天》中。还有齐努阿·阿切比,他在《崩溃》和《上帝之箭》中展示了一个外来的体系如何进入了乡村当中,并在《不再安逸》和《人民之子》中向我们展示了教育流动和城市中寻找新工作的复杂过程。但是我们太习惯于透过不同国度和不同种族的幕帐来思考一般经历,后果就是我们只是把这些故事的特别之处仅仅视为异国风情而已。一个社会进程正发生在一个我们原本不熟悉的社会里,这是它的重要之处。但当我们从乡村和城市文学的漫长历史中获得洞察力后,我们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看到,这个社会进程是人类共同历史中一个连接性的过程。

25 多样的城市与多样的乡村

(1)

289

乡村和城市自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现实。此外,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中,它们代表的仅仅是两种居住方式。我们的真实生活经历不仅仅是对乡村和城市的最独特形式的经历,而且还包括对二者之间的许多中间形式以及对新的社会、自然组织的经历。

然而有关乡村和城市的观点和意象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力量。这些观点和意象的经久不衰具有重大的意义,而能与这种重要性相匹敌的就只有这些观点本身实际具有的千差万别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变体了。我们通过某些主要形式了解了自身经历的中心部分、了解了我们社会中的危机;很明显,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对比就是这些主要形式之一。但尽管事实如此,我们还是会倾向于简化历史上各种不同的阐释形式,笼统地称作象征或是原型:甚至把那些最明显的社会形式抽象化,赋予它们一个基本上是心理学的或形而上的地位。当我们发现某些主要形式、意象和观点在经历了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之后仍然保存了下来时,常常会对它们做出这样的简化。但是,这些形式、意象和观点能够持续下来的原因恰恰在于它们的不断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常常很微妙,而且发生在内部,有时还不为人察觉。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一点,我们也能发现这种持续性暗示着某种永恒的或实际是永恒的需求,而不断变化的阐释正证明了这一点。我相信的确存在这样的一种需求,而且它是由特定历史的诸多进程创造出来的。但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历史进程,或者只是偶然看到它们,我们就会退回到以前的思考模式——那些模式似乎能够抛开历史创造永恒。我们可能在此中得到感情上或理性上的满足,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只处理了问题的一半,因为在所有这样的主要阐释当中,持续性和变化性的

共存才是真正显著的、有趣的现象,也是我们所要说明的,而不能把一者的事实缩减为另一者的形式。或者,以理论性更强的语言来说,我们必须能够用相关术语来解释概念的持续性和历史性。

290 有关于城市和乡村的观点就是这一问题所适用的主要情况之一。比如,很明显,我们不能单纯为了一种名义上的连续性,就把从一个中世纪城市的经历中得出的观点当作是关于一个 20 世纪大都市的观点,同理也不能拿描述皮奥夏乡村的田园式观点当作对现代诺福克的相关阐释。但同样,我们也不能说有关乡村纯真的观点,或城市为传播文明的中介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曾在如此多的历史时期,以如此多的形式出现过——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幻觉,只需人们来揭露和反对。揭露和反对常常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我们只是局限于这些观点的话,我们其实在讨论有关乡村愚蠢或城市作为腐败之地的观点所具有的相对持续性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然后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更深层的问题:这些观点的出现是为了阐释怎样的经历?为什么在某个时期会产生或再次产生某些特定的形式?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这些观点的不同形式进行历史性的和批判性的追溯。不过,如果我们在某些点上停下,截取一个特定的横切面的话,这也是非常有用处的:不仅仅要问在一个时期当中关于乡村和城市的观点有了什么样的发展,也要问这些观点在一个更广泛的结构当中同哪些其他的观点有联系。例如,我们必须注意到,16 世纪和 17 世纪时有关城市的观点同金钱和法律稳定地联系在一起;18 世纪时同财富和奢侈联系在一起;自始至终有关城市的观点还同暴徒和群众联系在一起,而该联系到了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达到了顶峰;19 世纪和 20 世纪则是同流动性和孤立性联系在一起。这些观点当中每一个都有一定的持续性,但以孤立性为例,它只在城市发展到大都市阶段的时候才作为一个主要的主题出现;而同样是将城市等同于金钱的反应也有所区别,有的观点较为孤立,将城市同腐败和阴谋相联系,有的观点则将城市视为一个商业和政治体系。类似地,在同乡村观点相关的其他观点当中,彼此之间也迥然不同:例如,在乡村居住的观点就不同于在乡村退隐的观点——后者暗含着流动性。每一种观点都能在不同的时期中找到,而且似乎是依赖于阶级变化的,但还有另外一种明显的对比——这种对比发生在两

种观点之间,一种观点认为乡村是经过耕耘的,这种耕耘就是朴实的成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乡村是未经开垦、未遭破坏的,没有开垦耕种,而是孤立的大自然。这种对比有着更为清晰的历史视角,因为后者很明显包含着对整个一种生活方式的反映,而这种生活方式基本上是取决于别处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观察劳动中的乡村时,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劳作事实被包含其中,这个问题同样是有历史前提的。但是,即使是在一段时期之内,我们也能看到,在类似黄金年代这样的观点当中,一种明显的相似性是如何经过分析被证明掩盖着不同的真实观点的,例如这一观点曾被贵族、小地主和无地者所分别使用过。在这些有关联系和内部变化的例子中,更为重要的常常不是关于乡村人们正在说什么,而是除了乡村之外人们还在说些什么;正如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更为重要的常常不是关于城市人们正在以传统的方式说什么,而是除了城市之外人们还在说些什么。

291

这种复杂性非常深奥。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乡村抱怨(这种抱怨很明显诉诸一个更快乐的过去)的三个主要阶段,这是很有用处的: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显而易见的是,每一个阶段都对应着乡村经济中发生特殊变化的一个时期,而我们发现这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直接的反映。问题不仅仅在于这些反映中每一个都包含了其他社会性的和形而上的观点,而且在于乡村作为一种安定的生活方式被不受欢迎的外来变化搅乱这种传统观念在我们这个世纪被有关城镇和城市的类似观点复杂化了。对乡村变化的抱怨或许来自受到威胁的小地主,或者来自平民,在 20 世纪甚至来自地主阶级,但有趣的是,在无数有关经济再发展、城市规划以及机场和高速公路体系带来的影响——对如此多的 20 世纪城镇造成的影响,甚至对伦敦的一些地区也有非常强烈的影响——的抗议运动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同样的词语——摧毁当地社群,驱逐小人物,对既定和约定俗成的方式漠不关心。我曾听到有人为保存考文特花园辩护,反对发展计划,而这种辩护几乎是在重复议会圈地运动时期为平民进行的辩护的每一个细节。很明显,关于乡村和城市的观点都有特定的内容和历史,但同样明显的是,有时它们只是一些更广泛的过程的孤立和识别形式。当人们说到“城市”时,他们往往是想说资本主义或官僚主义或集中的权力,而“乡

村”这个词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不时会意味着从独立到剥夺、从活跃想象的力量到意识释放的形式之间的任何东西。在每一个点上我们都需要把这些观点放在历史现实当中:有时它们会得到肯定,有时则会被否定。但当我们审视这整个过程时,我们也需要把历史现实同这些观点联系起来,因为有时这些观点表达了——不仅会以伪装和置换的方式进行表达,也会以有效的调解或所提供的,有时是非常有效的超越进行表达——人类的兴趣和目的,而除了这些观点之外再无现成可用的词汇对其进行表达。这不仅仅是由于缺少更为具体的术语和概念;而是因为确确实实存在着的乡村和城市,经历能够找到可以赋予思想以形体的材料。

292

我曾在一个单一的文学和社会当中追溯了这些主要进程的主要变化:文学是英国文学,它或许比其他任何一种文学都拥有着更为丰富的乡村和城市主题;而这个社会很早就十分彻底地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先是乡村经济和社群,然后变成了工业和城市经济和社群;这仍是一段特别的历史,但从某些重要方面来看,它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这段历史的每个阶段都可以单独进行审视,不过也还有其他方式来描述这些阶段的顺序、相互作用以及发展。很明显我们需要比较性更强的研究——在以下各国的文学当中已经有非常丰富的材料了:在法国和俄罗斯的文学当中,乡村和城市有着既相关又独特的重要意义;德国的思想和文学当中,将城市作为文化中心的观点沿着一个积极的方向发展;在美国文学和文化中,这个过程的速度和规模创造了非常深刻的,有时还是普适性的观点和形象;在意大利文化中,研究材料不仅是一种资料来源,同时也具有意大利文化当代转变的戏剧性特点;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些丰富的材料还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文学中,而在发展中国家里,审视相关过程的其他方式正在逐渐获得力量。人们希望也期待着所有这些都能得到详细的和比较性的研究。

(2)

但这并不仅仅是研究的问题——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从这个历史进程的某些主要特点来看,它实际上已经国际化了;这个事实意味着我们掌握的不仅仅是用来做有趣对比的材料。我们正触摸着一场全面危机,而且对此

心知肚明。举例来说,回顾一下英国历史——尤其是英国处于帝国主义顶峰的时期,我可以从乡村和城市关系不断变化的这一过程中看到一种生产方式的推动力——而这种生产方式确实已经改变了世界。因此我非常愿意跟现在的许多人一样,把城市看作是资本主义,条件是如果我也可以说这个生产方式具体来讲始于英国乡村经济,并在那里产生了很多典型后果。——增加生产量,为一个完全触手可及的世界重新制定秩序,改变传统的定居方式,将残存下来的人力变成无产阶级等,所有这些都一直以许多扩展的形式出现在城市、殖民地和整个国际体系当中。那么,我就完全不会因有关考文特花园的抱怨是对圈地运动时期平民抱怨的重复而感到惊讶,因为以这些特定形式出现的改良和发展的力量——金融和政治力量混合的产物,它追求的目标与任何地方社群的目标都不相同,却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内部原理——作为资本主义事业的发展阶段,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相似的。

石油公司做的事情,采矿公司做的事情,就是地主过去做的事情,就是种植园主过去和现在都在做的事情。许多人都同他们一样,认为土地和土地上的财产都能拿来进行可获利的开发:可得利润是非常明显的,这使得当地社群的不同需求遭到了践踏,而且这种践踏常常十分残忍。这个过程既困难又复杂,因为生产的增加以及新工作形式和财富的增加是确切无疑的,但尽管如此,比起农业和工业发展之间更为传统的对比——乡村被视为同自然的合作,城市和工业被视为是对自然的凌驾和改变——通常更有必要看到定居形式和开发形式之间的对比。耕作的结果和采矿的结果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质的不同,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对比,我们就只能看到所有结果中的一部分。人类定居生活所受的影响,与传统或地区性的自主决定的生活方式所受的影响常常是十分相似的。不论是由于土地的丰饶还是埋藏的矿脉,土地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被人用抽象的眼光看待。它被用于一种暂时凌驾于其他所有考虑之上的事业当中。自从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变化,我们就发现我们很容易忘记农业曾非常深刻地改变了土地,这种改变如今仍然很明显。在环境所受到的最早、最显著的影响中——不论这些影响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有些是由农业活动导致的:使土地变得更肥沃,但在许多地方也会因过度放牧而使土地变成沙漠;清理耕地,但在许多地方也会因砍伐树木

293

而毁坏土地或导致水土流失。土地的这些使用方法中有一些比任何资本主义秩序出现得都要早,但在世界历史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所有这些物质和社会转变最有效、最强大的媒介。城市只是审视这种变化的一种(现在可能已经变成了传统的)方式;而正如我们现在几乎全都知道的那样,乡村毫无疑问是另外一种审视变化的方式。原本人们喜爱的是经过开垦的乡村,后来却对“未经破坏的”地方投以强烈的感情,这种变化确实精准地记录了这个始终持续的过程及其在最活跃的时期产生的影响。

但我们也就必须将这些生产技术和生产的方式区分开来——后者是前者特定的社会形式。我们把技术上的变化称作是改良和进步,对它们带来的一部分影响表示欢迎,对另外一部分影响表示痛惜,要么感到十分麻木,要么意见分歧;在这种思想状态中,有关自然的乡村生活方式最抽象、最虚幻的观点不断引诱着我们——至少也让我们感到迷醉。或者我们可以后退一步说,这就是人类所处的状况:在必要的物质主义和必要的人性之间难以抉择。通常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区分工作和休闲,或是区分社会和个人,或是区分城市和乡村。这种划分不仅在我们的头脑中进行,还在郊区和花园城市之间,城镇房屋和乡村茅舍之间,工作日和周末之间进行。但我们常常会发现,这些改善的指引者,这些改变的领导者,比我们料想的来得更早、扎根更深;他们实际上已经进行了更为成功的自我区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乡村宅邸就是这种暂时性解决方法最初的形式之一,在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创造出的新贵族建起的乡村宅邸同存留下来或是改建的旧宅邸一样多——后者的建造者是农业变革时代的旧贵族,有些甚至还是新贵族们的祖先。这种居住方式一直为后人所大力模仿,甚至包括半独立别墅和休闲及度周末的方式这样的细节,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种无限多产的资本主义在其各个阶段都在扩展着资源和模式,这些资源和模式提供并包含——不论多么不均衡——了对资本主义所产生影响的各种反应形式。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着,我们生命中的大部分都被包含其中;那么,在经过这个过程后,要想恰当地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特点往往就很困难——这个特点并非是对机器或改良技术的使用,而是拥有这些机器和技术的是少数人。确实,当持续集中的所有权——开始是对土地的所有权,然后

是对所有主要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在多种政治和文化调解方式的作用下成为一个体系和一个国家的组成部分时,这种感知很容易会减弱,尽管事实却在增加。许多提倡过农村生活和提倡保护自然资源的现代人将“国家”和“规划者”视为他们的主要敌人,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国家正在管理、规划者正在为之服务的是一种经济体系,它的主要目的、程序 and 标准都体现出它的资本主义本质。高速公路体系、房屋拆迁、取代建有住宅和小商店的街道的办公大楼和超市,这一切可能以社会规划的形式得到实现,但没有任何一种情况不是自一开始就被嵌进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各种优先权的。这可能是简单的工业发展或采矿:最初做出决定并最终拍板的都是精打细算的所有者。道路体系的修建需要考虑他们对分配和交通模式的需求和偏好;不论是在用卡车还是用铁路的选择上,还是在把土地抽象地视为一个交通体系还是生产机遇(在其他地方土地就是被视为生产机遇的)的选择上,他们的需求和偏好都享有优先权。房屋拆迁和房屋短缺一样,都与人类住所分配的变化有关,而导致这种改变的是由少数人基于利润标准和内部的便利做出的一整套决定,他们决定人们在哪里能够找到工作。所谓的地区政策只是包含在这些优先权内部的补偿性措施,而不是决定性的对抗物。工业和农业之间平衡表现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不论如何调节这个平衡,它都是有关资本主义投资的一套决定的产物。这些决定由少数派做出,他们控制着资本,并通过利润计算决定这些资本的使用。

295

我们在这样一个体系中生活得久了,就很容易把它错当成一种必要的、实际的现实,不论我们可能在这个体系中发现何种令人不快的因素。但是,资本主义在英国所决定的不仅仅是乡村和城市以及二者之间直接关系的具体历史。它同样决定了我们心目中现代社会的总体特点。城市中的竞争性冷漠或孤立感可被视为同某些社会竞争和异化有着深远的关系,而这些竞争和异化正是这种体系所促成的。这些经历并非唯一的,因为在压力和局限之下的人们会做出别的安排,发展出别的情感联系,并试着按照别的价值观生活。但中心驱动力仍然存在。

现在,我们当中有太多人在城市里生活了太长的时间,以致使得新的交流方式的出现成为必需,而这些新交流方式反过来又展现了城市和工业进程

的扩展和流动性,以及为了资本主义目的而对这些媒介进行的占据和利用。我所指的并不仅仅是广告,尽管它是资本主义城市一种特定的变形。我所指的也并不仅仅是媒体被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为少数人服务。我所指的是将一种必要的社会模式转变成各种特定形式。作为对城市以及一个相互联系更加深刻的社会和世界做出的反应,我们养成了对信息——一种改变了的意义上的信息——的习惯性反应,这是非常惊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早报、晨间广播节目、晚间电视节目都是某种倾向的各种表现形式,而在这种倾向当中我们在寻找自己的中心社会意识,同时这种中心社会意识又通过特定、受局限的方式得到肯定。

华兹华斯发现,当我们在一个满是能够影响我们的陌生人的世界中变得不安,当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力量以明显外在的、无法辨认的形式在我们周围流转时,我们为求安全会退回到一种深深的主观性当中,或者我们会在自己周围寻找一些社会图景、社会符号和社会讯息,对于这些东西,我们试图以个体的身份与之发生联系,但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发现某种形式的共同体。现代传播技术的要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进行这种替代——替代人们与世界之间的那些能够被直接发现的过渡性的关系。这可以同现代社会的规模和复杂性联系起来,而城市又是这种规模和复杂性的最明显的例证。但是这种替代已经变得十分广泛,它延伸到了最偏远的乡村地区。它是一种共有的意识形式,而不仅仅是一套技术。而且作为一种意识形式,它无法用“地球村”这样的修辞类比来解释。它同有关任何种类的村庄或稳定的活跃社群的经历都毫不相干。因为就其主要用途来说,它是只针对于外部事件的一种多人共有的意识形式,且这种共有并不均衡。这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发生——通过那些强大的传媒方式——的事情,我们同这个世界中没有其他任何可以感知的联系,但我们感觉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既是处于中心地位又是处于边缘地位的。这一整套矛盾的单向关系本身决定着 we 心目中何为有用的信息和新闻,因此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这种意识形式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模式所固有的;而在此生产模式中,我们的技能、我们的能量、我们对自己生活的日常安排、我们对人生形态的感知,这些都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为一种对必要现实做出的外部阐释所定义和决定:那是一个外部

的、被操控的现实——说它是外部的,因为它被掌控在少数人手里——在我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只能从这个现实当中获取信息,别无选择。

潜在的社会关系经常以这些习惯性和常规性的方式呈现。传播系统并不仅仅是信息网络,它也是交通网络。很明显,城市一直是同交通的集中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在现代交通体系当中事实仍然如此,这个问题往往看上去是无法解决的。但交通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是一种意识形式和一种社会关系形式。如此之多的交通问题明显是由一系列有关工作地点和政治权力集中化的决定造成的;这些决定从来不是任何真实意义上的社会性决定,但却是由一种生产模式的优先特权所强加的。我所指的不仅仅是这一点,而是还包括现代交通的各种形式。在早期人们对大城市街道的描写中,人们就像孤立的原子,从这里飘荡到那里;毫不相干的个体从不同的方向汇成人流。现在我们在读到这样的描写时,透过这些人,绝不可能忽视由现代汽车所体现出的那种关系模式:私密,封闭,一股紧迫的、仅仅是汇聚在一起的车流当中的一辆单独的车子;存在着遵循某些潜在惯例的外部控制,但在内部,当我们以一种相同的模式走着我们最终不同的路时,还会传递着各种快速讯号:警告、躲避、让步、愤怒。这已经不再是只有城市才有的一个特征了,尽管这个特征在城市当中最为明显。从某个层次上来说,这是我们在这一片土地上一整个网络中互相联系起来的方式;这的确是一种定居形式,它与我们对旧的定居模式——城市,小镇,乡村——的看法相交叉并常常深刻地对之产生影响。

在所有这些实际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式中,关于乡村和城市的观点(往往是较为旧式的观点)继续扮演着偏袒的阐释者的角色。但我们并非总能看到,从它们最主要的意义来说,它们是对整体的社会体系的各种反应的形式。自从工业革命后——但在我来自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产生初期开始——我们心目中乡村和城市最深刻的意象一直非常明显地充当着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反应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最终我们决不能将自己局限于城市和乡村形象之间的对比,而是要进一步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这些相互关系看到潜在危机的真实形态。

举例来说,现在乡村的一般意象是一个有关过去的意象,而城市的一般

意象是有关一个未来的形象,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我们将这些形象孤立来看,就会发现一个未被定义的现在。关于乡村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以往的方式、人性的方式和自然的方式。关于城市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进步、现代化和发展。“现在”被体验为一种张力,在此张力中,我们用乡村和城市的对比来证实本能冲动之间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分裂和冲突,我们或许最好按照这种分裂和冲突的实际情况来面对它。

这样一来,关于城乡各种观点的历史的各个方面就可以帮上我们的忙。我们已经看到,一种关于乡村的观点往往是一种关于童年的观点:不仅仅是关于当地的回忆,或是理想化的共有的回忆,还有对童年的感觉:对全心全意沉浸于自己世界中那种快乐的感觉——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最终疏远了自己的这个世界并与之分离,结果这种感觉和那个童年世界一起变成了我们观察的对象。在华兹华斯和克莱尔以及很多其他作家的作品中,这种情感结构得到了有力表达;我们也已经看到,这种情感结构常常被转化成关于乡村往昔的幻觉:“我童年时代的快乐的英格兰”这样的观点,接连不断、不停地往回追溯。但现在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有着足够关于城市童年的故事和回忆,能够好好地感知同样的模式。旧式的城市工人阶级社区;街角小店、煤气灯、出租马车、有轨电车、馅饼摊子带来的快乐:这一切似乎都随着一代代的人消失了。在文学作品中,这些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事物同乡村场景中的小溪、公地、树篱、茅屋和节日一样,具有同样真实的感情意义。这样说的意义并不是为了驳斥或贬低两种感情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为了让我们通过辨析人们所描写的真正变化产生的一般过程,来看清楚这一变化的面貌。

这是因为在所有这些情况当中,悬而未决的是一种意识上的成长和改变:这是一种在许多人身上、在许多地方都出现过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观念和关系的改变。曾经亲密的、有趣的、接受了、熟悉的、内心体验到的一切都变成了分开的、可辨明的、吹毛求疵的、不断变化的、从外部进行观察的东西。不论是在公地还是后街小巷,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地区,这个过程都在发生着。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过程;我们可以说这种成人意识的成长极其必要——如果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看清楚这些为人所珍惜的世界是由人所创造,而且现在仍然被人所创造的话。但我们也不

得不说,一个孩子的村庄或后街小巷不是,也不可能是当代工作的成年人的村庄或者后街小巷。如果童年的真实回忆被投射成了历史——实际上它是没有资格成为历史的——就会引发非常大的混乱。但我们最后要说的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和社会关系模式通过教导、加深印象以及主动给予的方式,使那些分开的、孤立的、外部的感觉和行为模式显得正常甚至是牢不可破:这些观察和行为模式是利用和消费的模式,而不是接受和享受事物和人际关系的模式。那么,这些回忆录的情感结构就变得非常重要、不可缺少,因为它是对这种特定的社会畸变的反应。然而,它的重要性要得到承认,必定需要我们先做出一个历史性判断:这一切都是童年时的观点,当代成年人的经历要么驳斥它们,要么验证它们;还有,在这类消耗性的、把一切都抽象化的世界里,人类成长的过程本身已经被扭曲,扭曲它的就是对成人意识应当为何这一问题在内部深层做出的那些指引。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旧时的村庄或旧时的后街小巷。重要的是对一个特定世界的感知和肯定,在这个世界中一个人不必一定是一个陌生人或一个媒介,他可以是共有的生活资源中的一名成员或一个发现者。当然,单独来看这从来都是不够的。事实上,如果这种感知和肯定置换成有关旧时村庄和后街小巷的幻想,那么就连它最直接的重要性都会遭到削弱。要塑造一个成人,这类劳动世界必须要有锐利的批评意识和长期、活跃的媒介。不过,当未经疏远的经历是乡村过去,而现实主义的经历是城市未来时,我们从一个中心例子中就可以看到乡村和城市一些强大意象存在的真正原因。如果我们只看这些意象,我们可以从一个意象转到另外一个,却得不到任何启示。因为我们真的必须正视——城市和乡村都一样——那个导致异化、分隔、外部化和抽象化的实际的社会过程。我们必须在乡村和城市资本主义历史中去观看,不仅要以一种批评的方式,还要以一种充分的方式,也即对在无数人的生活中被发现和重新发现的那些往往处于压力之下的经历进行肯定:那是有关坦率、联系、亲密和分享的经历,最终仅靠它们就能说明真正的畸变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3)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我明白我终于同我小时生活过的村庄隔离开了。

我开始写下我对这段经历的看法,共写了7个版本,最终变成了《边境乡村》这部小说。通过这几个版本的记述,我发现自己正在把这段经历同更为广泛的有关人身和社会流动性的历史联系起来,并且超越于斯,还同教育和阶级的危机联系起来,而当完成这种联系后,我又回过头来认真地阅读乔治·艾略特、哈代和劳伦斯作品,就好像第一次读一样。除此之外,我还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村庄,不得不在我的童年记忆和我父亲那一代成年人的劳动经历之间建立起某种张力。但即便如此也远远不够。很多人都认为拥有很多花园的信号员哈利·普莱斯是以我父亲为原型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发现要描写出实际发生的事情,我必须要把我从父亲身上看到的那些相互冲突的推动力和模式进行划分和对比。我必须想象出另外一个角色——政客兼商人摩根·罗瑟,他同哈利·普莱斯的关系使得他可以表达出我相信我所见到过的那种内部冲突。如果要充分表现乡村生活那种复杂的发展,就必须要在某种关系中表达思想的模式和行动的模式,专注的工作模式和流动性的、关键的变化模式。超脱于此之外的就是作品中的儿子,一个更为疏远的观察者;他同这两种模式、这两种父亲的形象捆绑在一起,并把那永不停息的行动带到他在城市的工作中去。

在《第二代》这部描写城市的小说中,我使用了同一种方法来表现这种内部的危机,即先划分再联系。《第二代》描写的是同样的事情,只不过环境不同。那是一个有关交通的意象,是一个用交通来表现各种关系的意象,是一个不停试图寻找其他关系的意象,这同在《边境乡村》里的一样清晰,只是在《第二代》中使用的是一个更为简单的形式,也即乡村的铁路及其变化。这就是我从《边境乡村》后如何看待整个问题的,我的方式变得更为广泛。被写进小说中的经历变成了我对传统提出的疑问。

但当我在写《边境乡村》的时候,我曾经感到过一阵突然的悲伤,很明显它同我的主题是不相关的。我感到——因为我想有人这么告诉过我——农村经历,也即那个劳作的乡村已经消失了;它在英国已经变得边缘化了,而且随着时间流逝在所有地方都会如此。从某种层次上来说,我接受并持有这个观点的时间非常长,在现在看来这样长久的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现在已经明白了,这正是那些使我不停地回顾旧式乡村文学和历史的推动力之一。

我已经无法清楚地记起,究竟何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根本就不是真实的。甚至当我在小说中表现一种不同的、持久的经历时,这一观点也一直存在着。当我终于发现一切都是假的,我明白我必须去寻找它的根源。它的根源并不仅仅像人们可能猜想的那样是些多愁善感的田园主义者,尽管由于我个人的经历我必须面对他们。这个根源同时也是那些生气勃勃的城市进步主义者,他们当中许多人据称还是国际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对乡村社会的蔑视同他们对城市的工业化未来的信心一样强烈,而他们会用各种方式——包括现代化、白热化的技术发展或是革命——将这个未来转变成社会主义。这两种类型的人当中都包含了很多作家和思想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花很长时间、很大力气才能做一番考察,然后才能说他们共同持有的有关消逝的乡村经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那么,这种观点难道不是错误的吗?劳作农业在英国是被边缘化的,这难道不明显吗?这是我学会感知的第一个错误模式:在旧帝国主义国家里,一种抽象的沙文主义一直顽固存在而不为人所注意;在这些国家里发生过的,现在正在或将要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然是农业国家,但在由帝国主义进行划分的世界里它们其实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甚至那些看到自己在由帝国主义划分的世界遭到剥削的国家,也不一定会更进一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劳作农业,一种以任何可能形式出现的乡村经济不得不存活下去:在这些遭受剥削的国家中存活下去,以及在那些被抽象地看作发达的大都市国家中存活下去——如果一些剥削元素被减弱的话。或许现在我们当中知道这一点的人已经比以前多了。有关食物和人口危机的事实都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被广泛公开。如果我们想要生存下来,我们必须发展并扩展我们的劳作农业。那么,人们对于一个消逝的乡村世界的共同观点就不仅仅是对一段连续历史这个或那个阶段(令我们高兴的是,许多阶段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一种抽象观念。它同我们未来任何一个有效形态都发生直接的冲突,而在这样一个未来当中,土地上的工作只会变得更加重要、更加中心化而不是相反。我们最中心、最迫切、最必要的活动之一竟然错位得如此严重——时间上的错位、空间上的错位或是时空上的错位——以致它只可能与过去或遥远的地方联系起来;这就是工业资本主义造成的最

惊人的畸变之一。

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有所改变,甚至是在帝国主义旧欧洲内部。但是,在这里以及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农业的未来仍然主要被看作以资本主义形式出现,而且还仍要包含大规模的社会迁移。这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以同资本主义决裂的方式进行改变的迫切性,同这场危机中成互补关系的另外一个方面相关,即城市和工业的境况和未来。一些乡村作家真正的优点之一——这一优点常常因为其他因素的存在而被人忽视——就是他们坚持认为自然居住环境具有复杂性。既然这个环境面临的危险已经前所未有地清晰,我们的观点则不得不再一次做出改变。城市的一些最为黑暗的意象将会坚持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未来现实。对大都市工业主义专门化力量的过分信心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而这过分的信心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种境地:不论我们如何精确地评估,人类生存所面临的风险都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或者说如果我们能够幸存——我想我们可以——我们也很可能无法再按如今的方式继续下去。

即便我们知道这种说法很容易就会被转变成另一首唱给乡村的挽歌或是一种愤世嫉俗的宿命论,这种说法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处在这场不断加深的现代大都市和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危机中,处在世界其他地区难以抵御的持续贫困造成的更严重的危机中。我们应当记住资本主义模式的农业发展曾经并正在给环境造成多大破坏,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一场制造工业的危机。类似地,我们需要认识到,承认这场危机的存在,以及几乎所有可能解决这场危机的方法,都是意识的功能,也即灵活的、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观察和干预能力的功能:它发生在技术以及规划和保持的模式中,但更关键的是在真正决定我们未来的领域——也即决定领域本身——中。在我们感知一个整体的环境时,在我们记录如此多的被抽象化和分离开的活动造成的各种后果时,我们开始看到所有真正的决定都是关于社会利益和控制模式的决定。实际上,我们开始看到各种形式的少数派资本所具有的活跃力量是我们最为活跃的敌人,我们必须做的不仅仅是要说服它们,还要打倒它们、取代它们。必要决定的规模和联系范围是如此之大,以致需要动用资本主义——不论是何形式的资本主义——都拒绝、反对并疏远的那些社会力量和

社会资源。一无所有的劳工和城市工人在抗议和绝望之中产生的那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必须通过新的方式变成一个集体负责任的社会。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两者内部一直存在的斗争将会变成一场普遍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一直是一场普遍的斗争。

我们要处理的事情比我们通常承认的要多。人们说乡村英格兰是属于过去的,当然变化也非常明显。但如果我们摆脱这个观点并回头看看乡村,我们就会看到乡村中如此多的事物仍然存在——即便是在这个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我们国土面积的五分之四是耕地和荒地。耕地中的大部分得到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的保护,而通过一个施加压力和提高公开性的复杂过程,人们对荒地的利用更为方便了。对自然和劳动的体验曾经在我们的乡村文学中享受极大的赞美,现在这些体验对人们来说仍然唾手可得。在很多地方,乡村仍然是个美丽之处,我们中的许多人也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努力保持并发扬它的美丽。我曾有幸拥有一片树林,我砍掉了一些树木,看着九轮草、风信子和毛地黄一点点长回来;我修补并重建老旧的干砌墙;在长期疏于管理后重又围起树篱,挖深沟渠,并从熟练工人那里观察这些活儿应该怎么干。如果我们摆脱有关城市的观点,我们会在异常压力下发现许多充满爱心的、高明的的工作,它们可以让城市变得更干净、更优美,让城市显露出其最好的资质并构筑这些资质。要想直接了解这一切,我们必须也近距离地了解蓄意和冷漠的破坏带来的持续威胁。但每一个过程都是事实,最好的也是最糟糕的情况是,并不存在一项输掉的或是赢得的事业;这是一场活跃的、直接的、持续的斗争。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斗争,它触及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

302

(4)

我一直在论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模式是乡村和城市的大部分历史的一个基本过程。它的被抽象化了的的经济驱动力、它在社会关系中的基本优先权利、它衡量增长、利益和损失的标准,几个世纪以来改变了我们的乡村,创造了我们这种类型的城市。当它发展到终极形式——帝国主义时,它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如果以这种方式来看待历史,那么我当然确信,抵抗资本主义是人类进行必要防卫的决定性形式。许多具体的防卫行动都在没有看清这个决定性过程之前就终止了,而要想正确贯彻有关的观点和情感,这些行动必须要先受到质疑。但也有许多其他行动完成了防卫,变成了针对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反对形式——在这个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或科学技术或许可以被包含其中,但却没有进行任何具体的说明;这种本能反应从根本上讲的确具有防卫性,它对其他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缺乏信心,或者它们曾有过这样的信心,却被乌托邦式的或启示性的观点取代,而这两者与任何直接的社会实践或运动都毫无关系。人们问道,还能有什么样的严肃的运动呢?看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吧:在历史上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敌人,但就乡村和城市的问题而言,它们在细节上,而且往往在原则上却在继续,甚至是加剧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同样的基本进程。

303 这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和政治难题。托洛茨基说,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城镇战胜乡村的历史。在俄国革命伊始关键的几年中,他接着为这样一种胜利勾画出了一个极大规模的计划并将其作为战胜资本主义、维护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斯大林基本完全执行了这一计划,其规模和残酷程度使得对农民的“胜利”变成了整个乡村历史上最恐怖的话语。地方需求和优先配给变得令人绝望;经济崩溃,食品严重匮乏;乡村资本主义无疑正在以新的形式扩张开去。但这种扩张的方式以及其背后的精神就不仅仅是残酷了:它们利用了马克思主义中意味不明的一处元素,而这一点又对整体社会的特点产生了极大影响¹。

正如我们所见,恩格斯是最早将现代城市看作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物质结果的人之一,现代城市在资本主义模式中被建造出来并生活于其中。后来他又补充了一个决定性的观点:正是骚乱和苦难的过程创造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将终结资本主义并创造出不同的社会关系和不同的人类生活方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说“资产阶级使农村屈

1 参见 *The Prophet Unarmed*; I Deutscher; London, 1959. 该书已出版中文版,书名是《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以萨克·多伊彻著,周任辛译,刘虎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译者注

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²：这是为人熟知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他们认为这些集中和依赖的关系为革命创造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观点是正确的。

但在这个观点的核心当中有一个意味不明的地方。他们谴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痛苦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他们坚持认为人们必须依靠斗争来推翻这一切，并且他们向我们展示了进行斗争的一些方式。但暗含在这一谴责中的是另一套价值判断：资产阶级“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处在从属地位的国家都是“未开化和半开化的”，而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则是“文明的”³。因此，正是在这种对现代化和文明的单一价值观的信心之上，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歪曲产生了。忍受痛苦的乡村无产阶级要学习并创造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如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切，事态发展会非常不同。但如果资产阶级的发展形式包含了——不论会有什么样的矛盾之处——比“农村愚昧状态”或者“不开化”更高级的价值观，那么几乎所有打着城市无产阶级旗号的计划都会具有正当性并会得到强制执行。最可怕的讽刺在于，赋予城市和工业以绝对优先权，以及赋予发达和文明国家相应优先权的真正过程的实行不仅会伤害“愚昧的农村人”和“未开化和半开化的”殖民地人民，还会最终伤害城市无产阶级自身以及发达和文明的社会。在这些社会当中，这些优先权会发生一种奇怪的辩证性扭转，反过来向社会发挥它们的支配权力。看到苦难引发革命，这是一回事；而看到更多相同的事物产生更多不同的产物则充其量是一种启示性的希望。

304

这个难题在我们这个世纪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得到了解决。革命不是发生在“发达的”国家，而是发生在“不发达的”国家。中国革命在城市中遭到了失败，它转移到了乡村并最终发展壮大。古巴革命从城市来到了乡村，在那里它的力量逐渐成形。在国家和社会解放斗争风起云涌的整个时代中，受剥削的乡村和殖民地人民成为了持续的反抗斗争的主要源泉。中国有一

2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3，42页。——译者注

3 同上。

句描述世界革命的名言：“乡村”正在包围“城市”。这就是说，在过去的 40 年中，“愚昧的农村人”和“未开化和半开化的人”成了世界上的主要革命力量。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段真实的历史经历开始，回顾革命这个概念的基本形式中的一种。社会主义传统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基本思想，都含有一种公式化的内容，它在对革命的整个论证当中最让人激动、同主题关系最为密切，但同时也发展得最不完全。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称社会主义“废除了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发挥到了极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如果继续维持“现代大城市”，住房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我们才能恢复“工业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密切联系”。关于新式的稳定社区和社会，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给出了很多提议；正如我们所见，威廉·莫里斯仍然在以这种方式思考。但在 20 世纪，在各种压力之下，无论是发展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纯粹物质驱动力，还是大城市中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思想所包含的阶级习惯，这一特殊强调实际上都已经不复存在。人们仍然记得记述它的文字，不过也只是把它看作一个老旧的、不现实的、幼稚的梦罢了。但是现在人们又开始重新强调它了。它被宣布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者当中，作为对工业化文明和所谓超级城市所经历的危机的一种反应，这个观点也已经复苏。

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对其进行重述。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在现代有了新的形式，它们是劳动分工和专门化发展的顶点。劳动分工和专门化的存在先于资本主义，但却在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并开始引发改变。这一基本分裂的其他形式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裂、管理和操作的分裂、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分裂。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到处都可以找到这种分裂的各种症状：在社会各阶级的思想和做法中；在对工作和教育的传统定义中；在对居住场所的分配中；在有关日、星期、年、一生这样的时间安排中。我们时代的创造性思考中的大部分都是在试图重新审视这些概念和做法。这种做法的基础在于人们确信，产生这些概念和做法并由之组成的那个体系已经让人们难以忍受，注定无法继续生存了。这种思考的许多领域中不仅含有分析性反应，也含有计划性反应：这些反应针对的

是新的决策形式,新的教育种类,新的工作定义和工作方法,新的居住方式和土地使用方式。

现在,我回溯一代人的时间,回望二战刚结束时的那些年,我还能记得自己的感觉:除了某些简单类型的理想化的追忆之外,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主流思想不是被包含进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的基本形式中的。正统的共产主义和正统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的传统对手——的确以最有力的形式展示了这个体系的许多特征,这更加危险,因为这些与人们对社会解放和发展的持续渴望融合在了一起。但要想感知这一点,就要被迫返回到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统治我们思想的那种极端主观主义和宿命论观点上去。对我们当前面临危机的许多描述曾经并且现在仍然是在这些主观主义和宿命论的形式中完成的。

但现在在一个更深层的变化已经非常明显了。所有传统的优先权又一次遭到质疑。其他类型的社会反应和社会分析都坚持保存了下来,直到它们采取某种积极行动,而这些行动常常是以混乱且仍不完善的形式进行的。捍卫这个体系的人心中那种信心——如果不是实际的信心,至少是理论上的——已经消失了。各种观点的地位又一次变得不再确定,而讽刺的是此时正是实际压力几乎要压倒一切的时候。

就我而言,基本观点和问题发生的这种变化,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中的变化,一直是我长久以来不断寻找的联系:我通过某种具体的个人危机的各种地方形式来寻找这种联系,还通过广泛的探究——这种探究有着多种形式,但最终它仍然是关于乡村和城市的探究——来寻找这种联系。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同一个曾经飞速变化的问题:它实际是一种个人经历——原因我已经说过了;但如今它还是一种社会经历,将我同越来越多的其他人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为之努力的立场,那种形态感。然而,即使是在现在,它也仍然处于成形期。它是人们正在做、将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已经完成的事情。

因为现在最紧要的事情莫过于用严格的分析、严格的提案和严格的实践来检验最基本的观点,也即克服劳动分工的问题。只有新形式的合作能够完成这件事情。一场运动已然清晰的主要原则要想通过得到必要的理解和力

量来获取成功的话,我们就必须详细说明我们实际可以做的是什么,这可以包含很多事情——从区域和投资计划到有关劳动、教育和社群的许许多多程序。各种消极影响会继续显露,带来强大的、明显无法抗拒的压力:对环境的实际影响;过于拥挤的城市和人口流失的乡村中同时发生的危机,这一危机不仅限于一个国家,而是发生在国家彼此之间;某些典型工作和典型职业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的压力;人口和资源危机背景下的世界贫富差距的扩大;担忧和决策之间也有着类似贫富差距一样逐渐扩大的鸿沟,在它发生的这个世界中一切附带结果——不论军事的、科技的还是社会的——最终都无法摆脱。看到这些消极影响——不论带着怎样的急迫性——都会让意志瘫痪。劳动分工最后的喘息之处就在我们自身内部,在那里我们想要的和我们认为自己能做的似乎都毫无希望地分裂开来了。

只有拒绝被划分,我们才能够克服这种分裂。这是一种个人决定,但也是一种社会行为。我只能记录下我自己所了解的。其他人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进行了解。但正如我说的,我在一片土地上、在一个家庭中成长,在那里分裂是非常明显的。我从乡村搬到城市,现在我既在乡村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我通过多种形式,从社会和文学——它们最早、最完整地经历了一个变化,该变化将要具有普遍性,或者至少是为普遍性的发展提供一个模式——中学习了这段历史的形态、它的观点和意象。这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错综复杂的谜团,我必须在我的头脑中,在我的记录中慢慢地回顾这段经历,对令人着迷、具有塑造性的过去获得不同的理解,以这种方式获取现在和未来。

这一直是种具有局限性的探究:探究在一种单一传统中的乡村和城市。但这种探究让我能够提出它的意义、它的内涵和它同其他事物的联系:为了能够进行讨论和修正;为了能够进行各种可能的合作;但最重要的是为了能够突显我们生活着的许多乡村和城市——突显对一种经历的感觉以及对改变该经历的各种方式的感觉。

附录

307

“乡村”[country]一词来自 contra(相对,相反),最初指土地在观察者的眼前铺展开去。在13世纪,该词获得了它的现代含义,即指大片的土地或地区,也指国土或国家。在廷德尔所译的1526年版《圣经》中,该词和“城市”[city]形成对比:“到城市宣讲这件事,到乡村宣讲这件事”(《马可福音》5:14)。当时“城市”已经成为指代较大市镇的正规用语,虽然该词来自 civitas,而 civitas 又来自 civis(意指公民)。Civitas 过去有社群的意思,曾被用来指高卢的各个部落;后来它又被用来指代教区。在古英语中,它与 burh 可以互换,¹ 比 urbs 更常用来指代城镇,而 urbs 的意思则更为接近其现代含义。² 在中古英语里,该词逐渐变得普通,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开始用来指大教堂的所在地,不过这种用法后来不再用了。

从16世纪晚期起,正如整体的历史趋势驱使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把“城市”和“乡村”两词对立起来的做法越来越常见,两者的对立也越来越尖锐。乡村意义上的“乡下人”[countryman]和“乡村居民”[country people]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流行的,“乡村宅邸”[country-house]和“乡间别墅”[country-seat]也是如此。“带有乡村风味的”[countryfied]一词紧随其后,在17世纪中期出现;“土包子”[bumpkin]和“乡巴佬”[country bumpkin]也产生自同一时期。“农村地区”[countryside]的现代含义是在18到19世纪间发展起来的。“农村的”[rural]和“乡村风味的”[rustic]自15世纪起就被用于对乡村的物理描写,但自16世纪开始获得了社会性含义,主要体现在“质朴的”[rustic]和“质朴”[rusticity]上。同样的,“城市的”[urbane]一词在16世纪时也只是用于物理描写,后来得到了扩展,具有了现代的社会性含义,而对此的最早记录出现在17世纪初。

1 burh: 也即 borough, 中世纪筑堡设防的城镇。——译者注

2 urbs: (象征繁忙现代繁忙生活的)城市、都市。——译者注

“大都市”[metropolis]一词自16世纪起,一直都指主要城镇或主教宅邸所在地;“大城市的”[metropolitan]一词也主要用于物理描写,直到18世纪才开始具有了它现代的社会性含义。类似的,“郊外的”[suburban]一词自17世纪早期起就用于物理描写,到19世纪早期才有了社会性含义。

“农场”[farm]最初指“固定的报酬”,自16世纪起意义得到了扩展,具有了“租用一片土地”的意思,然后渐渐有了它现代的含义。“通勤者”[commuter]是一个出现在19世纪晚期的铁路词汇,指“按折扣价购买的车票”。“有卫星城的大都市”[conurbation]最早出现在20世纪中叶。“田园牧歌的”[pastoral]的核心含义是“放牧”,例如在“牧场”[pasture]一词中。自14世纪起该词就常用在牧羊人身上,几乎在同一时期获得了与“牧师”[priests]的类比含义。“田园牧歌的”一词的社会性和文学性含义出现在16世纪晚期,该阶段可被看成是描述本书主题的那些词汇的意义结构形成的决定时期。

参考文献精选

323

A: *Literature* (i) Chs. i – viii; Chs. ix – xvii; (iii) Chs. xviii – xxv

B: *History and Related Studies*

C: *Studies of Literature, Art and Ideas*

Note: the place of publication is London unless otherwise shown. Italicised names indicate editors.

A: LITERATURE

(i)

Hesiod. *Works and Days*, ed. Sinclair, T. A. , 1932

Theocritus. *Works*, ed. Gow, A. S. F. , Cambridge, 1952

Edmonds, J. M. *The Greek Bucolic Poets*, 1912

Gow, A. S. F. *The Greek Bucolic Poets*, Cambridge, 1953

Headlam, W. *A Book of Greek Verse*, Cambridge, 1907

Higham, T. F. and Bowra, C. M. *Oxford Book of Greek Verse in Translation*, Oxford, 1938

Virgil. *Elogues*, tr. Day Lewis, G, 1963

Virgil. *Georgics*, tr. Day Lewis, G, 1940

Juvenal. *Sixteen Satires*, tr. Green, P. 1967

Knott, T. A. and Fowler, D. C. *Piers the Plowman*, Baltimore, 1952

Pollard, A. W. *English Miracle Plays, Moralities and Interludes*, Oxford, rev.

1927

More, T. *Utopia*, ed. Sampson, G. and Guthkelch, A, 1910

Sannazaro, G. *Arcadia*, Napoli, (1966)

- Tasso, T. *Aminta*, ed. Sozzi, B. T., Padova, (1957)
- Politianus, A. *Rusticus*, 1672
- Alamanni, L. *La Coltivazione*, 1907
- Sidney, P. *Areadia*, ed. Baker, E. A., 1907
- Bastard, T. *Chrestoleros*, repr. Grosart, A. B., 1880
- Crole, R. (Crowley) *Select Works*, ed. Cowper, J. M., 1872
- Jonson, B. *Works*, ed. Herford, C. H. and Simpson, P. E., Oxford, 1925—1952
- Marlowe, C. *Works*, ed. Case, R. H., 1933
- Middleton, T. *Plays*, ed. Swinburne, A. C. and Ellis, H., 1887—1890
- Spenser, E. *The Shepheardes Calendar*, ed. Herford, C. H., 1895
- Rapin, R. *Dissertatio de Carmine Pastoralis Eclogae Sacrae*, Paris, 1659
- Greech, T. *The Idylliums of Theocritus with Rapin's Discourse of Pastorals*, 1684
- Fontenelle, B. *Discours sur la nature de Peglogue*, Paris, 1688
- Motteux, P. A. *Of Pastorals*, 1695
- Carcw, T. *Poems*, ed. Dunlap, R. Oxford, 1949
- Herrick, R. *Poetical Works*, ed. Moorman, F. W. Oxford, 1921
- Marvell, A. *Poems and Letters*, ed. Margoliouth, H. M. Oxford, 1952
- Massinger, P. *Plays*, ed. Symons, A., 1887—1889
- Milton, J. *The Readie and Easie Way to Establish a Free Commonwealth*, 2n. rev. ed., 1660
- Milton, J. *Complete Poetry and Selected Prose*, ed. Visiak, E. H. New York 1893
- Pornfret, J. *Poems*, 1792
- Chambers, E. K. *Oxford Book of 16th Century Verse*, Oxford, 1932
- Kermode, J. F. *English Pastoral Poetry, from the beginnings to Marvell*, 1952
- Grierson, H. J. C. and Bullough, G. *Oxford Book of 17th Century Verse*, Oxford, 1934
- Smith, D. N. *Oxford Book of 18th Century Verse*, Oxford, 1926
- Fausset, H. J. A. *Manor Poets of the 18th Century*, 1930

- Davie, D. *The Late Augustans. Longer Poems of the Later 18th Century*, 1958
- Congreve, W. *Works*, ed. Bateson, F. W. Oxford, 1930
- Etherege, G. *Works*, ed. Brett – Smith, H. F. B., Oxford, 1927
- Vanburgh, J. *Complete Works*, ed. Dobrce, B. and Webb, G., 1927
- Wycherley, W. *Play*, ed. Ward, W. C., 1888
- Nettleton, G. H. and Case, A. *British Dramatists from Dryden to Sheridan*, 1939
- Pope, A. *Poems*, ed. Butt, J. Vols I, III. ii, IV, 1961, 1951, 1953
- Defoe, D. *Novels and Selected Writings*, Oxford, 1927—1928
- Fielding, H. *Novels*, Oxford, 1926
- Richardson, S. *Novels*, Oxford, 1930
- Cole, G. D. H. *Defoe's Tour Thro'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1927
- Cowper, W. *Poems*, ed. Fausset, H. P. A., 1931
- Duck, S. *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 1736
- Dyer, J. *Poems*, ed. Thomes, E. 1903
- Goldsmith, O.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ed. Dobson, A. Oxford, 1906
- Gray, T and Collins, W. *Poetical Works*, ed. Poole, A. L. rev. Whibley, L. Oxford, 1937
- Langhorne, J. *Poetical Works*, ed. Langhorne, J. T., 1804
- Philips, A. *Poems*, ed. Segar, M. G., Oxford, 1937
- Shenstone, W. *Poetical Works*, ed. Gillfillan, W. Edinburgh, 1854
- Young, A. *A Farmer's Letters to the People of England*, 1768
- Young, A. *Autobiography*, ed. Betham – Edwards, M. 1898
- (ii)
- Addison, J. *Essays*, ed. Frazer, J. G., 1915
- Austen, J. *Novels*, ed. Chapman, R. W. 1923—1954
- Bewick, T. *Memoir Written by Himself*, 1882—1888, repr., 1961
- Blake, W. *Complete Poetry*, ed. Hillyer, R. S., New York, 1941
- Bloomfield, R. *Poetical Works* (of Robert Bloomfield and Henry Kirke – White),

- Clare, J. *Poems*, ed. Tibble, J. W., 1935
- Cobbett, W. *Rural Rides*, ed. Cole, G. D. H. and M. Oxford, 1939
- Coleridge, S. T. *Poetical Works*, ed. Coleridge, E. H. Oxford, 1912
- Coleridge, S. T. *Select Poetry and Prose*, ed. Potter, S., 1933
- Constable, J. *Lectures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1836
- Crabbe, G. *Poetical Works*, ed. Carlyle, A. J. and R. M. Oxford, 1914
- Evelyn, J. *Diary*, ed. Beer, E. de S. Oxford, 1955
- Galt, J. *Annals of the Parish*, ed. Gordon, G. S., 1908
- Gilpin, W. *Observations*, 6 vols., 1782—1798; *Three Essays*, 1792
- Jenner, C. *Town Ealogues*, 1772
- Johnson, S. *Prose and Poetry*, ed. Chapman, R. W. 1922
- Bosweel, J. *Life of Samuel Johnson*, ed. Hill, G. B., rev. Powell, L. F. Oxford, 1934—1950
- Kent, N. *Hints to Gentlemen of Landed Property*, 1775
- Lillo, J. *The London Merchant*, ed. Ward, A. W. Oxford, 1906
- Peacock, T. L. *Novels*, ed. Garnett, D., 1948
- Repton, H. *An Enquiry into the Changes in Landscape Gardening*, 1806
- White, G. *Writings*, ed. Massingham, H. J. 1938
- Wordsworth, W. *Poetical Works*, ed. Sellncourt, R. de and Darbishire, H., Oxford, 1940—1949
- Maxwell, J. C. *The Prelude: a parallel text*, 1971
- Arch, J. *Life*, 1898
- Bronte, C. *Shirley*, 1849
- Bronte, E. *Wuthering Heights*, 1847
- Dickens, C. *Old Curiosity Shop*, 1841; *Nicholas Nickleby*, 1839; *Dombey and Son*, 1848; *Hard Times*, 1854; *Little Dorrit*, 1857; *Our Mutual Friend*, 1865
- Disraeli, B. *Coningsby*, 1844; *Sybil*, 1845
- Dolby, T. *Floreston*, 1839
- Eliot, G. *Adam Bede*, *Edinburgh*, 1859; *Mill on the floss*, *Edinburgb*, 1860;

Felix Holt, 1866; *Middlemarch*, Edinburgh, 1871—1873; *Daniel Deronda*, Edinburgh, 1876

Cross, J. W. *Life of George Eliot*, Edinburgh, 1885

Gaskell, E. *Mary Barton*, 1848; *Cranford*, 1853; *North and South*, 1855; *Wives and Daughters*, 1866

Jeffexies, R. . *Hodge and his Masters*, 1880; *The Dewy Morn*, 1884; *The Life of the Fields*, 1884; *After London*, 1885, *The Open Air*, 1885; *Amaryllis at the Fair*, 1887; *Toilers of the Field*, 1892

Looker, S. J. *Richard Jefferies; Field and Farm*, 1957

Thomas, E. *Hills and the Vale*; *Richard Jefferies*, 1909

Kingsley, C. *Yeast*, 2851; *Alton Locks*, 1852

Somerville, A. *Autobiography of a Working Man*, 1848; *The Whistler at the Plough, Manchester*, 1852

Surtees, R. S. *Jaunts and Jollities*, 1838

Trollope, A. *Doctor Thorn*, 1858

Trollope, A. *The Barseshire Novels*, ed. Harrison, F, 1906—1928

Watson, J. *Confessions of a Poacher*, 1890; *Poachers and Poaching*, 1891

(iii)

Barnes, W. *Poems of Rural Life*, in the Dorset Dialect, 1844

Besant, W. *Children of Gibeon*, 1886

Booth, W. *In Darkest England*, 1890

Carlyle, T. *Collected Works*, 1857—1858

Conan - Doyle, A.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1894

Egan, P. *Life in London*, 1821

Gissing, G. *Workers in the Dawn*, 1880; *The Unclassed*, 1884; *Demos*, 1886; *The Nether World*, 1889; *New Grup Street*, 1891; *Born in Exile*, 1892; *In the Tear of Jubilee*, 1894

Gallienne, R. *le, English Poems*, 1866

Hardy, T.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1872;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1874;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1878;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1896; *The woodlanders*, 1887;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1891; *Jude the Obscure*, 1896

Orel, F. E. *The Early Life of Thomas Hardy*, 1928

Hollingshead, J. *Rogged London in 1851*, 1951

Keating, P. J. *Working - class Stories of the 1890s*, 1971

Mayhew, A. *Kitty Lamere*, 1855; *Paved with Gold*, 1858

Mayhew, A. and H. *The Greatest Plague of Life*, 1847; *Living for Appearances*, 1855

Morris, W. *News from Nowhere*, 1891

Morrison, A. *Tales of Mean Streets*, 1894; *A Child of the Jago*, 1896

Pall Mall Gazette, 1885

Rutherford, M. *The Revolution in Tanner's Lane*, 1887

Sims G. *How the Poor Live*, 1883

Wells, H. G. *The Time Machine*, 1895; *The War of the Worlds*, 1898; *TonoBungay*, 1909; *Experiment in Autobiography*, 1934; *Complete Short Stories*, 1927

Borrow, G. *Wild Wales*, 1862

Kilvert, F. *Diary, 1870—1879; (1938—1940)*

Stevenson, R. L. *Inland Voyage*, 1878; *Travels With a Donkey in the Cevennes*, 1879

Baudelaire, C. P. *Oeuvres*, Paris 1954

Dostoevsky, F. *Crime and Punishment*, 1886

Kafka, F. *The Trial*, 1956; *The Castle*, 1953

Mercier, L - S. *Tableau de Paris*, 1929; *L'An 2440*, Neuchatel, 1772

Thomson, J. *Poems and Some Letters*, 1963

Abercrombie, L. *Collected Poems*, 1930

Barrie, J. M. *A Window in Thrums*, 1889

Bourne, G. *Memoirs of a Surrey Labourer*, 1907, *Change in the Village*, 1912; *The Wheelwright's Shop*, Cambridge, 1923

- Bell, A. *Corduroy*, 1930; *Silver Ley*, 1931; *Cherry Tree*, 1932
- Bell, A. *The Open Air*, 1936
- Blythe, R. *Akenfield*, 1969
- Carpenter, E. *Towards Democracy*, 1885; *Civilication, its Cause and Cure*, 1889
- Christie, A. *The Body in the Library*, 1942
- Drinkwater, J. *Collected Poems*, 1923
- Eliot, T. S. *Collected Poems*, 1936;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 1939; *Four Quartets*, 1944;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1948
- Evans, G. E. *The Pattern under the Plough*, 1966
- Forster, E. M. *The Longest Journey*, 1907; *Howard's End*, 1910; *A Passage to India*, 1924
- Gibbon, L. G. A. *Scots Quair*, 1950
- Gibbons, S. *Cold Comfort Farm*, 1938
- Grahame, K.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1908
- Giknem G. *The Lonely Plough*, 1914
- Hudson, W. H. *A Shepherd's Life*, 1910; *Far Away and Long Ago*, 1918
- James, H. *Portrait of a Lady*, 1881; *The Spoils of Poynton*, 1897; *The Golden Bowl*, 1904
- Joyce, J. *Dubliners*, 1914;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1916; *Ulysses*, 1922. *Finnegans Wake*, 1939
- Kitchen, F. *Brother to the Ox*, 1939
- Lawrence, D. H. *Sons and Lovers*, 1913; *The Rainbow*, 1915; *Women in Love*, 1921; *Lady Chatterley's Lover*, (1961); *Phoenix*, 1936; *Phoenix II*, 1968
- Marsh, E. *Georgian Poetry*, 1911—1922
- Martin, E. W. *The Secret People*, 1954
- Massingham, H. *The English Countryman*, 1942
- Meredith, G. *The Ordeal of Richard Feverel*, 1859; *Rhoda Fleming*, 1865; *Poems and Lyrics of the Joy of Earth*, 1883; *A Reading of Earth*, 1888

- Phillpotts, E. *Dartmoor Omnibus*, 1933
- Powys, J. G. *A Glastonbury Romance*, 1933
- Powys, T. F. *Fables*, 1929; *Mr. Weston's Good Wine*, 1927
- Sayers, D. L. *The Nine Tailors*, 1934
- Scott, J. R. *The Countryman Book*, 1948
- Thomas, E. *Collected Poems*, 1936
- Thompson, F. *Lark Rise to Candleford*, 1945
- Tolkien, J. R. *Lord of the Rings*, 1966
- White, T. H. *The Sword in the Stone*, 1938
- Williamson, H. *Collected Nature Stories*, 1970
- 327 Woolf, V. *Mrs Dalloway*, 1925; *To the Lighthouse*, 1927; *Orlando*, 1929;
The Waves, 1931; *Between the Acts*, 1941
- Young, F. B. *Mr Lucton's Freedom*, 1969
- Clarke, A. C. *The City and the Stars*, 1957
- Han Suyin *And the Rain my Drink*, 1956
- Huxley, A. *Brave New World*, 1932
- Knight, D. *Cities of Wonder*, 1970
- Orwell, G.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3; *Burmese Days*, 1934;
A Clergyman's Daughter, 1935; *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 1936; *The Road to Wigan Pier*, 1937; *Coming up for Air*, 1939; *Animal Farm*, 1945; *Nineteen Eighty-Four*, 1949;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1969
- Tressall, R. *The Ragged Trousered Philanthropists*, 1927
- Achebe, C. *Things Fall Apart*, 1958; *Arrow of God*, 1964; *No Longer at Ease*, 1960; *Man of the People*, 1966
- Amadi, E. *The Concubine*, 1966
- Anand, M. R. *Two leaves and a Bud*, 1937; *The Village*, 1939
- Cary, J. *Aissa Saved*, 1932; *The African Witch*, 1936; *Mister Johnson*, 1939
- Harris, W. *The Far Journey of Oudin*, 1961
- Kemal, Y. *The Wind from the Plain*, 1964; *Anatolian Tales*, 1968

- Lamming, G. *In the Castle of My Skin*, 1953
- Mphahlele, E. *Man Must Live*, Cape Town, 1946
- Narayan, R. K. *Swami and Friends*, 1935
- Ngugi, J. *Weep not, Child*, 1964; *A Grain of Wheat*, 1967; *The River Between*, 1965
- Nwankwo, N. *Danda*, 1964
- Reid, V. S. *New Day*, 1950

B: HISTORY AND RELATED STUDIES

- Archenholz, J. W. von *A Picture of England*, Dublin, 1790
- Ashley, M. R. *Joseph Ashley of Tysoe*, 1961
- Bennett, H. S. *Life on the English Manor, 1150 – 1400*, 1937
- Bloch, M. *La Societe Feodale*, Paris, 1940
- Briggs, A. *Victorian Cities*, 1963
- Beresford, M. W. *New Towns of the Middle Ages*, 1967
- Bonser, K. J. *The Drovers*, 1970
- Booth, C.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 1889—1903
- Caird, J. *English Agriculture in 1850—1851*, 1852; *The British Land Question*, 1881
- Chambers, J. D. and Mingay, G. E.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1750—1880*, 1966
- Clapham, J. H.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Cambridge, 1927
- Coulton, G. C. *Social Life in Britain from the Conquest to the Reformation*, 1918
- Deane, P. M. and Cole, W. A.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Cambridge, 1962
- Defries, A. *Sheep and Turnips, bei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Arthur Rounq*, 1938
- Dickinson, R. E. *The West European City*, 1951

- Dobb, M. H.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1946
- Engels, 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1844*, 1892
- Fairbrother, N. *New Lives, New Landscapes*, 1970
- Fussell, G. E. *Village Life in the 18th Century*, 1948; *The English Rural Labourer*, 1949
- Fussell, G. E. and K. R. *The English Countryman*, 1955
- Hammond, J. L. and B. *The Village Labourer*, 1911; *The Skilled Labourer*, 1919
- Hasbach, W.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Agricultural Labourer*, 1908
- 328 Handlin, O. and Burchard, J. *The Historian and the City*, Cambridge, Mass., 1966
- Hobsbawm, E. J. *The Age of Revolution*, 1962; *Industry and Empire*, 1968
- Hobsbawm, E. J. and Rude, G. *Captain Swing*, 1969
- Habakkuk, H. J. *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19th Century*, 1962
- Harden, D. B. *Dark Age England*, 1956
- Hoskins, W. G.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1957
- Howitt, W. *The Rural Life of England*, 1838
- Jones, E. *Towns and Cities*, 1966
- Marshall, W. *Rural Economy*, 1787—1798
- Marx, K. *Capital*, 1887
- Mayhew, H.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1861
- Minchinton, W. E., ed., *Essays in Agrarian History*, 2 vols, Newton Abbot, 1968
- Migay, G. E.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18th Century*, 1963
- Mumford, L. *The Culture of Cities*, 1938; *Technics and Civilisation*, 1938
- Orwin, C. S. and Whetham, E. H. *History of British Agriculture, 1846—1914*, 1964
- Peacock, A. J. *Bread or Blood*, 1965
- Pirenne, N. *Medieval Cities*, New York, 1925

- Prothero, R. (Ernle) *English Farming Past and Present*, 6th edn., rev.
Hall, D., and introd. Fussell, G. E. and McGregor, O. R., 1961
- Rosenau, H. *The Ideal City* 1959
- Rubinstein, S. *Historians of London*, 1968
- Saville, J. *Rural Depopula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1851—1951, 1957
- Sheppard, F. *London, 1808—1870; the infernal men*, 1971
- Slater, G. *The English Peasantry and the Enclosure of Common Fields*, 1907
- Tawney, R. H.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16th Century*, 1912
- Thirsk, J.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IV, 1967
- Thompson, E. 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
- Thompson, F. M. L.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19th Century*, 1963
- Trent, C. *Greater London*, 1965
- Vaughan, R. *The Age of Great Cities*, 1848
- Vinogradoff, P. *Villeinage in England*, 1968
- Voltaire, *Oeuvres*, Vol. X, Paris, 1877
- Whitelock, D. *The Beginnings of English Society*, 1963
- Young, A. *A Farmer's Letters to the People of England*, 1768; *Annals of Agriculture*, Contrib. .

C; STUDIES OF LITERATURE, ART AND IDEAS

- Arnold, M. *Culture and Anarchy*, 1869
- Barrell, J. *The Idea of Landscape and the Sense of Place*, 1972
- Burckhardt, J. *The Civilis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tr. Middlemore, 1929
- Congleton, J. E. *Theories of Pastoral Poetry in England*, 1684—1798, 1952
- Cooper, E. H. *The Medieval Background of English Renaissance Pastoral Literature*, Ph.D. thesis, Cambridge, 1972
- Duckworth, A. M.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state*, 1972

- Empson, W. *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 1935
- Hibbard, G. H. *Journal of the Warburg Institute*, XIX, 1 – 2 (1954)
- Hill, C.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1958
- Hopkins, A. B. *Elizabeth Gaskell; her life and work*, 1952
- Hussey, C. *The Picturesque: studies in a point of view*, 1927
- Leavis, F. R. *The Great Tradition*, 1948
- Leavis, F. R. and Thompson, D.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1933
- Knights, L. C. *Drama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Jonson*, 1937
- Leavis, Q. D. *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 1932
- Lindsay, J. *George Meredith*, 1956
- Mack, M. *The Garden and the City*, London, 1969
- Malins, E. *English Landscaping and Literature*, 1966
- Rostvig, M – S. *The Happy Man*; 2 vols, Oslo, 1954 and 1958
- Smith G. *Dickens, Money and Society*; Berkeley, 1968
- Unwin, R. *The Rural Muse*, 1954
- Welsh, A. *The City of Dickens*, 1971
- Wilkinson, L. P. *The Georgics of Virgil*, 1969
- Williams, M. *Thomas Hardy and Rural England*, 1972

索引

Abercrombie, L. ,

Abernethy, R. ,

Achebe, C. ,

Adam Bede ,

Addison, J. ,

Aeneas Sylvius ,

After London ,

Akenfield ,

Alamanni ,

Aldiss, B. ,

Alton Locke ,

Amadi, E. ,

Aminta ,

Anand, M. R. ,

Andersen, H. C. ,

Anna Karenina ,

Annals of Agriculture ,

Appleton House, Upon ,

Arcadia (Sannazzaro) ,

Arcadia (Sidney) ,

Arch, J. ,

Archenholz, J. ,

艾伯克朗比 254

罗伯特·阿伯纳西 277

阿切比 285—286

《亚当·比德》167, 172, 173, 177,

253

艾迪生 127, 203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 121

《伦敦之后》235

《阿肯菲尔德》261

阿勒曼 20

阿尔迪斯 276

《奥尔顿·洛克》219, 281

阿马迪 285

《阿明达》20

安纳德 285

安德森 228

《安娜·卡列尼娜》203

《农业编年史》62, 119

阿普敦庄园 55—57, 123

《阿卡迪亚》(桑纳扎罗) 20

《阿卡迪亚》(西德尼) 22, 76

阿奇 105, 190—191, 196

阿兴霍尔茨 221, 228

331

- Arnold, M. , 阿诺德 105, 117
- Ashby, J. , 约瑟夫·艾什比 191, 196
- Ashby, M. K. , 阿什比 103—104, 197
- Austen, J. , 奥斯丁 108, 112—119, 124, 166, 167, 225, 249
- Autobiography of a Working Man* , 《一个劳工的自传》189
- Ballard, J. G. , J. G. 巴拉德 276
- Balzac, H. , 巴尔扎克, H. , 234
- Barnes, W. , 巴恩斯 226
- Barrie, J. M. , Barrie 285
- Bastard, T. , 巴斯塔德 11
- Bathurst, Epistle to* , 《致巴瑟斯特》58—59
- Baudelaire, C. , 波德莱尔 234
- Beggar's Opera, The* , 《乞丐的歌剧》144
- Bell, A. , 阿德里安·贝尔 261
- Besant, W. , 沃尔特·贝赞特 221
- Bewick, T. , 托马斯·毕威克 10
- Blake, W. , 布莱克 79, 148—149, 150, 154, 159, 233, 235
- Blish, J. , 詹姆斯·布利什 277
- Bloomfield, R. , 罗伯特·布鲁菲尔德 134—136
- Blythe, R. , 罗纳德·布莱斯 261
- Boccaccio, G. , 波利齐亚诺 20
- Booth, C. , 查尔斯·布斯 221—222
- Booth, W. , 威廉·布斯 221
- Border Country* , 《边境乡村》298—299
- Born in Exile* , 《注定流浪》225
- Borrow, G. , 博洛 255

- Bourne, G. (see Sturt, G.)
Brave New World,
 Breton, N. ,
 Brett Young, F. ,
 Brontë, E. ,
Brother to the Ox,
 Brown (Capability) ,
 Bunyan, J. ,
 Burckhardt, J. ,
Burlington, Epistle to,

 Carew, T. ,
 Carlyle, T. ,
 Carpenter, E. ,
 Cary, J. ,
Castle of Indolence,
Change in the Village,
 Chapman, G. ,
Chrestoleros,
 Christie, A. ,
 ‘ City ’ ,
City Madam, The,
City of Dreadful Night, The,
Cities of Wonder,
Clandestine Marriage,
 Clare, J. ,

Clarissa,
 Clarke, A. ,

 乔治·勃恩 261
 《美丽新世界》 274
 尼古拉斯·布雷顿 22
 弗兰西斯·布莱特—杨格 253
 艾米莉·勃朗特 176
 《公牛的兄弟》 262—263
 布朗(“农民”) 122, 124
 班扬 6
 布克哈特 121
 《致伯林顿》 55

 托马斯·卡鲁 27—34, 40, 59, 94
 卡莱尔 215, 231
 爱德华·卡朋特 256
 乔伊斯·卡里 281, 285
 《懒惰之堡》 69
 《村庄里的变化》 261
 查普曼 42
 《格言七书》 11
 阿加莎·克里斯蒂 249
 “城市” 1
 《城市夫人》 11
 《暗夜之城》 235—239, 273
 《奇迹之城》 276—277
 《秘密婚姻》 125
 约翰·克莱尔 10, 99, 119, 132—
 141, 196, 248, 254
 《克拉丽莎》 61, 64—65
 亚瑟·C·克拉克 276

- Claude (Lorrain) , 克劳德 124
- Cobbett, W. , 科贝特 7, 10, 62, 91, 99, 108—113, 117—119, 145, 146, 196, 220, 255
- Cold Comfort Farm* , 《寒冷舒适的农庄》 253
- Coleridge, S. T. , 柯勒律治 19, 117, 126, 18, 132, 215
- Collier, M. , 克莱尔 134
- Collins, W. , 威尔基·科林斯 227
- Coltivazione, La* , 《培育》 20
- Coming up for Air* , 《起风》 227
- Communist Manifesto* , 《共产党宣言》 36, 303
- Compton-Burnett, I. , 艾薇·康普顿-伯内特夫人 249
- Conan Doyle, A. , 柯南·道尔 229, 249
-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1844 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214—215
- Congreve, W. , 威廉·康格里夫 53
- Coningsby* , 《柯宁兹比》 219
- Conrad, J. , 康拉德 281
- Cotton, C. , 查尔斯·科顿 24, 123, 124
- ‘Country’ , 乡村 1
- Country Justice, The* , 《乡村正义》 79—82
- Countryman, The* , 262
- Countryman Book, The* , 《乡村人全书》 262
- Cowley, A. , 亚伯拉罕·考利 24, 26, 27
- Cowper, W. , 柯珀 71—72, 99, 126
- Crabbe, G. , 克雷布 10, 13, 18, 19, 20, 21, 26, 86, 87, 90—95, 96, 99, 109, 112, 141, 166, 172
- Crole, R. , 罗伯特·克罗尔 49
- Culture and Anarchy* , 《文化和无政府主义》 105

-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Society,
 Cunningham, A. ,
Cyder,

Daniel Deronda,

 Darwin, C. ,
 Defoe, D. ,
Demos,
Deserted Village, The,
Devil is An Ass, The,
 Dickens, C. ,

 Disraeli, B. ,
Doctor Thorne,
 Dodsley, R. ,
Dombey and Son,
Doom of a City, The,
Dorsetshire Labourer, The,
 Dostoevsky, F. ,
 Drayton, M. ,
 Drinkwater, J. ,
 Duck, S. ,
 Dyer, J. ,

Eclogues,
 Egan, P. ,
- 《文化与环境》9
 《文化与社会》201
 艾德里安·坎宁安 30
 《苹果汁》69

 《丹尼尔·德隆达》175—177, 181, 248
 查尔斯·达尔文 202, 205
 丹尼尔·迪福 6, 7, 62, 144, 146, 203
 《狄摩士》222—224
 《荒村》10, 74—79, 102
 《魔鬼是只驴子》49
 查尔斯·狄更斯 153—164, 217, 219, 220, 222, 225, 227, 233, 234, 235
 迪斯雷利 219
 《索恩医生》174—175
 罗伯特·道德斯雷 134
 《董贝父子》155—164, 233
 《城市末日》235—237, 273
 《多赛特郡劳工》207
 陀思妥耶夫斯基 234
 迈克·德雷顿 23
 约翰·德林瓦特 255
 斯蒂芬·达克 32, 87—90, 100, 134
 戴尔 69, 125

 《牧歌》16—18
 皮尔斯·伊根 217

-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墓园挽歌》72,74
- Eliot, G. , 乔治·艾略特 9,117,166—181, 198,217,225,248,250,253,264, 282,299
- Eliot, T. S. , T. S. 艾略特 84,239—241,242
- Emma*, 《爱玛》114,116
- Engels, F. , 恩格斯 215—216,231,303
- English Countryman, The*, 《英国乡村人》261
- Etherege, G. , 乔治·埃思里奇 52
- Evans, G. E. , 乔治·依华特·伊万斯 9,261
- Evelyn, J. , 约翰·伊夫林 128
- Falconer, W. , 威廉·费尔科纳 134
- Fanshawe, R. , 范肖 27
- Far away and Long Ago*, 《很久以前在很远的地方》254
-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远离尘嚣》209
- Felix Holt*, 《费利克斯·霍尔特》
- Fielding, H. , 菲尔丁 61,68,86,116,144,145,203
- Finnegans Wake*, 《芬尼根守灵夜》245—246
- Fleece, The*, 《羊毛》69
- Fontenelle, B. , 封特内尔 19
- Forster, E. M. , 福斯特 254,277,285
- Garden The*, 31—32
- Gaskell, E. ,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 219,233,243, 281
- Gay, T. , 约翰·盖伊 144
- Georgian Anthology*, 《乔治王朝时代诗选》258
- Georgics*, 《牧歌》17,20,42,43

- Gibbon, L. G. , 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 264, 268—271
- Gilpin, W. , 威廉·吉尔品 128, 255
- Gissing, G. , 吉辛 78, 222—225, 227, 231, 232, 235, 240, 241, 274, 275
- Goldsmith, O. , 哥德尔斯密斯 10, 68, 70, 74—79, 87, 92, 99, 102, 112, 127, 137, 141
- Grahame, K. , 肯尼思·格雷厄姆 258
- Gratitude, A Pastoral* , 《感激, 一首田园诗》89
- Gray, T. , 格雷 72, 74, 128
- Great Expectations* , 《远大前程》156, 281
- Great Society, The, 《大社团》42—43
- Green, M. , 马修·格林 26
- Greenwood, J. , 詹姆斯·格林伍德 221
- Habakkuk, J. , 哈巴库克 116 333
- Hall, J. , 约翰·霍尔 24
- Han, Suyin, 韩素音 286
- Hard Times* , 《艰难时世》153
- Hardy, T. , 哈代 5, 9, 166, 170, 171, 173, 181, 196, 197—214, 215, 216, 217, 224, 232, 248, 250, 253, 264, 286, 299
- Harris, W. , 威尔逊·哈里斯 285
- Heart of England, The* , 《英格兰之心》255
- Helpstone* , 《海尔波斯通》137—138
- Herrick, R. , 赫里克 33—34, 72—73
- Hesiod, 赫西俄德 14, 15, 17, 18, 21, 42
- Hobbema, M. , 22
- Hobsbawm, E. J. , 182

- Hock-Cart, The*,
Hodge and his Masters,
 Hogarth, W. ,
 Hollingshead, J. ,
 Holme, C. ,
 Horace,
 Hoskins, W. G. ,
 Hudson, W. H. ,
 Huxley, A. ,

Idylls,
 Innocent III ,

 Jacobean comedy,
 James, H. ,

 Jefferies, R. ,

 Jenner, C. ,
 Jerrold, D. ,
 Johnson, S. ,
 Jonson, B. ,

 Joyce, J. ,
Joys of Childhood,
Jude the Obscure,
 Juvenal,

 Kaye-Smith, S. ,
- 《典当手推车》33—34,73,87
 《霍奇和他的主人》192—194
 贺加斯 144
 约翰·霍林谢德 221
 康斯坦斯·霍尔姆 254
 贺拉斯 18,25
 W. G. 霍斯金斯 102
 W. H. 哈德森 254
 赫胥黎 274

 《田园诗》14—15
 英诺森三世 11

 詹姆士一世喜剧 11,51,61
 亨利·詹姆斯 181,199,248—249,
 282
 理查德·杰弗里斯 9,191—196,
 235,255
 查尔斯·詹纳 142
 杰罗尔德 218
 约翰逊 13,128
 琼森 27—34,40,41,48,49,59,72,
 94,125,129,141,144,166
 乔伊斯 242—246
 《童年的快乐》139
 《无名的裘德》197,198,201,203
 尤维纳利斯 46—48,144

 凯耶-史密斯 253

- Kemal, Y. , 雅沙尔·凯默尔 285
 Kent, N. , 肯特 122, 124
 Kingsley, C. , 金斯利 219
 Kipling, R. , 吉卜林 226, 281, 285
 Kitchen, F. , 弗莱德·基钦 262—263
 Knight, D. , 达蒙·奈特 276

Lady Chatterley's Lover ,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268
 Lamb, C. , 兰姆 141
 Lamming, G. , 乔治·拉明 288
 'Land' , “土地” 1
 Lang, F. , 朗 274
 Langhorne, J. , 兰霍恩 79—82, 83, 84, 85, 87, 90, 141

 Langland, W. , 朗格兰 11, 44
Lark Rise to Candleford , 《雀起乡到烛镇》 261
 Lawrence, D. H. , 劳伦斯 170, 171, 194, 196, 198, 213, 251, 252, 264—268, 270—271, 299

 Le Gallienne, R. , 勒·伽利安纳 228
 Leavis, F. R. , 列维斯 9, 108, 199, 259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 , 《伦敦人民的生活与劳动》 221—222
Life in London , 《伦敦生活》 217
Little Dorrit , 《小杜丽》 156—157, 160
Lizerunt , 《莉兹伦特》 225—226
Lob , 《罗普》 257—259
London , 《伦敦》 148—149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 《伦敦的劳工和穷人》 218, 221—222
London Merchant, The , 《伦敦商人》 144
Lonely Plough, The , 《孤独的犁》 254

Lovelace, R. ,	理查德·洛夫莱斯 25
<i>Love's Labour's Lost</i> ,	《空爱一场》23
Lucretius ,	卢克莱修 42
Luxemburg, R. ,	卢森堡 30
Mandeville, B. ,	曼德维尔 135
<i>Mansfield Park</i> ,	《曼斯菲尔徳庄园》113,116,124
Marlowe, C. ,	马洛 23
Marshall, W. ,	威廉·马歇尔 62
Marvell, A. ,	马韦尔 31,55—59,71,123
Marx, K. ,	马克思 37,216,303
<i>Mary Barton</i> ,	《玛丽·巴顿》219,233,281
Massinger, P. ,	菲利普·马辛杰 11,51
Massingham, H. ,	麦辛汉姆 261
Maugham, W. S. ,	毛姆 199,250,281
Mayhew, A. ,	奥古斯都·梅修 218,224
Mayhew, H. ,	亨利·梅修 218,226
<i>Mayor of Casterbridge, The</i> ,	209
Mercier, L. S. ,	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 272
Meredith, G. ,	梅瑞狄斯 248,250—252,254
<i>Metropolis</i> ,	《大都会》274
<i>Michael</i> ,	《迈克尔》130
<i>Middlemarch</i> ,	《米德尔马契》174
Middleton, T. ,	米德尔顿 51
Mill, J. S. ,	穆勒 202,205
<i>Mill on the Floss, The</i> ,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9,168,172, 173
Miller, W. M. ,	沃尔特·M.米勒 276
Milton, J. ,	弥尔顿 27,123

- Mingay, G. E. ,
Moll Flanders ,
 More, T. ,
 Morris, W. ,
 Morrison, A. ,
 Moschus ,
 Mphahlele, E. ,
Mr Lucton's Freedom ,
- Narayan, R. K. ,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The ,
Nether World, The ,
 Nevinson, H. ,
New Grub Streel ,
New Numbers ,
New Way to Pay Old Debts, A ,
News from Nowhere ,
 Ngugi, J. ,
Nineteen Eighty-Four ,
Northanger Abbey ,
 Nwankwo, N. ,
- Old Cumberland Beggar, The* ,
 Orwell, G. ,
Our Mutual Friend ,
- Pall Mall Gazette* ,
Pamela ,
Pastoral Poesy ,
- G. E. 明格 97
 茉儿·弗兰德斯 62,144
 托马斯·莫尔 11,43—45,49
 威廉·莫里斯 196,268,272—274
 亚瑟·莫里森 221,225—227
 摩斯科斯 14
 伊奇基尔·慕帕赫列列 286
 《拉克顿先生的自由》253
- R. K. 纳拉扬 285
 《塞尔伯恩自然史》118—119
 《新世界》222—224
 亨利·奈文森 226
 《新寒士街》224,232
 《新数字》256—257
 《偿还旧债的新办法》11,51
 《乌有乡消息》268,272—273
 詹姆斯·恩古吉 285—286
 《1984》274—275
 《诺桑觉寺》115
 恩坎姆·恩万科 288
- 《坎伯兰的老乞丐》130—131
 奥威尔 78,274—275,281,282,285
 《我们共同的朋友》156,220
- 《蓓尔美尔街公报》221
 《帕梅拉》64
 《田园诗》132

- Peacock, T. L. , 皮科克 125
- Penshurst, To* , 《致潘舍斯特》27—34, 40, 49, 55, 81, 87, 125
- Persuasion* , 《劝导》114, 116
- Petrarch, 彼特拉克 121
- Philips, A. , 菲利普斯 69
- Pirenne, N. , 皮雷纳 48
- Politian, A. , 波利希安 20
- Pomfret, J. , 庞姆弗瑞特 25
- Pope, A. , 蒲柏 19, 21, 25, 55, 58—59, 61, 123, 144
- Poussin, N. , 普桑 124
- Powys, J. C. , J. C. 波厄斯 258
- Powys, T. F. , T. F. 波厄斯 252—253
- Prelude, The* , 《序曲》128—133, 149—151, 215, 233
- Pride and Prejudice* , 《傲慢与偏见》114
- Primrose Gold in Our Villages* , 《我们村里的樱草金》196
- Pugh, E. , 埃德温·普 226
- Puttenham, G. , 普坦汉姆 21
- Quintilian, 昆体良 46
- Rainbow, The* , 《虹》264—266, 270
- Raleigh, W. , 罗利 23
- Rapin, R. , 拉辛 19
- Reid, V. S. , V. S. 雷德 288
- Repton, H. , 拉普顿 122, 124
- Restoration Comedy, 复辟时代的喜剧 52—54, 61

- Return of the Native, The*, 《还乡》201, 203, 224
 Reynolds, G. W. M., 雷诺兹 224
 Richardson, S., 理查逊 61, 68, 116
Richmond Park and Royal Gardens, On, 《里奇蒙庄园, 和皇家花园》89
Robinson Crusoe, 《鲁滨逊漂流记》62
 Rook, C., 鲁克 227
 Rowntree, S., 罗恩特里 222
 Rudé, G., 鲁德 114, 182
Rural Elegance, 《乡村优雅》73—74
Rural Rides, 《乡村漫游》91, 108—113
Rusticus, 《农事诗集》20
 Rutherford, M., 马克·拉瑟福德 225
 Ruttner, H., 亨利·拉特纳 277
 Ruysdael, S. van 雷斯达尔 122

 Sannazzaro, J., 桑纳扎罗 20
Saxham, To, 《致萨克斯海姆》27—34, 40, 55, 81, 183

 Sayers, D. L., 多萝西·塞耶斯 249
School Mistress, The, 《女教师》72
Scots Quair, A, A Scots Quair(译文中未找到对应翻译) 268—271

 Scott, W., 司各特 203
Seasons, The, 《四季》68—71, 134, 142—143
Second Generation, 《第二代》299
Secunda Pastorum, 《第二部牧羊人剧》23
Sense and Sensibility, 《理智与情感》114
 Sharp, C., 西塞尔·夏普 258
 Shelley, P. B., 雪莱 79

- Shenstone, W. , 申斯通 72, 73—74, 134, 141
- Shepherd's Calendar, The*(Clare) , 《牧羊人日历》克莱尔 136 335
- Shepherd's Calendar, The*(Spenser) , 《牧人月历》斯宾塞 22
- Shepherd's Life, A* , 《牧羊人的生活》254
- Sims, G. , 乔治·西姆斯 221
- Smith, A. , 亚当·斯密 144
- Somerville, A. , 亚历山大·萨默维尔 189, 281
- Sons and Lovers* , 《儿子与情人》264, 265
- Sorley, C. , 查尔斯·索雷 251
- Southey, R. , 骚塞 215
- Spenser, E. , 斯宾塞 22, 42, 74
- Stalin, J. , 斯大林 302
- Stevenson, R. L. , 史蒂文森 255
- Stuart, D. A. , 唐·A. 斯图尔特 276
- Sturt, (Bourne) , G. , 乔治·伯恩 9, 256, 261
- Swift, J. , 斯威夫特 144
- 'Swing, Captain,' 斯汶上尉 104, 111
- Sybil* , 《席璧珥》219
- Tasso, T. , 塔索 20
- Tate, N. , 内厄姆·泰特 25
- Tatarsal, R. , 罗伯特·泰特索尔 134
- Tess of the D' Urbervilles* , 《苔丝》173, 197, 203, 204—207, 208—209, 211—212, 253
- Thanksgiving, A* , 《感恩祈祷》72—73
- Theocritus, 忒奥克里托斯 14, 15, 16—18, 134
- Things Fall Apart* , 《崩溃》285—286
- Thomas, E. , 爱德华·托马斯 255—256
- Thompson, D. , 汤普森 9

- Thompson, F. ,
 Thompson, F. M. C. ,
 Thomson, J. ,

 Thomson, J. ,

Thoughts on the Labour Question ,
Thresher's Labour, The ,
Time Machine, The ,
 Tolkien, J. R. ,
 Tolstoy, L. ,
Tom Jones ,
Tono-Bungay ,
Tour of England and Wales ,
Town Eclogues ,
Trick to Catch the Old One, A ,
 Trollope, A. ,
 Trotsky, L. ,

Ulysses ,
Unclassed, The ,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
Utopia ,

 Vanbrugh, J. ,
 Vaughan, R. ,
Village, The ,
 弗洛拉·汤普森 261
 F. M. L. 汤普森 186
 汤姆森 55 (1700—1748) 55, 68—
 71, 77, 125, 127, 129, 133, 134, 141,
 142—143
 詹姆斯·汤普森 (1834—1882)
 235—239, 240—241, 273, 275—
 276
 《对劳工问题的思考》195
 《打谷者的劳作》88
 《时间机器》(1899) 273—274
 托尔金 258
 托尔斯泰 203
 《琼斯传》61—64
 《托诺—邦盖》229—230, 232
 《大不列颠全岛漫游》7, 62
 《秋季》142
 《妙计捉鬼》51
 特罗洛普 174—175
 托洛茨基 302

 尤利西斯 242—245
 《不入流者》225
 《绿荫下》203
 《乌托邦》11, 43—45

 约翰·范布勒 52
 沃恩 217
 《荒村》10, 13, 90—95, 172

- Village Minstrel, The*, 《乡村吟游诗人》136—137
- Virgil, 维吉尔 9, 13, 14, 16—18, 20, 21, 27, 42, 261
- Volpone*, 沃尔波内 41
- Voltaire, F., 伏尔泰 144
- Waste Land, The*, 荒原 239
- Waugh, E., 伊芙琳·沃 249
- Webb, B. and S., 韦伯斯 222
- Webb, M., 玛丽·韦伯 253
- Wells, H. G., H. G. 威尔斯 5, 225, 227, 229—230, 232, 234, 235, 272—274, 276
- Wheelwright's Shop, The*, 《车匠铺子》261
- Whistler at the Plough, The*, 《犁边吹口哨的人》189—190
- White, G., 吉尔伯特·怀特 108, 118—119, 133
- White, T. H., T. H. 怀特 258
- Williams, A., 阿尔弗雷德·威廉姆斯 262
- Wiltshire; Labourer, The*, 《多赛特郡劳工》207
- Wind from the Plain, The*, 《平原来风》285
- Women in Love*, 《恋爱中的女人》268
- Woodhouse, J., 詹姆斯·伍德豪斯 134
- Woodlanders, The*, 《森林之恋》201, 203, 209—210, 212—213
- Woolf, V., 弗吉尼亚·伍尔夫 241—242
- Wordsworth, W., 华兹华斯 5, 79, 119, 127, 128—133, 149—152, 154, 159, 215, 216, 232, 233, 234, 250—251, 252
- Works and Days*, 《工作与时日》14
- Wroth, Sir Robert, To*, 《致罗伯特·罗斯爵士》27—28,

Wuthering Heights,
Wycherley, W. ,

rardley Oak,
Yearsley, A.,
Young, A.,

31, 72

《呼啸山庄》 176, 253, 281

费德里亚 53

《白杨树》 71—72

安·伊尔斯利 134

阿瑟·扬 7, 62, 66—67, 68, 91, 96,

99, 108, 119, 146



三
辉
图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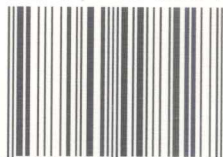
雷蒙·威廉斯通过梳理英国文学中有关乡村与城市的种种论断和描述，对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中一些错误的乡村观念和城市观念进行剖析，集中驳斥了部分学者所坚持的“消逝的农村经济”、“快乐的英格兰”、“黄金时代”等缅怀旧日农村的观念。无论历史事实还是部分作家的作品，都显示出昔日的英国乡村充满了苦难。相对于城市而言，乡村既不同于落后和愚昧，也不是充满欢乐的故园；同理，城市虽然在新的生产方式确立后兴盛起来，但并不必然代表了进步，城市也面临太多的问题。

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城市与乡村的这种矛盾与张力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遇到的一场全面而严重的危机，要化解这场不断加深的危机，人类必须抵抗资本主义。



上架建议：文化研究 文学评论

ISBN 978-7-100-09842-7



9 787100 098427

定价：58.00 元